

编 辑 说 明

一、为满足中共党史、革命史及中国现代史研究和党政领导工作查考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为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收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有时称中共西北中央局）1941年至1945年形成的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收入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历史原貌，根据编辑要求，仅对明显的错别字、衍文、漏字作了订正；改正的错别字以“〔〕”标明；新增的字用“〈〉”标明；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或原件所缺之字，以“□”代替。文中部分标点是编者加工的。

四、由编者拟定或改正的标题、副标题加“*”号标明。标题中简称“西北局”。

五、文集中的文件均按其形成的时间顺序排列。对于未标明月份或日期的文件，除考订的排在相应位置外，其他排在当年或当月之后。

六、由于缺乏经验，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缺点或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日)	(1)
西北局关于各单位不得私自卖存粮的紧急通知 (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	(3)
西北局关于检查总结两年来“三三制”政策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	(4)
西北局关于进一步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减租斗争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	(8)
西北局关于统销食盐问题的补充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14)
高岗关于加强回汉民族团结做好回民工作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	(15)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绥德地委人员的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2)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陇东地委人员的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3)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张鹏图、惠庆祺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4)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吴志渊等人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5)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李瑞山调动，王治舟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6)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刘秉温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7)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政府系统干部配备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8)

西北局关于加强与整理各县警卫队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30)

西北局关于贯彻统一领导及保证党对财经部门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初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32)

西北局关于整训自卫军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38)

西北局办公厅座谈会纪要

——关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筹备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2)

西北局办公厅座谈会纪要

——关于保管与检查秘密文件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5)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给边区政府党团的通知 ——发动边区群众做十万双鞋慰劳部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47)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边府党团人员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48)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成立边区一级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49)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关中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50)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延属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51)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三边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52)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绥德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53)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陇东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54)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公文处理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55)
西北局关于反奸问题致各地委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58)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给边区政府党团的通知	
——马义等人任职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62)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关于人事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63)
西北局社会部审讯工作基本条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4)
西北局党校教育计划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69)
西北局关于边区九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76)
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审干工作的提纲	
(一九四三年)	(84)
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执行审查干部政策的简要总结	
(一九四三年)	(85)
西北局关于精简工作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	(87)
西北局社会部关于逮捕反革命人犯的规定	
(一九四三年)	(107)
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农村党员、支部、区委情况调查提纲	
(一九四三年)	(110)

附录

西北局关于运输队工作的调研材料

(一九四三年八月) (114)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减租斗争的调查材料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134)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

西北局行政处一九四四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 (290)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减租运动中的两个不同典型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306)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山西兴县水磨滩减租运动的调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334)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山西兴县蔡家崖减租斗争的调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343)

西北局组织部召集部队劳动英雄第一次座谈会记录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 (355)

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的政策

——南泥湾全部工作的发展

(一九四三年) (384)

关于手工业作坊几点经验总结

(一九四三年) (398)

关于开设皮坊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 (402)

关于开设杀坊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	(418)
关于开设磨坊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	(431)
关于豆腐坊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	(443)
西北局机关人员生产总结	
(一九四三年)	(453)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陕甘宁边区土地和减租问题的研究	
(一九四三年)	(476)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 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根据西北局保委会条例决定，物价涨到一倍时保健费可以酌情增加。按现在物价情形，党、政、民、学系统的保健费暂依猪肉为标准重行规定如下：

1. 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
2. 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
3. 县书、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
4. 相当于二、三两条之老干部以及学校校长、群众团体主任亦按照二、三两条标准发给。
5. 根据此标准和西北局保委规定的名单，各分区及延安机关学校保委会可按照本机关干部实际情况，予以增加或减少，保健费如有不足，由各机关自行解决。
6. 临时保健费从九月份起一律不发给，各机关临时病员及其要临时保健者，由各机关自己负责解决之。

7. 猪肉按财厅规定价格每斤二百元标准折钱发给。
此决定从九月份起即实行。

西北局保委会

西北局关于各单位 不得私自卖存粮的紧急通知*

(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①

近查某些机关、学校、部队有私自出卖存粮者。现特规定：无论是自耕粮及节省粮，均不得私自出卖。目前应把存粮储蓄，以待适当处理（处理办法，以后将另有通知）。

西北局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关于检查总结 两年来“三三制”政策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①

自二届参议会的选举，边区“三三制”政策的实行已及两年，亟须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此政策作全面的检查与总结，以便更好的贯彻这个政策。各分区各县的检查由各地委负完全责任，切实进行。兹附来检查大纲作为参考，各分区依具体情形给以补充。自接到通知之日，即布置进行检查，如期完成。

西北局

附：

关于检查两年来“三三制”政策的大纲

第一部分：“三三制”的成份

- 一、边区参议员、县参议员、乡参议员的成份；
- 二、县政府委员会、乡政府委员会的成份；
- 三、区长、乡长、行政村长、自然村长的成份；

① 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四、专署、县府、区署工作干部的成份。

上列各项之成份，指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混入的反动分子或特务分子而言，须查清各占若干，其中无党无派和有党有派的党外人士亦须区别清楚。

五、其有各级参议员或政务委员而兼经常行政职务者，须依其成份及所兼职务分别加以登记。

六、两年来新发现有哪些党外人士可以吸收参加政权工作或原来已经参加政权工作而值得提拔的；

七、其他

第二部分：“三三制”中党外人士的政治动态

- 一、对精兵简政；
- 二、对减租政策；
- 三、对发展生产；
- 四、对食盐（专）卖统销政策及金融问题；
- 五、对整顿三风；
- 六、对审查干部与反特务斗争；
- 七、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
- 八、对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
- 九、对“三三制”；
- 十、对我党与党的领导一元化；
- 十一、他们对于职权问题的意见；
- 十二、其他。

以上党外人士的动态，应该分别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其他党派分子、反动分子，尤应注意中间分子的动态，如有反

动分子，则须查清其主要反动事实。

第三部分：二届参议会后几个组织问题的检查

一、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改选或补选过没有？如有，其结果如何？

二、县参议会、乡参议会开过几次会？主要议程是什么？结果如何？

三、县常驻会开过多少次会？议了什么？

四、改选过哪些乡村政权？为何原因？结果如何？

五、有无议员小组（边区参议员的、县参议员的）？其作用、其利〔弊〕如何？

六、有无居民小组？其作用、其与乡村政权的关系、其利舞〔弊〕如何？

七、议员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及作用如何？
八、其他。

第四部分：我们党部、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三三制”的认识及领导作用。

一、对共产党员以外三分之二的具体认识如何？有无偏向？是怎样纠正的？

二、怎样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

三、怎样运用有职有权的原则？

四、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党外人士特别对中间人士有无帮助？是如何帮助的？

五、日常工作中同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关系如何？

六、日常生活又如何？

七、团结和领导党外人士的主要经验；

八、党内对实行“三三制”政权存在着何种思想问题的原则问题？并应如何解决？

九、其他。

第五部分：检查中几点应该注意的事

一、要以县为单位检查，在一县之内又按级检查，其材料亦应按县按级整理。

二、按县总结一下，然后又作一全分区的总结。县的和分区的总结连同各种具体材料一起寄西北局（不能只有总结，没有具体材料）。

三、地委、县委须先对检查工作有讨论有准备，对区委、支部应有传达指示。各级党委须具体指导政府党团进行这一工作，同时自己也负责检查，不能直接推给党团了事。各级党委并须调查几个典型。

四、限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检查总结完毕，随即将全部材料送到西北局。

西北局关于进一步领导 农民群众开展减租斗争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

(一)自去年秋季西北局颁发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以来，各地减租运动已有显著的进步，其主要表现就是有些地区（如葭县的店镇、城关、乌龙、通秦寨等区，米脂的河岔、卧羊、桃花峁等区及印斗区八乡，绥德的义合、沙滩坪等区，以及合水和镇原的个别区乡）已经发动农民起来，成立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减租斗争，使减租开始成为集体性和群众性的运动。凡是这类减租进行得彻底的地方，群众生产热忱大大发扬了，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群众减租后自动实行变工扎工，修畔溜崖，多施肥，多锄草，增加生产，同时群众更加拥护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积极参加自卫动员工作和锄奸工作，热烈响应政府每一号召，推行各项建设。这些经验，说明在边区未分土地区域，减租运动实是发动群众积极性的锁钥，是这些区域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这些区域不谈减租减息，只谈民主选举；不把减租减息当做中心，而把民主选举当做中心的思想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但是这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斗争的地区，在边区内未经分配土地区域的减租

运动中还占少数，多数地区是只凭少部分干部党员和群众中积极分子推行减租，而不发动广大群众。他们把减租不看做是农民的群众斗争，而看做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恩赐。在这类地方，虽然也可以减一些租，但不会彻底。因此，这种恩赐的减租是错误的，是不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各种建设事业和保卫边区积极性的。至于有些地方对减租工作仍旧漠不关心，不查不问，或少查少问，不发动群众，只由政府检查一下执行程度就算完事，因而不但不能发动群众积极性，而且连恩赐的减租也不能实现，则更是错误的。

(二) 检查各地减租运动是否贯彻，首先应以发动群众的程度为标准，故今年秋季以后，在还没有实行减租或实行得不彻底的地方，党应继续领导和组织农民的减租运动，必须达到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进行减租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法令，都是为了协助和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故应使之配合与推动减租斗争，而不是代替群众的减租斗争。应经过党的组织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广泛的发动农民，召开租户会议，成立群众组织（组织名称如农会、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等均可），经过这种组织，团结以行政村、以乡，直到以区为单位的所有佃户和农民，开群众的减租大会，进行集体的减租斗争。由群众议定（一定要由群众议定）实施减租的具体办法，用群众力量揭发和打破地主对抗减租的各种反攻，并处罚顽固的地主，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三) 在发动群众减租的斗争中，对地主阶级应当是又团

结又有斗争的政策，反对有些同志对地主只团结不斗争的错误思想。这些同志生怕在减租中得罪地主，为了迁就地主，就不去发动农民，结果使减租运动不能贯彻，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发扬。去年秋季以来，所有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的经验都证明：如果不同某些顽固地主进行斗争，则农民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扬，减租就不可能贯彻；但是只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和某些顽固地主进行斗争之后，就不但可以贯彻减租和发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决不会破裂农村统一战线。相反，会使农村统一战线开始得着广大群众力量做基础，达到扩大和巩固之目的。因此，今后凡在未实行或未彻底实行减租的地区，都必须发动农民起来向某些顽固地主进行斗争，以发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保证减租能彻底实行。不要害怕群众斗争闹得过火，就不敢大胆的放手去发动群众，这种畏首畏尾的倾向是错误的。但当群众起来时，放弃党的正确领导，让群众斗争自流的发展下去，对地主进行无区别无限度的过火斗争，在斗争中忘记了团结的一面，也是必须防止的。

(四) 在农民减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党必须加强对它的领导，使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力量。它不仅领导群众的减租斗争，而且能扩大到领导群众其他各种切身利益的事业（如生产、防奸等），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党团结农村基本群众的有力组织，并协助乡村政权工作，成为乡村政权在群众中的支柱。党对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应注意保持其群众团体的性质，不要把它与乡村政权相混淆。因此以行政组织形式（如某些地方的减租检查委员会等）来代替这

种群众组织是不对的；同样，以这种群众组织来代替乡村政权（如某些地方已发生的）也是不对的。同时，这些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也应当与政权工作方式加以区别。这些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应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避免少数人专断和命令的方式。

（五）在群众减租运动中，必须是具体和灵活的执行边区政府《土地租佃条例》的各项规定，并把它做各地减租运动的一般标准和合法武器。必须指出：减租的主要对象是未分土地区域，把租佃条例机械的搬到已分土地区域照样实行是错误的；减租主要是减地主的租，而在农民互相间及有特殊情形的（如鳏、寡、孤、独及抗、工属等）土地租佃关系中也漫无区别的照样实行减租是错误的；减租率应根据各地土地收获量及租额等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规定，不应当无区别的一律规定或机械的执行二五减租（如陇东及关中某些区域把过去已经规定和实行了的三七减租和对半减租改为二五减租是错误的。对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在租佃条例所规定的原则下都要实行减租，不是只减定租，而不减或少减活租和伙种。目前特别注意把活租与定租及伙种严格区别，并认真照减。按租佃条例所规定，过去的欠租一律认真免除，禁止和反对某些地主讨取欠租，并发动群众进行勾帐换约运动。地主因减租而无理收回农民佃地，应实行“翻地”；地主违背减租法令而强行讨取之超额租粮，应实行“退粮”；地主对佃户之一切额外剥削，应严格禁止。各地并应依照租佃条例原则，并参照当地具体情况，规定统一的单行减租条例，以切实贯彻执行。

彻减租运动。

(六) 在发动农民减租运动中，保障农民佃权是一个极重要的步骤。过去经验证明，保障佃权不仅是制止地主威胁农民反对减租的主要手段和发动农民敢于进行减租斗争的前提，而且是提高农民生产情绪，改良农作法和增加生产不能缺少的条件，因此，今后必须由群众力量和政府法令加以确实保障，反对地主假典、假卖或任意撤佃等破坏农民佃权的行为。但是保护佃权并不等于“土地完全不准动了”，应当了解：在减租运动深入之后，土地变动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且是土地由不生产者向生产者手中转移的趋势。要认识这是一个进步。当地主有正当理由出卖土地时，党的政策不是不准地主卖地，而是扶助农民买得土地，保障佃农对于购买土地的优先权，使之能买得土地。如因农民购买土地发生佃权纠纷时，应由农会或租户会等群众团体适当的自行调解之。此外，还可提倡农民的信用合作事业，以扶助农民买得土地。

(七) 凡在农民减租斗争深入的地区，必须立即计划和组织明年的生产运动，发动每乡每村以至每家农户开荒、积肥、修崖、溜畔、修水利、改良农作法，以及推广使用运输等事业的准备工作，把减租运动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又必须抓紧群众积极性的增长，用显著生动的例子，去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和破坏边区的特务活动罪恶，在群众中进行时事教育和阶级教育，增强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及日特国特的无限仇恨心，号召他们积极起来参加自卫军整训工作，努力学习打手榴弹和其他武器的使用；在本乡本

村清查坏人，展开群众锄奸运动，为保卫边区和保卫群众自己的革命利益而积极斗争起来。凡农民减租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即应过渡到这种自卫动员和反奸运动上面来。把这两种群众斗争结合起来，更进一步发扬群众积极性，切实巩固党的政权，并使这些地区的工作走上全面的和彻底转变的道路。

(八) 在今年秋季以后的减租运动中，党的领导必须真正具体实现，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把领导核心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在未减租的各县，都应有计划的先在一两个中心乡村去发动群众的减租斗争，做出榜样，去影响推动其他地区，取得经验，去指导帮助其他地区，然后推广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减租斗争。坚决克服只有空洞的一般号召而没有个别的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心行动而没有广大群众行动的领导方法，这将是今后展开与深入减租运动的重要保证。

西北局关于统销 食盐问题的补充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过去统销食盐决定中，曾规定老百姓运盐除卖给盐业公司外，还可在遵照盐业公司规定的条件下（买必需品进来或将法币按牌价交银行），自行运出边界外卖。但据最近情况，老百姓把卖出换进的法币，交政府的极少，实际上成了变象[相]走私（顽固分子在中间也捣鬼）。使我们的法币收入大为减少，如陇东过去每日可收入法币三十多万元，现在则每月只能收入法币三十多万元。此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故特决定如下：

(1) 今后老百姓运盐不准自行出卖，必须一律卖给盐业公司。

(2) 盐业公司收买老百姓食盐，必须照顾到黑市价格适当提高盐价，务使老百姓运盐有利可图。故凡非放青运盐，均应保证每人（以赶二牲口为标准）一天除人和牲口消耗外，还得赢余相等于一升半小米的钱为原则确定盐价（但应取得延安同意）。

(3) 必须统一缉私（由边区政府颁布办法），集中于保安处领导之下，加强缉私工作，杜绝走私。

高岗关于加强回汉民族 团结做好回民工作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

同志们：

本来早想来同大家一齐〔起〕开开会，讨论，给大家帮一点忙，可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来，今天才来与大家见见面；有些同志是早已见过面的，譬如在延安的、关中的、陇东的、三边的同志过去是都见过面的；有些没有见过面，虽然没有见过，因为我到过的地方很多，像甘肃、宁夏、合水、庆阳、镇原、平凉、固原……等，因此，我对于下面的情形也都了解一点。

在过去土地革命的时候，有许多回民同胞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回民同胞过去在边区的创造上，边区的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边区的各方面都是回民同胞和汉民一起创造起来的，这可以说是回民同胞过去的功绩。

抗战以后，在进行剿匪和巩固边区这一方面，回民同胞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帮助我们，譬如在××地方有十几股土匪把三边搞的一塌糊涂，那些地方的回民同胞就帮助剿匪，并且还把他们的羊、麦、面拿来帮助消灭土匪和巩固边区的军

队。又如在关中有顽固分子造谣、破坏、捣乱，而那里的回民同胞就动员农民同他们打，这证明回民同胞的勇敢。回民同胞在镇压顽固分子方面，是同样有不小的功绩。

再看我们对于回民同胞在生活上是否帮助了一些呢？我记得在中央到这里来以后，政府法令上就确定了一条，就是：不准打骂回民同胞；不准任何人到回民澡塘去洗澡；不准到回民同胞家里去吃东西；要尊重他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要认真的帮助回民同胞。我方对于回民同胞的经济多方面给以帮助，我们曾经把一个名叫×××——当地的教育厅长——他是最反动的，就是向你们要租子最厉害的一个大土豪——赶掉，我们把许多汉人大地主的土地、牛、羊也搞了一些分给回民同胞，因为如此，现在大家生活才搞的都差不多，大家都有了地、牛羊。边区人民的经济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许多地方也有着不少的回民同胞现在还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在我们计划分些土地给回民同胞，并给他们以各种帮助。边区政府是采取这样的政策，使外面来的回民有地种，又有耕牛，这是对于回民同胞经济上农业方面所采取的办法。

在商业方面，回民同胞可以来到延安和边区各处作生意，如果没有房子，政府可以给点地，帮助盖房子，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外来的回民同胞在这里可以发展他们的商业经济。

再看对于政治方面，中共六中全会时，毛主席曾经这样

说过：“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要用分裂我中华民族的政策，以达到其灭亡我中华民国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化政策。”要达到这一条，就要我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和回民自己团结起来。那就必须回民自己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在回民居住的地方，一区或一乡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府；在回汉杂居的地方，也可有回民自己组织委员会，管理同自己有关的事情。另一方面，汉人在各方面，尤其在文化上，要帮助回民同胞，这样的条件下，大家才能够很好的、很亲密的团结起来。

在某些地区的政权组织今天已经有了回民参加，并且还有回民的单独的组织，在山[三]岔有一个回民抗敌协会，这个抗敌协会几乎可以代替他们的行政权，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在盐池柳庄（听音写）有一个乡长很不好，后来就选举了一个回民作乡长。你们可以选举参议员参加边区参政[议]会，县乡一级有回民的地方都应有回民代表参加各级参议会，这就是说边区党和边区政府在政治方面真正的作到了使回民有组织、言论、出版、集会以及发展民族文化的自由，使回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使回民同胞有组织游击队、自卫军、武装抗日的权利。在过去还没有成为边区的时候，回民同胞是从来没有选举与其他这许多自由权利的；在过去回民不敢动，一动就受到限制。现在不同了，现在回民已经获得政权，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管。但是现在也还有些怀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他们还不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而说回民只是回教徒。其实回民有自己独特的文字、语言（虽然已大部分能

说汉语)、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住居在相当集中的区域，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一个民族呢？所以我们承认回民是一个在发展中的伟大的民族。

在文化政策方面，过去在边区是没有回民学校，现在在山〔三〕岔办了一个回民小学，我们又打电报要在盐池办一个；我们要帮助回民都从文盲中拯救出来，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西北许多的回民同胞他们生活上都是很苦，我走过很多的地方看到回民在地方上占有势力的非常之少，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是处在非常低下的状况。现在只有边区的回胞已经得到了民族平等和解放，其他许多地方的回民同胞还是受着压迫，因此，我们不仅要使边区的回民同胞在政治、经济、文化、武装上……有自由，而且要使全国的回民同胞能够得到利益和自由，这点还需要我们回民同胞很好的努力。

我们看看过去以及现在，我们回民同胞所获得的自由、政权，这只是在边区的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就不成，所以，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这里有民主政治，这个民主政治的来历，是由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广大的人民共同奋斗所得来的，如果大家不奋斗，也就没有今天的成绩，这是过去。现在呢？我们回民同胞在边区住的很少，最近来的也还不算多，所以更要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搞得好，使外面回民来看到，赞成我们边区，羡慕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这里的好处，那么，就需要把山〔三〕岔、曲子搞好，作成好的榜样，使其他地方的回民同胞模仿、学习，这一切

更需要回民同胞努力。现在边区党、边区政府愿意很好的帮助你们，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的作，如果没有办法，可以请政府帮助；另外请政府号召汉人帮助你们，这一点是我们党和政权应做的事；同时，你们也要看重和帮助自己政府；政府号召汉人帮助你们，这一点边区政府是同意的，同时你们也看重和帮助自己的边区政府。

现在边区周围，也还有些问题，就是最近在边区的周围筑了两道碉堡，也有由友区开军队到边区附近来的事。我们为着保卫边区的和平，为着巩固抗日后方，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进行战斗，以阻止那些顽固分子、反共分子来捣乱、破坏边区。这个任务要我们大家来负担，就要边区的回、汉民众有很好的团结，去打破敌人新的进攻。这个制止奸人破坏的斗争，我们能不能胜利呢？能够的，是有保障的。在过去有许多实际例子都证明他们来打我们是违反老百姓的意思的，是友军弟兄所不愿意的，友军弟兄们用开小差和叛变他们长官来拥护边区，拥护八路军，就是友军中某些军官，也明白反八路军反边区是没有道理的，例如在××地方友军曾贴标语：“打倒八路军”、“八路军捣乱后方”，后来朱总司令到那里，他们就赶快把那旧标语扯掉，贴上“拥护抗战劳苦功高的朱总司令”，这样一来，他们自己的弟兄们也就更加明白反对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捣乱坚持抗日民主政权的后方是不对的。又如某地有一个特务机关的人把许多乡长及人民集合起来，问他们：“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问了大半天，没人敢说话，于是他说：“你们说吧，没有关系，说错了也不要

紧。”于是有一个五十八岁的老汉名叫张和正，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说：“天理良心，好，倒底还是共产党好。”他说：“共产党好在什么地方？”老汉说，“共产党来了他和老百姓商量办事，你们不好，你们只看自己做事。”几句话把特务机关的人说得面红耳赤，闭口无言。我们还看见许多老百姓见了我们的军队，就给他们鸡子吃，并说，“吃一个鸡子，打一个日本鬼。”而他们对友军又是另外一个态度，如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曾经对友军说：“你们也很年轻，也有父母妻子，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反打自己呢？”许多士兵被她这句话提醒了，都不愿意打我们。我们不能被人家消灭，我们要保卫边区的和平，要继续保存抗日的民主政治，这就要我们回汉同胞更加团结，更加努力，更加警惕。

第三个问题，回民同胞内部怎样才能团结得更好？我认为最要紧是回民同胞内部要不分一切教派，都要团结起来。我们应该提倡各信各德，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回回民族各教派都要各弃所短，各取所长，不管政治、经济、文化，好的我们就接受，不好的我们就改正。“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有事大家商量，一心一德，整个儿回民团结好，就有力量了。

回民都一致要求进步，要求民主，要求生活改善，就要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回民干部。一切革命问题的解决都依靠干部，如果没有优秀的干部，革命就不能够成功。就拿国民党革命的历史来讲，也是一样，国民党有孙中山，有黄兴，有廖仲凯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在的蒋委员长等等；我们

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洛甫诸同志等等。回民同胞要解放，也要有许多优秀干部来领导和组织大家进行经济文化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回民能够在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进步，各教各派都能团结，和汉人又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力量就无穷了，就可以战胜日本，就可得到自由独立和生活上的幸福了。过去各教派虽然有些许隔阂和争执，回汉间虽然过去有几百年民族冲突的历史及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但是我们共产党、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回民同胞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我们是竭尽力量多方面帮助回民同胞的。并且我们回汉同胞都应看到，现在是民族敌人打进了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和同一祖国的人团结起来。汉人和回民都是中国人，去打日本，打我们共同的敌人，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搞好，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次大家开很长。开始时，连棉衣也没有发，使大家受冻，真是招待不周，使大家吃了苦，不过这次大家讨论了许多问题，使以后做事有办法。这个会议是一个胜利的会议，这个会议是把西北团结起来的会议，谨祝大会的成功！

编者注：原文是根据高岗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纪录所整理。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绥德地委人员的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习仲勋、袁任远、白治民、李井泉、朱辉照为绥德地委常委；李华生、陈希云参加地委委员。

此致
绥德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时间为编者考订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陇东地委人员的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段德彰、马锡五、王维舟等三人为陇东地委常委，彭绍辉、王月明参加地委委员。

此致
陇东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张鹏图、惠庆祺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张鹏图、惠庆祺参加关中地委常委。

此致
关中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吴志渊等人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吴志渊任定边县委书记，王春华任靖边县委书记，白玉华任副书记。

此致
三边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李瑞山调动，王治舟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李瑞山同志调中央党校学习，王治舟同志代理边区青救会主任。

此致

抗联崔田夫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刘秉温任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刘秉温同志移住延属分区，并参加延属地委常委。

此致
延属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政府系统干部配备*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月二十一日西北局委员会对政府干部配备如下：

折永年任吴堡县长；

刘齐家任甘泉县长；

赵耀光〔先〕任曲子县长；

谢怀德任西川县长；

刘子谋任延川县长；

陈世恭任靖边县长；

孙润华任定边县长；

淳耀县长刘永培和新宁县长李集成对调，刘任新宁县长；

王恩惠任边区粮食局副局长；

常黎夫任边区政府秘书处处长；

逯月喜任边区政府总务处长；

李义堂代理民政厅一科科长；

白世杰任民政厅政务秘书；

· 魏希文任绥德专署二科长；

马万里任三边专署一科长；

陈学鼎任关中专署一科科长；
周崇德兼关中税局长；
傅培芝兼三边银行行长；
杨霖任盐务局长；
井肋国任保安处一局一科副科长；
叶运高任保安处一局三科副科长；
马义兼葭县保安科长；张清山任副科长；
陆为公调边区政府研究室
固临保安科长赵正隆调回学习。

此致

政府党团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西北局关于加强与 整理各县警卫队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各县警卫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地方革命秩序，保卫地方政权。过去边区各地的警卫队虽是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无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都还存在许多弱点，某些干部及战士中贪污腐化、不遵守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尤其严重的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未被肃清，如固林〔临〕县警卫队曾经发生武装叛变，延安县警卫队内破获了有组织的反革命案子，其他各县警卫队内亦有不少来历不明以及哥老会分子等均未清查出来，这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西北局特责成各县委书记协同各县县长根据下列办法首先改选并加强各县警卫队的组织成份。

第一，在干部中，凡政治上有嫌疑的分子，应立即调开警卫队整风审查；在一般战士中，可首先在警卫队上有计划的号召坦白，收集材料，然后分别处理。

第二，从新挑选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且在工作和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党员或乡村自卫军中的连排干部补充警卫队，以加强警卫队的政治质量。各警卫队的数额，由各地委专署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觉得酌量扩大之。

第三，警卫队队长由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县保安科长兼副队长，另设副指导员一人。

第四，由国民党军队中开小差来的分子，一律送上级审查处理，不得收留在警卫队。我八路军防守部队开小差的，亦应送回原部，不得随便收留。

第五，公开宣布严禁在警卫队秘密结社（如结相识及拜哥老会等），违者应予以严厉的处分。

其次是加强警卫队的管理教育：

第一，警卫队的政治教育，应由县委书记、县长负责亲自上课或讲话（有时亦可指定干部去上课），要根据最近反特务斗争的实际例子以及《解放日报》、《群众报》揭露国民党的许多具体材料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具体的阶级教育。

第二，加强警卫队中党的组织和工作，配备适当的党员数目，健全支部，加强支部教育，这是巩固警卫队的核心。

第三，切实提高警卫队的军事技术。今年冬季每个战士要练习打手榴弹、瞄准、刺杀，并发动竞赛，奖励特等射手、特等掷榴弹手。

第四，严整军事政治纪律。按照纪律条令进行纪律教育，对不执行命令违犯军风纪，侵犯群众利益的各种行为均应从重惩办，并利用这种具体事实在战士中作教育。以上各指示责成各县委保证实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西北局。

西北局关于贯彻统一领导及保证党对财经部门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初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自去年高干会提出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以来，经过继续整风与审查干部，一年之内已有很大进步，以西北局为中心的全边区领导的一元化与以地委为中心的各分区领导的一元化基本上已经实现，党政军民关系较过去大为改进，对党闹独立性的现象及党政军民关系上互相闹本位主义的现象也大为减少了。由于党领导一元化的实行，使今年边区生产、防奸、备战等一切重大的任务的完成获得很大的保证。

二、但在实行党领导一元化中还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在党的方面，对军队及财经部门的领导还抓得不紧，对一元化的了解还发生一些偏见，如把党领导一元化误解为只是党委书记一个人的事，发生一切都推到党委书记身上，或党委书记认为应当包揽一切的现象，因而减弱了党的组织领导作用；政府方面个别地方有强调政府系统一元化不顾及党领导一元化的现象，因而发生对党的领导表现不够尊重；军队方面对

党领导一元化也欠深入，组织上服从的多、思想上服从的少（如说：“如果不是一元化限制，我早就想打人了”等）；团以上干部了解的多，团以下干部了解的少；一般干部了解的多，供给部门干部了解的少，因而在供给部门及某些下层干部中还发生一些不妥当的举动；特别在财经系统方面对党领导一元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某些部门在政策上独行其是，在组织上还有离心倾向，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还在各种形式掩盖下对党闹独立性。所有这些情形，都说明还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的全面的来贯彻党领导的一元化，特别对财经部门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加以彻底解决，以保证党的政策和任务能在一切方面贯彻执行。

三、为要全面的贯彻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在党政军民、财经各部門、上下层干部中，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使他们对党领导一元化在思想上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纠正各种误解和偏向，对一元化从被动的组织上的服从进到主动的自觉的服从，从上层组织和干部深入到下层组织和干部中去。一切部門都应从部分组织和人员扩展到全体组织和人员中去，最后达到一切工作统一于党领导之下，并根绝对党闹独立性的現象。但不能把这种一元化曲解为一切都要依赖党委书记或党委书记应当包揽一切，因为这样就会减弱党的组织领导作用，助长干部不负责任的精神，使他们失去在党统一政策和方针下的独立工作精神和创造性的发扬。各级党委应即在所属范围各部門检查一元化执行的情形，在检查中开展自我批评，对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应进行解释教育，保证各

部门所有干部对一元化领导在思想上有正确透彻的认识。

四、在组织上必须更加加强党对各方面的领导，特别是对军队及财经部门的领导更应加强，经常有计划的讨论和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后〔候〕要求党更能掌握全局，照顾各方面情况，获得恰当的正确的处理，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树立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和威信，保证一元化领导正确有效的实行。

五、各地应（立）即将去年春节以来的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拥军及拥政爱民运动，使之成为真正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应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欢迎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民众方面应由当地党政及民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军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应再三再四的将过去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缺点，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并于今后彻底改正之，使党政军民更加打成一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项任务。

六、统一财经部门的领导，是面〔目〕前全面贯彻党领导一元化的主要方面，因为不仅财经部门某些干部对一元化领导的思想问题未彻底解决，而且在组织上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以调整，以（确）保财经部门领导一元化的实行。特决定如下：

（一）改组过去财经办事处上面统一战线性质的财经委员

会为西北局下的财经委员会，以贺龙同志等为委员，贺龙同志为主任，×××为副主任，其职权相当于西北局的一个部。凡有关财经的一切重要问题，财经委员会必须提交西北局讨论决定，方能执行。凡有关财经工作的重要指示，必须由西北局发出。西北局的指示，同级政府党团、军政首长必须绝对执行。这样使财经工作的领导，完全统一于西北局。

(二)财经办事处原为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根据地政府、军队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公开办事机关，目前仍应存在，但他的组织与工作应即归财经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必要时财经办事处可发布命令训令，但有关陕甘宁边区者，必须有边府联署；有关晋西北者，必须有晋西北政府之联署，然后发出。

(三)根据上举原则，改组各分区之财经分会为地委之财经委员会。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地委必须保证西北局及其财经委员会指示的切实执行。对财经办事处及边区政府关于这方面的命令、训令等，必须经过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或党团保证其实现。

(四)县委下可设立以党、政、军三方面负责同志组织之财经委员会。

(五)凡边区政府各财经部门及联网分散在各地方的直属机关（如银行分行、物资分局、公营商店、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税局等）必须受其上级与地方党政的双重领导。在执行任务与政策上，他们必须依照其直属上级机关的决定，在地方党直接领导与帮助下坚决执行。在执行任务与政策的具

体办法上，在人员的配备与管理教育上，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地方党政的领导。地方党政对这些机关中不称职的人员有调动奖惩之权；但对于主要负责人的处理，则应取得其直属上级之同意，然后执行。

(六) 凡财经机关在执行任务与政策上，给其下级直属机关以日常指示时，应通知同级财经委员会，并应通知其下级直属机关所在地的财经委员会。凡重要指示，均须经过财经委员会或西北局发出，使下级党部能够切实负起执行指示的责任。

(七) 各财经机关的负责党员同志，必须经常将财经方面发生的问题报告同级党的财经委员会或党委，并有系统的供给其具体可靠的材料。下级财经委员会及党委必须将此类问题及材料（包括其处理办法）报告上级财经委员会或党委。特别指出：关于财经问题各方面的材料，如关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运输、合作、盐业、畜牧、机关生产、植棉、植树、养蚕、生产计划、减租减息、人民生活、天灾虫灾等材料，均须抄送西北局一份。

(八) 各级地方党今后应切实掌握并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并把党关于财经问题的每一重要指示，在党内充分讨论，以教育干部。

七、晋西北留在绥德分区内之各机关部门，原则上和边府驻各地之直属机关一样，应受其上级和绥德地委或当地县委双重领导，以达领导一元化目的。具体管理办法由晋西北分局与绥德地委直接协商解决之。同时凡延安派到各分区之

商店或生产人员同样亦完全接受地方党政之领导，不准脱离地方党政领导而自行活动。

八、本决定各项，必须在各级党内传达讨论，并由党的领导机关及各部门负责党员（特别是财经部门负责党员）切实保证执行之。

西北局关于整训自卫军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的军事准备，目前仍在加紧与周密的进行着。在此情况下，要求我们必须加紧备战的各方面工作。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人民，以制止投降危险与分裂危机，则必须争取时间，加强整训边区广大人民自卫军，准备保卫自己家乡的自卫战争，粉碎可能爆发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这是当前边区党的一个重大任务。

(二) 边区人民自卫武装，虽有优良的光荣战斗传统，但还存在一些弱点，如组织上的复杂不统一，有些地区自卫军竟有六种之多（普通、基干、模范、少队、模范少队、游击小组），而编制人数多少极不一致；政治质量还不很纯，自实行三三制后，豪绅地主及受过革命打击的分子也参加进去了，甚至某些区乡的自卫军干部还混有政治上不清楚的分子；军事训练表现有老一套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政治教育更加不够，以及领导上自精兵简政后，竟形成了三不管的现象。上述这些弱点，必须在今冬整理与训练自卫军中把它完全克服，并坚决努力达到全边区训练好二万五千个能够作战的地方自卫武装。

(三) 为加强自卫军军事政治领导，必须健全自卫军的领

导机关。联防司令部专设管理自卫军的人民武装科；分区司令部同；县设大队部，设脱离生产的大队附一人，县长兼大队长，县书兼政委；区设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副营长一人，区长兼营长，区书兼政委。乡级领导组织仍旧。各地过去凡是在边保教导营受过训练的自卫军营连长，现在被分配其他工作者，须尽可能的抽调出来仍做自卫军工作。

(四) 为便于加强训练，必须首先整理自卫军组织。今后各地自卫军应一律改编为基干、普通两种（取消其他模范、游击小组和少队等组织形式，唯边界地区之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仍应继续存在）。基干自卫军，每区可组织一个连，人数以一百二十人至一百五十人为限，参加条件应该是：(1)工人、雇、贫、中农及新富农；(2)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男子；(3)家庭两个劳动力以上者。除队员须适合上述条件外，其排班组织应以便于集中为原则，个别偏僻分散的村庄，虽合条件亦可不参加。这种基干自卫军经训练之后，必须准备在必要时能够成为作战的现成地方游击队。至于普通自卫军，凡抗日公民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一律参加，其主要任务为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有些地方大脚妇女在特别需要下，亦可参加，唯须单另编制）。其次一个乡自卫军人数在三百以上者，可打破过去按乡组织一连的限制，其领导仍归乡支部及政府。

(五) 过去自卫军之选举制度，根据延安经验，在边区不甚适宜，因这使破坏分子容易混入，或被选者不甚称职，因此，确定今后自卫军的干部采取超一级的委任制度，但须将

委任名单提交自卫军大会通过。至其人民武装委员会之组织可以不设，在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原则下，由分区司令部、县大队部统一领导。

(六) 装备方面。基于自卫军须做到每人有两个手榴弹，尽可能再有大刀或锚〔矛〕子一支，最好多配备土枪及少数步枪，并且学会使用。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发动一个自卫军收交一斤生铁的运动，由县集中起来交工厂换手榴弹，并且布置熬硝、造火药、修理土枪土炮。普通自卫军每家尽量做到有一件矛子或大刀，并配置担架运输工具。这些装备工作，目前即应进行筹划布置完成。

(七) 关于今冬的整理训练工作，其重心应该放在基于自卫军方面，特别是应该抓紧边境地区及交通要道基于自卫军的训练。整个训练办法：营长、连长可集中县大队部训练，于十一月半开始，训练一月至四十天；基于自卫军及普通自卫干部可集中区上训练，于十二月半开始，训练二十天至一月；普通自卫军可采取开大会形式，教育训练几次。训练内容：政治方面，应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进攻边区和破坏边区的具体事实及各地实际反特务斗争的典型例子作教材，提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军事教育应以学习、使用自己武器为中心，如掷手榴弹、打枪、埋地雷等。分区司令部应特别注意训练基于自卫干部，学会造地雷和进行地雷战的方法。在整理训练中，提倡学习竞赛运动，发现模范的投弹手和射击手，应加以奖励，开展军事战线上的吴满有运动。

(八)各地党委必须认识自卫军是反对边区内部隐藏的好细、特务斗争和反对日寇、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的一个基本力量，在训练自卫军时，必须使每个自卫军自己懂得他们自己这两方面的基本任务。因此，党，特别是乡村党的支部，必须加强对自卫军政治的、组织的领导，必须把乡村党员力量适当配备到自卫军去起核心、团结、领导作用。另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严防特务反动分子对自卫军的破坏活动，不让自卫军中隐藏任何一个特务反动分子。

(九)上述问题，各地党委于接此指示后，应立即进行讨论与布置，并将执行情况随时报告西北局。

中共中央西北局

西北局办公厅座谈会纪要*

——关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筹备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时间：十一月二十八日

到会人：贾拓夫、陈正人、李卓然、杨清、高自立、高长久、曹力如、鲁直、袁福清、赵通儒、冯治国、马定邦、杨一木、武开章。

记录：武开章

座谈事项：关于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如何进行问题。经座谈议定事项如下：

一、确定会议的基本目的是交换生产经验，并综合这些经验推广到全边区明年的生产运动中去，更加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更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以达到普遍丰衣足食之目的。在总结生产经验中，应特别着重劳动互助与提高技术问题，这是明年更加发展生产中的两大中心方向，应将这两点在代表中加以深刻的宣传，并号召他们起积极的模范推动作用。

二、根据上述会议目的，会议不是我们给劳动英雄讲许多一般号召的话，而是要好好的组织与帮助各个劳动英雄发

言，尽量讲出他们一切生动的生产经验和创造，组织、领导他们展开详细的讨论，然后加以综合，于最后向他们做一综合性的报告，确定明年的生产任务和努力的方向。因此，机关方面的报告和讲话，应该缩小到最小范围，除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讲话外，一般的报告或讲话均应停止。

三、在会议中除丰衣足食的口号外，并提出备战备荒的口号，号召代表们不仅自己做这项努力，而且要影响、推动广大群众同样为此目标奋斗，以达到增加生产耕三余一^①、保卫边区之目的。

四、号召和推广吴家枣园、陈家坬、白源村、郝家桥等生产模范村运动，使每个劳动英雄不仅自己当劳动英雄。而且要象吴满有一样，经过自己积极推动的作用，使自己的村庄变成生产模范村，这应是明年所有劳动英雄奋斗的一致目标。

五、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发动每个代表写出他个人明年的生产计划，并同一县份的代表互相订立竞赛，以影响全边区的生产。

六、分类别奖励劳动英雄，最好的要奖牛；要推举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在未奖励之前，应该：(1) 定出劳动英雄的标准，让代表们讨论；(2) 具体研究每个劳动英雄的特点，定出切合实际的等次；(3) 确定适合的奖金额；(4) 奖励个人，同时也要奖励集体（如吴家枣园全村增加细粮百分之八

① 即耕种收获三年有一年的余粮。

十，应受到奖励），

七、由西北局研究室与各方面收集材料的同志合作，并统一管理，以进行搜集材料的工作。特别要搜集吴家枣园、陈家坬、郝家桥等生产模范村的材料，整理写成有系统的东西在报纸上发表，号召、推动各县区创造更多的生产模范村；同时提议由西北局宣传部依据这些典型材料编成简洁扼要的小册子教育群众，并作为小学教科书。

八、大会在讨论完毕，应通过向全边区人民、机关、部队号召明年如何进行生产的书，作为大会的总结和明年生产的总号召。

九、应给每个劳动英雄写一个详细的自传，包括其历史和生产经验及特殊的创造。

十、大会进行应建立核心组织，负责领导大会之进行，由高自立、高长久、曹力如、袁朴身、鲁直、杨一木等六同志组成，每天会后汇报和研究大会之具体问题，并与西北局取得联系。

十一、指定马定邦同志负责整理、领导代表中的党员，建立党团，使与会代表中的党员都过一定的组织生活，并在会议中起作用。

西北局办公厅座谈会纪要*

——关于保管与检查秘密文件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时间：十一月三十日

到会人：贾拓夫、杨清、张经武、李景林、任自新、白栋材、周扬、李景膺、秦力生、刘海滨、李甫山、肖采峰。

记录：武开章。

座谈事项：关于保管与检查秘密文件问题。

经座谈议定事项如下：

一、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把这件事情报告各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并在最近学习小组会上由组长负责传达做一个政治动员，使同志们深刻认识保守党的秘密是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任务，单纯看作技术问题是错误的。

二、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一律从明天开始进行检查，西北局、政府及联司应各组织检查组到所属各单位进行切实检查。检查范围包括：(1) 有什么秘密文件？(如学习文件、防奸经验、防奸材料、高干会文件，及各系统特殊的秘密文件等) (2) 发给什么人看？是否都有保证？(3) 如何发的？收发制度如何？(4) 过去是否进行过检查？(5) 现在有无遗失

文件或被偷阅偷抄等情形？如有，其具体情形如何？（6）一般同志平常如何保管文件？对此是否重视？（7）对秘密文件之收发保管有何具体意见？

三、上项检查，指定政府由李、任二同志负责；联司系统由张经武同志负责；西北局由秘书处负责；地委由李、秦二同志负责；延大由周扬同志负责；保安处由刘、李二同志负责；民众团体由肖采峰同志负责。并统限于十二月八日前把检查材料送交西北局办公厅，西北局办公厅整理好后，于十日汇报中央秘书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给边区政府党团的通知

——发动边区群众做十万
双鞋慰劳部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发动全边区群众作十万
双鞋子慰劳部队。此致
林伯渠同志转政府党团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边府党团人员组成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边区政府党团除原来(林、贺、周、罗、刘、南、高、谢)②八人外，增加霍维德、范子文、黄亚光、雷经天等四同志为委员，并以林伯渠、贺龙、罗迈、霍维德、周兴等五同志为常委，林伯渠同志为书记，罗迈同志为秘书。此致

林伯渠同志转政府党团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② 林伯渠、贺龙、周兴、罗迈(李维汉)、刘景范、南汉宸、高自立、谢觉哉。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成立边区一级专管友军
工作的核心组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领导，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边区级成立专管友军工作之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并以高岗、贺龙、贾拓夫、徐向前、周兴等五同志负责，以高岗同志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关中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于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各分区均应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关中分区由张德生、汪锋、文年生等三同志负责，并以张德生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延属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于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各分区均应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延属分区由王震、李景膺、强自修、刘秉温等四同志负责，并以王震同志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三边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于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各分区均应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三边分区由王世太〔泰〕、罗成德、贺晋年等三同志负责，并以王世太〔泰〕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绥德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于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各分区均应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绥德分区由习仲勋、李井泉、王尚荣、徐向前等四同志负责，并以习仲勋同志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

——决定陇东分区成立一核心组织专管友军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①

最近时期各地对友军工作多少有放松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于十二月六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各分区均应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陇东分区由段德彰、马锡五、王维舟、陈伯钧等四同志负责，并以段德彰同志负主要责任。此致

同志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公文 处理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西北局所存文件的检查，在我们文件技术上尚有如下毛病：

文件用纸大小不一样，字迹模糊不真（特别是复写品），草字、创造简笔字、新文字等都有夹杂，甚至还有不写时间及发文机关者。为使便于保存、阅读和解决问题计，特规定如下各点，希严格遵守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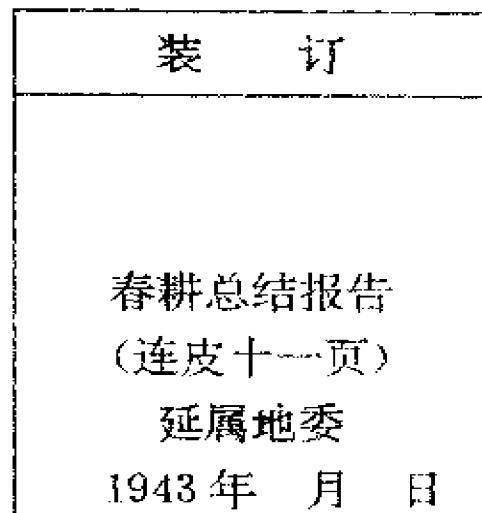
（一）用纸上，纸质不限好坏，但大小必须以白有光纸十四裁为标准（半张腊纸大），一律使用单页纸，唯油印品必须使用双页者，可在印好后折为双页装订成册，使其形式仍等于单页大小。

（二）写法上，一般的都用行书字横写，不得夹入草字、创造简笔字及不必要的新文字、英文等；复写字要写真，并特别注意数目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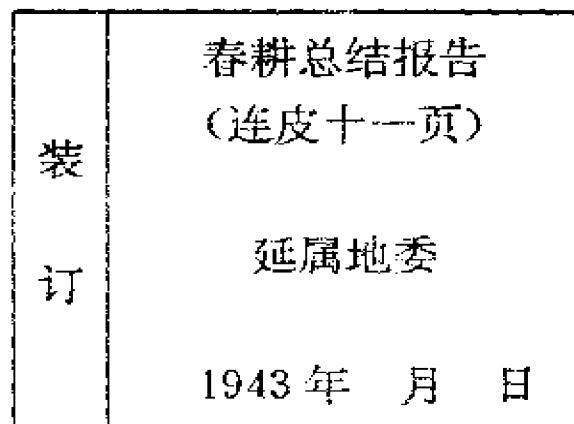
（三）装订文件的封面上，要注明文件名称、连皮页数、发文时间及发文机关名称等。装订钉子一律钉在上边，唯双页油印品可以钉在旁边，兹举延属地委的春耕总结报告为图

例如下：

(1) 单页纸式



(2) 双页油印品式



(四) 一张纸上尽量不写两件性质不同的问题，以便于阅读和归档的处理（分拆或合并），因之，例如工作报告，应以问题的性质分开类别，好〔如〕像开荒、施肥、耕作法等虽

为春耕工作之一部，但在写总结报告时，应分为开荒、施肥、耕作法等三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写完后，不管那一张纸还剩多少空白，即让他空白着去，再从再一张纸上开始写另一个问题，然后合几个小册，装订成一大册总结报告。

中共西北局办公厅

西北局关于反奸问题致各地委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各地委：

从最近各地关于反奸斗争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自今〔去〕年高干会后，各地在机关干部及社会群众中的反奸运动是进一步展开了。在此情况下，我们虽未收到各地详细报告材料和研究（已指定专人开始研究），但下列各点是应当提出并引起各地严重注意的。

1. 在反奸运动掀起后，党要特别注意掌握情况和政策，并加以具体领导，防止可能发生的夸大特务力量和活动的“左”的偏向（目前已有若干象征和表现）。这种“左”的偏向可能在下面几种情况下发生：（1）特务阴谋故意夸大陷害好人（如绥师特务陷害好人；在陇东提出“普遍自新”的口号）；（2）农村中以至干部中的报复心理反映到反奸斗争中来；（3）领导上的偏听一面，或使反奸斗争简单化。这些都应严重注意，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则应深刻研究其原因，如有必要时应对其负责者加以审查，以明真象。

2. 现在各地坦白分子中（如绥德有六十多人），应估计到真正特务分子是少数，而多数可能是有党派关系或其他问题而非特务关系者，甚至是完全搞错的。断定一个特务必须有：

(1) 特务组织关系；(2) 破坏活动的事实这两项可靠材料。在这两项材料未充分证明前，就肯定为特务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就会混乱反特务目标，而使真正特务隐藏起来。

3. 在反奸中，为了避免或少犯错误，必须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对每一个可疑者都要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重证据，不重口供；一般口供只应当作参考，从口供中再进行研究，不要完全凭口供，以免中特务陷害好人之计。同时整个运动发展趋势也要经常研究和掌握，运动向前进了一步，就要做一次研究，取得经验，纠正偏向，再继续推动运动前进，如此才可减少错误。

4. 在反奸斗争中，必须把肃清坏人与发现和培养我们的反奸干部二者结合起来，不应该只是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领导干部应懂得，如果不能发现和培养区乡积极干部，则我们在下面的反奸斗争是无法进行的；而如果我们在下层干部党员和群众中有了可靠和积极的核心时，则反奸斗争才能长远和胜利的进行下去。根据警区某些地方和延安的经验，这类反奸积极干部，只要我们在下面反奸斗争中注意物色和培养的时候，是可以出现很多的，各地应特别注意到这一条，并对群众中反奸积极而有成绩的应加表扬，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奖励，以推广和深入反奸运动。

5. 反奸斗争是要真正肃清特务，如果不是特务而把他当作特务处理，当然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此，在反奸斗争中，还要注意保护好人，使之不被特务陷害。同时在过去司法机关或其他部门如有被特务陷害的人，则应

要他们出来伸冤，党应很仔细的审查和研究他们的材料，给予恰当解决。但这些人除了被特务陷害的部分外，还有其他错误时，也要防止他们藉此逃避错误责任。

6. 在反奸斗争中，还应充分注意到农村群众中甚至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私人报复现象。这种私人报复和反映到反奸斗争中是非常危险的，各地应加以注意，如发生这种情形，应立刻纠正，并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应当了解，在外来知识分子中确隐藏着不少的特务分子，但绝不能估计所有外来知识分子都是特务，不能把特务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混淆起来。这里更要防止本地干部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排挤现象。

7. 开群众反奸大会，必须事前有充分准备，不能无的放矢，随便召开。在准备中最重要的是（1）有了核心和骨干；（2）有具体的调查研究和充分材料。如这两条还不具备时，宁可迟开，以免发生毛病。

8. 在反奸中，除边境区乡有特殊情形者，一般的一定要少捕人，尽可能不捕人，捕人数目不应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特别是证据还未确实的，不要轻意逮捕，因捕易放难，且可能引起群众恐慌，特务藉此捣乱，阻碍坦白运动展开。同时绝对禁止在审讯中打骂犯人及施用肉刑。

9. 对坦白分子在未弄清是非轻重之前，一般仍应与他们保持同过去一样的态度，不要因为他们已经坦白就对他们冷淡歧视，以至明显的表示仇恨，这样就会阻碍我们进一步查清是非和争取他们的工作。

10. 目前各地反奸运动可暂时停止一下（特殊地区及特殊情况例外），以便能集中力量在已经进行反奸斗争地区和坦白分子中选择一、二典型地区（如镇原庙曲三乡）由党的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进行研究，看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特务，有多少是党派关系，或其他关系，有多少是弄错的，及为什么弄错的。在这种具体研究中取得经验，再指导和进行第二步工作，并将研究结果火速报告西北局。

以上几点，只是一般提出，望各地能具体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执行。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给边区政府党团的通知

——马义等八项职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①

十二月十七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

(一) 藁县、米脂两县县委委员会改为县政府，马义作葭县长，贺秉章、马济堂任米脂正副县长。

(二) 西川办事处改子洲县，谢怀德任县长。

(三) 吴铁鸣兼陇东中学校长，万成章任副校长。

(四) 王子宜兼任法院副院长。

(五) 杨一木调任物资局二科科长。

(六) 黄静波调任粮食局局长。此致

林伯渠同志转政府党团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关于人事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①

十二月十七日西北局委员会对于徐向前同志十二月七日来信决定：

(一)第三大队队长赖光勋同志补为七大代表问题由谭主任②详细审查其历史及工作后再行决定。

(二)雷钦、许风翔、李呈瑞、叶明四同志已参加学习组，文件亦发去。余益之、王英高二同志决定不参加。此致
联防司令部
政治部谭主任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② 谭政。

西北局社会部 审讯工作基本条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为了正确的进行审讯工作，分清案情的是非轻重，实行对犯人的感化争取方针，并防止某些偏向，西北局社会部根据各分区暨各县市反奸斗争具体情况，特规定审讯工作基本条例于下，望各地各级保卫机关务必切实遵行。

(甲) 审讯工作上必须严禁的事项：

一、凡未有确实证据，及未被审讯证实确为反革命之人犯，审讯人员不得只凭主观推测肯定其为反革命分子。

二、严禁“车轮战”的审讯方式——即派人轮班审讯，不准犯人休息，拖得犯人精神失常，而勉强得到口供的方式。

三、严格禁止肉刑及任何变相肉刑的行为（如罚站，罚坐，不准睡觉，不给吃饭，罚冻，罚晒太阳，拔胡子，抓头发，限制开水吃，限制大小便等等）。

(四) 禁止假枪毙、假刀杀、假刑审（如假电刑及法庭上摆列许多刑具等）、假刑声（如法庭隔壁房内假的施刑声音等）等威吓犯人的行为。

五、禁止指供的审讯行为。不得指出人名，指出事实，或

随便安罪名叫犯人承认。

六、严禁打骂及一切侮辱犯人之行为（如捆、吊、打耳光、拳打脚踢、谩骂、污辱、唾面等）。

七、不得专门利用犯人生理上的变化（如女犯在月经中所引起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与身体上的弱点（如犯人病中病后所引起的生理与心理变化）当作审讯工作的便利。

八、不得轻信口供（不是不信），应注重证据，辨别口供的真、假、轻、重、大、小。

九、对犯人供词不得增加或减少，必须保持犯人口供的原状。

十、在审讯过程中，如犯人实行夺枪、逃跑、自杀、打骂审讯人员、喊反革命口号，或公开发表反革命言论等行为时，审讯人员有权当场设法严厉制止，并给以适当处分，但不得伤害其生命。

十一、严禁接受犯人及犯人亲属朋友的任何私情、贿赂及苟且行为。

（乙）审讯工作上必须执行的事项：

一、审讯工作必须实行调查研究，注重证据，实事求是的方法，以劝导、严肃的态度进行之。

二、审讯人员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必须耐心周密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亲身阅读犯人的各种有关材料，如各种证明信、犯人有关的谈话材料及整风笔记、生活日记、来往信件、文章小说、保卫机关的侦察材料及一切证据等等。从犯人一切现有的和可能搜集的各种材料中去研究他的全部历

史，研究他与各方面的联系，研究案情的性质与证据的真实性。审讯人在未研究材料前，不得正式进行审讯（侦察性的谈话除外）。

三、在进行审讯某一案件时，审讯人员必须亲自或派人到犯人有关的地方去进行调查，开调查会，研究材料。

四、实行监狱侦察制度。派自己的干部及利用犯人进行狱中侦察，搜集犯人在狱中的日常表现、心理变化、各种活动、企图、动向等一切材料。

五、实行侦察审讯制度。在未正式审讯时，必须首先进行侦察审讯工作，从犯人的口中调查他的历史，了解他的个性、心理、平时表现、他对法庭的企图、他的长处与弱点、假象与本质等等，做为正式审讯的准备。

六、审讯人员要细心的将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发现矛盾，找出中心和关键，记写审讯笔记准备审讯。

七、必要时实行陪审制度，在正式审讯时由一人主审，一人或二人陪审。

八、必要时〈实行〉审讯会议制度，凡参加某案审讯的主审及陪审人员，必须在每次审讯前召开审讯会议，共同研究材料，商讨案情，定出审讯计划，决定此次审讯的目的、策略、方法、态度。在审讯后，要共同研究口供，辨别真伪，写出审讯人对此次口供的判断，及下次审讯的方针。

九、实行劝导的与严肃的审讯方法。用宽大政策与恳切态度去感化犯人，以动摇犯人的思想，必要时用必要的材料（或人证，或物证，或事实，但不是把所有证据都拿出来）去

进攻犯人，以打破犯人的狡辩。审讯中禁止（甲）项一切违禁行为，同时也应反对审讯工作中的自由主义（即是完全跟着犯人口供转，自己无主观，或把案情拖延很久处理）。凡证据确实，而坚不承认的犯人，不能任意认为是无罪的分子，而应以各种适当方法去攻破其强辩与狡滑的企图，最后应按罪分别轻重处理。

十、审讯人要搜集一切反证，允许犯人提反证，反驳是非，讲清道理。在审讯结束，犯人不服时，允许上告。

十一、每次审讯，无论正式审讯或侦察审讯，要有记录，发问和答供都要如实记上，不得虚写一字。

十二、每一审讯口供，必须交该人亲阅（如不识字的要一句一字念给他听），并签名画押；犯人对口供某些不同意的地方，应允许其修正。每一案件在审讯终了时，主审与陪审人须根据确实证据与侦察审讯中证实的事实，提出意见书（共同签名盖章）说明该犯有罪无罪、罪大罪小，及如何处理之意见，呈交上级核阅。

（丙）审讯工作上必须遵行的事项：

一、凡参加审讯工作的人员，必须有奉公守法的精神，必须认识这是对革命最负责的工作，不能丝毫夹杂任何主观片面和感情的作用，应自觉的遵守审讯工作的一切条例与一切纪律。

二、凡违犯（甲）项严禁事项者，按其轻重给以处分。

三、建立检查工作制度与总结工作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保卫部门应召集会议，检查与总结某一时期、某一案件的审

讯工作经验，从实际工作中去教育本机关与各机关参加审讯工作的干部。一切保卫工作人员都必须有最高度的从实际中学习的精神。

四、审讯人员应绝对遵守秘密，凡不能使犯人晓得的秘密材料，审讯时不得暴露；对审讯无关的人员，不得泄露和谈论任何有关案件的一切秘密，违者应以犯法论。

五、陪审人员须在主审人问话完毕时方能发问，记录员不得在审讯时插话，不得任意增减供词。

六、整理口供送交上级时，必须将犯人的履历、逮捕的根据、审讯的方法、犯人变化的过程、主审人对供词的判断等记载上去。

西北党校教育计划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 教育方针

西北党校为县区级、营连级的干部学校，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干部对革命事业之无限忠心，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干部对敌、顽、特务斗争与对根据地各种建设（战争的与和平的）的实际工作能力，消灭文盲，养成自觉遵守纪律之习惯，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作风。

为此目的，不论前方后方来的干部，凡未经过整风审查者，首先按照文化程度（而不是按照职位）高低编入二区、三区进行整风审查，以便在思想上初步解决无产与非无产（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等，特别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应成为主要的任务），在政治上解决革命与反革命，这不仅是教育计划的重要部分，而且是贯彻教育方针的必经步骤。

为此目的，干部经过审查之后（除特务外），立即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党建教育、理论教育，在此四项教育全部过程当中，要贯彻党的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要使每个干部懂得党的历史经验，领会党的具体政策，学习毛主席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高司令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并能把所有这些应用之于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全校整个教学过程的基本内容。

但由于学生文化程度之高低不齐，而具体教材之规定教授亦不应雷同一律，因此我们对于没有文化或文化太低的工农干部，首先与着重文化教育，提高其文化至相当于高小程度，能看《解放（日）报》或《群众报》，能写工作报告或会议记录。然对于文化程度高的干部教育之中心，应当放在政治教育上面，提高其政治质量，加强其党性锻炼。

教以致用、学以致用之原则，必须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教材之选择应当是重质不重量，以能懂能用为原则；教学之过程应当是由具体到抽象，由现在到过去；教学之进度不以时间为标准，而以问题弄清楚为标准；教学方法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自习与讲解并重。“填鸭”方式固然要反对、废止，然只让同学们自我学习，独立思想也是不行的。

在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实际材料和《解放日报》应充分利用之。

（二）教育计划

甲. 整风审查时间除外，学制暂定为二年。（注：除去寒暑假八十天，生产三十天，星期日八十六天，假日二十八天，实际学习时间则为六百一十天左右）。

① 指陕甘宁边区保安司部司令高岗。下同。

乙. 课程：除整风、军事两门外，计有：

1. 政策课；
2. 党史（或叫党的建设）；
3. 文化课；
4. 理论课；
5. 游击战争的一般常识（或叫游击战术）。

丙. 编班按文化之高低两级授课，文化程度高的（相当高小以上的程度）不上文化课。文化程度低的（相当初小程度及至文盲）不上理论课。为组织教学及管理方便起见，文化程度高的编若干支部，每支以不超过五十人为限；文化程度低的亦编若干支部，每组以不超过四十人为宜。

丁. 课程内容及时间

党的政策：

内容——中央关于十大政策的指示，及西北局关于各种政策的决定。具体内容由西北局订。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教员——林主席。

军事政策。教员——张经武。

防奸政策。教员——周恩来。

统一领导。教员——高司令。

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教员——马国瑞。

整顿三风（以整风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他们）。教员——彭校长。^①

① 彭真（中央党校副校长）。

审查干部（以审查干部的经验来教育他们）。教员——李景波。

时事教育（包括督促看报，及作时事报告和时事座谈及讨论）。教员——李卓然。

“三三制”政策。教员——刘景范。

减租减息。教员——贾拓夫。

其他（及以后）中央和西北局决定之各项政策课以贾拓夫同志为主讲人。

教学——高低两级一块上课，分别讨论，讨论之后提出问题由教员一块解答。

时间：高——占全部学习时间 35%，约 1428 小时，讲与自习为 1：4。低——占全部学习时间 20%，约 876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党史（或党建）：

内容——党章（可以用七大通过之“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教材）。教员——陈正人。

西北党史（以高岗同志之《边区党的历史检讨》为教材）。教员——高司令。

中国党史（七大后再讲）。教员（将来再定）。

教学——与党的政策课大略相同。

时间：高——占全部学习时间 30%，约 1224 小时，讲与自习为 1：4。低——占全部学习时间 15%，约 612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文化课。只低级班上（内分高、低两级授课）。教员由本

校解决。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 60%，约 306 天。各课具体分配如下：

国语：

目的——能看报告，写报告、看指示，写指示，作调查记录，给党报写简要通讯，能看《群众报》或《解放日报》。

教材——较低的班（文盲至识字五百左右）除选用西北局宣传部编印之《初级文化课本》外，再另编印有关读物。

较高的班（能看《群众报》，写作有困难，文化常识贫缺），编选以叙述文（格式是多样的）为主的模范文选。

教学：低——着重在识字、讲解、初步练习写作。高——着重在阅读的指导及作文上边。

时间：低——占文化课 60%，约 1469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高——占文化课 40%，约 979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算术：

目的——能学得调查统计，大量地折算度量衡、累进税、债息、各国度量衡换算，与日常生活工作的算术知识。

教材教学——准备以徐老主编之《中级简明算术》作课本，选教整数、小数、四则分数（包括百分法、利息折扣）、求面积等问题，再以中央党校新编算术中之练习题为辅助教材。

时间——低——占文化课 15%，约 367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高——占文化课 15%，约 367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历史：

内容——讲授一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道理与事迹，将社会进化与事迹、人物、年代从黄帝到“五四”运动。综合编辑讲授。

时间：低——占文化课 7%，约 171 小时，讲与自习为 1：1。
高——占文化课 15%，约 367 小时 讲与自习为 1：2。

地理：

内容——使其懂得中外地理形势概况，解除读报痛苦，将自然地理与军事、政治、经济地理联结起来以总、分（各省、根据地特别地区）、合的原则来编辑教材。

时间：低——占文化课 10%，约 245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高——占文化课 15%，约 367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自然卫生：

内容——使其懂得习闻常见的自然现象（例如风、云、雷、雨）、日常生活的卫生常识，编辑自然教材时，与边区的经济建设联系起来，而卫生则应从边区为害最多之病疫以及群众尚未建立之卫生习惯出发。

时间：低——占文化课 8%，约 196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高——占文化课 15%，约 367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理论：只高级班上，目的是以毛主席之思想来教育干部提高干部。

内容——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

共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教员——陈正人；战争与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教员——徐向前）；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教员——杨清）；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员——李卓然）；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教员——白栋材）。

其他：

教学——采取先个人阅读，提出问题，然后请教员报告之后组织讨论，如在讨论中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人解答。

时间：占全部学习 30%，约 1224 小时，讲与自习 1：4。
游击战争一般知识：由贺晋年同志担任，教材内容由他自编。

时间——占全部学习 5%，约 204 小时，讲与自习为 1：2。

戊，组织教学应每学期以一门作主科，以一或二门作副科，根据由具体到且〔抽〕象之原则，本年度之第一学期高级班应以政策课为主科，而副之以党建课（只上西北党史）；低级班以国语为主科，而副之以算术与政策课。

西北局关于边区 九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边区党九年来，随环境条件变化，接受党中央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工作过程，为便于叙述，可分三个阶段。

三五年冬到“双一二”，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阶段。这时内战尚极残酷，蒋介石亲到西安，企图最后消灭我们。日本帝国主义酝酿华北“殊化”，企图在“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烟幕下，利用国民党不抵抗的睦邻政策来不费一弹一矢灭亡中国。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时，我们在边区境内实行了改变土地政策，由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募捐抗日经费，以支持战争需要；改变了肃反政策；释放与医治俘虏的白军高级将领如师长牛营〔元〕封〔峰〕之流，释放过去专门反共而被俘后表示愿意抗日的××师政训主任王××；支持红军东出开赴抗日前线及西征找寻团结抗战的战争；团结当时抗日情绪比较明显的东北军与西北军。

在一切这些工作中，边区的党政军民曾付（出）很大血的代价，才换得国民党统治者回心转意。

这一阶段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被贯彻到底执行着，左的关门主义残余和右的新倾向，都不起什么作用。

“双一二”事件后到三八年边区政府和留守处的“五一布告”，可说是统一战线形成后边区党内右倾倾向发展到投降路线的第二阶段。

这时之初，从“双一二”到“七·七”，边区党接受了中央关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的指示；举行边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实行了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将苏维埃政府转变为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特区警备部队与地方保安队；执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行为拥护国民党，实行蒋介石先生诺言，实现全国民主政治对日抗战与三民主义。

可是，国民党却不真诚实行蒋先生之诺言，虽然停止了内战，仍不坦白承认国共合作，而以“共产党投降”之诽词，毁谤我们；利用我各个苏区不甚联贯的空隙，仍然鬼鬼祟祟，布置消灭我神府苏区及其他边远地区之红军游击队与地方苏维埃政权。有的幸经我发觉，未中狡计；有的地区却吃过大亏。同时，却进占住〔驻〕我定边县属之安边堡，靖边县属之宁条梁等。

“七七”虽然日本打来，国民党只进行应战政策，仍不允许我们参战。直至敌人晋绥，始勉强准我抗日，但其欲借机消灭我们的阴谋并未放弃。

此时，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右倾思想在边区党内却随和平实现而开始发展起来了，如在转变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时，却实行完全没有必要的自动取消红宣县、赤安县、子长县、赤源县、秀延县等特区内部为行政便利的区域划分与名称；在改编部队时，借口经费困难而裁减与遣散许多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工农干部等。

党的十二月会议前后，正是太原、上海失陷，国民党的中央与前线正在混乱逃亡不暇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浪潮发展到最高涨的情况，国民党还顾不来压制抗日运动，他想消灭我们的心力相违之时，边区党内的右倾思想，由张国焘[焘]、郭洪涛所代表，而向投降主义的路线发展了。他们被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冲昏了头脑，满足于国民党当局的片面应战，认为一切都好了，甘愿俯首臣服，硬要一切经过人家，一切服从人家。因此，在划界时，使边区的红宣、横山、葭芦、固北等四个县全划给了人家，把定边的砖井、公布井一带；盐池的八岔梁横城一带；靖边的诸冈湾一带；神府的镇羌堡、大小保当附近一带也不要了。另外还在边区内部分出所谓统战区，其中包括陇东、关中、绥德三个分区和现有延属在延安、延川、延长、宜灵、志丹；或者是放弃了原有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承认了二重政权，至少也是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合法的据点，使边区领域大受损失。大大小小的政治土匪出现了四十多股，以宁夏为后台的赵老五，以安边为后台的[口口口]、张廷芝等著匪到处抢掠。二重政权的保安队在我们面前大摇大摆，背过我们就进行瓦解我党政军民学的

组织和抢人暗杀，甚至虐待与蹂躏抗工属的活动。当时弄得延安附近就抢人，甚至曾出现过截刺周恩来同志的惊人事件。此时，地主也企图复辟，各县地主向农民要土地。过去和红军游击队或县区乡党政干部结婚的女人，也被二重政权的政府认为不合法而挑拨民间争夺诉讼……。尤其是不只农民，连党员干部也闹糊涂了。张国焘本人开小差，下面的落后党员干部也有的开小差，有的消极不干。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甚至也向农民要土地。在职的子长县委书记，为了参加抗敌后援会而将自己的履历向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填表请求委任。陇东的党，把给上级的报告和表册交国民党邮局寄递，经兰州、西安才来延安。在让地、让政权时，也曾将自己的部队让人，如李振海所带的游击队，硬是将部队给人家，将李同志另调工作。

此时，国民党当局又借口调遣军队，把许多杂牌军队调来调去，过往边区，扰害人民，图谋不轨。最显著的如姜云台旅，原说道经定边，结果到定边后却驻下不走，开嫖放赌，把定边城关的社会秩序弄了个一塌糊涂，反而封锁我城内驻军，不许进出，简直喧宾夺主，几至巷战。

总之，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正确路线为主，右倾思想颇为发展。到了后期，右倾思想发展成了投降路线，竟在边区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边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边区一切，可以拱手送人，不只卧榻之旁任人鼾睡，甚至共产党人的头上可以任人舞枪弄剑。

从三八年“五一布告”到现在，是坚决执行巩固与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边区党把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与巩固的核心。因此，这一工作过程，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五一”到三九年底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时期。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后期和相持阶段的初期。全国的第一个抗日高潮逐渐过去，亲日派准备投降与国内分裂；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前面进攻我们，炮打宋家川；国民党的反动派在边区的内部、边区的周围不断的向我们挑衅磨擦，他们“溶共”、“限共”之不足，又行所谓“防制异党办法”，企图消灭我们，走向对日投降；“他们用尽造谣污蔑的手段，挑拨邻区人民、邻区政府、友军部队、哥老会以及少数民族等对于边区的恶感，以掀起危害抗战团结的磨擦；他们不但在边区内外遍设特务机关，实行所谓暗中包围，而且还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点线工作……瓦解边区；他们组织土匪……达四十余股之多；他们用暗杀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他们用封锁办法、绑票办法来隔断边区同邻区交通；他们挑起的事变有陇东事件、栒邑事件、瓦窑堡事件、杨家园子事件、延川事件、靖边事件、神府事件、鄜县事件等，对边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他们侵占去边区十个区、七个半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节录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岗同志在边区二次党代表大会报告）

在上述情况下，为巩固边区，保护人民利益，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边区党根据党中央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

指示、三八年六中全会决议及三九年六月十日反投降指示与十月十日决议而有三八年五月边委关于应付挑拨及破坏边区事件指示、关于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五月十五日边府与留守处布告、三九年三月的统战部长联席会议、边委统战部给各分委县委的通知、边委给各级党政军关于统战问题指示信、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磨擦问题指示（五月三十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指示（七月二十九日），给绥德分委关于统战工作及党的群众工作的指示，以及在三九年春季召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颁布边区第一次施政纲领；冬季召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等决议与布置。经过这些步骤，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斗争和坚持团结，才制止了顽固派的分裂内战和对日投降，也克服了我们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同时坚决执行了党中央自力更生的指示，展开边区的开荒运动，使边区军民在断绝接济与封锁中未至饿死，保存了全国坚决团结、抗日、民主的中坚力量。

从四〇年到四二年的高干会，是第二时期。

英美苏被欧战拖住，日本以诱降为主，除使汪逆粉墨登台外，还欢迎蒋回南京，汪逆亦申明甘愿让位。两次反共高潮就在此际出现。顽固派阴谋以反共献媚日寇，密颁“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调动二十万大军包围边区，沿边境又筑碉堡封锁；何绍南捣乱于警区五县^①之内；九十七师等部队则攻栒邑，夺宁县，占镇原，而

① 指绥德警备区之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五县。

陕甘两省当局尚集中大军计划进攻庆阳、合水、淳化、鄜县、延安；更于西安、汉中设立劳动营，拘囚爱国青年，办理特务训练班，上磨擦课，专门训练“反共人材”。

边区党根据中央四〇年二月一日、七月七日诸决定及四一年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指示等，曾有边区周围磨擦问题指示（四〇年七月二日）、国民党公开机关在边区进行特务处理办法（四〇年四月十五日）、给关中分委关于反磨擦斗争及三种不同军队之不同策略指示（四〇年四月五日）、关于警区农民索取土地问题指示（四〇年四月五日），并于四〇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四一年“五一”又颁布边区施政纲领，冬季召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使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更能切合实际与具体化。

在反磨擦和实行“三三制”过程中，都发生过偏左偏右的倾向。在反磨擦中以偏左倾向为主，个别事件上，个别干部能掌握有利，但却不太熟悉于有节的原则。在实行“三三制”时，起初是“左”的关门倾向，不敢让富有者进来，接着便走向右的尾巴主义，一切惟地主绅士是从。这些左右的摇摆，边区党在发觉之后，均曾予以适当的纠正。

从高干会到现在是第三时期。

日本的诱降政策更加活跃，正面战场几至静寂，大批汉奸派到重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更向准法西斯独裁方向迈进，用五十万大军和三道封锁线包围和封锁边区；用绑票办法，断绝交通；用抢劫办法，侵扰交界区乡；去年七月，更拟闪击延安。

经过高干会，首先纠正了打出去的思想，指明建设边区的方针，纠正了“三三制”中的左右摇摆；建设工作中的样样模范；贯彻了农业第一；自己动手，发展合作事业，使边区境内的党政军民及外来移民都做到了丰衣足食。我们经过“三三制”实现了各抗日阶层的民主团结；经过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合作社，组织了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合作；经过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避免了农村中的阶级对立。

九年来，边区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革命政策，才克服投降主义，渡过困难年月和三次反共高潮，并建设和发展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为推动全国进步，准备反攻，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西北局组织部 关于审干工作的提纲*

(一九四三年)①

进行审查的目的：

(一) 揭露混进机关、学校、部队中的日本间谍、汉奸和其他破坏分子的面目。

(二) 暴露我们的干部工作人员思想上、行动上的缺点错误。

(三) 审查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能力、特长、不足。

政策：

(一) 以宽大政策，不抓不杀，争取破坏分子悔过自新。

(二) 以自我批评实际教育干部纠正缺点。

(三) 以其所长决定每个干部的工作岗位。

方法：

(一) 整风，自己反省。

(二) 坦白运动，说老实话。

(三) 对破坏分子不自省者进行劝说。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西北局组织部关于 执行审查干部政策的简要总结*

(一九四三年)①

一、查清日本特务、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抗战以来，大批各职业界的人士到边区来参加了各种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热心抗战建国工作的，但也有一些敌探、汉奸、破坏分子混进了党政军民学各个系统、各个工作岗位，以“革命”的面目进行破坏活动。我们为了巩固抗战力量，巩固民主经济等各种建设，必须把这些分子清查出来。

估计到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经过教育感化是可能回头的，可能不再继续作破坏活动的，因此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宽大政策，争取其悔过自新。为此目的，采用的具体方式是整风运动要他们自己反省，坦白运动号召说老实话，劝说运动促其自觉。个别不愿反省坦白者，进行感化。这样的结果，敌探、汉奸、破坏分子×××人向我们悔过自新了并交出了他们的各种罪恶的证据。对这些人不仅未严加治罪，而且仍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二、教育干部纠正自己思想上行动上的缺点错误。我们的干部和每个工作者，其出身各不相同，到革命阵营来的时间先后不一，工作中的锻炼时间长短不一，因此有些人在思想上行动上是存在着毛病的。但在自己尚未了解到革命者的态度应该是坦白忠诚的时候，是没有勇气暴露自己弱点的，我们要揭露这些人的错误，以具体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错误的根源，给他们指出改正错误的方向，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彻底改正过来。为此我们采取了学习整风文件，反省自己的思想行动，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自己所有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作的结果有×××人说出他们曾经隐瞒过自己本身某些问题，以及某些时候违犯过群众利益和政府法令等各色各样的事情。

三、鉴于干部的才德，发挥其所长，增强工作效能。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办事的才德有强弱之分，工作经验有多少之别，同时各有所长，各有欠缺，为了因才器用，发挥其所长，发挥其经验，亦赏〔偿〕其不足，使之更能胜任其工作，进一步增强工作效能，因此采取了细密的检查工作，奖励工作优越者，教育工作落后者的办法，结果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把这些干部提升了工作岗位。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适于原来工作的人，换掉了这些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是大大的增强了。

西北局关于精简工作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①

精简工作，根据现有材料，总结如下：

(一) 精简前

精简政策提出之前，边区各学校、群众团体及各分区有以下的情况：

一、部门太多，虚浮而铺张。当时边区各群众团体都有四——六个部门（边妇四，青救六，工会五）。延安市青联，正副主席之下有地方科、青年俱乐部、少年团、中山图书馆、阅览室、体育会、秘书处、杂技团等八个部门（即使是去年二月才正式成立之边区文协，初尚有秘书处、组织部、美术工作委员会、出版发行委员会、大众化研究委员会、大众化工作委员会、语言研究委员会、《群众报》、《新文字报》社、新文字丛书委员会、新文字协会、戏剧委员会等十二部门，还附有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艺工作团，杂技团及民众剧团）；鲁艺在精简前，院长直接领导八个工作部门（总支委在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外）；旧延大亦有十个部门（包括各院系）；自然科学院也有八个部门；各分区各县之政府内分科太多。

二、人员太多。有的人没有充分的工作做，同时，各机关学校都有许多不从事生产的“家属”。当时边区三团体有工作人员一〇二人，鲁艺有工作人员二一八人（包括平剧团、美术工厂等在内），什务人员九十二人；自然科学院、西北党校、旧延大、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共有工作人员二九三人，什务人员一九〇人（五校学生只一四一三人）。当时西北局有干部一〇四人（管理员在内，但闲住之干部不在内），什务人员五〇人。当时四个分区共有脱离生产人员五七〇四人（按：警备区未将乡长统计在内），什务人员五六八人，共六二七二人。这一数字，比第一次精简后的五〇八三人尚多出千余人，更不比〔必〕说比现在了，当时有的县份内，工会与县青救还保有三——四个干部。由于人员太多，有的人就没事作（如旧延大收发科三人，其实只一人作事），有的机关内干部无事，或看书，或时常回家。

三、各机关学校的部门相重复，人力物力分散。当时边区各团体都有自己的秘书处（从秘书、管理科以至于收发等），都有自己的巡视团，鲁艺、旧延大、科学院等校都有自己各色的工作部门；旧延大有中学部，自然科学院也有中学部，此外，学校多了，图书材料也不集中。

四、有些组织机构流于形式。这主要地表现于县、区、乡级，如群众团体工作因抓不住群众要求等于虚设；有的地方工人成份已起变化而工会组织不变；有些合作社因未能掌握

政策而流于形式。此外，以前各县县区级都有许多委员会，有的负责人天天忙于开会；有的县份（如清涧）乡政府下之锄奸委员会内也设有组织及宣传之名义，有的地方优抚委员不兼任代耕队长。

五、对干部标准未曾规定明确条件。各校对学生亦然；各县对小学教员当时亦未甄别。

六、机关内什务与干部人数之比例：学校内工作人员（干部与什务）与学生之比例没有规定，例如当时西北局干部与什务之比例大约是二比一；边区三团体有什务五三人，干部只一〇二人；各学校（鲁艺在外）内工作人员与学生之总比额为四八三比一四一三，约为一比三，即学生三人就需要工作人员（干部及什么）一人；当时各分区、各县之什务人员亦嫌多了一些。

七、当时因尚未实行干部的统一管理，所以各县各分区党委未能调动群众团体或其他部门干部来充实下层，亦未改变其组织形式。

八、机关内部因人多，手续亦多，遇事要多经周折；又因各部门（如群众团体）分立，各部门都以自己工作为中心，比他人的要重要，散乱了下层干部与群众的注意力；又因未实行一元化领导，各地党委、政府对营业、税收等机关不加或少加管理、领导，没有注意抓紧掌握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等。

九、当时不论是各团体、学校与各分区，工作中都多少存在着事务主义；各团体、各学校对自己机关内的干部情况、精简情形没有加以研究，统计数字不确（其中要算各团体较

好)；各分区则忙于动员工作，经常工作差，而动员工作则都以零星动员工作居多。清涧城区一乡自前年六月到去年六月一年内财物动员达三十四次之多(人力动员在外)，财物之总数并不大。这种动员每次均须经传达、开会、干部下乡、分派(摊开)、催收、开会清算结束等手续，这就是繁政之具体表现。

十、机构的变动性大(尤其是学校)，干部的流动性大。各学校在精简前都先后经一到三次的大小变动，在变动中或在平时，工作人员变学生以及学生变工作人员的事例太多；各分区组织机构变动虽少，但干部经常流动，有时全县或全区的主要干部均全部换成新的，这对工作有时会有些影响，有时有些干部到任未及半年即受调动。此外，还有一件重要事实，即干部不安心工作的人相当多，如青救、妇联很多人都不愿安心工作，各分区下层也有这种现象。

(二) 精简中

除鲁艺、旧延大、自然科学院的第一、二次精简是在中央文委领导下，新文字干部学校的初次精简是由中组部通知办理外，各分区和西北局、边区各团体、西北党校、民族学院自始至终都是直接在本局领导之下进行精简，鲁艺、旧延大等之最后一次精简才由本局领导。

一、机构变动与人员减缩。西北局的三次精简都减缩了人员与科别，共减少干部十七人，取消了民运部、直属县管理委员会；改四局为调查研究室；宣传部四科并为二科，另设一行政处；边区各团体第一、二两次精减只减少“科”，未

减“部”，至最近才彻底裁减“部”及巡视团，干部人数由一〇二人减至目前三〇人，将来尚可减少（他们的下层机构的精简——第一次，以及妇联的第二次，是他们自己筹划的，但第二、三两次则是地委、县委领导实施，他们自己未直接指导，下层于精简后亦未来报告，不过在第一次精简中已将区工会、区妇联加以部分地裁减）；西北党校去年第一次精简中减去一直属校长领导之干部科，并将各处下之科略行合并，当时未减人员，今年春第二次才减少人员一四三名；鲁艺初次精简只改编机构，减干部五人，什务与学员反而增加，第二、三两次除机构大有变动外，各色人员均行减少（什务还增加）；自然科学院初次只有机构变动，未减人，学生反见增加，最近一次虽减了一些，但亦增了一些，初次精简前全校工作人员一〇三，学生一七一，今工作人员一〇八，学生二〇五；旧延大以前之机机〔构〕原不若鲁艺铺张，到今年一月才将机构紧缩，但生产机构扩大，到今年二月底，因实行整风，将原来机构又加紧缩一些外，另成立由校长指定之十五人的委员会领导整风，并领导教务及总务工作，委员会下另成立各院系各部之学分会，计有六个学分会，至最近才将各院系裁减，留下社会科学院（下设三系并附一研究室），除大批干部调出工作外，其余人员尚在新延大内，由三人组成之整风委员会（下有三分会）领导整风。新文字干部学校以前曾为特务分子侵入，他们竟敢排斥优秀人员，造成学生对党不满，去年九月由中组部加以改组，洗刷不良人员，最近该校成为延大社会科学院下之一系，工作人员除另分配工作外，有数人

参加学员内整风，学生减至三十六人，以前机构全取消，由三人组成之委员会领导整风；各分区、各县之政府二、四、五科实行合并，县、区、分区之群众团体减缩，保安科成为县府之一科，司法处由县长兼任裁判员。

二、机关学校的合并与精简的普遍深入。由第一次第二次的分别各自实行精减，进到第三次的边区各团体合并为“抗联”，各学校合并为新延大，这样就减了“秘书处”很多，统一了行政，节省了很多人员（以前每一学校、团体自秘书长至收发，样样俱全）。此外，精简之发展也注意到了不脱离生产人员之精简（如警区已将乡政府六委员会改为四委员会；清涧今春已将四委员会也取消了）以及小学教员之审查、裁减。

三、人员的甄别。在初次精简时，有些同志尚认为精简等于裁员，到第二、三次精简时才更加注意到挑选干部及学员之标准，并对在职人员按标准加以甄别；有的机关在开始时虽亦曾规定标准，但尚嫌模糊，至第二、三次才渐趋具体、明确，如民族学院初次精简时只说身体不好，不能培养成少数民族工作的人应当减去；第二次精简时规定：不能做少民工作，有病或年老不能学习的，家不在少数民族区以及不堪造就的人一概减去；第三次规定最简明：留下的学生标准是：年轻，进步快，将来能作少民工作，且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又如自然科学院以前甄别学生的条件不具体，今春依本局指示，规定学生之条件如下：（1）政治上无问题；（2）身体好；（3）有开展；（4）干部子弟。清涧县今春甄别小学教员之标

准如下：（1）政治上无问题；（2）称职；（3）在群众中无不不良印象者。

四、行政合理化。如西北局增设行政处，划分秘书工作与行政工作于二处；旧延大以前有好几个会计，精减后会计工作亦集中；以前鲁艺直属院长领导之单位有八，今则减为六个（目前尚在变动中）；旧延大之领导单位亦减少，整风后实行集中领导，由整风学委会负责一切，员生称便（以前各院系有分支部、学生会和班部，都是领导机关）；各县上下行文一律经过县长；保安科、司法处也由县长领导；各分区实行统一管理干部，统一管理生产工作（以前县级各机关生产，有些地方是分散的）。

五、生产机构与经济部门的扩大。西北局到目前为止，生产单位有三个农场，又有皮坊、磨坊、杀猪坊、木炭厂、石炭厂、豆腐坊，又有生产科所营之商业部门，目前自种及按庄稼之田地已逾千亩；三边分区最近一次编余人员八十四人中有四十四人转入生产部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绥德分区编余人员中有三十五人转入生产；鲁艺每次精简后，生产门亦扩展；花样增多，如清涧由主要干部组织生产委员会，县委书记主任；延属分区仅东三县及郿县共有二十五人转入生产部门（均指最近一次精简后，生产的扩展以最近最为显著）。此外，尚须特别提到：各分区最近新增设物资局、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等，这些机关的干部还不够用。

六、业务条例之订立与工作制度的建立。去年春西北局各部门订立业务条例，后来陇东也着手订立业务条例，但这

一工作在全边区尚未普遍深入，工作制度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建立，下层尚在开始。

在这里尚需根据现在材料对各分区第三次精简情形作一叙述：

第三次精简各分区均事先曾有通盘筹划，如陇东分区当各主要负责人尚在延安开会时即进行协商，征询各县负责人意见，绥德地委亦事先研究干部的能力、政治、思想，考虑各人的去留，征询各部门及各县负责人意见（只是决定分区抗联会人选时，未与边区抗联会商讨），各县亦首先了解干部情况；西川县还因为对区级干部不大熟悉，县委派人到各区了解各人情形并征求意见。

各县传达精简政策，都与传达高干会整风精神相结合，说明三次精简是彻底精简，是要加强下层，加强生产部门，降级使用干部。各县都是二月底三月初才开始传达，直到四月底，调动之人员才到新职，比原先规定之时间为迟。

各县在配备人员上注意以下方向：(1) 加强政权干部。如绥德分区抽调两个县书任县务委员会主任（县长），此外由地委、县委干事、区书、区委委员调任政府科长、区长、助理员、乡长、文书等尚有二十二名，陇东朱敏、苏耀亮等人调任副专员及县长，又有几个县委部长调任政府科长与秘书，鄜县县委调五人、群众团体调四人到政府中工作，保安科增一副科长及科员。(2) 加强生产工作部门。陇东调分区工会主任及好几个优秀区长到生产部门，各分区各县均有大批人员到生产部门。(3) 充实区乡。如绥德分区四十九个区中新任

区长有二十一人，党政民部门转入乡级的人有五十五人；三边分区有八人到区工作，十五人到乡工作（靖边未计入）；延属分区仅鄜县及东三县有三十七人到区工作，二十五人到乡工作。（4）加强边境干部。如陇东调县组织部长三人及副部长二人到边境任区书，又派曾任政府科长的二人到边境任区长。（5）加强与洗刷教育干部。如绥德分区曾于今年二月进行小学精简与教员甄别试验，将完全小学从二十八减至二十四，初小一百八十六合并为一百六十六，不良之教师，加以淘汰；米中、绥师亦进行甄别师资及反特务斗争；陇东六个县的完全小学在精简前，教员、校长中有党员十五人，非党二十四人，今有党员二十六人，非党十五人；鄜县也进行审查教员，撤换七个坏分子，十四个低能的，派了六个党员到学校中；延川淘汰了五十七名教员，他们除个别任乡文书外，余均回家。

这次精简干部调动很多，绥德分区调动工作的占百分之五十八（按：该分区原有干部一〇三六人），陇东干部调动已知者有九十八人以上，三边分区调动八十人（靖边在外），这些调动主要是转移岗位或降级使用以充实下层。提拔上升只是个别现象，但不是没有，如陇东各县建立县组织部副部长一职，准备培养组织部长或县书人才；定边调一个区书任县委副书记等。

新编制全按西北局、边府之规定，由于以前有些地方干部有缺额，整编后党委人数反见增加，如绥德分区地委精简前二十二人，今增为三十四人；六县县委前四十三人，今只

有三十八人（缺额二十六人不在内）；陇东地委前三十二人，今三十八人（什务均在外）；关中地委与省委合并，一百六十人尚剩下六十人；专署与县府按规定将一、三科，二、四、五科合并，人数减少；陇东专署前四十二人，今二十五人；三边专署今只二十一人，关中专署今三十人；绥德分区各县政府干部由一七二人减至一一二人，区政府由二七〇减至一七四。此外，陇东取消了交通运输局、调查站，地方卫生所与三五九旅医院合并，粮食调剂局只剩下一两人，改为一股；分区税务局与庆阳税务局合并；绥德分区也取消了市公安局及多余的委员会，减少生产单位；分区的各生产单位统一于专署与独一旅，各县由县政府统一领导。但绥分区银行与贸易机关未精简。

党政军民的精简的具体情形，因材料缺，仅以绥德分区为例来说明。

党委干部配备根据三原则：(1)建立党领导核心；(2)本、外地干部配合；(3)适合一定条件的工作任务。依此观察，地委领导核心已有了，本、外地人员配合也作到了，只是各部门有几个干事未经过审查（组、宣、统战部及《解放报》通讯处内部有一两个）。各县中，米、清、吴、西川本、外地干部配合好了，但清涧缺外来干部，如宣传部已无一人，吴堡的外来干部历史不清，葭县有些干部意识上有些毛病，干部团结上不正常，绥德宣传部长不善掌握原则，历史须审查。区委的核心，或已建立，或因区书调其他工作未补充新人，四十九个区区书缺额者有十个区；知识分子的宣传科长，近有

调入行政部门，四十九个区只剩下二十一个区有外来干部任宣传科长。

分区、县、区行政人员均减了，共减了一二七人（由四八三减至三五六），行政干部配备原则：（1）照顾“三三制”；（2）建立党在政府中之核心；（3）本、外地干部配合。今专署人员强，已符合上述原则。米、清、吴、西川政府主要干部均为较强党员，能起核心作用。只有葭县倪伟，政治上弱，历史不明，未形成强的核心。绥德县长非党员，缺第一科长，政务秘书政治上也弱，历史不明，亦未形成核心。至于“三三制”，除西川外，各县均有一两个正副科长为非党人士。西川的外来干部较弱，其他各县本、外地干部的配合作到了。精简以后，行政人员大大增强，除去一些特务分子，他们多是旧公务人员。贺秉章、马义等人转入政权工作后，在政府中形成核心。区政府人员减少一些，但配备得较精干，原有人员中有很多转入生产部门或回家，另由党委抽二十六人，群众团体抽三十九人加强区府工作。全分区有五分之二的区是新区长，较强。此外，精简后有五十五人到乡任乡长或文书。（这次行政精简中淘汰的大多为旧日公务人员，但近因干部不够，所以他们未淘汰净尽，如绥德市府委员五人，区主任（等于乡长）八人，除副市长为外来干部外，余均为何绍南时代公务人员。

群众团体按决定大多转入生产部门、学校、行政或党的部门：（1）分区留工、青、妇、文各一人，设一秘书，共五人，组织警区抗联。（2）各县工、妇、青各留一人，组成抗

联。(3) 区级一律取消，在有工作需要处（如西川盐场）可由各县提请分区留一两人。配备干部是从各部门中抽政治强、有相当工作经验的人、与群众有联系的人来任职，尽可能使本地干部。依目前状况看，工青干部较强，妇救弱，米脂、西川尚缺人选。

（附：陇东分区抗联会今三人，曲、庆、合每县二人，环、镇、华每县一人；关中分区全体群众工作者由一百二十多人减为今天的十八人）。

编余人员的处理法有：(1) 分配到县级，如三边分区各部门到县工作的有二十三人。(2) 分配到区级，如三边分区有八人（靖边在外），延属分区仅鄜县与东三县即有三十七人。(3) 分配到乡工作。三边分区各县（靖边在外）有十五人，鄜县与东三县有二十五人。(4) 供给生产部门。三边分区共四十四人，鄜县、东三县有二十五人，绥德分区三十五人。(5) 当教员。鄜县与东三县共十五人。(6) 去学校学习。三边十四人，鄜县与东三县二十六人。(7) 退伍回家。三边十三人，鄜县、东三县三十四人，绥德分区九十九人。(8) 养病。三边二人，鄜县、东三县共五人。(9) 分配其他工作（民教馆、检查站）两三人。(10) 未处理。三边十人（调回延安一人），延属鄜县与东三县七人，调回延安三人。

据绥德分区统计，“打回家”的干部原因如下：(1) 有政治问题十五人（国民党十二人，无党派二人，共产党一人）；(2) 意识不良四人；(3) 贪污腐化十二人；(4) 落后、不愿工作者十五人；(5) 不负责任的十二人；(6) 能力弱者二十

五人；（7）家庭困难的五人；（8）年老五人；（9）无适当工作者二人；（10）有病者二人；（11）有孩子之本地女干部二人。

共九十九人，其中国民党三十一人，无党派二十七人，余均为共产党员。

干部对精简工作的认识的改进与所发生问题的减少，标〔表〕明了精简工作的逐渐向前进步。在初次精简时，一方面因缺乏经验，一方面因有思想上的阻碍，所以发生问题较多，例如工会在第一次精简后，有如下现象：（1）逃跑三人以上；（2）有两三个县级以上干部不愿转入生产部门；（3）有三个县级干部告假回家，另调工作不来，在乡村中又给群众以不良印象（如卖大烟，活动当乡长等）；（4）未得适当安排（有病的人）者埋怨上级，计有七人以上；（5）取消了有些区工会以后，下层有些干部以为工会工作可以不要作了，乡工会没有头了；下层妇联干部被裁减者亦有怨词（有病的人与提拔——回家——提拔的人）。鲁艺以前裁减出去的干部，到后来发现其中有些人是有政治问题的。但最近一次精简，一般说来，不良现象与工作困难大为减少，甚至还有些好现象，如三边有些干部以前不安心工作的，而今愿长留那里工作。不过严格说来，不良现象在最近一次〈精减中〉还是有的，诸如：

（1）在未宣布何人回家以前，区级干部与县级人员中颇有不安心或疑虑者。

（2）区级、乡级干部想回家，或想在本乡本区工作，有

些人自动地回了家。

(3) 嫌新岗位地位低，不愿降级，陇东地委宣传部干事不愿就任区委宣传科长，背后出怨言。又一个从军队方面转来的老干部不愿当区书，等。

(4) 陇东有少数从军队转来的人想作经济工作，或找下干妈，准备退伍，或想改作地方工作可以自由些。

(5) 西北党校被调出的不宜当学员的人（包括以前当通讯、保姆、特务员、护士的人）出怨言：“斤三两小米不给吃了”，或讽刺他人“你们是好干部”，甚至骂人。

(6) 由于事前有些地方动员解释不够，所以三边转入生产部门的人以为自己“吃不开了”，绥德分区在精减绥师及小学教员时事先未动员，以后特务分子进行反宣传：“精简应当公开呀”等。

这次整编之进步原因由于精简与整风相结合，因而对于不良表现亦用与整风结合来克服，如陇东除事先召开动员大会进行解释外，复在整风会上对不良干部进行斗争；如华池县对前任组织部长史文俊，宣传部长李志诚进行了十四天的斗争。此外，还有采用个别谈话、集体说服，有谈到五次之多的。

(三) 精简后

精简以后，不但人员马匹（详另表①）减少了，预算缩减，

① 表缺。

而且有以下好处：

一、效率的提高。各分区第三次精简正完毕，尚未看出来，但边区各机关学校则已普遍感觉到，如西北局宣传部目前工作时间较前增加，效率亦较前高，干部科人减少，事较前忙；组织科人较前少，但工作强度亦未见减低；鲁艺等学校精简后效率亦提高；延大（旧延大）精简前，感到人手多，手续多，精简后则行政简速，员生称便。

二、领导作风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开始，然亦略见实效，如群众团体转向抓紧据点工作；分区、县开始采用调查研究方法以掌握政策；陇东等地在上半年规定集体学习，集体办公，厉行汇报制度，加速信件之答复，并建立一般工作制度等。

三、不良现象的减少。以前各系统尚个别地存在着领取缺额人员的粮食等预算情事，但精简后已逐渐减少；一般同志对工作不安心现象亦在减少中；又如西北局近来什务人员的工作情绪较前更加提高，由实行奖罚、改善待遇、会议教育、提倡相互参观方法等之故，使本局灶房工作较前改善；勤务也较前更加忠于职守，不良表现减少。又如绥德分区，据报告，自行政机关中旧公务人员撤换，配备以较强干部后，不良现象减少，政权内气象一新。

四、干部对精简的认识加强，真正了解到精简的伟大意义，渐知勤于自己所担负之专责。以前有人怕人少了事情做不了，但至今日则此种杞忧已不见。

同时在精简进行完毕以后，也可看到这一工作中的缺点：

一、在初次与二次实行精简时，从一些干部的现点来看问题，只注意到裁减觉得是多余的人员，未曾注意到在新的工作作风下究竟可节省多少人；在工作进行中还受形式主义思想所限制，还为过去的分工制度所束缚，打不破因袭习惯，例如鲁艺医务所，有好些护理员，还另设一挂号的人；此外，各系的秘书、助理员等，原也是可以着手裁撤的。

二、时间上没抓紧。初次精简后，边区各团体即等待本局指示他们如何合并等，他们也没有给下层以指示，所以下层也等待他们；分区、县党委因未实行干部的统一管理，也不好全部着手改编群众团体，所以群众团体的改编，去年是待了一年；党政的精简也嫌稍慢，延大（三、精简中提拔干部的工作或准备提拔的工作很不够，依赖上级派干部来的心理甚浓，如绥德分区在第三次精简中真正提拔起来的干部仅五人。各地都一心要好干部，米脂、绥德二县均将稍有毛病之人调工作，以为调了以后，延安就会派人去（绥德调了五个区书任其他工作，却又向地委要五个区书）；又如三边因延安允派宣传科长之故，便将该项职位全空出来，这就影响了工作。

四、事先的解释动员工作在有些地方还不够，故发生前节所述之不良现象。在第一、二次精简中，对编余人员的处理亦较差，如有些女干部裁减后不替好好安插，有的人有病无法；工会内有些干部裁减回家地方上对这照顾未周，有些干部说“要时就提拔出来，不要时就打回家去”，这种说法会影响今后农村干部尤其妇女干部的提拔的（不过最近一次

精简中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确是进步了，如延川对回家干部除令地方上照顾外，还对困难者济以粮食；绥德分区对有病者轻的分插到各大机关，重的令停止工作；对有孩子之女同志当教员，或要她们到地委受训练）。

五、据靖边报告，原青救主任调任乡文书，抗会主任调为自给店主任，不甚适合；又有十五个干部送回家了，未争取他们到生产部门或在乡村中任一定工作。

六、据陇东报告，曾一度因对精简专注之故，初时对春耕领导抓得不紧。

目前工作中的困难和存在着的问题如下：

(甲)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还有占着相当重要工作岗位的，要调换却无人替代（绥德分区、鲁艺）；(乙)有些机关的彻底精简的计划已拟好，但目前因整风与审查干部之故无法立即贯彻，如鲁艺按边府指示应减到一二〇人，但目前尚留有四百余人；旧延大还有许多人留在校内整风；(丙)各分区各县干部缺额太多，急待解决，如三边分区分区级缺三人，县级缺四十四人，区乡缺二十五人，乡级缺九十七人，共缺一七六人。清涧县委宣传部及各区宣教人员均尚付阙如。

(四) 意见

为使精简政策收到十足的成效，鉴于目前情况，今后尚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规定各种人员间的比例。学校中工作人员与学生的比例；机关内什务人员与干部的比例；多少人以上之机关学

校可以有一个或三个脱离一般工作之总支工作人员……等，都需要有一原则之规定。又，目前生产机构正在扩大中，若过于扩大，亦将吸收过多之人力，需要略有限制。

二、目前有的地方已规定干部与学生的标准，但尚未普遍。这一普遍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今后将这种标准规定得明确，减少人员与学生的流动性，可以使工作与学生改进。

三、在今后检查工作过程中研究下层干部配备时，最好责成各县对每个脱离生产人员是否适合其工作岗位，是否提高了效率，加以具体研究，并检讨其原因，加以总结。

四、今后还应当提倡：各机关学校如何能节省工作手续，提高效率，如何使一人能做两人以上之工作；不很忙的职务，可由他人兼职。

五、调整干部“忙”和“闲”。如西北局总务科宋炳祥同志亦说自己太忙，会计科的人稍闲；宣传部有的同志亦说自己较忙，有的人则过于闲。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

六、今后需责成各机关学校造具机构编制之简明图表（这种图表以前各机关学校都没有，他们甚至连自己部门的精简情形亦无存根，只有一不完备之名册），研究自己机关学校编制制度之沿革。

七、业务教育，学校与各分区均未真正做出成绩来。今后从业务教育的建立到各部门工作细则之详细规定，应促其实现。

八、医务所精简法：大的机关可设一医生，配备少量普通药品，但其他司药、助手等可以不要。若遇需要特种药品

时，可由本机关医生开方到附近医院内去取（以前各学校都有一整套的庞大医务所组织，自所长到挂号，样样俱全）；此外，于适中地点，由数机关学校共有一医务所亦可。

九、各级地方机关内到现在为止还有些形式的组织（其中有些已名存实亡），如“委员会”之类，这些尚需加以检讨取消（绥德分区曾实行）。此外，乡村精简尚需进一步贯彻。

十、过去的预决算制还不能算是严格，浮报人员既在所不免，在自给情形下又无查账制度。今后应当在机关学校普遍建立查帐制度，根据节约之标准加以检讨；其次，要解决某些女干部（精简后未得适当安排的）的预算问题；提倡节约，要各机关算出每日开支平均款项来（据宋炳祥同志谈，西北局每日两万多元钱，大的工程及粮食均在外，其他机关未有统计）加以研究比较；实行集体吃饭或“分区集体吃饭”以节省粮食；各机关都要像中央党校那样算出究竟节省了多少东西。

（五）经验

一、过去机关为什么那样庞大？“委员会”为什么那样多（如文协）？这是因为：“事事为中心”、“件件要模范”的观点所致；形式分工的旧观念的束缚；铺张作风、本位主义未曾根绝，对干部工作之“容量”（每人究竟作了多少工作）未曾加以逐一具体检查。

二、各分区在三次精简后为何到现在效率还未见提高？这是因为：机构虽整编了，但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尚未彻底转

变了旧日的一套，即“政”未“简”，精兵简政的本质尚未完全贯彻到最下层。

西北局社会部关于 逮捕反革命人犯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

为着锄奸保卫工作中更能确切执行和贯彻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关于逮捕反革命人犯的手续，特规定以下具体办法。各级锄奸保卫部门应切实执行。在执行此规定中，必须严格防止不按照一定手续乱捕人的弊病，但同时要避免拘守成规，机械地运用逮捕人犯的办法，以致放走敌人，这两种偏向都是对革命有害的。

一、县委级（须经县委书记、县府党团书记及保安科长签字）有权批准逮捕暗藏在乡政府干部中、乡参议员中、支部委员中、一般党员中及地方公民中之个别反革命分子。

二、地委级（须经地委书记、专署党团书记及保安分处处长签字）有权批准逮捕暗藏在支部书记中、区委科长中、区助理员中、县委或县府的科员中、驻在各县的边府附属机关（如税务分局、物资分局、银行分行办事处、中学、师范或其他附属边府的机关学校等）的科员或相当科员的干部中、完全小学校长中之个别反革命分子。

三、军队团级（须经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及锄奸股

长之签字)有权批准逮捕暗藏在排级或相当排级的干部中或战士中的个别反革命分子；倘案情较大，牵涉较多时，仍应详报上级请示处理。

四、旅级(须经旅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及锄奸科长签字)有权批准逮捕暗藏在连级干部中或营级干事中个别反革命分子。

五、如在上述以外的党政军重要干部中发现有暗藏的个别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者，在地方须经西北中央局或中央之批准，在军队须经联防司令部或中央军委之批准。

六、规定县级以上的保卫机关及团级以上之锄奸机关始有逮捕反革命人犯之权，但遇有紧急情况或反革命分子现行犯(如正在进行破坏行为、阴谋暗杀、暴动、张贴或散发反动标语传单、武装土匪、武装侦探及反革命叛徒分子等)或脱逃犯或曾经军政机关通缉有案之人犯，不及履行上述批准手续时，得不分党政军民或机关等级可随时拘留之，不受上述规定之限制，但拘捕后，须于二十四小时内将人犯、证物等转送一定机关处理，并捕[补]办上述批准手续。如有捕风捉影，滥用威权，无端加以罪名而施行逮捕者，其执行逮捕人或机关应依法处理。

七、地方党政干部中或公民中之反革命犯不属于本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者，除战时或戒严期间另有规定外，军队不应遽行逮捕，须通过地方保卫机关执行之。军队中之反革命犯应由军队锄奸机关逮捕，但其破坏行为在地方时，地方保卫机关得予逮捕，惟须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将人犯及物证等

送主管部队处理。

八、分区、县及旅、团锄奸保卫机关如破获重大案情，其线索牵涉到自己权限和所辖地区范围以外者，须事先将案由报告边区保安处请示批准，且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将逮捕经过情形报告备案；其属于本规定第一、二、三、四诸条所逮捕之人犯，须将案情于逮捕后三日内详细呈报边区保安处备案考核。

九、凡属被捕人犯之证物、文件、资财及随身携带或存留于居住处之一切行李物件（如信札、书籍、笔记本、像片、枪械、钞票、现金、路条、护照、衣物、床铺、被褥及其他日用品等）应严格细密搜查，注意发现疑点，并详细登记（注明数目号码、破整和新旧程度等情形），妥善保存其原状，不得有意无意损坏；凡遗失、私自调换或扣留者，应受严格处分。

十、不论在逮捕人时或审讯中，绝对禁止对犯人施行污辱、打骂以及一切变相肉刑，违者须受严格处分。

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农村党员、 支部、区委情况调查提纲

(一九四三年)

(一) 党员问题

(1) 历年来党员的变动情形如何？发展多少？减少多少（原因说明）？现有多少？自生产运动以来党员的成份、政治表现与思想动态的变化如何？

(2) 自生产运动以来发展了多少党员？如何发展的？今后发展的对象、方法、手续、候补期等应如何才对？

(3) 所谓好的、中等、坏的党员标准现在是根据什么条件确定的？将以什么标准才对？对坏党员如何处理？对中等的党员应采取什么办法来提高他们才更有效？

(4) 党员的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包括内容、方法、时间等）？将应如何进行才对？

(5) 自生产运动以来在党内与党外发现有哪些积极分子与劳动英雄？过去这些人的表现如何？发现后采取了什么办法去团结与教育他们？将怎样去团结教育与巩固他们的情绪？

(6) 全乡有几队变工队？队员多少？合作社社员多少？党员参加的多少？党员当队长与组长的多少？党员在其中如何

起领导作用？党员在生产组织中如何进行组织生活与党员的教育？将要怎样进行？

(7) 党员缴纳党费的情形如何？应多少时间交一次？每次应交若干？

(二) 支部工作

(1) 支部如何领导生产建设及其他工作？有何优点与缺点？支部对领导党员与领导群众如何进行？

(2) 支部所属组织形式是否适当？应如何才对？即现在支干的分工是否适当与需要改变？支书强者兼乡长，或乡长强者兼支书好呢？还是分开与分头进行工作好呢？

乡政府党团是否需要？在生产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中的党员是否需要另编小组？支部与这些生产组织的关系怎样？

(3) 支干会与小组会多少时间开一次？现如何开法？应如何开法才好（包括讨论的内容方法与会议时间）？

(4) 乡级干部是否称职？其思想作风特别与群众关系如何（主要是指支干与政府委员）？

(5) 支干过去做些什么主要工作？要做哪些工作才对？现在小组长做些什么工作？应做些什么工作？

(6) 支部如何布置与总结工作？党员对支部工作有何反映？支干会对这些反映采取什么态度与办法？支部如何领导党员与党员之间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与互相学习？支部的改选应多少时间进行一次才好？

(三) 区委工作

(1) 现在区委本身经常工作是做些什么? 将应做些什么?
将党务工作与其他工作在领导上如何联系? 又如何分开? 将
应如何? 区委与政府、群众团体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如何? 将
应如何?

(2) 区委现在的分工是否适当与需要改变?

(3) 现在区委怎样领导支部工作, 将应如何领导才好?

(4) 区委会多少时间开一次? 内容是什么?

(5) 区级干部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 将应如何进行才好?

(四) 县区二级好坏干部的典型例子(包括思想作风等)。

(附注: 调查时应以支部工作与党员问题为主)

附录

西北局关于 运输队工作的调研材料*

(一九四三年八月)①

一、大车和高脚牲口的增加

今年年初，西北局、西北党校及抗联都有运输牲口，为各单位运输粮草、煤炭、菜蔬等用品，开支均实销。当时计有大车 4 辆、拉车牲口 16 匹、高脚 23 匹。文协是没有运输牲口的。半年来，以西北局运输队发展最快，西北局由于修建办公厅，需运大批木料，便拨用商业上的盈利，新从关中购买骡子 21 匹，行政上并拨款陆续添置大车 5 辆，现在西北局已由 2 辆大车增加至 7 辆，组成大车队一队，由 9 匹驼[驮]骡增加至 21 匹，组成驮骡队一队，可说是增加了两倍。文协为了自运供给物品，兼营商业上的需要，也在 4 月份成立了一队 7 匹牲口的运输队，现在收缩为 4 匹。西北党校及文协保持原状，无有增减。至 7 月底 4 个单位已共有大车 9 辆，高脚牲口 39 匹，计增加大车 5 辆，高脚 13 匹。兹列表

① 月份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如下：

大 车 数 目

机 关	月 份	车 辆	牲口数	附 注
西北局	一月	2 辆	6 匹	全是骡子
	七月	7 辆	24 匹	全是骡子
西北党校	一月	2 辆	8 匹	6 骡 2 马
	七月	2 辆	8 匹	6 骡 2 马
共 计	一月	4 辆	14 匹	骡 12, 马 2
	七月	9 辆	32 匹	骡 30, 马 2

高脚牲口数目

机 关 月 份 牲 口 数	西北局	西北党校	抗联	文协	共 计
一月	12	10	1	0	26
七月	21	10	1	4	36
附注	全是骡子	一月 6 骡 3 驴 1 马 七月 8 骡 1 驴 1 马	1 骡 2 驴 1 马	全是骡子	一月 骡 16 马 2 驴 5 七月 骡 34 马 2 驴 3

今年新增加的这五辆大车，18 匹骡子，共投资 2263100 元（西北党校以驴 2 匹倒换骡子 2 匹，并未贴钱，不能作为投资，各单位亦未增修马房）。详表如下：

今年运输业投资表

单 位 斜 线 单 位	种 类 钱数 (元)	大车	骡子	装备	共计
西北局	150000	1777800	85300 (注)	2013100 元	
文协		200000	50000	250000 元	
共计	150000	1977800	135300	2263100 元	

注：这不是全部装备费用。

经过这样发展以后，运输力是大大增加了，如每辆大车平均以载重至低 1 千斤计（平秤，下同），高脚至低以 180 斤计，每月均以 14 次算（菜、粪、石炭每日可来回一次，粮草、木炭每 2 天来回一次，少量亦有三、四日来回一次者，在此均依 2 天来回一次算，并且除去 2 天误工），则至少：原来（一月份）每月可运物资 113960 斤，现在（七月份）每月可运物资 224280 斤，较前增加约一倍，即 110220 斤。

二、四种经营方式

这些运输力量是采取怎样的方式经营呢？大约可以分成四种：

第一种，完全是供给性质的，即完全为本单位运输物品，开支亦在本单位报销，不计算赔赚，有空时虽也有的揽脚作生意，但收入亦归本机关，如抗联、文协、西北党校 1、2 月间和西北局的高脚牲口、1 至 6 月的大车队都是采取这种方

式。

第二种，是独立经营。本单位运物品时，出价雇用，运输牲口自己维持开支，盈利运输人员可以分红，如西北党校在3、4、5三个月规定大车和高脚给学校运输物品，学校按市上脚价九折付钱。给学校运输物品以外，运输队独立揽脚作生意，每月运输所得除去开支（运输员除雇的人之外，衣服津贴仍由学校供给），将红利20%作为运输人员的奖金（雇的人除外，但亦曾奖以少量日用品）。这种办法大体上与杨家岭运输合作社相同，不过未立名称，办法也规定得简单。

第三种，是7月以后，西北局的情况，即驮骡（月初有10匹，8月19日增至21匹）仍采第一种供给制度；大车7辆（月初为4辆）独立营业，为本机关拉运物品时，机关上支付伙食和马干（除雇的人外，仍由机关上供给衣物），而以大部分时间自己独立揽脚作生意来维持自己的开销，并设法赚钱。此种方式与第二种不同，即以一部分运输力量独立经营，又不采取分红制度。

第四种方式，是西北党校6、7两个月的情况。西北党校见到3、4、5月间运输牲口改成相当独立性的经营后赚了钱，为了进一步减少学校的开支，又加重了运输队的责任，停止了3、4、5月间的办法，改为学校义务运完两个月的用品，空闲时自己营业维持全部开支，如果完成任务，以1%作奖，超过任务者以20%作奖。这种办法仍是使运输队相当独立的经营，分红办法变了些，又给他们规定明显具体的工作任务，促使设法挤时间营业来维持开支。

这四种经营方式的比较，可分别从下面检讨运输情况开支和运输人员表现上看出。

三、运输情况

运输可分为本单位运输用品及营业两大类，营业类又可分成拉脚及贩运货物两种。

今年各单位运输多少物品，尚缺全面的统计。以西北局论，平均经常有 4 辆大车，8.5 匹驮骡（见表甲），除营业拉木料等 420 天外，为本机关拉物品约为 50 余万斤，这是运输的成绩。

但仔细检讨，运输力量的浪费是很大的，除去大车营业 420 天，其余约平均经常用 2.2 辆大车、8.5 匹驮骡为本机关运物品。但逐项核算，顶多有 ① 辆大车 ② 匹驮骡便够运输需要，浪费在 ③ 匹驮骡以上（见表乙）

（表甲）西北局 1 至 8 月 19 日（共 233 天）运输力量统计：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19 日	共劳动日	平均经常有
大车	2 辆	2 辆	3 辆	3 辆	5 辆	5 辆	7 辆 (注一)	7 辆	913 日	4 辆
驮骡	12 匹	12 匹	9 匹	6 匹	6 匹	6 匹	10 匹	15 匹 (注二)	2040 日	8.5 匹

注一：月底才增加至 7 辆
注二：1 号为 10 匹，以后陆续增加至 21 匹，平均以 15 匹计。

① ②③原文空字。

(表乙) 运输牲口本年 1 至 8 月 19 日为本机关运回物品重量及依本〈年〉常载重量需用大车日工估计:

品名	重 量	往返需要时间	每车载重	天数	说明
粮	418.2 石 (共 127410 斤)	二天	6 石	210 天	
料	20 石 94.4 石 (共 34440 斤)	三天半 半天	6 石 6 石	11 天 8 天	
草	2500 斤 3000 斤	一天 三天	1000 斤 1000 斤	3 天 9 天	
煤	103700 斤	一天	1200 斤	84 天	
木炭	30000 斤	二天	1000 斤	60 天	
菜	69200 斤	一天	800 斤	87 天	
煤油 洋烛	(17 驮) 3400 斤	六天			
其他	(25 天, 每四以 1000 斤计) 25200 斤		25 天		
粪	(专送 152 车, 每车以 700 斤计) 106400 斤	一天	900 斤	119	另取菜 70 车不计在内
共计	509950			612	

注: 煤油洋烛需用高脚驮 17 驮, 每驮 6 天, 共骡工 104 天, 因必需驮运, 未列在本表内。

表乙说明：

(一) 重量系依收到物品计算，共 509950 斤，其中菜、粪是按车估计数，木炭也是估计数，草因公草多系发钱，或由群众送来或到市上买，自己运来者仅 5500 斤。这些物品依平常重量及所费行程计算需□^① 天大车即可运回。表中所列每车载重量均系最低估计，尚能提高甚多。

(二) 八个月来，大车车工共 913 日（见表甲），在揽脚营业方面用 420 日，尚余 493 日，因天雨泥泞及大车损坏至多误工 60 日，尚可为机关上运物品 423 日，如此，上述□^② 大车车工尚差□^③ 日需驮骡运输（当然仍以用大车拉省开支），如每六匹高脚载重量顶一辆大车，则需□^④ 天骡工，四匹驮骡自 1 月至 8 月 19 日可驮 932 天，骡工去掉 36 工闲置，恰好可将上述需要运的物品全部运完。今年来，平均经常有驮骡 8.5 匹，其中□^⑤ 匹是浪费了的。浪费的原因一是载重量不够，一是行程短。这次运盐原拟 7 辆车出发，论斤数赚脚费共揽脚大称 7600 斤，因临时 1 辆车不能出发，6 辆车每车平均运了平秤 1700 斤。因为运得多，又有回头生意，所以这次虽然因雨误工 18 天，仍然赚钱。从这次例子看，给机关运输东西时是拉得太少了。

据运输同志的反映，拉石炭一般是 1200 斤（仍是平秤），拉粮一般是 4 石，也是 1200 斤，拉粪七、八百斤，拉菜六、七百斤，有时是单程。如果以 7 月份的开支计算，每斤合 1 元

① ②③④原文空字。

5毛至2元钱的运费。最不上算的是用驮骡驮木炭，驮最大的两包亦不过百来斤，拉菜一车六、七百斤，也用四套牲口。据今年年初的检查，烧炭虽然省了钱，但用我们的牲口运回来，加上路费比市场买的还要贵些。朱家沟拉炭来回60余里，也有过在途中住宿的现象，这都是浪费运输力的。

7月31日，大车队报帐，拉石炭3300斤（炭厂按平称发炭），用了4辆车，每车才拉825斤。又9辆车拉小米25.86石，每辆车才拉2.87石，亦不过850斤。本来上面规定的运输量就减低，而实际拉的更少。

在给机关上运东西时运得少，在独立营业以后呢？独立营业以后，主要是拉木料，木料拉得足量不足量？向来没有称过。运输队和工程处方面各有一种看法，特别是6月中配备了队长以前，运输情况最成问题。工程处估计到山高，牲口是新配的等条件，说每车至少可拉1千斤，但一般拉的只约有六、七百斤，而运输队方面则说一般都是拉一二三，路途一处69里，一处75里，运输队说前者一般走两天半，后者则走3天或4天。给工程处拉木料是论天，而不是论车或论分量的，加之运输队员又不积极，拉得少，行程短，这方面的意见大约是正确的。

只在7月底给盐业公司运盐上使足了运输力量。像这样浪费运输力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其实不只是西北局牲口大车一处的现象。其原因，与领导管理有关系，而主要的是运输队员不认真，没有充分使用运输力的情绪，拉得多对运输员们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拉好了他们得不到额外的好处；

拉得差他们依然是每天两斤面的伙食。拉木料虽然是营业性质，但并不影响运输队员的情绪，仍未变化，只在队长领导严格时才相当改善了一些。

西北党校 3 月以后，运输队独立，实行分红制度，运输力却提高了，原牲口原人原工具，从前骡子驮平称 180 斤，现在至少驮 200 斤，一般的驮二百三四十斤；从前大车载重 1200 斤，现在最少拉一千五六百斤，一般是拉一千八九百斤；在行程上说，从前从 100 里处蟠龙运粮高脚来回 4 天，运输队员还表示不满，现在则只走 3 天。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如大车两辆四月四号由蟠龙运回来 11 石，每车平均载重 1650 斤；5 月 22 号由真武洞运回粮 12 石，每辆 1800 斤，90 里远走 3 天；高脚 10 个，7 月 11 从宋家川运回米 7 石 1 斗，平均每匹驮 213 斤。西北党校实行的这种公私利益结合的办法，确在提高运输上面起了不少的作用。

四、收支

收支多少？是赔是赚？有否浪费现象？运输队怎样才能维持开销？怎样才能赚钱？这原是领导组织运输队的重要问题，也是检查运输队工作的关键，但我们的运输工作上是很少注意这类问题的。仍以西北局运输队论，驮骡至现在不单独记帐，大车至 7 月才算分开了，因此开支帐项一问题，一向与机关的骑马、运水马等等混着的，究竟装备补充上、驮骡和大车各开支了多少？灌药、钉掌、修理装备等项杂支各开支了多少？是无从清算的。在人的伙食、马的草料开支上也算不清楚，因为固然出门曾领路费可查，但在家日子多少？

向不注意，现在已无法清算，不能得出全月伙食、马干实际开支数目。帐目既然不曾独立，也不去留心核算，因此，开支情况是很难检查，也就很难发现浪费的。大车队虽曾从5月后单独记过帐，而且说是赚了钱，补助了大灶，添置了大车，向豆腐坊投了资，但在家的大概开支却没有入帐是不足为凭的。

如果说帐目和经营不独立，才收支不易检查，浪费很大，那未经营独立之后，支出应该减低，浪费应该减少了吧，事实不然，仍然是赔钱。

在叙述大车独立时，先讲一讲独立以前之阶段。

在年初有两辆大车时无所谓独立。自从4月份西北局建筑办公厅需要木材，陆续添置大车以后，大车队给拉木料，采取了营业的办法，论日算脚费。不久，为加强对伙食对运输的领导，在总务科长之下，增添了一位管理主任，大车队的规模建立起来了。大车虽说是一部分时间营业了，但伙食、马干杂支等项仍与驮骡、骑马混在一起记帐，甚至有一个时期连拉料大车路费都在机关经费中报销，因此，就难怪以为5至7月三个月赚了三二十万元。

6月中，行政处开会，发现这种混乱不清的状况，决定自7月起全部大车实行真正的独立。车添得多了，家里住不下，改到大生客栈（西北局与建设厅合开的）去住，以后机关上用车只给路费，大部时间去营业。

7月份虽然独立了，但全月运了多少日子？多少重量？缺乏登记，连帐项也未仔细清结，不过现在研究考查起来，可

以得到下列的情况：

1. 全月大车的劳动日。月初是 4 辆，8 号和 25 号使用起两辆新车，13 号把修理好的一辆旧车又使用，全月前后共 7 辆，一共可劳动 170 天。

2. 作了什么。营业方面·拉木料脚 92 天，拉盐 18 天，共 110 天；供给方面 51 天，给干部子弟学校义务送菜 3 天。总共工作 164 天，其余 6 天大约是空工。

3. 收入怎样呢？拉木料每天 1600 元，共收入脚费 147200 元，向廊县运盐收入 34000 元，在机关上报销 51 天的路费 79374 元，总共收入 260574 元。

4. 支出呢？伙食、马干 246900 元（平均每天每车 1452 元），杂支 33447 元（新车新添的装备未列入，本月杂支不比□①月大，平均每天每车 197 元），总共支出 280347 元（平均每天每车 1649 元）。

5. 是赔是赚？全月看来赔了 19773 元。是不是受了供给方面的拖累？并不是受了什么拖累，因为给机关运输占全月运输量三分之一稍弱，向机关上报销的伙食、马干亦为三分之一稍弱，机关上出的路费已接近脚费，即使把机关上的运输改成脚费，亦不过在杂支方面负担三分之一而已，即是大车队可再收到 11200 元，如此，仍然赔累 8573 元。5 个人一个月的被服物品约合 8000 元尚未计算在内。

我们即使抛开为本机关拉物品的时间，和收支不管，单

① 原文空字

看营业方面，1600 元的脚费按月底算，固然有些小，但就全月看，并不算小，即使我们在脚费收入上，最高提至平均每天 1800 元，并从杂支中减除三分之一，则营业部分总结下来最多亦不过赚 9,827 元（仍然未算运输员的被服支出）。

亏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伙食、马干的开支太大。上面已经说过，平均每辆车每天人马平均开支 1452 元，竟占脚费的 91% 之多；本月草料最贵是一个原因，而主要在于不论外出或回来都得住店，几乎完全是吃店中的草粮、伙食，成天辛苦不过为店家赚钱，不过落得运输员们成天吃面而已。其次是杂支太大，平均每辆车 5 千余元，仅修理补充五辆旧车便占 14000 元。

这还是全月有固定的脚物拉，尚且赔钱，可见目前运输队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在开支方面，也可以看到西北党校的新的经营方式下是比较成功的，他的情况可以与西北局大车队作一比较。

西北党校大车两辆，牲口 8 匹，高脚 10 匹，加上家中两匹骑马、两头驴，共 22 匹。如果说骡子和在家牲口开销可以少些，那末可以折成 20 匹骡子。外人力 11 个（内雇工 3 人）。西北局大车牲口月初十二、三匹，月底增至 24 匹，亦算作全月 20 匹，人力是最后 9 个人，平均可算作 7 个（内雇工 4 个）人。牲口数是不相上下的，人数是西北局比较少的，但西北党校两个月共在家吃饭约 220 顿，恰好可去掉三、四个人，因此，人数也是相等的。开支情况怎样呢？

西北党校六、七月两个月伙食、马干，在家在外才开支

202039 元；前西北局大车队 7 月一个半月的开支 246900 元、杂支及工资西北党校两个月开支 113196 元（内坏车一辆开支 40000 元）；西北局开支 33417 元。总起来，西北党校两个月开支 315236 元；西北局一个月就开支 280347 元。西北党校开支的节省是有成绩的。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还不是因为存蓄了草料，只不过住店日子少，开销少，队员们节省而已。

五、运输人员的表现

先讲西北局的情形。西北局运输人员配备如下（8 月中情况）：

	队长	队员	总共
运输队（驮骡）	2	9	11
大车队	2	9	11
总共	4	18	22

这些运输人员的来源：两位正队长是党员，从西北党校调来的学生，其余人员都不是党员，来源如下：

来源	旧运输员或原在西北局者	359 旅新调来者	法院犯人	雇的	总共
人数	7	2	3	8	20

队长之中，大车队正队长虽然比较积极，但太慌张，不

懂得运输和牲口，帐算不清，年轻，又好和队员开玩笑，因此，领导不起队员，如有一次，他催着队员们赶路，上山时队员故意倒耍鞭稍，虽然口内高声吆喝，牲口却不上拉，队员们便借此说牲口拉不动，只好住下不走。副队长人比较谨慎，经济观念好，〈但〉领导能力也差。

驮骡队的正队长能力强些，也不懂运输和牲口的事。刚才开始工作，还不知表现如何。副队长史经理担任运输队长已经很久，懂得牲口，有经验，但毛病很多，给人私稍过炭，与罗云兴合伙贪污分钱 300 多元，与队员们分伙食钱，与老百姓妇女打游击，在店里偷条帚，偷“样秋”，^①偷“料斗”，偷“□版”，偷碗……过去运输队报路费只凭他写条子盖私章就领钱，其中也会有毛病。

至于运输队员呢？牲口打扮好些，称说牲口和车运不动，少走点路，少运些份量，人吃好些，这就是他们的要求。能自动喂牲口的就是好的了，这样的人不过两三个。大车队上的多不好好喂牲口，牲口很瘦；时常打牲口，人们也常噪〔吵〕架，情形最坏。对于贪污腐化的情形过去注意还少，发现不多，但就白炳宣、孔反省两人的情形就可见一般〔斑〕了：他们是老赶车的，白炳宣拉粮食，仓库过斗弄错，多发了一斗粮，他既不退回，也不交给机关，私自卖了与别的队员吃了东西；又曾用别人丢下的图章盖条子冒领路费 1050 元。孔反省的贪污腐化已发现的有以下五项：（1）在桥

① 即铁锹。

儿沟拉石炭，贪污 2 斗料，5 个人每人分了 150 元。(2) 在拾粪沟与曹斌昆列〔克〕扣马料，自认 1000 余元。(3) 车坏自己能修不修，浪费 300 余元。(4) 在大北沟与老百姓妇女打游击，给人送红布、挂面、梨子。(5) 新队长景向华到来后，他见景比较忠实，说景不懂大车，为难景，排挤景，不服从领导。

此外，运输队员请假回家不来的现象更为普遍，七月间还曾有两个人开了小差。

这就是西北局运输人员的现象。是不是因为队长领导能力差，纪律废弛，教育少才有上述的毛病呢？当然这方面有些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工作好坏运输赔赚与他们不发生什么利害关系，他们一般并不是对于革命工作已有了足够的认识。

西北党校的经验证明了运输利益与他们结合以后，他们的表现是会变的。前面已经举过一些例子，都是他们积极的结果。由于运输力量的充分使用，他们到现在甚至已经开始研究是否牲口使用太过分了。在牲口的饲养上他们早已实行头水料、二水料、晚料、早料，多次喝水等比较仔细的饲养法；人也分开明班夜班，所以牲口虽然负载重了，精神却不差。西北党校运输员间贪污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不安心开小差，请假不回的现象这几月间是没有发现的。由于他们经心，去年每个牲口都换了二次鞍架，而今年半年了还未换五个。

六、经验总结

关于这半年运输队的情形，以西北党校为最有进步，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表现为运输作用的提高与开支的节省；以西北局发现为最显著，但领导上缺乏细密的作风，未能很深刻的检查工作解决问题，以致未能起足够的作用，并且开支过大；文协新添运输牲口；抗联仅为供给的方便。

半年来的经验可以按经营方式、运输力、营业、收支与人员五项来叙述。

(一)在经营方式方面。从前各节的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出，运输牲口经营不独立计算的制度最不好，只有运输牲口太少时，为了省事还可以这样作，否则运输力难发挥，开支也决难节约。以采取合作社制度为最好（杨家岭的经验最显著），这主要是可以提高运输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于是别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随着解决。象西北局七、八月份大车队那样的独立方式，由于未于〔与〕运输队员私人利益相结合，管理领导上也弱，不能算是很好的办法。西北党校六、七月间实行的制度因为是在3、4、5月工作提高之后，还未显出特殊进步或退步，无法证明其好坏，但因为义务运输的加重，很难赚利钱，运输队员恐怕是要发生消极的情绪，这种方式较之不给明确任务的自流运输会好一些，但必不会比合作社方式更好。

今后像西北局这样规模较大的运输牲口，如果能配备上可靠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力，应该组织合作社，不然可以考虑留下少量大车，其余驮骡和大车向南区合作社入股，接受他们的领导，或者给物资局包运货物（他们负责开支，但衣服

自备，保证每年至少一本一利）。像西北局这几个月的情形是不可再继续下去的。

(二)在运输力的使用方面，第一是每天要走足够的程路，不要把时间浪费，要减少误工；第二是要载足重量。除此还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有很细密的计划，即如在为本单位运输物品方面，应有全年和每季度的运输概算，要估计季节、晴雨、路程和物品的季节性等等条件，把何时运什么、何时忙闲作一个概况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每月再定每月详细的计划。能够这样，每月和全年才有一定工作任务去完成，也好避免因为本单位的需要影响到营业。第二是要恰当的根据客观条件使用大车和高脚。一般的讲，一辆大车的载重量可抵六匹驮骡，而其开支不过为六匹驮骡的二分之一，顶多三分之二，所以在路近路平天晴时候以使用大车为得当，只有在远途和化冰多雨时节驮骡才比大车方便。以西北局情况来说，凡机关所需要的粮草、煤炭等项无不以使用大车合算，春天解冻和秋季河涨时候，大车要吃些亏，但全年算来比驮骡还开支小，过去主要以高脚负担运机关用品是不恰当的，用驮骡驮炭更是浪费。第三，冬季机关运输需要最大，此时农户最闲，脚价较低，牲口比使用本单位牲口运还便宜，运木炭，运粮草等项可以雇用群众牲口；秋季雨多时，也是农家牲口较闲时候，石炭市价常不甚高，也可采购一部分，因此机关上供给部分预算的牲口无妨少些，以免空闲畜力。第四，同样的开支、赔或赚与牲口的好坏有直接关系，因此，骡子要养壮的，大车要买好的，而不可单求数

量。

(三) 在营业方面，用运输牲口营业分别几种条件，第一是高脚与大车的比较，如西北党校四、五月间，十四高脚到靖边运盐，每次除支运费外，赚 6 千元；去绥德送脚货，12 天长洋 3600 元，利都不大，但有一次用大车运盐，往返五天却长 22200 元，可见大车是比高脚获利的。第二是要注意季节，如遇多雨和道路泥泞时节，大车就不宜远出，高脚则比大车得力。第三，揽脚一般是不易赚钱的，同时揽雇工不容易，西北局和西北党校牲口揽的脚去绥德都无利，只有给盐业公司送盐还算赚钱。第四，牲口不放空也很要紧，一般揽脚赚钱是赚在捎回头脚上。第五，自己有人力有资本单独作生意比揽脚多赚钱，不过过去这方面还作的很少。第六，以后公家使用运输队付脚费应废止论车的办法，而主要应依分量，同时照顾是否单程和运的何种物品。

西北局运输牲口最多，建筑木料已经运完，估计有两辆大车便够家中使用，其余大车出脚究竟怎样使用呢？假使自己经营利小，而且揽不到很多，最好用来贩货作生意。依目前市场情况和边区经济建设上的需要，主要应该是运盐，至 8 月下旬，高脚已开始运盐，今后大车队也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资本不够，应该与商店结合，或者与盐业公司建立包运关系。总之，要作有长期性的把稳的营业。

(四) 在开支和管理方面，开支太大的第一个原因是住店太多，如西北局的牲口近两月就是全部住店。今后应该设法减少，或者自建马房，或者与大生栈订定优待办法；在姚店

于这类常走的站口，西北局系统各单位可以考虑联合开一草店，一方面住宿牲口方便，另方面也可作些贩粮收买土产的营业，兼作杀坊、磨坊的助手；运盐发展下去，邮局要设法在沿途设置草店。开支太大的第二个原因是草料全是临时买的，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用店里的，今后应在草料贱时存蓄一批草料，上路时也应该尽可能的携带一部分。开支过大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伙食、衣物等项开支比老百姓大，如衣物一项，依七月份布价每人全年便需 3 石 2 斗的开支；伙食按每天 2 斤面开销，全年每人合米 5.475 石，全年每人经常开支竟合米 8.675 石。公家虽这样的支出这样多，但因为是供给制度，运输员们反不觉得对自己有多大利益。所以改变待遇办法是绝对必须的，不止（只）像杨家岭像西北党校那样分红，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伙食、衣物的全部或一部供给都让他们自己解决，这就是说扩大运输赔赚与他们利害关系的一方面，最大的刺激他们的营业积极性。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把开支缩到最低的限度，于公于私是两利的。开支过大的第四个原因是杂支太大，修理太多，今后要提倡节省，自己修理，自己配用零件，建立严格的保管制度。开支过大的第五个原因就是会计制度不严格，以后要很好的审查开支是否超过标准？是否必需？每月仔细核算——全月共运多少天？多少分量？全月总共收入多少？开支伙食、马干、各项杂支各多少？存草料多少？究竟赚利若干？并依米价进行月与月间的比较，这样不仅能算清赔赚，而且可以研究出很多经验。

最后是人员方面。以西北局论，大车与高脚全部资材依

时价在 500 万左右，并且每月赔赚钱数都可达到很大的数目，所以首先应该配备强有力的干部专心去领导。领导人要加强营业观念，要深入下层，要多研究经验，多向别人学习。其次队长的配备和提高也是当务之急。最后运输队员的改造也甚重要，如上所述改造的办法主要是待遇制度的改变，使运输队员站到运输利益的原则下，实行依工作好坏的差别待遇，这样，运输队员间便能自治，便能作到消除浪费和贪污。当然，加强教育，加强会议检查制度，严格实行过称〔秤〕过斗办法也是必要的。

这就是运输队工作上的一些经验。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 减租斗争的调查材料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

目 录

- 一、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
 - 甲. 牛沟减租斗争调查
 - 乙. 木头峪减租运动调查
 - 丙. 刘木瓜沟减租斗争调查
- 二、米脂县印斗八乡减租调查
- 三、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
- 四、合水县两个减租斗争调查
 - 甲. 六区二乡三村对地主的减租斗争
 - 乙. 二区一乡对地主的减租斗争

说明：今年西北局派了两个调查组到绥德分区及陇东分区进行减租调查，兹将其对几个典型地区的调查材料印出，以资研究边区减租工作之参考。关于对边区全面的减租问题，将另有材料写出，特此说明。（拓夫）

一、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

葭县店镇区今年发动了群众的减租斗争，首先在牛沟（第四乡）开始，继之以木头峪（五乡）的联合减租运动（发动了6个乡的租户），最后又在刘木瓜沟（六乡）进行了减租斗争，兹一一介绍如下。

（甲）拧牛沟减租斗争调查

（一）拧牛沟的地主

拧牛沟是葭县店镇区四乡的一个主要行政村，全村194户，855人，是葭县大村庄之一，全村有地主、富农12家，是葭南土地比较集中的一个村庄。这12家地主富农除过两家土地不详外，其余10家共有土地785.75垧，最多的为张慕宾有地106.75垧，其余均在80垧以下。他们的土地又多在本村周围，远地都是租给别庄人。他们在本村出租的形式，是以活租、伙种为主要形式，按庄稼很少，定租者没有。该村小地主多，自耕少部分土地，老百姓叫拧牛沟地主为“土财主”，就是指他们是从地上发财，土地上的剥削比其他地主更甚一层，他们有一年换一个伙子者，因为换个新伙子能够多剥削一些无报酬的劳动，如张德耀的伙子给他担一年水，还稍[捎]种二垧洋芋和一堆瓜。又据拧牛沟活租、伙种、按庄稼调查，共64宗，只12宗是〈民〉二十九年以前种上的，十分之八以上是近一二年内才新种上的。

（二）拧牛沟租佃形式的变动情形

拧牛沟本村和租户没有以定租形式租进本村地主之土地者，也就是说，拧牛沟地主本村周围之土地完全以活租、伙

种、按庄稼各形式租出，并且经常倒租户，近三年来，因部分实行了减租，倒动更特别厉害，地主张慕宽、张德耀每年倒一个伙子，后来倒的是外村的伙子，因为外村人乖，好说话。我们这次调查出因为减了租倒佃者有 22 家之多。该村租佃现况如下表：

租佃形式	活租	伙种	按庄稼	合计
承租人户数	27 户	5 户	5 户	37 户
地数	326.5 垄	289.75 垄	174.5 垄	796.75 垄

从上表可以看出，伙种、活租的形式是主要的，同时地主为抵抗减租与造空取巧，便大改租佃形式。因为历年减租、活租与伙种不分之故（都是四大分），在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两年中由自耕改为活租者有 8 宗，计地 36.5 垄；由定租改为活租者 3 宗，计地 20 垄；伙种改为活租者为数最多，计有 14 宗，地 130.75 垄。总之，二年中新改为活租的有 25 宗，共地 187 垄 1 亩，但伙种形式仍还不少；由自耕改为伙种者六宗，地 52 垄；由定租改为伙种者 2 宗，地 20 垄；由按庄稼改为伙种者 1 宗，地 33.5 垄，总计新近改为伙种者 9 宗，地 105 垄半。

从这个情况看出按庄稼的少了（据谈〈民〉二十九年前犂牛沟按庄稼有十多家，现只留五家了），自耕也愿意活租伙种出去，因为这样比自己雇人种和播种有利，所以也不雇人种了，也不愿按庄稼了！

(三) 地主对付减租的办法

民国二十九年，葭县的政权还未彻底改变，而减租命令是有了。这个区的地主他们讨论过抵抗减租的办法，据云，当时联保处文书刘争先（地主）把命令拿上与杜某专门讨论了一夜，犂牛沟的地主虽没有参加，但也受了些影响，所以对减租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他们用以下的办法来抵抗减租（这些法子是他们三年来主要的方法，但现在这些法子都用不上了）。

1. 倒换伙子，有的一年换一个。
2. 定租、按庄稼改为伙种、活租（上面已经说过）。
3. 外村找伙子，因为外村人乖，不捣鬼。
4. 造谣。三十一年征粮时，干部来说非减不成，后来他们造谣说米脂对半分了，于是也就对半分了。其实米脂是定租对半交了，或说“就没公示”。
5. 打击乡级干部，使他们对减租工作马虎起来。阎鹏耀给张慕仁、张五儿分了一次粮，按四六分了，地主张慕仁说犂牛沟的减租是张慕玉、阎鹏尧戳起来的，曾骂阎“把断种事做下了”，地主曾商量要打阎鹏尧，后来陈主任来了，地主问：“有没有四六分的公示？”陈主任答：“有呀，非实行不成！”一下子不敢打了。
6. 威胁伙子，与伙子商量好，叫伙子不要实说，说了地就不给种了。

(四) 犂牛沟的减租斗争与减租会的产生。

三年来政府执行减租的情形。

二十九年前没减租，好年头全交，如遇荒年或歉收年，定租有的交三分之二，有的交一半，伙种与按庄稼仍照旧例分。

二十九年减租命令来的迟，定租的地一部分按公示减了，伙种的只有黑豆分的迟，专署派来了人，工厂也搬来了，在他们督促下才按四六分了，其他粮食没实行减租，都对半分了（没有减租）。

三十年有了减租的命令，上面顾及不到，下面不敢提，定租大部分实行了减租。因为到三十年地主由于定租在二十九年减了租；已经将能改为伙种的都改成伙种，定租在三十年已经很少了，伙种地的在主场上打粮，佃户们怕地种不成，按四六分的反比二九年少了，（二九年后的伙种改为活租的187.15垧），有的对半分了，甚至还有多给主家分一点的；也有的租户为实行减租，告过地主，如郭桂香告地主张慕宽，但乡上干部推区上办，区上推乡上办，结果没减成。

三十一年收夏时，伙子们都说命令不顶事，都对半分了。秋后征粮时，区上干部在参议会上宣布今年的租非减不成，伙种要按四六分。但参议员们暗中说：“不顶事，算了吧！”乡长也认为“不顶事”。租户得到这个消息，大家把庄稼堆起来不打，张五打得早，按四六分了（主四佃六）。这时传来一种谣言说米脂对半分了，地主说话了：“米脂对半分，这里也要一定对半分！”佃户怕地种不成，只得对半分了。区上晓得了这个情形，又说非四六分不成，结果对半分了的佃户被地主一威胁，不敢减租，大家都说：“按公示走了。”

据店镇区长区书谈，今年二月间在县上传达高干会决议

布置春耕时，县上特别强调减租，并说减租为了生产，如果那个同志不认真执行减租，党性就不强；减租工作也是测验党性标志之一。并且说过去右了，但现在不能右，不过在开始“左”一点也没关系。并指出了领导斗争的一些办法。

区上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乡长、干部干事等），传达与布置店区的减租工作，并提出：牛沟打第一炮，于是干部主力首先放在牛沟，县上派来两个干部和区长、区书，决定于三月初旬到达牛沟去。

今年阴历二月初八日，陈昌霖（区长）、李德玉（区书）及县上派的同志先后到了牛沟，和乡上干部配合，分开两组调查，一组专门向地主调查，一组在租户中调查。调查了3天，地主先请干部吃饭，什么都不讲，但暗中又与租户说好，叫说按四六分了，租户也不敢讲。随后变了计划，集中力量在租户中调查，首先调查出李长城按对半分了，区上干部找来问，他不敢说，后来要禁闭他，李长城才实讲了。接着又查出几家对半分了，于是召开了口会（租户会）登记租地和去年分的粮数，同时宣传：“分柴能烧火，分粮能吃，分草能卖钱。”雷鸣雨不敢实说，因为地主张国标的祖母已告诉他，叫他不说，可是他老婆已经约乡上一个干部实讲了。他跑回去老婆问他：“你实说了吗？”“没有。”婆姨骂道：“我把你糊脑松，你不跟我说。”正吵闹时，乡上那个干部闯进去了，雷鸣雨见瞒不住了，才实说了。差不多将公粮情形登记清了，决定对违抗政府减租法令的三个地主加以处罚。二月十三日召开租户会，斗争地主（这时党内也做了动员），四十多家伙

子全到了，地主也叫来了。由乡长张慕裕主持开会，区上县上的干部坐在高处看着。乡长说：“减租法令不执行不成，减租是为了抗战，为了生产，多分的要退。多分了的还要给一至五倍的处罚，……张慕宽多收了 1 石 7 斗多，应罚多少？”群众说：“9 石”……“8 石”，结果罚了 8 石 1 斗。第二罚的是张慕敏，罚了 9 石 5 斗，张慕谦罚了 2 石。张慕谦说话了：“罚的不多，国难期间我准备一下，我在欢迎上 2 斗。”有人说“要欢迎多欢迎上一些，2 斗少了。”慕谦说：“对了！对了！”接着又罚了两家。张慕敏说他没粮，要求少罚一点，群众说减上 2 石。张慕宽在会上本来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的，听见他兄弟减了 2 石，他也说话了：“给咱也减上两颗。”群众说“不减了，连张慕敏的也不减了。”租户郭树枝本来多给张慕敏分了 2 石 6 斗粮，他只报了 1 石 6 斗。群众斗出后，群众说：“郭树枝有粮吃，硬愿把 1 石粮多给财主，这 1 石粮退给我们大家吃一顿吧！”大家哄然通过了（后来租户会抽了他 12 垡地给别人种了）。区上干部觉着罚的太多了，超过原来决定，即提出借粮问题，意思是没受罚的地主出一部分借粮，经大家提议共借 9 石，张慕信借 5 石（因群众要罚他，区上人制止了的），张德耀借 2 石，张国标借 1 石，张慕永（中农）自动借了 1 石。接着群众又提出我们要组织减租会（党内事先已有布置）我们才有办法，大家都赞成。当时选出张慕裕（乡长）、阎鹏耀（工人）、张德有（支书）、张慕汗（贫农）、张慕第五个为委员，慕裕为主席。到会的伙子全参加了，减租会就这样在群众的欢呼下成立了。主席宣布散会了。下午

退粮，先背罚粮。

下午没有召集，租户们一个个都来了，没地种的穷人也来了，有的拿着口袋，有的提着斗，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的谈笑着。减租会的人来了说去背罚粮。大家一拥而至，口袋不够去工厂借，工厂的工人把所有口袋（二十多条）都借给了，并给他们拍手庆贺！农民更高兴了，背粮的来来往往络绎〔绎〕不绝，工人们婆娘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热闹。天很晚了还在退粮，共退了多分的粮 15 石，背了罚粮 30.15 石，借粮 4 石。退粮借粮都是用小斗（8 升斗）量的，罚粮退粮大部分都是黑豆，因为黑豆价小。张慕信的五石借粮区上干部叫他借上 2 石谷子、3 石黑豆，张不肯，后区上的干部将张慕信找来，慕信说没有谷子，区上干部生气了，说：“如果你家穷的没有 2 石谷子，5 石借粮不借了；要是你的谷子 2 石多出来，那五石借粮变成五石罚粮。”张慕信没有话说，结果派人到仓库一看，谷子 3 石还多，于是就将五石借粮改为罚粮了。

群众斗争情绪起来了，庄上的穷人也来参加背粮，他们说一夜不睡觉也不要紧。他们为庆祝胜利，杀了一口□□□半的猪（2 石 4 斗黑豆换的），二□饭□□4 斗小米，吃饭的有一百多人，背粮的，做饭的，不租种地的农民也来了，都美美的吃了两顿。可是那些财主看也不看，都在家里睡觉去了。

梓牛沟罚粮统计表

姓名	粮统计
张慕宽	9. 55 石
张慕信	5
张慕敏	2. 6
张国标	3. 3
张祝三	6
张慕谦	2. 2
郭树枝	1
合计七户	共粮 35. 15 石

借粮统计表

姓名	借粮统计
张德耀	2 石
张国标	1 石
张慕永	1 石
共三户	共粮 4 石

(五) 减租会的工作及群众的反映。

减租会的职责，区县没有明确的指示过，只陈主任（即区长）说过“保佃很重要，你们这五个人啥事都可以做，与村主任共同负责办理就对了。”减租会的几个是很团结的，他们常在一块商量事，他们发明了个调剂土地的办法，他们规定租户不愿种地时，将土地退给减租会，由减租会处理。他们今春调剂了 121.5 垡地（详看附表），18 家没地种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抽出的地大半是借口租户和地主捣鬼，不实报被减租会抽出，作为一种处罚。张所娃说乡长压迫他们，捣鬼的人为什么都不抽呢？有的被抽地的外姓人说“我们迟早

在梓牛沟减租减（住□）不成了。”地主张友三说“抽下的地都给穷光蛋种，是分的底了。”据支书说，自减租会成立后，他们有了力量了，公事好办的多了，以前该保上的事难办的很呵；租户大半都齐心了，地不准倒，没地减租会给想了些办法，穷人都高兴，有的租户说：“现在公家给咱作主，咱该发财了！咱们操心往起爬吧！”现在农民们见了减租会的人，说就是叫吃叫喝的，比从前亲热的多了。

减租会五个委员的分工：一人管领导变工队——生产，一人管帐和借粮，一个人管开老坟地，一个人管清查户口和帮助工厂。乡长忙，什么也得管一管。

实际上现在该乡不管出了大小事，总是减租会的人和乡长办，如这次战争动员时，查户口和贮藏公粮（100石），他们都半夜半夜的工作着。

地主们恨减租会的人，在去年想打阎鹏耀没打成。今年罚了他们，非常不满，说：“命令就是给梓牛沟的。”不几天木头峪地主也罚了，才不讲话了，但又给减租会造谣说：“减租会的人吃罚粮了。”（其实没有），又说：“村里有多少有知识的人，为什么公事都交他们办？”张慕清说：“呵，就那几块地，分了就算了。”

附一：

罚粮的处理统计：

买驴二头用法币4500元，乡长弟兄三人喂一头，后沟张家喂一头。买棉花用法币3909元，一斤二斤的借给穷人纺纱了。减租大会用了黑豆2石4斗，米4斗，菜油276.4元。

(法币)。入合作社用了 35174 元(县上命令)。招待费用 150 元。学校费用 150 元。送礼用了 200 元。共用了法币 14455.4 元。现存法币 22674 元。

〈附二〉 牝牛沟减租会三十二年春

调剂土地调查表 1943.7.20

地主	原租户	被抽地数	被抽与□地原因	现种地租户	备注
张慕宽	牛见尾	10 垮	因地主伙子捣鬼，不实报交租数	张九全种五 垧张口玉种五垧	
张慕仁	张五儿	14 垮	地主不愿给五 儿种，五儿也不 愿意种。	张得石分种 张本真	
张国标	李家坬	30 垮半	老婆漂亮，怕工 人走了。	张明福 4 张明治 4 张惠治 4 垮 李同子种了 18 垮	
张明周	高忠棣	17 垮	因父亡不种了 (不确)。	张慕和 9 张慕同 8	
张本敬	宋玉山 张所娃	10 垮	因不执行减租 和地主捣鬼。	张九林 分种 张本裕	因租户说 是乡长压 迫他。
张慕敏	郭树枝	12 垮	因多交租不实 报，罚粮一石，并 抽地。	李增玉 10 垮 张本万典去 2 垧	
张慕宽	高林详	9 垮	因两家捣鬼、高 雇人伙种。	张慕加 分种 张来子	
张慕谦	常德法	10 垮	因和地主捣鬼	牛占渭	
张德有	郭成干	9 垮	不实报	张慕起	
合计	共十 租户	125 垮		得到租地者 十八户	

有的群众反映说减租会的人有□外村来租户的现象。

(乙) 木头峪减租运动

(一) 租佃情况

木头峪是店镇区五乡的主要行政村，附有自然村高家畔，土质贫瘠，是河畔红胶土，是中小地主集中地，有中小地主 14 家，其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如下表：

木头峪十四家地主小地主破落地主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

姓名	张子身	苗庆谷	苗友时	苗桂芳	苗恭俊	苗云峰	苗光昌	苗英	苗□	苗晋仁	张春明	张哲生	苗□事	苗晋桢	
成份	地主	地主	地主	地主	地主	地主	经营地主	小地主	小地主	小地主	小地主	破落地主	小地主	破落地主	
现有地数	436	207.5	165	120 坪 4 分	108.6	112 坪 3 亩	94 坪 1 亩	86 坪 3 亩	□ 坪 3 亩	61 坪 1 亩	79 坪 3 亩 4 分	50 坪 4 亩半	48 坪 1 亩	38	
原有地数	天地		272.5	201.2	180.5	128 坪	191.6	135	120.3 亩 7 分	90 坪 3 亩				42.5	
	典地		100.03	190	36.5	51 坪 1 亩			4					54	
	总计		372.55	391.2	236	179 坪 3 亩	191.5	135	24 亩 1 分	90 坪 3 亩		169 坪 4 亩半	69 坪 1 亩	56.5	
减出地数	腾走		134.05	190	51	45 坪 3 亩			48 坪 2 亩半			76		54	
	出租	46.5	6.5		29.5	7.5	9 坪 1 亩	19.5	11.5			9	5	1	
	出卖		15.5	39.2	31	18	48 坪 3 亩	32	17 坪 1 亩半	13 坪		22	14	3.5	
	总计		156.05	229.3	111.5	21 坪 1 亩		51.5	72.5	13 坪		107	19	50.5	
自种							19 坪 1 亩	1 亩	13 坪 3 亩		2 亩 7 分	2 坪 1 亩 4 分	5 坪 9 分	1 亩	
出租	36 坪 3 亩	198.5	165	118 坪 4 分	81 坪 2 亩	50.6	58.5	48 坪 2 亩	60		78 坪 3 亩	77	42 坪 3 亩 1 分	48 坪 2 亩	36
租耕	87.13	46.42	40.85	24.79	19.66	13.05	17.52	12.25	17.79		21.2	17	8.7	12.25	6.8
平均租额	2.4	2.33	.24	.21	.24	.25	.29	.23	.25		.27	.22	.207	.25	.22
伙种地数	□ 坪 1 亩	4.5		2	21 坪 3 亩	63 坪 3 亩		12 坪 3 亩			1 坪 3 亩	2 亩	3 坪 5	1 坪 2 亩	2
备注	二块地			四块地日久遗失						去年典入的五块			内五升租已三折斗算		
考	丙申														

木头峪本〈民国〉村伙种和活租较多，其中二十五年种的只有一家，其余多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年种的现有租户 25 户，共地 106 垚 1 亩 16 分。这 25 户共合租种地 51 宗，每宗地数很少，内有 16 宗是家族关系，按阶级成份说，16 宗是租地主的地，35 家是贫农间相互种或是租水手工人和小商人的。在 51 宗内，活租有三种〔宗〕，伙种全出牛工者有 1 宗，此外 38 宗是各出一半牛工者的，9 宗是主家自挖地或出人工来代替出牛工的。

在高家畔定租占主要地位，伙种和活租共有 11 户租户，其地 35.5 垚，其中亲属关系的有 7 宗，按阶级成份说，贫农租种贫农的 8 宗，贫农租种中农的 7 宗，活租 7 宗，伙种出全牛工者 3 宗，出一半牛工者 4 宗。于此可见（1）该村伙种和活租的关系多是中农和贫农间的关系，地数不多，家数不少；（2）出一半牛工的究竟算伙种还是算活租，难以定论。

木头峪减租情形在三十年只有五宗四六分（一宗是贫〈农〉与贫农，四宗是贫农与地主），余均是对半分。三十一年，县上强调减租工作，便只有五宗对半分了（都是贫农与贫农），其余是四六分，柴草随粪走，主家多上粪，多是归主家所有。在高家畔，三十一年有四家对半分，三家四六分，其中有两家说定对半分的。柴草分法与木头峪同。

木头峪定租租户有 17 户，租入地 77 垚 3 亩 4 分（内庙地、户地 9 垚 3 亩），土地只有 2 垚，共出租子 15.97 石，平均租额为 2 斗 1 升 5 合；有 12 户是租种地主的地。高家畔定

租户有 28 户，租地 136 垄 3 亩，上地只有 4 垄，共出租子 30.215 石，半垧租额 2 斗 2 升（当地平均租额鲜有高于 2 斗 5 升者。该村首户张子珍有出租地 366 垄 3 亩，租额共 87 石 1 斗 3 升，平均租额为每垧 2 斗 4 升弱），有 16 户租木头峪地主的地。减租情形如下表所示：

高家畔				木头峪			
年 代 项 目 数 目	民 29 年	民 30 年	民 31 年	年 代 项 目 数 目	民 29 年	民 30 年	民 31 年
租地	123 垄 3 亩	121.5 垺 3 亩	136 垺 3 亩	租地	57 垺 3 亩	69 垺 2 亩	77 垺 3 亩 4 分
原租额	27.645 (石)	28.645 石	30.215	原租数	10.29	12.17	15.97
交租数	23.329 (石)	20.589	17.906	交租数	7.4	8.56	7.84
长交数	10.884 (石)	3.40	2.748	长交租	3.77	1.258	少交 1 斗 4 升
实减率	15%	28%	40%	实减率	28.2%	30.5%	52%

从上表看出，高家畔租户二十九年长交租百分之三十，三十年长交租百分之十二，三十一年长交租百分之十。木头峪二十九年长交租百分之十六点五，三十年长交租百分之九点五，三十一年全部按五成减了（只有一家种父亲的□老地，没有给租）。

该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木头峪本村租户追粮追的不彻

底，他们说：“在一个庄子里，天天见面，实在不好意思。”

这次我们去调查，地主瞒报土地很多，如苗及时，瞒报了 70 来垧，其余瞒报 20 �垧，10 多垧的不少，于此可见该村工作一般了。

（二）减租运动

铧牛沟减租斗争结束，县上区上干部检讨认为是成功的，原来计划接着搞贺家沟的减租，因为没有调查出材料，便决定发动木头峪的退租运动，处罚顽固地主苗庆渥、苗庆宝，通过了发动办法，是先号召后调查，然后发动一个各乡联合的退租斗争。采取这种方式的动机：（1）做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2）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3）利用群众集合的机会发动生产。

三月十九日，县区干部分别到五乡、六乡、七乡调查。六乡租户开会，乡长说：“二十七日到木头峪退租子，政府有命令，谁不去，地种不成，去时要带口袋。”有人说：“去可以，要人负责，我们怕租子要不回来，地又被人家要去。”干部答：“去了能斗争，一定保证种地。”“去了不给装，可以不可以自己装？”干部答：“组织起减租会，由他们退。”“没住处，人家饭也不给吃怎么办？找不到地主怎么办？”干部答：“要一起去，回来一起回来，不要你的粮一盘了就跑掉。”会上调查时，群众议论着：“要了好，粮能吃，地也能种，租子是地主强迫的要去，谁还愿意交？”

七乡张顺家沟，西山开了乡长政府委员会和支部会，规定宣传和调查共一星期。孙昌林（区长）在村民大会上问：

“谁长交了租了？”大都说：“按公家命令交了。”问：“按命令给了多少？”说：“不知道。”“记不清了，回去问婆姨们。”有一个党员张大□说：“这三年长给了四石多租子”（预先布置的）。陈昌林再一个一个的考查，还有半数以上的租户马马虎虎的不讲。

二十五日县区干部到了木头峪，住在张好娃家里，各乡长通知租户出发：“凡是木头峪的租地户长给了租子的，一律要去木头峪开会退租，不能短少一个，谁若不去处罚。”他们是用“不斗争，不减租，地给政府留下”的口号来动员的。六乡东山马支福，虽然不种地，但区上同志说他的斗争性好，敢说话，敢负责，叫他参加领导。动身时有人说：“公家不去就咱去，这还能要下啦？只是去惑人！”“事搞不好，地也要跑。”有些推马支福说：“我们不敢说，去了你说。”党员和积极分子便在旁边发动说：“不去不行，他们长拿去了咱的租子要还咱。”

少数的坏分子也就在说破坏话：“租子给了人家又向人家要，八路军尽真是做这些尽头事情哩。”“看八路军若倒霉，你们连地也种不成了。”

七乡张顺家沟有32户木头峪租地户，去了16户，有6户是积极的，其中有3个对减租有正确的认识；有两个是讨租时没把地主摆待好，把地主怪下；有一个是地主把地已经收回，更不怕地主要地。有七户是“联络去的”，去怕惹人，又怕地保不住，不去，□现时退的来就能吃，同时公家又不让；有三户是动摇的，去是为了应付环境、怕村里的人和公家责

备他。还有十六户说没长给的，没有去，据调查，只有极少数没长给租子，多数是怕惹下地主种不成地。还有的想：“已经长给了人家拿出去就不疼了，要和人家去要，见面眼热面花，实在难为情。”

二十七日，各村的组长（每村推一组长率带）把租户带来了，到的是五乡、六乡、七乡、一乡、二乡、三乡是第二天到的。才到，木头峪街上的人哼着鼻子说，“乡下人装租子来啦！”地主们故意一问一答嘲笑的说：“乡里那股活贼来了，还要吃饭！”“喝雄〔熊〕！”“人家还要窑里住呢。”“就在露天地里貉纠〔圪蹴〕着去吧！”

人到多了，便按照拟定的手续，先由组长带着租户去找木头峪乡长做见证，说明来意——“为的减租，请你帮忙。”于是由乡长把谁的租户，集合起来，带到地主家，说：“过去你们没有认真执行减租，如今退租来了。”集合起来的原因，为了怕单个去搞得不彻底。

当时几家地主不在，一直等到下午，到了七八十人（入夜增至一百人），便开各乡租户联合大会，提出：“马支福、乔增明、高风禄当主席团，乔增明当主席。”（预定名单）大家说：“赞成！”当即通过主席团名单。这时县区干部还是暗藏着，由积极的租户当通讯员，与大会主席团联系。之后，主席即说话了：“以后大家有粮吃，要好好种地，坚持抗战；减租以后租户把地种好，交好租，对地主也有好处……”

接着登记长给租子的数目和算帐，花了两三个钟头。算完帐，苗庆渥多装了二石一斗七升，苗庆宝多装了四石多，主

席问：“多租子是谁的过？”刘向荣说：“地主强迫要的，我们这些稀活人（穷人）还意多交吗？”大家质问苗庆渥：“二十九年公家有命令减租，咱们解不下，你们念书人还能解不下？”主席问：“该罚不该？”“该罚！”“多少？”“50 石。”“30 石。”（马有曾提）“20 石”。“20 石”……多数通过。以后又罚苗庆宝 20 石。据租户们说：“罚倒了，木头峪的人都灰不溜溜的怕了，罚的时候，地主眉眼不好看的恶啦，一句不言传，灰不搭搭的。”大家只是交头接耳的传了“原来为区干部决定各罚 10 石，共罚 20 石，”但通讯员传错了（也许故意多罚一点），说：“每人罚 20 石。”群众提出张子珍也要罚，苗庆谷也要罚，主席说：“张子珍已经把单子写给县上（其实没写），苗庆谷也写了单子给乡书记”（乡文书）。群众于是交头接耳的论了一回，就算了。原来江平同志和陈昌林认为张子珍比较进步，葭芦合作社 20 万元的股，决定不能罚他，便这样向群众解释。因为纪涛平常要到苗庆谷家里走，江平往常到木头峪，也爱到苗庆谷家里吃饭，恐怕是泄了风声，苗庆谷便写了一张单子交给纪涛。

当场成立减租会，选举五人（马支福、高风详、乔增明等五人）为减租委员，负责退粮。

当晚，倪主任秘密的来了，大家把罚粮的情形告诉他，他觉得处罚过重，苗庆渥的超过了 5 倍，于是翻了一下专署的指示，内有“个别坏地主可以单算帐”一项，便提出算苗庆渥等旧帐来补救，大家都同意了，当即由江平、陈昌林把减租会委员找来布置明天算苗庆渥的旧帐。这时租户们住在乡

政府给找下的窑里歇，嫌冷，又怕地主把粮移走了，提议晚上搬粮，准备一夜不睡，减租委员便领着租户到苗庆渥家里。粮盘开了，苗庆渥的婆姨看到租户们一拥而入，东一句，西一句，吵吵嚷嚷，很看不惯，便不高兴的说：“你们又不是土匪，急的干什么？”马支福马上把斗一摔，发了脾气：“你胡说些什么？！我们不盘了！”站在旁边掌灯的苗庆渥吓的连忙陪笑说：“婆姨们不懂事，公事还是公办。”减租会的人才又继续的抹着斗大声报数……。这一晚共盘了四石多，盘粮的斗是刘木瓜沟租户带去的，重25斤。二十八日早上，继续盘粮，苗庆渥一共罚了20石，还长装了3石多，把他的女婿高天孝存在他家的两石多粮也拿走了，装了两石小米，1石2斗小麦，7斗大麦，其余都是黑豆。最后去装的是一个减租会委员，仓里只剩下两斗多黑豆了，有人说：“给他们留下点口粮吧。”租户令委员说：“把仓扫光。”扫完了还不够，便抓着苗庆渥问：“不够怎么办？”“怎办！”“折钱”！这样折了1050元法币，顶了7斗租粮。

江平、陈昌林到木头峪，已知苗庆宝全家在十余天前搬往榆林，但估计他家有麦子十来石，卖地的钱5万余元，亦可折粮，故仍决定罚他以维持原议。苗庆宝的门给打开了，没有一颗粮食，只好将他卖地的钱（只一部分，大部分预先给他的岳父要去到榆林做生意）折粮5石多，不够的再将公家的罚粮3石分给来了的租户，以维持群众的情绪。

早饭后开算帐大会，算出苗庆渥3年共长收租子4石8斗。有些群众嚷着：“苗庆宝不务正，赌博，嫖妓，把地卖了

又到李家寨买地赚钱，害老百姓，要多罚他个！”

苗庆宝的门打开了，区上干部想威胁他回来，就封了他的门，经全体租户议决，由乡长写封条，代管产业，并发动苗庆亭（他的侄女）写信叫他回来（现还未回）。

为了庆祝和巩固会议的胜利，并援引牛沟的前例，有些租户提议：“人家说咱们喝雄喝不上，咱们提议好好吃他个狗日的！”还将 3 石多罚粮换了 1 口猪，买了 120 斤白面。猪是马洪晨杀的，杀了 43 斤半，吃一顿活烙〔饸饹〕面，从早上一直吃到下午，大家笑嘻嘻的说：“吃美了，顶过一个年！”有些破坏分子说：“事是过好了，就是差着一顿油糕。”（油糕是埋死人时吃）当天背走了三、四十石粮，天刮着风，下着微雨，刘召先翻了十七八里的山，一口气把 3 斗黑豆背到家里，向儿子说：“够一个多月吃了。”马洪晨退了 3 石来回的粮，大部分卖了，背回两升黑豆，用卖粮的钱付了买地的地价。“没有这笔钱，马便要卖掉啦！”大家都一致的说：“唯木头峪做了个好，家里多少没有吃的，这回可顶事了！”积极一点的就问乡上的干部说：“地什么时候分呢？”或是相互议论说：“唯这个好，比土地革命好！？”（意即不用流血，将来就不能不给租子，分地）。

二十八日到的租户都要求算旧帐，区上干部多方说服，还是不依。羊园山和张家圪塔的租户把张××（有 20 垮地，4 垮园子）抓住在街上转来转去算旧帐，闹到江平那里，结果写了欠条了事。20 余垧的“地主”也要退租，很多退不出粮的破落小地主和富农、中农便想出一个写欠条的办法，答应

秋里扣除，后来县区干部决定让租户们自己和小地主算帐，闹到不得开交，再去调解。有些租户遂与地主妥协，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在地主家里吃饭，更不好意思带口袋去装粮。七乡有些租户长给租子不很多，只背了九升黑豆就回来了，一些破坏分子来乘机造谣说：“你背是背来了，恐怕给人家背的再送！”

二十九日开了租户、地主联合会，倪主任也参加了。先是减租会委员说话：“我们乡里人，不懂规矩〔矩〕。”客气一番。租户多讲了，有说要换旧的，有说以后要好好种地，要交租。张子珍和苗桂芳说了话，说自己过去长收租子不对。苗培英（破落小地主，50多岁，家无劳动力）说减租后“苦乐不均，生活实在难过”，倪主任叫他参加生产。（江平讲）

（三）各阶层对这次运动的反映

这次我们调查，开了个地主座谈会，苗普祯说：“减租好，新法没病，法久才生弊”（含有反面的意思）。苗桂芳等说三点意见：（1）减租要实际调查土地；（2）一律使用公斗（他们收租是8.5升斗）；（3）公粮要按实际收入征收。苗恭俭还说驮租要用钱，1斗租子实际只有6升。（注）

地主觉得自己的威风打下去了，惶惶不安。张子珍这次谈到当时开会情形只说“厉害，厉害！”不敢再说旁的。张逸民（张鹏图同志之父）说：“地主们开会时只管抢烟布袋，不敢做声，怕处罚到自己头上。”又说：“大家都想，地要分了，租子吃不成了，今年四六减，明年三七减，后年二八减……地不能倒动，又要照出公粮，地要变成害了。”

对于退租，张子珍、苗桂芳都说：“退粮用咱的斗，没有折合。”只有刘木瓜沟的租户带了一个斗来盘苗庆渥的粮时用了。张逸民说：“退 3 年的租太利害了，退不出来！”

破落的小地主都诉说生活的困难，张健说：“减租苦的还不是咱们。”

六乡租户会在租户心目中有了威信，他们说：“租户会好，实在好！”租户会一叫开会人便来了。

〈注〉：苗恭俭驮租子的费用，民三十一年实收租子数目：

谷米——3 斗 1 升，黑豆——7 石 9 斗 2 升，麦子——2 斗 6 升，杂豆——8 斗 5 升，共粗粮——10 石 3 斗 4 升，折细粮——5 石 1 斗 7 升。

驮租费用：

出驮租洋——法币 895 元，按市斗去冬谷粮价折合黑豆 1.081 石。

出牲口料——2 斗 7 升

出牲口食草——法币 120 元，按市斗去年冬粮价折合黑豆 2 斗 1 升 8 合余。

除去驮工费用实收：

粗粮（折市斗）——6 石 7 斗 1 升 3 合。

折细粮（折市斗）——3 石 3 斗 5 升 6 合半。

去年出公粮——1 石 5 斗。

（丙）刘木瓜沟减租斗争

（一）顽固地主刘争先

葭县店镇六乡刘木瓜沟（行政村）是土地革命时的游击

区，这村里有两家地主，叫刘争先、刘丕先（堂兄弟）。刘争先共有地 368.25 垛，出租 108.5 垛，常年吃租 27.605 石（内有 6 垛不出租粟）；伙种出 188.75 垛，自耕 71 垛（雇人种）。

刘丕先之兄在定边三旅七团当兵，共有地 214.5 垛，计出租 107 垛，常年吃租 32·3 石，伙种出 64.75 垛，自耕 25 垛。

刘争先是中学肄业生，年 40 岁，过去当过绅士村长，是国民党员，土地革命时分过他的三、四十石粮，在联保处当书记数年，今春区上才减下来，现在家里管家。他看不起乡级干部，对新政权及农村建设常造谣破坏，看看这村的谣言吧：这次环境紧张，大批动员牲口时，他说：“八路军快走了，住不成了，八十六师来那些做工作的怎么办？”今春组织变工队时，他把组织变工队认为是强权；动员移民时，他们造谣说：“移了去当兵去，种下地全是公家的！”组织自卫军基干班时，造谣说：“是抓兵哩！”把几个队员吓的跑到乌龙镇去了。区上有干部估计刘争先是个特务头子，大概差不多。刘争先会说会讲，狡猾至极，过去当村长绅士时，村里的各种负担由他派，他是大户，反负担的少，甚至不负担；他收租是大斗（比别人的每斗米重二斤半——我称了的），老百姓说他斗上的铁梁是活的，入时铁梁下用木片撑高，出粮时就没木片了；他伙种给人地，他不上粪，可是柴草一定要分一半；过去常用他的政治地位欺负人，又善于挑拨是非，所以周围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活埋人”的绰号。

刘争先他对减租法令是研究过的，他认为减租农民太便宜了，地主太吃亏；他始终是站在反对的方面，自民二十九年专署颁布减租法令后，他便与地主等研究过一夜，研究的结果，当时虽没得到材料，但在他历年来反减租的行动看来，大概是有几条对付办法的，其办法：

1. 以倒佃对付减租的租户（这时还没保佃法令与工作），以假佃实行倒佃，如假佃给刘进宗 10 垄地，以改变租佃形式，实行倒佃（这一条是对付本村租户用的，因为外村不可能）。
2. 收回自耕，主要是收回实行了减租租户的地，收回后自种上一年，再另租给别人。
3. 威胁农民，使他不敢减租。这一条刘争先和他继母唱过双簧，今春刘争先退租时，（没罚以前），刘给退，她在发脾气：“退给退了，明年把地收回自己种！”租户怕的嘴也张不开，刘争先说：“我的粮不够吃，你先拿上些，你别听别人的话，地明年你还是种。”去年前年因他在区上工作，农民更怕他了，他也利用自己的地位说几句大话，可是农民有的就被他吓住了。
4. 假仁假义，假慷慨，麻痹租户。当租户交租时，总是问他怎么装，他总是说：“我们几辈的交情了，你看的装去！多装多吃二颗，少装少吃二颗。有些租户不好意思就给多装几斗（比减租率多几斗）。
5. 退一部分，应付减租，这是刘争先今春的办法，因为别村地主罚的罚了，退的退了，自己给乡上干部声明一下，把门前的租户退上几家，应付一下公示，打算马虎过去。这是

他过去办事处的经验，可是今年没用上。

6. 造谣，活动，进行明减暗不减活动。“八路军快走呀，八十六师快来到！……”。这个谣言乡干部都说是他讲出来的……。这个谣他是按具体条件讲出真能动摇人民（去年兵工厂搬家时讲过一次），又打算与租户勾通打条子，进行明减暗不减的活动，今年也碰了钉子。以上办法刘争先都用过，梓牛沟地主也差不多用过。

（二）减租斗争经过

这村的农民是受过去土地革命影响的，有的还参加过土地革命，对共产党有相当认识，故在梓牛沟、木头峪减租斗争以后，他们便要斗争他们最痛恨的地主刘争先，很多租户不断的找乡长及支部上的负责人，积极分子说：“我们可等不得了，非斗争刘争先不可！你们看怎么办？”找过刘进孝（支书、乡委员）的就有十多人。支部便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一次），决定先叫刘争先退租，他不退再说；一面请示区上看怎么办。

第二天刘争先的叔父请马余九（主任）、马进孝（支书）和刘争先吃饭，吃饭中刘争先说：“木头峪、梓牛沟的肉都吃了，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呀！”马进孝（支书）马上很诚恳的肯定的答道：“那看你退不退粮，你要把粮全退了，我敢保不吃你的肉！”刘：“你敢保？”“敢。”第二天刘争先找了四、五家租户，马马虎虎的退了一下。刘进孝也通知了四、五家租户，刘争先又退了一点，长交三、四石粮的，他只退1斗5升麦子，以作了事。刘进孝又告诉他：“你退就退清，不然

还是麻烦！”刘争先想了个办法，晚上他去和租户写假条子以作证据，条上写：“按法令四六分了。”叫租户打手印，租户不愿意，也没行通，相反的有的租户找乡上负责人找的更紧了。刘进孝又与马支福（支干）商量，叫马支福到区上请示，马见了陈区长，约定初五日退租，并决定罚刘争先 20 石、刘丕先 15 石。他们知道有些群众还怕地主，支部即布置了动员。刘木瓜沟党的小组长是个中农，自己没有租种别人的地，但他认为是党的任务，是打击坏人的机会，他一个人就动员了好几家胆小的租户，如马海礼、马海良、马进业、马继业等，他是用木头峪胜利的故事动员的，他们又动员了刘争先骂过的刘召先（佃家积极分子），叫他在大会上提出罚粮数目，按一倍的提。刘召先当时说：“这我一定能做好！”附近有刘家租户的村庄都通知了，也进行了动员，约定初五早到。初四日陈区长秘密的来到马康业家，叫马找刘进孝来，可巧刘进孝和刘争先正在刘争先门口闲谈，马康业一来，刘争先即问：“区上有人来吗？”康业说：“不晓得！”刘进孝看马康业的神气，知道有人来了，便欲摆脱刘争先，可是争先就不离开他……。这时，刘争先已经知道要斗争他了。

陈区长来布置了一下应如何进行会议及罚一倍的原则，晚上又走了。第二天就是初五了、区上李德玉、高增先来了，秘密住下了，没出头。外村的租户也来了，乡长和马支福主持，先统计各租户 3 年长交的租，统计了一个上午，刘争先三年长收的租 31 石多，刘丕先长收租 20 石 9 斗。开会了，到会的租户 50 人，马支福主席先讲了一下为什么要减租，刘争

先插嘴了：“我先问一问，今天开会是政府叫来的？还是自己来的呢？”主席即很机动的指着马应田说：“你说谁叫来的？”马应田说：“自己来的。”刘争先没话说了，打算捣乱开会的企图破产了。接着主席又讲刘争先不执行政府法令，长收租30多担反而倒地抽搐，不合道理……，又假典给刘进宗10垧地，太不对，应该罚！群众：“同意！！”“罚多少？”主席问，“……30石，你们看多呢还是少？”马得超说：“减上5石。”马恩来说：“少罚一些。”马恩不说：“不要罚，由政府办！”高福鸿说：“粮退了就算了，为什么罚人家？”“……减上些，……。”李浩很生气的说：“哈，这么个会！人家要要求还有人骂的不收！”（这些人可能是刘争先事前动员的）。一个党员马一质问李浩道：“谁不叫？”李浩说：“是马增杰说的。”马增杰见势头不好，说：“我没说！”“……捣乱会场！”（群众说李浩）大家争吵起来了。马恩来（注二）除给李浩辩护外，还活动对落后群众说：“不要提说罚了，罚不罚不管他，何必惹人呢？”这时刘进孝已趁空请示区上干部回来了，告诉主席说叫把李浩捆起来！主席即高声喊：“把捣乱会场的李浩捆起来！”（又有的还叫捆马恩来）群众都站起来了，有的马上找绳，找不到绳，解了两条驴缰去捆李浩。刘争先说话了：“事是我的事，不要捆李浩，捆我！”说着上前受缚。主席没命令，群众不敢捆，站住了，刘争先问主席说：“我说几句话。”主席允许了，刘争先把他的父亲如何行善救药、施术救人说了一气，又说：“我们都是门跟前人，罚我是应该，就是我出不起……。”“你出不起谁能出起？”群众嚷起来了，刘的话也不讲

了。主席说：“到底罚刘争先多少？”……30 石！通过了！”“罚刘丕先多少？……20 石！也通过了！”

接着是成立六乡减租会，选出刘进先（刘木瓜沟人）、马得川（在山上人）、马支福（东山人）、马进昌（东山）、刘召先（刘木瓜沟）、马心亭（高卖家沟人）、马应田（七乡高家山人，因租种刘家地也选上了）等 7 人为委员。租户说：“选的好！我们就靠你们”！……主席宣布吃了饭后背粮，先起罚粮，然后就退粮。有的租户提议做饭的做饭，吃的吃，背粮的背粮，……。主席说“好”！又提议我们吃一口猪……同意……散会了。

散会后，减租会的负责人他们即商量处理李浩等捣乱会场及马恩来会场活动等问题。商量的结果经区上干部同意，处罚了以下数人：

1. 李浩（注一），因其扰乱会场，抽其租地 3 垡半，罚黑豆 4 斗。
2. 马恩来，进行破坏活动，罚黑豆 4 斗。
3. 马福明，平日即反对减租，这次说：“不该罚”，抽其租地 2 垡。
4. 高福有，平日和其兄福明一样反对减租，这次又说：“少罚些”！
5. 高友明，这次开会通知他没来是有意的，抽地 3 垡（外村租户）。
6. 马恩丕在会场说“不要罚”是不对的，给了个批评。当即将抽下的 10.5 垡租地分配给没地种的穷人种了。

晚上和第二天继续 着背粮、退粮……。罚粮起够以后（刘争先 30 石，刘丕先 20 石），接着就退粮，把刘争先的仓子都扫了还欠 11 石（已退 20 石），刘争先说：“我再没粮了”。减租会允许打欠条，今年秋后扣除。刘丕先也不够了（已退 20 石），打了 6 石多的欠条（后来县委书记到东山检查减租工作，给马支先讲刘丕先是抗属，把欠的 6 石多免了，马支福心里有点不高兴，只减了 5 石多）。他们热闹了两天，杀了 1 口猪（40 多斤），吃了 3 顿，共费 3 石多粮。吃饭时有七八十人，租户们说：“咱又胜利了！有办法。”有的租户看了退粮运动后，暗 中问刘进孝：“地什么时候分？”有的党员也打问过这个消息，因为农民们看见和亲身曾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他们看退粮罚粮的情形和土地革命时差不多，他们的推测是快分地了。支部书记都给他们做了解释：“这是彻底执行减租减息，不是要分地，现在不分，再过几年也不分。”有的农民们还存在着等着看的心理，期望着分地。

（三）刘争先被群众斗争后的活动

刘争先对二十九年减租的意见，证明他对减租是有研究的，这次我们去调查时，他提出的问题中的一个“二十九年我们（指他）不给国民党县政府完粮纳税，这里政权还没改变，这一年的租应不应退？”从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的口气和提法，可以判定这是他们二十九年不减租与抵抗减租的公开理由，正由于那时政权还没有彻底改变（彻底改变该是今春，名 誉上是三十年六月），大权还在他们手中，减租就叫他们马虎过去了。

今春罚了他以后，在刘争先认为区上县上办错了，退二十九年的租子没道理，罚更没道理。于是他便欲联合被罚的地主告区长；他活动了好几家地主，有的地（主）因他没退二十九年的粮不下，有的不敢干，但是他总不甘心。阴历四月初八，在白云山庙会上活动木头峪地主张子珍，张自珍把他谈了一顿，他才不活动了（这也是他当时特务活动内容吧）。

这次我们去调查，杨一木同志在该村，就住在他的家中，经过两天的时间谈话，他内心的话说出来了，他说今年罚他他不满意，打算告陈区长、倪主任，后来张子珍劝的我不了（其实他是见其他地主不随，他胆怯了）。他用了新的方式控告了，对我说：“你是延安来的，是我们的上级，来了正好，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清楚，请你给我答复一下”。他说我本来打算去绥德专署去领教，你来了省得我去了。杨一木同志说：“那么你写个信，我一定给你交给专员”。他说可以，他把头一低（大概是计上心来）一想笑了，说：“我写不成个样子，我讲就对了”。他用很老练的口吻一句一句的好像有提纲式的讲话了，他说：（下边的话，是他讲的原句）

“第一，我要问的是今年罚的命令是区上的县上的？还是上边有这命令？命令是没退粮的（指长收租粟）都罚？还是罚几家？”

第二，罚是公家罚还是民众罚？要是民主罚就应该有民主，就不能罚民众，我们这儿罚了我，又罚了租地户，你说这是民主还是压制？！（说至此长出了一口气）民众罚，你说

民众有权利没有？为什么说话也没权利呢？事后我问过陈区长，他说是减租会罚的，减租去又说是公家的命令！实在罚的我不明白呵！我找不到路，请你给我答复。”（这时他的意见是要我答复）我说“再呢？”

“第三，二十九年长装的租，应不应该退？二十九年我还给旧政府完粮纳税哩！一切公示都是旧政府的，你看这个情形该退不该？

第四，再我欠的 11 石粮，我出不起了，请你给我想一个办法。”（话稍停，他很不自然的又笑着说）“就这个，请你答复一下！”

刘争先提出的问题，证明刘争先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同时刘争先平日即以他意见的内容，到处告诉以示反抗，到处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杨一木同志曾把这四个问题和陈区长等谈过，他们说：“实在厉害，我们没法答复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杨一木同志把村主任找来（乡长不在，支书没找来），同马洪恩等当面答复的，先称他的斗（他的比马洪恩一斗米大二斤半），称罢，他就给讲好话，但没有睬他，也没作声，他要给杨一木等饼子吃被拒绝了。杨一木同志开始答复他的问题了，主要的是先以具体材料打破了他“减租是农民吃亏还是地主吃亏”的观念，大家算了种一垧高粱一垧谷子的细帐，从做垅修地算起到收获、种一垧谷子普通要 10 个工（以伙种计），除一个驴工外，伙子出 8 个工，1 工按 40 元计算，合 320 元，接收 6 斗谷子算（去年 5 斗收成），伙子按法令分 3.6 斗，谷子买 100 元 1 斗算（今春 80 元 1 斗），伙子能长 40

元，如各价是 80 元计算，3.6 斗谷子是 288 元，伙子白贴 32 元，只能分 30 斤谷草，谷草按 1.5 元 1 斤共 45 元，除过 32 元，下剩 13 元，这是伙子辛苦一年到头的红利，这怎么能养老婆娃娃呢？地主呢？只出一个驴工，得 30 斤草合洋 45 元；2.4 斗谷子合洋 192 元，共合洋 237 元，谁的利大？谁的利小？（以上工价粮价均按今年春天计算，以法币为单位）刘争先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还是我们有利”。众人都笑了，李浩也笑了。又算了种一垧高粱的细帐，租户更没利了（因为去年高粱收成不好）。接着又说明为什么要减租和二十九年应该减租的道理，这两个问题说明后，还批评了刘争先对农民压迫的几件事实，和一个公民在抗战期间的义务等，婉转的将其提出问题都答复了，他没话说了，他说：“我这下子明白了，你给我上了一次课。”

（四）六乡处理的几件土地案件

穷人买地，土地归谁种？这样的案件有下面四宗：

1. 刘向应租苗方田地 7 垢，买来 4 垢，空下 3 垢马增杰买了。刘向应有 30 余垧地，马增杰也差不多，乡上干部叫他们两家分种。马增杰买的 3 垢地，一人 1 垢半，后江平下来开会，说这不对，“认地不认主”，人家租的，卖了还该刘向应种。马增杰说买地为了种地，就和苗方田翻了，结果苗方田把钱退回给马增杰，因币值变动，不好退，同时苗方田又没钱，就把地价减了，一下卖了 1 垢半地给他。

2. 马增业（贫农）买了 1 垢半地，是燕嘉宾租种的，燕嘉宾还要种，要乡上干部解决，租户种 1 亩半，买主种 3 亩，

后来区上翻了案，把地给了贺风祥。

3. 刘召先（佃农）卖过公粮后，地被李浩扣的，区裁判员调解各种一半，李浩的种了，刘召先就搁种了。

4. 白草圪塔马能科买粮拿有收据单据。该地贺凤祥租种，双方都坚持要种，后区上判决：贺凤祥把两块自种地补给贺凤祥，地由马能科种了。

以上的案件处理，我们与乡上干部详谈中，他们对区上的处理不满，实际上区上处理远不如乡上处理正确。

（注一）李浩是刘争先继母的前家儿，在刘争先家长大的，现不在刘家了，老百姓说李浩是“带羔子”。

（注二）刘丕先、高福明、马恩来、李浩、刘都是刘争先的走狗，支部负责同志说都是国民党员，跟着刘争先跑。

二、米脂县印斗八乡减租调查

（一）概述

印斗八乡共辖四个自然村（也是行政村）：流曲峪、张家峁底、艾家峁底、赵家石畔。流曲峪为该乡中心。建有纪玉屹塔寨，为昔日反共据点之一；乡政府设张家峁底。该乡西距米脂城 30 里，南距杨家沟 10 里，北距刘家峁 10 里，东距桃镇 10 里。原乡桃镇二保，一九三八年八路军驻防桃镇，一九四〇年组织二保抗救分会，是秋组织自卫军。保长原为马绍绪（为过去联保主任马绍先之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改选为郭俊彦为保长（郭亦接近马绍先），一九四二年七月改选马汝生为保长（马为中农，是党员）。同年十月改保为乡，乡长马汝生，乡文书王玉亮，全乡 197 户，人口 8016 人。

(二) 土地租佃关系

该乡位于杨家沟与刘家峁间，山上的地多是杨家沟地主的。租户占全户数 67%，是租佃户集中地。一般佃户自地很少，每人平均只有 1 垄，地多给杨家沟地主买去，又由租户租回耕种。

兹将该乡人口、劳动力、畜力及土地租佃情况列表如下：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牲畜	自地	典地		租地		伙活地	
					典出	典入	租出	租入	伙出	伙入
富农	3	16	5	3	120.5	2	/	17	/	2
中农	44	267	49.25	35.5	583	1	62.5	7.5	62.5	21
贫农	121	635	133.5	49.5	561.5	145	107.5	/	1028	20
雇农	13	38	16.5	/	5	/	/	/	/	7
其他	16	60	7.75	1.5	18	/	7	/	7.5	/
合计	197	1016	212	90.5	1290	17.5	162.5	24.5	1098	43
										100.5

从上表看出：

1. 该乡无地主，很穷，富农占全户口 1.5%，中农占全户口 20%，贫农、雇农、工人等占全户口 76.5%。

2. 租地的几乎全是贫农，贫农占全户 61.4%。

3. 贫农每一劳动力种地 13.3 垑，每一畜力耕地 36 垗，劳动力剩余多，畜力剩余不多。贫农土地很缺，全靠租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该乡租户主要租种杨家沟地主的地，在流曲峪多是杨家沟欲仁堂、重庆堂的租户，在艾家峁底多是衍福堂、大中堂、中正堂、至正堂的租户，在张家峁底多是欲仁堂的租户。这三个村子只有少数租米脂城地主的地。

由于种的是地主的村外地，故租佃形式主要是定租。活租和伙种不占重要地位。定租的租佃关系是地主与中农、贫农的关系。

定租户的租佃现况有如下表：

村名	定租户数	租地数 (垧)	原租额 (石)	平均租额	去年交租数	实减率
艾家峁底	49	610.5	188.58		92.79	49%
张家峁底	29	21.75	67.4	0.31	33.7	50%
流曲峪	30	270	86.2	0.319	43.1	50%
总计	166	1098	342.18	0.313	168.59	49%

从上表看出：

1. 定租是主要的租佃形式，133 户的租户中有 100 户是

定租户，占全租户数 81. %。

2. 原租额很高，每垧租地的平均租额为 3 斗 1 升 3 合（艾家峁底最高额 7 斗，最低的 2 斗，张家峁底的最高租额为 3 斗 9 升 4 合，最低租额为 3 斗；流曲峪最高租额为 3 斗 9 升 4 合，最低租额为 2 斗）。艾家峁底租地，上地只有 11 墺，中地有 239 墺半，下地有 352 墺；张家峁底，上地只有 4 墺，中地 98 墺，下地 115 墺半，说明绝大部分地质是中下地，故 3 斗 1 升 3 合的平均原租额是很高的。

3. 去年 实减率为 49. 3%，这接近于去年 50% 的减租率，说明去年年底该乡的减租工作较好。

至于伙种和活租，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与定租的不同。从阶级成份上说主要是中贫农间的关系，从社会关系上说主要是亲属邻居的关系。

村 名	伙户数	伙地数	减租情形
艾家峁底	12	56	有 8 家待分
张家峁底			
流曲峪	21	81. 5	
统 计	33 户	137. 5 墺	

艾家峁底有 3 宗是兄弟关系，7 宗是叔侄关系，两宗是爷孙关系，一宗是姑舅关系，只有一宗是伙种地主的地。在流曲峪，7 宗是兄弟关系，7 宗是父母子关系，其余是邻居关系，他们减租的少，也不能彻底执行，因为大多数是中、贫农，不是减租的对象，故这一类人的租是否要减还是一个问题。

其次，在 35 宗伙种中，真正的伙种（出了牛工、粪、种子）只有 7 宗，其余 28 宗是活租。真正的伙种是占四分之一，如果按法令减租，便多应是三七分，这更难实行了。

上面是该乡目前的租佃情况。除此而外，租户与地主的掌柜的关系值得研究，下面是一个最坏的掌柜的介绍。

马瑞壁，流曲峪人，当欲仁堂马醒民掌柜 10 年，是附近 30 里租户的死对头，特别是张家峁底的租户吃他的亏最大，老百姓叫他做“犯白的”（即接近国民党或国民党员之意），又叫他“二糟子上匪”，叫他的哥哥马瑞林“坏豌豆”，他对老百姓是“能扶事，能坏事，能治事，是最坏不过的东西”。

他凭两种势力从贫农跃为富农，一是马醒民的封建经济势力，获得马醒民之信任，握有出租土地大权，从而欺榨（诈）租户，渔利自肥；一是马绍先（他的叔叔），系联保主任的封建官僚的政治力量。其剥削农民、抵抗减租的主要花样如下：

对农民的剥削。有：1. 以假典名义将租户好地抽回自种；2. 选抽好地自种，提出坏地租出。这样租户不特失去好地，而且相对的提高了租额，计前后抽掉张家峁好地 90 垡，有如下表：

年 代				亩 数	地 主	经 营 方 式
1924	2	1.5				抽好地自种
1929	2	3.7				不详
1934	1	10				抽好地自种
1935	3	18.5				同上
1941	3	11.5				同上，并打击减租积极分子

这些好地收回后，主要分配给自己亲属租种，计：马瑞壁叔伯兄弟租种 50 垑；郭保千（“好”租户）24 垑；李师圣（溜沟子货）7 垗。合计 81 垗（马师左 9 垗地主收回）。

3. 欺下瞒上，荒地压地，减低租额，自行耕种。
4. 假借法令，利用地主土地，进行货币投机。
5. 利用转租或伙种方式掠夺佃农。
6. 雇用廉价雇工，经营低租额收回的土地。

在抵抗减租上，主要是利用抽地、打击减租积极干部、威吓农民、拉拢上面派来的干部，打击乡级干部，欺负他们不识字，不了解法令。

这种掌柜的中间人物，不特是地主剥削租户的爪牙，而

且狐假虎威，刮〔剥〕削租户以自肥，因而加重人民的痛苦。他与租户同村，对租户情况还比地主熟悉，故强制敲诈租户的办法更毒辣，更无微不至。马醒民和马瑞璧唱双簧，马醒民吹得好听，他的掌柜却无恶不作，张家峁底的租户感到直接威胁的是掌柜，不是地主，看见掌柜来，恨不得“钻到肚皮下躲着。”有些租户现在还说：“财主是好人，就是掌柜可恨！”因此掌柜对地主剥削农民多少起点蒙蔽作用，因此在减租运动中，发动群众打击了掌柜，由此提高了农民的情绪与觉悟。

（三）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减租情形

该乡租户多是几辈子的老租户，历代受地主压迫，多对地主仇恨，但各村的内部情况又各有不同。

流曲峪最复杂，共分3派：后村马家（马绍绪等）是一派，在国民党时代是统治者，有当地主掌柜的，积极反对减租；后村郭家是穷人代表，有农民领袖郭保胜在那里，是减租运动的积极分子；前村马家和郭家是中间派。

张家峁底政治情况单纯，有好多党员干部和支部委员也在该村，受共产党八路军影响大，没“溜地主沟子”的，是减租运动的发动者，受地主的打击也最厉害。

艾家峁底，地处杨家沟到米脂的大路，多贩炭卖盐，杨家沟是其市场，日常将谣言带回来，影响租户减租的信心与情绪。有一部分人在马绍绪影响下，选举时想活动马绍绪当保长，说我们干部是“短布衫、毛头小子”。

1. 减租运动第一期

一九三九年，年成是下平年，何绍南与八路军会衔出了个减租布告，减租一半，但真正敢交一半租子的一个都没有。个别租户想减租，又怕地主倒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少交一点，如张家峁底刘向恩少交 4 斗，但第二年就被马瑞壁抽了 4 垮地。

一九四〇年驱①胜利，建立了新政权。组织抗救分会，马绍绪的保长也撤了。张家峁底的支部委员听说桃花峁交三成租，大家一商量说：“人家交三成，我们也交三成。”都言传开了（后来葭、米定为歉年，五五减租）。欲仁堂打发伙计来盘租子，先盘马汝生的（当时的支部书记），马汝生炒瓜子招待伙计吃，他给交了三成，大家都按三成交了。减租公事出来后，马瑞壁认为租户故意捣鬼，便亲自跑来说：“要交五成，不够五成要劫地！”这一来大家都害怕，一个个都补交足五成，补交时粮食选择得更严格了。

流曲峪差不多都按法令交了，艾家峁底的租户大家都交了，共多交了 31 石 1 斗 9 升。

在这期间，地主就来报复了，马瑞壁采用了打蛇先打头的办法，集中力量先打击租户，尤其是吕正有、马汝生和王家兄弟，使用的办法是用典地或假典大到典倒地的目的。一九四〇年底，就将王国有、王国玉、王国忠三兄弟 15 垮地抽走典给高庙山地主蒋鹏保。马瑞壁又怀疑吕正有与桃花峁党员有关系，可能是个党员，遂于一九四一年强迫吕正有典地

① 即驱逐何绍南。

说：“你不典旁人就典了。”吕典不起，只好放弃优先权，马瑞壁就把吕的好地 2 垄、中地 1 垄抽走，给张家峁底马汝林种，顶换马汝林好地 3 垄收回自种，来挑拨租户间的团结。

但是吕正有和王家兄弟很“抗硬”，吕正有声称要到桃镇区政府控告，走到大路上，马瑞壁叫人把他拦回来了，退回 1 垄半地给他。王家兄弟打官司打到专署，也把地保住了。

有些怕事的租户，便只好孝敬地主一些礼物（如艾家峁底郭茂余兄弟送给广德堂 8 斗麦、8 斗米），或是眼看着抽地给抽走了没有办法可想。3 年共计倒动租户 16 户，共地 91 垄，主要是四〇年和四一年，四二年只倒动两户，共地 5 垄。

一九四一年六月地主普遍收了夏租，每石租子收麦子 5 升，计艾家峁底收麦子 6 石 9 斗 5 升，流曲峪收麦子 9 斗 5 升，张家峁底收麦子 1 石 2 斗，四二年艾家峁底有些租户又给了 1 石 1 斗麦子。

当年年成是上平年，四成减租，张家峁底租户都按法令交了，没有多给，也不敢要。流曲峪租户也按法令交了，只有两个讨好地主的租户，郭保千和李师圣多给了 3 石 4 斗 2 升，但艾家峁底的租户则多交了 10 石 1 斗。

当时政府规定了典地回赎概用边币照算，地主趁着机会大做典地投机生意，马瑞壁一面用强迫典地办法来威胁农民，打击干部，以讨好财主；一面利用边、法币比价的变动从中渔利，来了个一箭双雕。最令农民愤恨的有下列两宗：

1. 一九四二年，要刘向恩典地 3 垄，计法币 200 元，秋后以同数边币赎回，并向刘向恩讨 3 斗旧租，否则不让他这

3 垮地。

2. 一九四二年六月，要马师建用法币 400 元典地 2 垮半，要吕应亮以法币 600 元典地 4 垮，人家典不起，要将夏收的老麦赎，顶算，或出卖交款，如若不典，便要向外典出。二人典地后，还要出一半租子，七月才交价，九月又要每垧地续法币 400 元，说：“爱地呢，将钱准备下；爱钱呢，人家就把地赎去了”。

据谈，四一年典地时，法币 1 元顶边币 1 元；赎地时，法币 1 元顶边币 2 元 2 角 5，数阅月间，获利达 200% 以上。许多租户都痛心的说：“一个萝卜两头切。”总计四一年强迫租户 3 户典地 10 垮，典价法币 580 元，秋后全以同数边币赎回。四二年强迫租户 7 户典地 24 垮，典价法币 3650 元，后来规定赎地 3 元边币顶 1 元法币，才没赎走了。

当时，租户最头痛的是典地回赎和倒地。对于典地回赎，租户们痛心的说：“再也不敢典了，现在钱也没了，地也没了”。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区政府在流曲峪召开全乡大会，规定：1. 典地不能在该年续价；2. 续价不能超过典价三分之二；3. 以后卖地、典地、续价、赎地都一律使用边币，于是才停止了这种投机性的典地赎地运动。

当时，区乡政府没有注重减租工作，发生好些倒地案件，没有调查，更没有解决。抗救分会组织了，但只宣传一下减租，不领导，不检查。据区上同志说，支部是个“老爷支部”，工作推不动，法令的执行主要是靠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起作用，地主方面也就千方百计的打击他们。租户希望减租，

而且也敢减，就是怕公家不出头，公示不抗硬，减了人家倒地就没有办法。

艾家峁底积极分子少，党员也有暗中多交租的，我们调查的时候，小组半年没接到上面的指示，没交党费。地主又收买坏租户，如马先祖说些破坏话：“谁看重公家，谁就倒霉，人是良心要紧，种人家好田好地，就这财主也够受了”。因此租子就长给的多。下面是个艾家峁底 29 家种杨家沟地主地的租户 3 年交租情形的统计：

年 代	租地数	原租额 (石)	减租率	交租数 (石)	实减率	长交数 (石)	多交租 的%比
1940	233	68.45	55%	33.5	51%	2.7	4%
1941	231	67.65	40%	44.75	33%	4.16	7%
1942	203	58.3	50%	29.6	49%	0.45	1%

一九四一年反比一九四〇年多交 3%，这就说明了地主施行种种抵抗减租办法所得到的效果。

(四) 一九四二年的减租运动

自政府提出贯彻减租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阴历），区上干部来宣传减租交租法令，老百姓敢减租，但不敢“抗硬”。当时秋收已过，租户们一面期望公家下令减租，但不敢按命令给租的心理还存在，背地里说：“减是我们愿意，减了，抽地谁有办法呢？”“公家公示是好，就是不抗硬，减了人家

抽地怎么办？”可见保佃实是贯彻减租的关键。区上干部知道了这种情绪，便开了一个大会，说道：“今年地能保障，要按政府法令减租、交租，不能多给少给，你们要做得好，便要组织租户会，少给租的要说明道理”。接着，农民中有信仰的郭保胜讲了几句话：“一定要减，地只要陈区长说能保就能保，不过咱庄上人要齐心”。农民们多多说话，有的提出只要地能保就行。当即成立租户会，选举一个主任郭保胜。主任就说话了：“今年公家命令一半交租，不能多给少给。以前给旧租要扣，不扣的要处罚，多给的也要处罚。伙种的四六分。交租时一定要叫我，不叫不行。典地抽时，按三元算，自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起着来抽。”区上干部还怕租户不相信政府决心保佃，便又着重的说：“今年和去年不同了，县上有命令向区上负责，我向你们负责，如果地保不定，你们到区上来打我的耳刮子！人家说是吹牛皮，今年一定能吹响。”这时大家都高兴极了，散会时都说：“今年咱有办法。”“今年地许能保定啦”。

交租时，第一家收租的是欲仁堂。先到平常“溜沟子”的李师圣家里驮租，希望他多给，以影响其他。李师圣怕罚，不敢多给，但又怕得罪地主，便说：“我们有了租户会，要叫主任来呢”。当即叫主任，主任来了，说对半交，结果量的长了两三升，地主也不要。各租户交租时，没有不叫主任的，于是一九四二年的租子都按五成交了，夏租也都扣了。

租户、主任对驮租的人说：“夏租要扣，你们敢驮的驮去！”结果谁也不敢不扣。是时，租户们高兴是高兴，但是否能保

住地是□□□□，过了年见地没动，便相信了政府保佃的决心，说：“公家公示真抗硬，咱地不能动了！”

在张家峁也成立了租户会，选出主任吕正友，参加租户会的 17 户，租按五成交了，还扣了夏租。

但在艾家峁底工作不是这样顺利的，区上干部去问减租情形，租户都说：“按公示交了。”隐瞒不报。后在该村开了两三次会议，宣传减租和政府今年保佃的决心，租户们都不相信，多交夏租的数目，还是由该乡文书王玉亮（本乡干部）调查出来的：在十一月的大会后，该乡也成立了租户会，选举出租主任郭怀旺。郭怀旺本人没有多交夏租，对扣夏租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交租时只有郭加光扣了夏租。后来地主说：“没有这项公示”。又把扣下的租子讨回去了，于是再没有人敢扣夏租，还多交了 4 石 8 斗租子。去杨家沟贩炭的人，把杨家沟地主的谣言也带回来了，说：“今年公粮交不齐，迟早要倒地”。“地主已在延安请准了，公家有公示，明年可以动地了”。租户便更加恐慌，不敢信政府的话。

艾家峁底有一个租户，叫郭良凯，租城内小地主李耀祖 11 垡地，订明除租子外，还加给两布袋洋芋，20 个南瓜，给了两斗麦子的夏租。四一年地主又把 11 垡地伙种给他，打场时住在他家里监督着，光抽大烟就用了他三、四斤灯油。他对地主又讨厌，又害怕，这次扣夏租他叫公家写了信，拿去见地主，地主把他大骂了一顿，要他把租的地都按伙地交，并申言要抽他一垧园子地种菜。因此，艾家峁底扣夏租运动是失败了。

腊月二十日，又在流曲峪召开乡民大会，传达减租保佃法令，郭怀旺、郭良法、郭怀治等亲眼看见流曲峪、张家峁底的租户都扣了夏租，没有动地，特别是张家峁底租户马思成，典了一块地，被地主卖掉，亦由政府命令退回，才相信了政府保佃的决心，自动报告了他们没有扣夏租。当晚，区上干部即到艾家峁底开全村大会，揭破地主造谣，宣传流曲峪和张家峁底扣夏租和保地的事实。有几个租户当场提出“夏租能否退回”？经一夜讨论，决定明天到杨家沟退夏租，由租户主任带着去，区上干部把租户会主任鼓励一番，主任便积极起来了。

第二天，租户会主任刚把租户集合起来，马维新（河岔区区长）路经该村，区上干部即向他交涉退夏租事，马维新当众说：“退就退吧！”租户们知道马维新说话一句顶一句，信心更高。郭怀治、郭良法首先到马维新处退回老麦 5 斗，其他租户便都去退了，一共退了老麦 5 石 5 斗，按 1 石抽出 1 斗，于正月十五日庆祝退租胜利，并请张家峁底、流曲峪的租户主任、村主任和抗属吃了一顿活烙〔饸饹〕面。

以上是印斗八乡三年来减租运动的情形。减租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要求减租，而地主又想尽办法抵抗减租；主要是农政府不大管，抗救分会工作马虎，是减租工作不好的原因。后一阶段是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和贯彻减租法令，强调保佃与组织租户会，是减租工作能以贯彻的关键。

（五）换约与勾帐

租户会组织起来，但扣夏租以来，没什么事可做，也不开会。五月，区上发动换约运动，很多地主说原约遗失了。马瑞壁写了一大批栏约条子，写的是他，见证还是他，没有堂号的章子，也没有盖他的私章，栏约上只写租子按章程办，旧约遗失等字样。租户们背地说：“这个纸条条不顶事”。

西北局调查组同志去了（六月十七日），便帮助换约勾帐工作。地主收买的坏租户马先祖听到消息，便向地主报告，马瑞壁就把艾家峁底五家租户约退了。马先祖和马瑞壁商量：“公家问道，就说我的帐已算清了”。

调查组的同志向租户宣传换约勾帐，他们很多就了解，说：“顶重要呢，不勾旧帐给儿孙留下的害！”“比扣几斗粮还重要呢！”但也有些怀疑的，认为“不顶事，人家财主有好几本帐！”。

地主就想法抵抗这个运动，调查组同志叫马瑞壁到张家峁底换约勾帐，但只带了帐本和栏约表，并带了一个国民党员马品三写约。当时我们发动租户与马瑞壁斗争，虽然没有开会的形式，但情形是紧张的，而且收到教育群众的效果。

事先，调查了一些关于马瑞壁的材料，并和刘向恩谈话，问他马瑞壁抽去的四垧地还要不要，他说：“够种了，不要了。”这是农民的保守心，只要人不犯我就满足，很可以代表一部分租户的心理。马瑞壁来后，群众都围上来，首先把吕正有的事提出来（因这件小事他能办到），在政府和群众的力量下，他说：“吕正有要种，就给他种去”。群众都积极起来了，连婆姨都大声的说马瑞壁的罪状。马瑞壁走后，刘向恩的儿子

出来说：“我那四垧地还要”。问他：“你老子不是说不要吗”？他说：“怕马瑞壁，不敢说要呢”？我们拿这件事教育群众。群众都批评他怕地主。后来这件事交减租会处理。

租户轻易看不到地主的帐本的，他们不知道欠地主多少，都说：“谁敢看财主的帐”？这次认识几个字的租户，把帐本拿过来一页一页的翻着，“啊！这是我爸的名字”！于是算看长交下多少租子。乡长马汝生算出了长交 4 斗租子，答应秋里扣，便高兴的蹦起来，逢人便说自己已算了帐，秋里扣回长给租子的事。

艾家峁底有个别租户还在动摇，换约时对地主叹口气说：“这是公家的事”。但大部分租户是积极起来了。租户主任很高兴的去找地主换约勾帐，地主正在吃饭，不招待他进去，回来气的骂道：“以后他到庄上来，也不给他吃饭”。

该村勾帐与抽约同时进行，勾一笔帐，抽一张约。郭怀亮看帐时，有一石多租子错写在别人名下，便大吼起来：“给了租子不给往上写，是什么用意呢？咋这回租你两垧地，由你们操呢！”掌柜的悄悄的，一声也不响。

租约是调查组拟好的（见附件），流曲峪的约都换了，艾家峁底六家地主的租约都抽了，张家峁底因暂时无人写约，等交秋租时换齐，不换约不给租子。说原租约遗失的（实际不一定），都立即给租户写了栏约，没办完的事都由租户会主任负责办。

杨家沟租给八乡的地主^①，马衍福堂、欲仁堂、重庆堂、大中堂、广德堂、□仁堂、欲和堂、仁载堂、益世堂、中正堂、三余堂、至仁堂的帐都调来了，进行了租户与地主算帐。四〇、四一、四二这3个年头农民多交了租子，计流曲峪租户共长给粮3石4斗，张家峁底1石2斗，艾家峁底7石2斗。调查组与乡上干部决定要地主退，结果地主派掌柜的在众人面前把帐挽住了（结了），并注明长交的租允许在今秋后扣除。这时租户会又活跃起来了，又解决了几件案件（见附件）。租户们川流不息的来了，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各村租户会都开会，讨论和通过了扣长给租子，订下了章程：（1）交租要经过主任检查，倒动土地找主任；（2）按政府法令交租，不多交，也不少交；（3）大家合力把地保住；（4）穷不与穷斗，不抢种人家的地；（5）努力生产；（6）有事开会，平常一个月开会一次。在艾家峁底区、区上干部多加上一条：“违犯公约者，第一次劝告，第二次批评，第三次开除租户会员资格”。这弄得有些严格了。讨论章程后，大家打手印，全体租户都参加了租户会，租户主任照旧。

现在租户们比从前齐心多了，不怕地主了，事情也好办了。有事几个租户会主任一起商量、讨论，政治觉悟也提高了。这次时局紧张，碰到一个租户，问他害怕不害怕，他说：“怕，从前拿着长矛子还不怕呢！”然后悄悄的说道：“现在我们兵工厂出了这样粗的炮呀！”

① 原文如此。

(六) 减租后的收获

减租后，明显的可以看出获得以下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租户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流曲峪、张家峁底一带租户对地主的态度与前不同了，二十八年前，地主收租期届，租户们得事先有个准备，最普通的是炒很多的瓜子招待地主，大点的租户还得招待吃饭，肉酒也得准备一点，如果是掌柜的来，租户们总是百般的奉承，就是打发伙计来盘租子，也得迎入送出，白给好东西吃，因为讨租的虽是伙计，而他是有权的，民间流行着一种谚语，可见一斑：驮租子打发伙计去，租户给伙计吃好的，装回的谷子净秕秕的（给的坏粮食之意）。反之，如招待不好，交粮食就严格了，何况伙计还会在地主面前说不好的话，把地抽走呢？虽然租户们怀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期望地能保得住，租子交坏一些，但是掌柜和伙〈计〉们却有他的职责与威权。二十八年前绝大多数的地主本着“什贵要什”的原则去讨租，在欲仁堂的租票帐上看得清楚，一九三六年前后收米多，约占70%，有的年头收米少，是由于那年米贱黑豆贵。其次，地主讨租总是大斗满斗量，1石总装1石1斗，农民总是敢怒而不敢言，如果稍说一句，倒佃将接踵而至。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政府虽有减租法令，但对佃权没有保障，租户对地主的心理和从前没有基本区别，对地主态度的转变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十一月，这时租户们有了租户会，佃权有了初步保障，从这时起，不怕地主了，地主收租时，瓜子也不炒了，酒肉更没了，只是招待些家常便饭，也

可以过得去了；粮食也好交了，碎米也要了；租户们心里笑了，婆姨们也差怕了。

在地主方面，感觉自己过去的威风和特权的丧失，有些更考虑到自己的前途，这表现在卖地上面。卖地的主要原因，一个是装穷，另一个是怕分地，故收集白银防后。他们卖地时，如买方是熟悉的人，便先将大姆指和食指圈个圈圈问道：“有这个吗”？（白洋）卖成白洋后，便窖在地下。因为他们想：“白洋比地靠得住”。所以宁愿牺牲地租和利息。至于杨家沟地主转向于工商业上发展的象征，现在还看不出来。减租后地主大量卖地，可看艾家峁底的买卖地统计表：

卖地统计	成年份代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其他	
		户	垧	户	垧	户	垧	户	垧	户	垧
	1940	1	3								
	1941	1	5								
	1942	2	6								
	1943	7	20					1	3		
	合计	11	34					1	3		
买地统计	1940							1	3		
	1941							1	5		
	1942							2	3		
	1943							8	23		
	合计							12	37		

从上表看出：

1. 卖地的多是地主，今年 8 宗土地买卖，有 7 宗是地主卖给贫农的，只有 1 宗是贫农卖给贫农的，这户贫农卖地的原因是还帐。

2. 地主卖地，主要是一九四三年，这是减租交租法令开始贯彻的一年。

3. 买地的全是贫农，他们都是原来租户。

减租的第三个结果，是租户（贫农）生活的改善。从前“租种五六辈子，买不起一亩地”，现在很多能够买地了。张家峁底三年来有两户中农、两户贫农买了地，一共 20 垄。

张家峁底刘向恩，60 岁的老农，家有 5 口人，劳动力 1 个半，现租地 17 垄半，只有 3 垄是中地，其余的全是下地，每垄平均租额 3 斗 5 升，最好的年头，能长粮四、五石。但在过去，“粮是长不下来的，因为地主在半年便讨欠租，所以长不下一颗谷子”。减租后生活过得比前好了，但极力节约，企图置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将驴卖去，得法币 3500 元，买马绍许地 2 垄半，用去法币 4500 元。一九四二年四月，买郭家沟郭怀旺地 3 垄，价法币 1530 元（此地是一九四一年腊月以 350 元法币典来的）。同年十二月，又买马瑞岐地 2 垄半，价法币 2900 元。一九四二年将该 2 垄半地典给刘起福，价法币 800 元，用以买驴条条一头。刘向恩说，从前听说土地革命地区分土地时，心很活动，马瑞岐讥笑他说：“你想要地，在你手上再也赶不上了！”“尔个我赶上了，3 年减了 9 石租，买了 5 垄地，典了 1 垄半地：八路军再住 10 年，我还可以再

买 20 垡，如果不减租，那再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个村很穷，这几年年成又不算好，过去减租也不彻底，故买地还不多。生活最穷苦的是马师在，他租种 6 垡地，没有自地，没有牲口，家有 6 口人，1 个婆娘 4 个娃，窑也是杨家沟的，租杨家沟地 3 垡，净是长草的赖地，去年种了 1 垡洋芋，收了七、八布袋； 垡半谷子，打了 6 斗，4 堆荞麦打 1 斗， 垡半黑豆打 6 斗，给寺地租 4 斗半，给欲仁堂租 1 斗，去年有个驴，常贩炭卖盐，帮助生活，后来没吃的，便把驴也卖掉吃了。一天 3 顿，早上是钱钱饭，中午是钱钱汤，晚上是钱钱饭加洋芋，一个月吃不上一顿捞饭，去年过年吃了 1 斤半猪肉，3 升麦子的面。当问他为什么不走南路时，他们说：“掉不下嫁出的女儿河下来的媳妇”。亲戚关系把他们拖住了。同时政府在动员生产时，曾提出这样的口号：“谁当二流子，就把谁送下南路”。乡级干部对于移民政策的不了解，也是妨碍伙民南下的□□原因，但是，“想改善生活，除了贯彻减租，还必须做好移民工作。

减租的第三个结果，是对生产有了极大的影响。减租保佃后，大家都说：“生产的心有劲了”。今年修了水坝，组织了 49 队之变工小组，利用弟兄等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夏田锄过了，谷子锄的剩下一半，洋芋没锄，糜子没种完，因为天没下雨。这次废约运动后，天下雨，提出在 5 天内把草锄完，后来碰到乡上干部说：“胜利的完成任务了”。

生产最困难的是粪，因为牲口虽多，但租户常须驮盐贩炭，来补助生活，故牲口常出外，每年一个驴只能踏 40 布袋

粪（不出外一年踏 60 布袋粪）。

他们努力生产的原因，是“地不能动了”。据他们的估计，一样的年成，每垧至少可多打 5 升粮，照这样计算，3 个村子可多打粮食 129 石 6 斗 5 升了。

三、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

（一）概述

延家岔是绥德县辛店区的一个乡，全乡辖有二十里铺、延家岔、贺家坪 3 个行政村，共 7 个自然村。延家岔是地主集中的一个村庄，在绥德至米脂的公路旁边，距县城 20 里，村前果树，枣树最多，是一片好风景。这个乡在驱何胜利后，乡村政权仍在地主手中，农民们仍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过去只马马虎虎的退过一年的长装租子，未彻底实行减租。农民们还惧怕地主，还没深切感到边区政府对他们有多大利益。他们羡慕着后庄上那些分配过土地的农民生活，更羡慕着那些村庄大小事“穷人能决定”的政权。但是他们自己乡里的政权却交给地主，今年七月改选乡长时，仍选了个破落地主延祖兴，农民认为这个乡长比前乡长延风城强些，但是问他们为什么不选穷人当乡长呢，他们说：“穷人没知识，吃不倒财主，怕负担派不出去”。又说：“穷人支应不起（指招待来往工作人员之意），还是叫人家有钱的去办吧！……”。证明这个乡的政权还是地主把持着，广大群众还没有翻身。这个乡直到现在还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党员，今年二月派来了一个乡文书是党员，就他一人在这乡里工作着。

（二）租佃关系

延家岔行政村人口、劳动力及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形如下表：

阶 数 目 层	项 目 户数	人 口	劳 动 力	畜 力	自 地
地主	11	750	0.5	6.5 个	1239.5 垚
破落地主	3	24	0	1	154.5
富裕中农	2	17	1	0.5	33.5
中农	8	78	15	$3\frac{1}{3}$ 个	121
贫农	34	202	38	2.5	128
佃农	7	26	8	0	0
其他	14	65	0	0	19.5
总计	79 户	4870	62.5 个	$13\frac{1}{3} \frac{1}{3}$ 个	1696 垚

延家岔地主及破落地主共有地 1394 垚，占全村地数 83% 强；中农、贫农占有土地 302 垚（每人平均 0.79 垚），占全村地数 17% 弱；富裕中农每人才平均有地 2 垚，其所以富裕是因有其他副业收入。穷人们说“他们是大树下的草”，的确是那种情况。

贺家坪行政村人口、劳动力及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形如下表：

项 别 成份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畜力	自地	租地		伙 出 入		说明
						亩人	亩入	出	入	
富农	3户	33口	34	3头	123.516 亩			3	6.5	
富裕中农	1	4	1	1	41.5 垄				21	
中农	4	26	4	1	76. 垄			5.5	12	24
贫农	29	126	33.5	6	233.5	5	14.5	12.5	49.5	52.5
佃农	11	52	13.5	1 $\frac{1}{3}$	16		2	2	81	52
雇农	1	3	1		6				6	
其他	12	55	9	3 $\frac{1}{3}$	44	2		10	14.5	
合计	61	298	65	15 $\frac{2}{3}$	545.5	9	16.5	31 亩	142.5	80
										104.5

贺家坪村每人平均有自地 1.8 垄，现共有自地租地 687 垄，每个劳动力平均有耕地 10.5 垄（畜力没算），若按一个劳动力和四分之一的畜力可耕 20 垄计算，该村尚缺地 600 垄。

二十里铺行政村共有户口 92 户，人口 468 人，劳动力 60，牲畜九又四分之一，自地 681 垄，每人平均不到 1.5 垄，牲畜更为缺乏，每 6.5 个劳动力才有一个牲口。

延家岔乡的租佃形式以延家岔、贺家坪两个行政村的调查材料可列如下表：

行政村名 租佃形式	延家沟	贾家坪	说 明
租入地数	188.5 垄	141.5 垄	
共租额	35.35 石	33.13 石	
平均每块地亩	5.28 亩	3.35 亩	
定租入宗数	21 宗	13 宗	
租户数	17 户		
民 29 年前	16 宗，地 91 垄		
租哪年	民 29 年前 3 宗，地 10.5 垄		
租入年	30 年 没		
	31 年 1 宗，地 6 垄		
	32 年 4 宗，地 11 垄		
活	租入地数	71.5 垄	10 垄
	租入宗数	12 宗	13 宗
	租户数	8 户	6 户
	民 29 年前	1 宗，地 10 垄	1 宗地 5 垄
	哪年	民 29 年 3 宗，地 6 垄 4 分	没
	租入年	30 年 2 宗，地 5 垄	2 宗地 9 垄
		31 年 4 宗，地 40 垄	5 宗地 6.5 垄
		32 年 2 宗，地 10 垄 2 吋	5 宗地 19.5 垄

二、三十里铺行政村的租佃调查，没整理出来，故未附上。
 三、此调查是向租户调查的，按各村租户租入地而论，
 地主出租其他村者不在此数内。

伙	伙种地数	134.5 垄	66.5 垄	一、贺家坪在延家后沟相距三里路。 二、贺家坪村没地主，其租种之地80%以上是延家岔地主之地。
	宗 数	18 宗	18 宗	
	伙子数	15 户	15 户	
	哪 年	民 29 年前 4 宗 47 垄 1 咀	没	
	种 地	29 年 2 宗 42 垄	3 宗地 9 垄	
	上 的	30 年 4 宗 28 垄 1 咀 31 年 5 宗 10.5 垄 1 畜 32 年 3 宗 6 垄 1 亩	6 宗地 31.5 垄 5 宗地 19.5 垄 5 宗地 19.5 垄	
按 庄 家	播种地数	93 垄		
	伙子数	7 户		
	共吃借粮	7 户今年 共吃租粮 54.15 石		
	负役情况	有 6 户给地主担水， 3 户给喂牲口		
	哪 年	民 29 年前 1 守地 16 垄		
	种 地	29 年 2 宗地 18.5 垄 30 年 没 31 年 2 宗地 40 垄 32 年 2 宗地 18.5 垄		

从上表可以看出：

1. 从延家岔定租入租的年代来看，该村定租租地 85.7% 是减租前租入（二十九年的算在减租前），14.3% 是减租后租入，同时多亲族关系，或以高租租入（内 3 垄川地租额 1.8

石), 这就是说, 地主自减租后, 以定租的形式出租地少多了。

2. 活租的形式在减租后有了新的发展。延家岔减租前有 4 宗活租, 共租地 16 垚 4 分, 内只 1 宗是山地, 其余是川地、水地(老百姓说是瓜儿山芋地), 零块地地主租出为的是种瓜菜麻, 而 78% 的活租地都是减租后租入, 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租入数又占全数 70% 强, 贺家坪减租前活租的形式只有 1 宗, 5 垚地, 70% 是减租后新租入的。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租入者又占该村活租地数 65%。从这两个行政村的材料可以看出活租形式的最高发展是去年和今年。这些地以前大部分是定租, 地主在减租后看到活租利大(过去活租是主四佃六的分法), 遂将定租改为活租, 这是他们抵抗减租的一种办法。

3. 延家岔在减租前伙种形式不少, 就伙种地的调查, 现在该村农民租入地、伙种地比活租、定租地都多些, 其伙种地 66% 是减租前种上的, 34% 是减租后伙种的, 但从减租后伙种地宗数上看, 都是零碎小宗(12 宗 47 垚地)。贺家坪的伙种都是二十九年以后种上的, 以前没有, 同时伙种地的来源都是定租新近改成的。

4. 延家岔 10 家地主过去都按伙子(按庄稼), 现在只有 6 家接着伙子, 从他播种地数上看, 内只有一家的伙子种地 24.5 垚, 其余都是种 10 垚左右, 并且佃户给地主的无报酬负役很重, 如伙子李生保夫妻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地主做杂活, 这 6 家地主吃的水都是伙子担, 喂牲口的草也是伙子铡, 牲口也大半是伙子喂。地主为什么要按伙子? 有人说是为了

叫担水，喂牲口，寻门户，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延家岔按庄稼的伙子，吃借粮每亩地平均吃4升多，按旧习惯每垧吃1斗借粮，并且是粗细两样，有的租户说：“财主这二年可巧了，一垧地给吃二、三升借粮”。有的问我们“我们窑也不住财主的，每垧地吃二、三升借粮，算不算按庄稼呢”？的确，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佃农按庄稼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吃借粮，地主不给借粮吃，佃农生活问题没法解决，一定要妨害生产。我们这次调查中，区乡干部对按庄稼这种租佃形式并没重视，与活租伙种一样看待的不少。

延家岔行政村十三家地主及破落地主的土地状况，据调查如下表：

姓名 项目	合计									
	延文换	同	64.5	27 墟	8.89 石	11 墟	18.04 墟	90 墟	105.3 墟	286.9 石
延振华	同			59						14
延明	同	130	20.5	71.5	21.5 石	2 墟				
延仁	同	131 墟	19 墟	48 墟	11.3 石	16 墟				
延振文	同	124.5		61 墟	14.27 石	21.5 墟				
延凤仪	同	131	3 墟	64 墟	16.6 石	17 墟				
延念曾	同	122.5	1.5	15.5	16.58 石	6 墟				
延振国	同	117 墟		85.5 墟	21.1 石	33.5 墟				
延九龄	同	154	2.5 墟	138.5	44.45 石	13 墟				
延凤城	地主	214	6.5 墟	134	34.7 石	48 墟				
延凤池	同	225.5	5 墟	131	37.45 石	29 墟				
自耕地										
定地数										
租出										
伙种活租出										

续表

														22.5 垧
卖 出 地	民二九 年前		1 垧		9.5 垧					12				
买 入 地	民二九 年后	16	29.5	2 垧	49 垧			15 垧	24 垧	18 垧	16	5	20	16.5 垧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前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后				3.5 垧								3	6.5 垧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前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后	39.5	28			18	15.5	29	13		8	13	11	4 垧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前													
典 出 地	民二九 年后					4	2		7			2		15 垧
现有土地	188.5	167	148.5	39	95	83.5	83	82.5	53	94	93.5	62.5	41	1344 垧
备 考	前任乡长	现任乡长	垧数 种地 数					均 每 垧 产 量						

上表附注：

- A. 破落地主延风翥因去榆村未统计在内，现约有地 50 �垧未列入表内。
- B. 此表所统计地主定租出租之租地，系按其旧租票帐统计，地主

把近二年延家岔地主活租之地隐瞒不报，与对本研究之原因，是欲在解决问题时将其近二年改为活租之地，复原为定租，故此表活租租出地数少，定租租出地数多。特此说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延家岔村地主及破落地主共出租土地为 1053 垄，租额 286.9 石，每垧的平均租额为 2.725 斗；租额最高的是延九龄，平均租额为 3.2 斗，延文焕为 3.1 斗，其余都在 3 斗以下，延振文最低，为 1.34 斗。

从上表又可看出，延家岔地主没有一家不典卖土地的，二十九年后典出去的土地共 36.1 垄（延凤翥未计算），这个数目字不算小，它占有现有土地 26%。究其典卖出典原因：(1) 卖下钱暗中做生意，利既大又能减轻负担，据不十分确实之调查，延家岔地主有 8 家暗做生意者；(2) 有的是因家中开支大，减租后，收入减少，不得不卖地以维持其腐化生活，主要是要吸鸦片烟。

延家岔地主的地典卖给什么人呢？据查延风池、延振铎之帐，他俩二十九年后共卖地 69.5 垄，都卖给原租户了。土地向贫农、中农手中转移之趋势，这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延家岔地主最痛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年典进之地，在近年一元顶一元的被赎出，延家岔地主和木头峪地主一样，原有典地占其共有地之三分之一以上，请看延焕亭土地变动调查：

延焕亭在民国十九年时，有买地 207 垄，典地 226.5 垄，共有典、买地 433.5 垄，而今年只剩买地 183 垄，典地 6.5 垄，现共有地 189.5 垄了。其破落原因，主要是典地被抽。其被

赎年代如下：

赎地年代	被赎地数
民国十九年	1 垄
二十五年	109.5 垄
二十六年	9 垄
二十七年	9 垄
二十八年	52.5 垄
三十年	20.5 垄
民国三十一年	8.5 垄
合 计	220 垄

延焕亭二十七年后共卖地 24 垄，民二十七年卖了 3 垄，三十年卖 21 垄（延焕亭之地今春全数分给其子延振华、延念曾孙了）。延振国原有典地 183.5 垄，也是近 10 年抽光的。

（三）过去减租情况

一九四二年以前，区、县对这个乡的减租工作是没有领导与检查的，去年冬（1942 年）这个乡是辛店区征粮试验乡，区的干部及全区的乡长集中在这里试验证粮，他们在这个乡进行了一次退粮运动，这个运动简单情况是：在延家岔只召集了延家岔的参议员开了一个很简单的会，推定延培艾、延

文梅负责减租减息工作。他们见群众情绪不高，并有恐惧现象，区上干部对参议员说：“你们跟上我退，我们给你包办一下”。于是在一个下午，延家岔的退粮工作就完结了。

贺家坪行政村民大会上，马区长在讲征粮问题后，提出减租减息工作要实行，并要组织减租会等，群众没一人发表意见，区上干部提出贺锡会、王九林等8个人负责减租工作，8个人中推1个为主主任；1个为副主任，王九林见贺锡会能说，就提议贺锡会为主主任，贺不高兴，反提出王九林，于是他俩人都当选了。贺锡会本来是在绥德城内摆小摊的，选起二天后就到绥德去了，至今尚未回家。王九林当时有病不愿干，区上干部说：“七八天公粮就齐了，粮也分光了，推什么呢”？王九林才应允了。据王九林说，他去年监督的分了3家粮，都按四六分了，其余的都没管，那7人自然更不管了。可是不管怎样，自此以后，庄上人都把王九林叫“减租减息”，认为他是负责减租减息工作的。

七乡有个地主王银盘到贺家坪驮租子来了，租户贺先耀不在家，他的婆姨不知应该怎么给，把“减租减息”找来负责装租子。地主说他们七乡是六成交租，王九林说：“我们乡上是五成交租，都是按对半交了，你一定要按六成装，你就装去，命令要是五成，你可得送来，我们没人找去，要是短下，我们给你背的送去！”结果按对半交了。除此以外，再没人找王九林，他也不知怎么交的。

据调查，延家岔只是经过土地革命地区之定租地一九四〇年都没收租子，政府叫免了的，同时农民根本不愿交，还

想分地（归田运动）。但本庄的租地则大都分没减。地主都按原租额收了；伙种地按对半分了。贺家坪的伙种地、活租地都按对半分了。

延家岔一九四一年定租基本都按六成交了，只有一、二家长交一、二斗。但是伙种、活租却都按旧规矩分了（没有减）。

一九四二年贺家坪以定租租入地 142.5 垑，原租额共 33.43 石，实交租 19.1 石，该年减租率为 50%，实长交租 2.385 石。延家岔该年定租地，据这次调查只长交租 3 斗，实际恐不止此数。

贺家坪一九四二年的活租、伙种都是按对半分了，后又都按四、六退了。延家岔一九四二年伙种者对半分的有 10 家，四、六分的有 1 家，四五、五五分的两家（该年伙种地共 13 家），后来区上干部叫都按四六退了粮，也有按四五、五五退的，可是因分粮的详数调查不出来，退的非常马虎，该村共计退粮 1 石 7 斗。据新的减租会负责人讲：“去年退的实际上连三分之一也没有退出来，可是租户不向公家实报，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是一九四二年以前延家岔乡的减租情形，大致看来是没有彻底减租的。

（四）这次推动减租工作经过

这个乡两个月前派来一个乡文书叫陈明，陕西省城人，农村中的一般常识知道的不多，没有做过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他来了感觉没办法，又没依靠（没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

就是瞎碰，现在才多少摸着一点头绪。这次我们（西北局派出的调查组）去调查，他和专署的同志都提议要求我们帮助把这个乡的工作整顿一下。我们估计我们的时间有限，怕做不下个样子，于是动员了抗大民运工作组的 11 人参加了整顿延乡的工作，根据该乡具体情况，决定了工作步骤是：

1. 进行侧面背后调查，调查减租情况及该乡内幕，进行清查登记户口，进行全乡租、伙地调查、夏收调查及清查地主占有土地情况和历年收租的情况。
2. 从处理个别土地案件（由区上干部出头）分夏粮起，联系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在第一阶段我们没向群众说我们做什么来的，乡上干部只乡文书知道，我们即分别到各行政村进行了侧面背面的调查。在群众“不知做什么来了”的情况下，调查工作开始了，有些群众感觉到是“密查”来了，可是这个期间我们已调查出地主倒佃、定租改为活租、夏租如何交的等情况来了。老百姓怕出了乱子，他们很快的三人五人一伙的开小会了，定出了对付我们调查或登记的办法，一般的是“见了公家人少说话”和“各管各”的办法。王家崖自然村王文玉老汉和我们一个同志谈话，他的儿子发觉了便叫了回去，儿子申斥他：“你再不要多说话！”老汉也怕了，每天吃了饭家里都不敢盛（住）了，到处转来转去，见了公家人便躲了。我们住在延家岔学校里，校长延文梅（农民）开始每天总来招呼我们吃喝，后来忽然不来了，原来是他的儿子和侄儿们不叫他来了，怕老汉说下乱子。对我们讲出些问题的老百姓，一经群众知觉

便要被大家批评，租户王金堂讲了去年地主延九龄强迫长装去他2斗多租子，村里的租户们都埋怨他，他的侄子王志功、王志明说：“唯二叔你把租子给人家，又多说话，不是寻的惹人哩！”你叫那些批评一下，延九龄还不是向你要地！抗大的同志也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总不多，共收集到了十多件，我们即开始了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首先在各行政村进行了租户会、地主座谈会……，有的是开村民大会的，说明我们来是要调查土地和减租情形的；对地主说把土地数弄清楚与地主的好处，保障地权及公平负担等；对租户着重说明了政府为什么要减租，减租对农民的好处，说明政府一定能保佃等，要他们实说实报，地主不实说不行，租户不实说也不行……。经过二次三次的对证、清算，地主土地弄清了，租户的租地也登记清了。在第二次登记时，租户对三年交租的数目多以“记不清了”而应承，我们再三解释，允许他们回去问清再报。租户延宇贞的大儿子问了地主，把三年交租数目写到手背上来了，这说明租户们还是先问地主，要和地主说通，怕出了乱子，而实际交租的情况自然是以地主说的为凭了。类似这样的报法，延家岔开始就占半数。随后发现了积极分子，延家岔行政村主任是个租户，人比较开朗，经我们再三解释后，他积极坦白了，他说他报的不实，他又重新报了他往年交租实数，并将全村的情形实讲了。贺家坪行政村发现与争取了王金堂、王志仁两个积极分子，在积极分子的出现，又重新登记了一次，从中看出了历年交租概况。

我们怎样发现与争取积极分子的（我们去了四天，没有找上那些是积极分子）？在登记租地及调查交租情形时，王金堂一来就带着气色的面孔，对我们同志说：“这不是我的帐，你们看先□（登记我的）？还是怎办？”问他的减租情形时，他很响亮的说：“我长交给延九龄地主 2 斗租子，人家要哩，谁愿意多给？”许多租户听了，都在旁暗中吐舌。登记完了，租户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怨王金堂，没一个不嫌他实说的。他的哥哥很严厉的说：“你装租时为什么不说？……不是寻的惹人哩！人家把地抽去看你怎么办！”王金堂一句话也不言喘〔传〕，他着慌了，他想了半夜，总觉得说坏了。睡了一阵，天就明了，早上就来找我们的同志说：“我昨天晚上说的那问题，众人你一句他一句，把我批评到〔倒〕了，这个问题你看的办，最好你们不要批评人家财主，我半夜没睡觉，要是人家把地抽去，就把我 6 人口杀下了！我吃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这可能是积极分子，就把他找到另一个窑里，对他说：“我们保你没问题！……敢担保地抽不去，……你说的话走不了，……。”“要是这样我就不怕了，只要你们能给我们想办法，我是不怕事！”王金堂又转变了，接着他把庄里人不齐心，和昨天怎么把他批评倒了的情形讲了一遍。我们又说：“只有租户齐心，你们才能翻身！我们再过两天要帮助你们组织减租保地会……”等。提到能保地，他进一步的又将地主延九龄倒地的情形讲出来了。他说：“去年延九龄来对我说：‘你种的我那地，我要往出典，你不典我要典给别人，我等用钱，一垧地 500 法币就典’。我租了他 13 墟地，我怎么能典起呢？人

家就知道咱典不起，专来吓呼我哩！人家一说就要走，我向他要求不要典，他说门上的地不典也行，那么你伙种的去吧。说完就走了。我危（着急）了，第二天我就过去给九龄去商量，我说咱私下办一下，不让公家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给你送上 2 斗粮，不要伙种了！”延九龄不答应，说：“你伙种去吧！”我出来和亲戚朋友一商量，都说：“伙种去吧，不要叫他走了”。于是我就伙种。主家什么也不出，今年就要四六分粮（实活租）。”又讲了延九龄以同样的办法倒了二十里铺等处的 3 家地。最后还把庄上人怕地主的情形讲了一些。（注：延九龄去年改王金堂租地 13 垮为活租，我们打算要延九龄仍改为定租，因县上给区上干部指示只收集材料，问题暂不处理，区上干部不敢负责，故未解决）。

各村除二十里铺外，都找到了几个积极分子，同时地主对佃户的花样与佃户的心理以及历年交租情况，我们大致上了了解了，于是开始了第三步工作。

本来我们打算处理调查出的一些案件（尤其是今年的），以发动群众，可是县上不同意，故未处理，只揭破了地主对租户之倒佃长收租和无报酬劳役等违法剥削行为，并宣布不给地主担水和其他无报酬的事情（佃户给地主负役情况，参看李生保负役调查）。又决定协助乡区干部做退夏田分粮的工作，并以此去发动群众，组织减租会。在这个方针之下，延家岔经过乡级干部和积极分子两天的宣传动员，于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开会了，虽然天是不断的下大雨，但是租户们都到齐了。乡文书陈明主持开会：“今天开会为了彻底执行减租法

令，清算今年夏租谁长了多少，应退多少”。又传达了专署关于夏收分法的指示，说明夏租应怎样分。结果今年租种夏田的 17 家就有 16 家分了的，一个老头子说：“我们不晓得公示，叫人家口说的装走了，我的一家要叫他退”！又有佃户说：“我的昨天退了一次，还没谈够，还得向他要”。群众情绪提起来了，调查团的同志给他们讲了两个没办法的租会工作，讲的租户们都笑了，都说我们也要组织减租会（张守荣提出），介绍的人就此不讲了，主席就让张守荣讲他的意见。延守荣说：“人家有租户会，我们也要；人家有那大的权柄，我们也可以有，有了权，地就能保住，咱还怕什么呢！”一个年青的佃户插嘴说：“唯有这个好！……。”主席问：“他们提议要组织减租会。你们同意吗？”“同意、这还有不同意的？！”一个老汉这样的说。主席：“大家都同意了，那你们就报名，愿参加的就报名，不愿意的就不要，报了名还要打手印。”话还没说完，延文梅便要打手印，大家笑了，说名字还没写上就打哩！于是一个一个的都报了名，打了手印，共签名打手印的有 24 户，都是家中担事的人。随后提出选负责人有的说选上 5 个，有的说：“龙多不治水，选上 3 个就够了。”大家都同意选 3 人，主席说：“提上 5 个选上 3 个好不好？”大家都同意。“选要选抗硬，能办事的。”一位佃户这么讲了一下，大家表示对这个意见同意。选举的结果，延守荣、延学谦、延培艾 3 人为委员，延守荣为会长。接着讨论租户会的工作，规定：(1) 保佃倒地要经过租户会，租户会通过了才能抽地；(2) 按公示交租分粮，交租分粮时，租户会的负责人不到不准自己

乱交私分；（3）凡租户会大老 邵耀廷：（4）好好生产，地荒了不行，荒二年的要下地。租户会的三作大家讨论了一气，总结是这四条。佃农李生保说：“现在会有啦，权也有啦，就看会用不会用”！我们抓住这话，又在大会上鼓励了一番，末后又说：“你们大胆办事按公示办，公道了就对；我们把你们租户会的事和负责人向专员报告一下，你们不要怕，是通上的……”。群众喜的都笑了，有的站起来了。租户会的人说：“明天就退夏田多分的粮，我领上你们退”。“二十八年的欠帐，专署同志说叫财主明天一齐勾”。“我们看的勾”……散会了。

晚上减租会的人来了，延文梅也来了，说：“我是旧减租会的负责人，事没办好，以后我还要办”。减租会的人说那好极了。我们两个同志给他们谈怎么工作，做些什么，谈的很起劲，谈了半夜他们才回去。

贺家畔行政村，在二十八日的晚上，成立了减租保地会。减租会的成立，也是经过了几天的宣传动员，抓住了积极分子，王金堂、王志仁收集了一些材料，在召集租户开会时，传达与解释了专署关于夏租分法的指示。折永年同志又把贺家坪、王家崖的倒地交租具体材料及租户对我们的心理办法讲了一下，又说明对我们讲实话的好处，说明他们对付我们隐瞒的结果，是地保不住！……只有租户齐心，有了组织，地才能保住！米脂葭县有了减租会，地都保住了。看你们组织不组织？群众都说：“那我们也组织”。群众的情绪提高了，于是他们都要组织保地会。在这种情形下，就开始选举负责人，到会的 20 余租户都参加了，当下提出 7 个人，选了 5 个，当

选的王志功、王九林、王金堂、王志仁、贺玉叶等为减租保地会的委员。第二天开了个委员会，推选主任，本来拟叫王金堂负责，可是推选的结果，正主任王志功，副主任王九林、王金堂没选上。王金堂自动说：“我给帮助记帐当文书”。大家都很高兴，继续讨论了减租会的工作：（1）调查，报告；（2）保地，减租；（3）解决问题，开会商量；（4）关心租户生活，监督生产。

会后王志仁、王金堂自动的作夏租分粮调查，自己做模范；先按法令分。

自减租会成立后，群众的情绪基本上有了转变，具体表现是对分夏粮退夏租的积极行动和对我们的态度，有的租户对折永年同志说：“你那天晚上讲的好，讲到骨尸上了”。

二十里铺的农民没发动起来，就不打算组织减租会，专署的一位同志也把它组织起来了。

这是我们在延乡工作的简单经过。

此外我们还登记与调查了一次户口（这乡来往人复杂），作了地主土地调查、租佃形式调查、佃农给地主负役调查、历年减租情形调查等等。总之这个乡我们工作了 8 天，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没有将所有的问题给予适当解决（是一个缺点），故群众及乡上干部在我们离开时还要求留两三个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这次的调查，是帮助区乡干部对该乡有了一个较正确的认识，并且启发了他们的工作情绪。

四、合水县两个减租斗争调查

(甲) 六区二乡三村对地主的减租斗争

(一) 减租前地主与佃户关系

合水六区三乡三村地主程景胜，有土地 642 亩，自种地 180 亩，其余的 462 亩租给住在同村的 9 个佃户耕种，其中有一佃户韩治保，佃程地 53 亩，于一九四〇年曾以党员模范作用按三七减租法令交程 7 升租子（原租额 1 斗）被程收回土地，后来托人说合，改为伙种，又增加 47 亩地，共伙种 100 亩，打下粮食按四六分，夏秋各半，种了一年，程景胜怕韩治保说怪话，或告到上级政府去，把土地收回去了。韩治保告到区政府，结果不但佃权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被下乡帮助工作的同志不问皂白把韩扣押在程景胜窑内，韩于半夜里抬开门逃了出来，于是佃户们说：“眼下的八路军不同了，不敢‘胡骚亲’，小心招祸。”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但另一方面，程景胜又是个软欺怕硬的家伙，人们说他是“歪人的菜，瘪人（老实人）的害”。他的佃户陈培林和陈培华因为人厉害，欠他一些租子，他也没有办法。

此将这次减租斗争以前，各个佃户和地主程景胜的关系列表简述如下：

姓名	卓正福	李兆福	陈培林	陈培华	金满堂	韩治保	强自发	屈自发	张彩荣
伙种地		120亩				100亩	30亩		
佃种地	59亩		10亩	50亩	63亩				
租子额	1斗	对半分	1斗	1斗	1斗	四六分	对半分	1斗	1斗
如果实行减租	夏0.65石 秋0.45石	9石 6石				0.22石			6.03石
如果实行减租	夏 秋		1.5石 1.5石	2.5石 2.5石					
党派关系		弟弟是共产党				共产党员			
备 考		①装租子要送到地主仓库里。 ②奉养地主硬，一一条驴，地主把他的驴死了，拉驴皮了没。	地主在民国二十九年把土地收回去了。		地主要收回土地出当。	地主在民国二十九年把土地收回去了。	地主要收土地出当。		

注：奉养是地主的一种剥削方法。伙种地的佃户使用地主的驴，叫奉养。驴死了要照价赔偿，而且驴皮要给地主。

(二) 减租斗争经过

区委帮助支部召开了三村的小组会，到会的3个党员（全小组有4个，1个到赤城去了，没有回来）。韩治保、李非连、张德荣（内张德荣不是佃户）说明减租的意义、办法，调查了程景胜与佃户的关系，并指出过去三乡减租偏向地主的错误，党员一致拥护，随即决定发动减租斗争，各个党员以群众面目去活动其他的佃户，计李非连活动他的邻家金满堂和他的父亲卓正福（韩治保原是卓正福的儿子，过继给韩家的）；张德荣活动邻家强德发、屈自发及陈培林（陈按减租法令，还欠租子3石，但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而按减租法令还欠租子5石的陈培华，估计他们的斗争情绪可能不高，为防止走漏风声给地主，就没有指定人去活动他，并规定严守秘密，不使程景胜知道。

小组会后，党员都积极执行组织决定，活动佃户，他们的方式是很灵活，例如韩治保对他父亲卓正福这样说：“春天来了，我没地种怎样办呢？我想去和陈老三（程景胜的绰号）去闹一闹，听说公家又要给咱们佃户撑腰了，多交租子是错误呢，你的租子怎样装的？”卓正福说：“我没有给他多装。”韩说：“不要瞒我，你和我还有些啥呢？”卓说：“这回可不同了，公家要真正的保护咱们，他的地收不回去；不对了，就和他闹，咱们要跟他去算算帐，不然，可犯下法令了”。卓说：“看大家怎样，我就怎样，别人算帐，我也可以搭把手，只是不敢冒干”。卓正福终于被动员起来了。

经过党员的这些活动后，区委就找各个佃户个别谈话，他们都能大胆说出实在情形，只有金满堂是个老实无用的人，

不敢说，等到要把他押起来的时候，他才说了实情。在谈话中，抽出租佃条例与该佃户有关的几条，加以扼要说明，如对伙种地的李兆福指出送租子装到地主仓库里要多费一些工，是额外的剥削；强拉毛驴，更是不对；伙种地的租子对半分，太重，应改成三七分。对于正要被程景胜收回土地的佃户张彩荣，说明地主如果收回自己种，要头年搭话，如果出卖或者出当，佃户有购买及承当的优先权，按租佃法令，现在土地已经耕过了，无论如何是不能收回的。把这些政府法令浅鲜〔显〕的三翻〔番〕五次的说明，使他们了解记下，并且帮助佃户算清几年来的租子帐，更教给他们在三村的生产会议上要胆大、沉着的提出自己的道理和要求退租来。又估计到程景胜可能抵赖多装韩治保的租子，以打击韩治保，乃决定预先借个名义，约韩治保装租子的见证人到场，一个是本乡的乡长（非党员），一个是程景胜已辞退的伙计从儿，由和他熟识的张德荣约他那天来帮忙，准备减租斗争时，随时叫出来讨论、对证。

程景胜对他家的长工长喜儿不好，吃饭两样菜，自己吃肉，却不给长喜儿吃，长喜儿时常和他争吵：“咱是给你揽长工的，为啥不拿咱当人待？”利用这个矛盾，长喜儿把地主装佃户的租子都照实在数目说出了，又找了从儿谈清楚，到底程景胜向他的几个佃户装了多少租子，这两个人说的材料证明了佃户们自己说的材料都是确实的。

以政府名义召开了三村的生产会议，到会的除佃户外，还有本村的人，共 16 人，区委和区政府人员 4 名，本乡的文书

和乡长没有到，由村主任做主席，讨论生产问题，后来韩治保说：“提起种庄稼，都是好话，可是我没有地，拿屎种呢！程老三你做事太无情，把我的地收回去，说是自己种，后来又租给薛家种，你闹的我两年没有地种，咱们今天要讲个清白”。遂展开了大家对程景胜的斗争。陈培林说：“公家命令是 7 升租子，你为啥要 1 斗租子？你又为什么要收我的土地”？程景胜的老婆把金满堂叫出会场，对金满堂说：“你就说你的地是当下的”。韩治保问金满堂：“你做啥去了”？金满堂说：“她（程景胜的老婆）跟我说，要是大家问我地，就说是当下的”。会场哄然大笑，佃户们情绪更为高涨，程景胜抵赖不过，多装各个佃户的租子都承认了，只是死不承认韩治保的租子，后来把证人叫来对证，他才承认了。

会中佃户的情绪很好，7 个人都讲话了，只有陈培华没有多言传（九家佃户中，一家佃户没有来，一家是他婆姨代表他来的，没有说话）；更具体的解决了佃户的租子问题、地权问题：金满堂佃种的地仍由他种，不得收回；强德发佃种的土地，今年麦收后交地，佃户有购买和承佃的优先权；另外佃给韩治保土地 40 亩，今年麦收以后交地；陈培林过去佃种的土地由他承当（原租 10 亩，承当 20 亩，比原租地多 10 亩），每亩 100 元，卓正福、李兆福、韩治保、强德发、张彩荣 5 个佃户多装的租子夏租 9.71 石，秋租 6.70 石，限古历十月以前退清，在没有退清以前，由地主打欠条；陈培林的欠租 3 石，限古历十月以前退清；陈培华的欠租两年内还清；此外旧帐旧约当场作废，另立新约新帐，帐本改为两本，佃

户与地主各一本；以后地主装了租子要在佃户帐上划押，免得日后挠缠不清。

会后恐怕程景胜逃跑，押了他一夜，第二天区政府召开了佃东会议，指出过去佃户与地主双方各自的错误（？），多装租子和拖欠租子都是不对的，今后应该遵照政府法令来做。佃户们也相继发言：“我们说话不周到处，程掌柜不要见怪，今后租子一定要按法令装足”。程景胜说：“我收一斗租子是不对的，政府给我批评我接受，扣押也是对的，照今天大家这样子，事情好办，陈培林的地还可以多典一些”（会后程景胜又多典给陈培林 5 亩地），并且请佃户们和区上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

这次三村的减租斗争是真正的把佃户发动起来了，佃户们大胆的无情的清算了几年以来过重的租子，把民国二十八年以来地主多装的租子清算了出来，程景胜打了欠条，古历十月以前，就要退清。此外，又请政府工作人员和佃户们吃了一顿饭，更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次的减租斗争是成功的，胜利的。

（乙）二区一乡对地主的减租斗争

（一）地主杨柏林概况

杨柏林有土地 585.5 亩，自种 210 亩，分佃给六家：谢永会 62.5 亩，张云 22 亩，何万成 71 亩，张明铎 70 亩，杨元 80 亩，麻文选 70 亩。

杨柏林今年三十六七岁，高小毕业生，讲起话来还带点文绉绉地，个性较强，有哭鼻子毛病（以哭来表示他无办法，

借以取得别人原谅)，对佃户很苛，佃户对他很不满。他有两个子弟在西峰镇念书，他也经常到西峰去，据说他常将我们的情形告诉顽方（一定与特务有勾结）。

（二）斗争前的准备工作

参加主持这个斗争的有县上赵云山同志，准备步骤如下：

A. 开支干会，在支书刘振祥家里，到支干4人。会上大概了解了一下地主与佃户情况，大家认为可以发动起来的佃户有谢永会、张云、何万成等，因为地主要收谢永会土地；张云的地已被地主收了一部分；何万成是干部。另外又了解了一些和地主有矛盾的群众，如非党干部杨恒林等（一乡乡长），并在会上给每个支干分工具体搜集材料。

B. 和佃户个别谈话，首先找谢永会，从他家庭生活谈起，知道他家里现在没有吃的，土地不够种，非常怕地主收回土地，问他是否给地主多装了租子，他说多装了，但不清楚多少，恰好他儿子相儿来了，问他娶〔娶〕过婆娘没有？他说：“现在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还有钱要婆娘！”于是就抓紧他没有吃的这点，告诉他要敢和地主算帐，退出粮来就有吃的了。相儿把他们装过的租子数目记得很清楚，算起来多装了3石多粮，问他敢不敢和杨柏林斗争，他说：“敢！怕个屁！他还把我一刀杀了吗？”接着说张云也对地主不满意，因为地主收了他30多亩地，

他和张云关系很好，因此就要去活动张云。他和张云谈话是在开斗争会那天早晨，相儿已和他谈好了，他表示敢斗争，主要是算了一下他以前给地主多装多少租子，算的结果

多装了 2 石多粮。

和麻文选谈话时有支部经干刘杰在旁，最初麻不敢说，刘在旁鼓动他，他就照实说了：他在民三十年才伙种地主地 40 亩，三十一年又租给他 30 亩地，由伙种改为活租，也是对半分，只去年就给地主多装了 3 石 5 斗粮。

和何万成谈话比较简单，他是干部，有啥都讲了，算了一下帐，多装了 1 石多粮。

还有张明铎和杨元，因为他们和地主关系好，就没有找他们谈。

C. 开租佃会议，到会佃户谢相儿、何万成、张云、麻文选等 4 名，农会干部刘振祥、刘杰、袁生花等 3 人，党员杨春发，非党干部杨恒林等。在佃户会议上作的有几点：(1) 确定由农会干事长召集会，请县干部参加指导。(2) 决定佃户和地主斗争办法：a. 和地主算老帐；b. 佃户记清自己装租数目；c. 估计到地主可能用发誓哭鼻子等办法，佃户不要受骗；d. 斗争后佃户要求地主退出粮来；e. 确定张云先打头炮。(3) 在佃户会议上鼓励了佃户斗争情绪，告诉他们只要长装租子是实在的，保证叫地主退租子；并向佃户解释法令，保护佃权，以后不许地主无故收回土地。(4) 分配乡干部具体帮助佃户，鼓励佃户敢说话。(5) 告诉佃户在会议上结论的意见，并取得佃户同意。

(三) 租佃会议斗争经过

A. 租佃会议是在地主家开的，到会的人有：4 个佃户和几个乡干部及地主杨柏林。

B. 会议由农会干事长刘振祥主持，他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开这个会：（1）佃户要求重算帐，去年算帐时何万成和谢永会儿子没参加，所以重开会解决。（2）开会时正遇县上赵云山、白焕亭在这里作农户计划，故请参加指导。（3）在这会上大家都要说实话，不要隐瞒或多报。（4）地主不要误会这是对自己过不去。

C. 算帐情形。先叫地主讲他收张云租子数目，讲毕，张云说，不对，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的帐差了。当时地主发急说：“我有帐，你不要掩着心口说话。”张云说：“我去年给你装麦7斗，秋7斗，在第一次算帐，你的帐上写着麦7斗秋5斗，这次帐上又是麦7斗秋7斗了，你的帐到底是怎么样弄着呢？”地主说：“你去年为了少出粮，少报了地，你叫我给少写2斗。”这时乡长杨恒林把帐拿来看了一下说：“这帐不对，去年算时你的帐写的是汉码怎么这一次成了洋码了？账还能随便换的吗？”地主没话可说了。佃户要求把老帐拿出来，张云说曾见过地主有个蓝布皮很厚的帐。于是杨柏林发气的说：“张云，我把你怎啦！我从前什么时候拿口袋要1石我不敢给8斗，要30、20我不敢给您10个8个？你说我那儿对你不好？”张云说：“你大概是忘了你那‘猴带帽’、‘大加一’、‘大加二’吃利了吧。”顶的地主没话说，要和张云发誓说：“张云，你开口把一家人赌上，一口棺材埋了！”张云说：“我最近死了几个驴，大概是因为对你不好？”可惜张云把二十九年装过租子数目忘了，地主拿住这个弱点向他进攻，农会干事长叫张云先想一想再说。这时坐在张云旁边的经干刘

杰给张云“打电话”，把张云叫到外面去，告诉他，张云才记起了。

接着算谢永会的帐，谢永会的儿子相儿把过去装过租子数目记得很清楚，但不会反驳地主的话，只是死记住数目字。地主要抵赖，除奸不事杨子发在旁说那一年装的租子他都清楚，相儿说的对着呢。由他这一证明，地主又无话可说了，表现出要哭的样子。

何万成的租子数目对着呢，就是地差了 10 亩，地主说 90 亩，何万成种的是 80 亩；后来按 80 亩算了。

麻文选的帐因系伙种和活耕，分过的粮食数目字也对，没有什么斗争。

地主在会上后来又拿出一本帐，是用汉字写的，但数目字和第二次拿出的帐一样，所以在算帐时就没有按他的帐算。地主老帐始终没有拿出来，算的结果：4 个佃户在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四年中共长装租子 11.985 石。这些多装粮食限一周内退出三分之二，由乡长、农会长负责督促，其余可在麦收后退出。

D. 赵云山同志在租佃会议上的结论：

(1) 地主的帐是有毛病的，表现在二十八、二十九年 3 个佃户的帐目都不对，从这里看出这次算帐并不是佃户有意弄地主。

(2) 从地主多收佃户的租子看来，以及地主在租佃上会佃抵赖，说明地主是违犯法令了。

(3) 多装租子限一周内退出三分之二，余在麦收后退。

(4) 解释租佃关系及保障佃权。

(5) 张云租种之地，地主于张云不在家时（去驮盐）收回，现调解再佃给张云 20 亩地。

(6) 希望地主今后不要再违犯政府法令，不要对佃户怀成见。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 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

前　　言

这个材料是根据去年我们到绥德警区的考查材料（《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今年各地减租工作的报告材料综合写成的。第一部分是对边区减租地区土地阶级关系的一般分析（减租的客观根据）；第二部分是对减租运动的历史检讨（减租的发展过程）；第三第四两部分是叙述在减租中地主和农民的动态（减租中的阶级关系）；第五部分是提出在减租中发生的一些思想、政策及其他具体问题（今后贯彻减租需要解决的问题）；第六部分结论，是把以上各个问题的要点总结出来，以便利阅者掌握全部材料中心。总的目的是为了检讨减租问题做参考和根据。要看租佃关系，及减租运动具体执行的过程，还可参考减租斗争调查材料，那里收集了绥、米、葭及陇东合水几个典型地区的调查材料，亦为这个材料的主要根据之一。

拓夫

九月十六日

217

一、土地阶级关系概述

(一) 两种地区

陕甘宁边区有两种不同的地区：一为曾经分配过土地的区域，一为未曾分配过土地的区域。后者几占边区百分之四十的面积，在全边区二一三个区中，有八十一一个区（百分之三十八），一二三八个乡镇中有四六八个乡镇（百分之三十六）都没有分过地（一九四二年西北局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调查）。这种地区包括警备区的米脂、葭县两个县全部，绥德、西川^①二县的一部分；陇东分区的庆阳、镇原、合水三个县和环县的一个区；关中分区的同宜耀、淳耀两个县和新正、新宁、赤水三县的一部分；延属分区的鄜县的十一个区；三边分区的定边、盐池二县的一小部分。

这两种地区的发展历史也不相同：凡分配土地区域，都是过去土地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未分配土地区域，则大都是在抗战后统一战线环境中形成的。如果说前一种区域由于过去土地革命是从游击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以山地和比较荒僻的农村为根据地，那末后一种区域（未分土地区域）则大部分是土地比较肥沃，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带；若以人口计算，则未分土地区域的人口当占全边区人口的半数。

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地主的土地占有已被剥夺，而

① 即今子洲县。后同。

比较平均分配与广大的自耕农民；封建剥削已被摧毁，在农村农户中占统治数量的是中农、贫民及新兴富农。各阶层的经济普遍地发展与上升，他们经过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真正从革命中间收〔受〕到了利益，因之他们对于我党所领导的政权、军队是衷心拥护的。这是一种情况。然而在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副〔幅〕图画。现在我们就略述这些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情况（三边分区没有材料，而且租佃问题无关重要，故暂不論及）。

（二）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土地阶级关系

根据我们过去的调查和各地最近的报告材料，关于未分土地的各地区的土地阶级关系，略述如下：

在警备区，过去我们在《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中已指出绥、米二县土地占有的特点是：“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之手（从百分之三十七直到百分之七十五）；中农无论在户口数量上或土地所有数量上都是不发展的，最大多数的农户是贫农（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七〈十〉），他们每户的平均所有土地是从二点八垧到五垧……”（原书页四十六一五十四）。最近葭县的调查，乌龙铺联保共耕地一万五千垧，而七家地主即占有三千余垧，在“老财”所住村子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佃户、伙子（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再例如高家寨村共一二五户，耕地三九五三垧，而十八家地主即占有二六八一垧，六六户贫农所有土地只二七四垧，（葭县报告），证明和绥、米情况也是大体相似的。

在陇东分区，镇原全县人口三三四〇五人，耕地三四九二五九亩，只大地主六十二户（九三〇人）即占有八一八一〇亩，即全县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又如庆阳全县有三百亩以上的地主一六五户，同县高迎区地主占有全区土地之百分之三十九，其余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才分则〔别〕为中农、贫农、富农占有，佃农和半佃农的数量占全户口的百分之四六点四。再如合水一区六乡，地主二户，有地三四六五亩（全乡耕地之百分六十七）；富农六户，有地八三五亩；中农三十七户，有地二七四〇亩；贫农一二八户，有地二二九二亩（百分之七十一户口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四土地）。

在关中分区，同宜耀，全县二九八九户，耕地六〇四二三亩，地主占有其中的百分之七一；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户都是佃农。赤水县三区、四九八户，耕地三〇二六六亩中，地主三户即占有八三八〇亩（全乡耕地之百分之二十八）；中农一一七户，占有九六一四亩；贫农三七六户（户口的百分之七十六），占有一一六八三亩（耕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郿县的永平、太乐、交道等区，佃农数量较少，自耕农、半佃农数量较多。但在张村驿、直罗、牛武等区，则因客户很多，土地多为当地地主占有，例如张村驿的五个乡的调查，六一五户中有收租户五十一户；佃农四二九户，半佃农六户，自耕农一二九户。在牛武区第一乡有耕地六四二六亩，为交道区八家地主所有者即占四五四〇亩，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余百分之二十九的耕地才分散为小自耕农所有，佃农占农户的很大数量。

由于上述地区都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所以耕地都是比较缺乏的，尤以警备区的“地少人多”的问题为严重，按人口平均每人只耕地二垧余，这就加深了农民土地不足的痛苦，农民不但被束缚于土地之上，而且时刻有“失地”的威胁，租地都租不到。

上面所引各地区的调查，虽都不十分完整精确，但已可使我们对于边区整个未经土地分配地区的土地阶级关系照出一个轮廓：

1. 和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土地分散为自耕农民所有的情况正相反，就是土地集中于一部分脱离生产过程的地主之手。这种集中程度在各地区是不一致的，但封建的土地所有依然存在，则为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共同特点。

2. 地主阶级虽然为数不大，但它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着，它占有了农村的主要生产条件——土地的很大一部分，这就确立了地主阶级经济上的优势。

3. 绝大多数的农户都属于贫农阶层，他们没有土地或土地绝对不足使用，一部分中农也是如此，他们为了进行生产维持生活，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租入土地。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在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有的地方经过了土地革命时代的游击战争，地主受过打击，群众曾一度发动；又有的地方根本未受过土地革命的洗礼；有的地方自内战到现在长期处在我们政权力量之下，只以国内和平实现未及分配土地（例如关中的淳耀、赤水等地）；又有的地方曾被国民党于国内和平后一度侵占，我们政权力量不能行

捷，直到反摩擦斗争始告恢复；有的地方处在边区中心或比较巩固的地带；又有的地方处在边境（这是大部分），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威胁或袭击，特务活动也比较猖獗；有的地方地主住在边区之外（如关中的同宜耀、淳耀）；又有的地方地主绝大多数住在边区境内（这是大部分），这些不同地区的阶级关系、租佃关系又各有其特点。

（三）在已经分配土地地区地主怎样进行剥削——五种租佃形式

边区的地主一般依靠下列五种租佃形式来进行剥削——定租、包山租、活租、伙租、安庄稼。

（甲）定租。定租就全边区范围来说是占绝对优势的一种租佃形式，它的地租是按土地面积来计算的，不管收成丰歉，农民应当向地主交纳议好的一定的地租。

定租不但是边区内占绝对优势的租佃形式，而且是大地主、中地主出租土地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在这个形式之下的租佃关系无疑的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在绥米的调查及最近关中、陇东及警区各地的调查材料都在证明上述说法是对的（材料就不再多引了），因此减租的主要对象是定租。

定租的租额在全边区范围来说，虽是各地悬殊很大，最高与最低可以相差到七、八倍，而只就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来说，一般都是很高的。因为各地习惯用的度量衡不统一，只能用地租所占平常年成的收获量的百分比来作比较：在警备区最低约百分之三十，最高百分之五十以上，通常是百分

之四十一—百分之五十；在陇东地租一般是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五十；在关中的地租一般也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高的则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只就各地平年而论，若一遭歉收，则农民须将收获之百分之七十一—百分之八十交于地主，而遇到荒年，则将全年辛劳所得全部缴纳仍不够地主的。因此说：“古淳耀的百分之八十的佃农，有百分之六十因租额太高而无法交租”，甚至地主都承认“从光绪年间到如今我收租子的标准是丰年八成，常年七成，灾年二、三成，谁个能收够十成呢！”（张文选语，见一月八日《解放日报》）。

同时测量地租的高低，还必须考虑到土壤的质量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准，以边区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土壤是比较饶薄，农业生产技术也是比较低下的，所以以同样劳动力施诸土地的结果，所得的收获居然还低于其他地区。现在举物产丰饶的几个省份的旱地谷租（即定租）来与边区地租比较一下：

据去年国民政府主计处所刊《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上统计各省旱地谷租（即定租）所占中等地收获量的百分率是：江苏四十二，浙江四十五，江西四十二点三，湖北四十三点二，四川五十一点四，河北四十五点九，山东四十九点一，山西四十一点五，河南四十五点一，陕西五十二点五，广东四十点五，辽宁四十三点五，吉林二十八，而十八个省的总平均则是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可见边区从前的地租并不比其它地区为低，而且在减租之前，农民交纳地租之后的保有量比其他地区还少，也就是过去边区农民所受地租剥

则比其他地区还重，这是明显的事。

因为地租过重，一遇歉荒，农民不能交纳地租，就商请地主记在帐上，变成欠租。“但是旧帐未清，新欠又来，于是日积月累，几乎凡是老佃户没有一个不欠陈租的”。（《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高庙山地主的佃户有每户欠陈租达七十五石、六十五石、六十一石的（见同上）。陇东镇原的十一个乡，有民二十八年以前陈租一千八百七十九石；庆阳赤城区五乡四十二家佃户中即有二十五户欠租子的（陇东报告）；关中淳耀农民李相保，自光绪年租地二十七亩，每亩九升租，至今欠租已达五十八石（关中报告）。这类例子淳耀很多，其他县也有。这些“永还不清的子孙帐”（关中农民语）是地主加到农民身上的另一条锁链，逼使农民俯首贴耳，受地主剥削，不敢反抗，不然地主就算旧帐，每遇年成收获较多，农民经济稍有发展时，地主即以还欠租名义搜刮而去，使得农民永世不能翻身，农民若稍有积蓄向地主买地或典地，必须先将旧租偿清。因为据地主说“有力量置地，就有力量还旧租”，反之地主则可以借旧租来掠夺自耕农民的耕地。每个佃农欠租究竟有多少，往往自己都不知道，而凭地主一方面所记的帐。“若是问一个农民欠租多少，十、九回答不出来。问他为什么不到财主家看看帐，有一个农民回答：‘财主家的帐谁敢去看？’……就有的农民要看帐，地主说：‘你要还旧欠吗？’吓得农民也不敢看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

陈租和高利贷同样，是地主束缚农民的一个工具，它加强地主的经济统治地位，加强封建剥削，同时妨碍农民经济

的上升、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定租虽多为不定期限的契约关系，但数十年以至百年以上的佃户则为常见之事，例如绥德沙滩坪八十一户租户即有百年以上者四户，八十年以上者四户，四十年以上者五户，二十年以上者十六户，十年以上者十八户，五年以下者三十四户。又如葭县冯家岔五十五家租户，七十年以上者一户，六十年以上者四户，五十年以上者二户，三十年以上者四户，二十年以上者六户，十年以上者二十五户，十年以下者十六户。又据葭县高家寨一家地主二百八十户租户的调查，咸丰年以前者一户，同治年以前者十八户，光绪年以前者九十八户，宣统年以前者十五户，民五年以前者二十七户，民十以前者四十一户，民十五以前者二十八户。这些农民累世积代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劳动，每年以生产物缴纳入地主，剩下一点来维持生活。警备区农民有句谚语“怀揣石头三年热，地种三年如母亲”。佃农对于土地一定程度的佃权（土地使用权），在习惯上是早已成立的。虽然如此，地主为了增加地租或其他原因，而任意撤佃，侵犯农民佃权的事实却数见不鲜，在从前是丝毫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的。

定租关系中有一小部分是自耕农民之间的相互租佃，这或是由于耕地距离为了耕作便利的“换种”，或是由于农户丧失了劳动不得不出租。这种关系虽没有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多，但也是多少存在的。

(乙) 包山租。地主的第二种剥削形式是包山租，它可以看出作定租之一种，不过它的地租不是按垧或亩，而是指定某

一架山或一大片土地言明多少地租，其中往往有一部分荒地，因之租额是较低的（关中新宁每亩一、二升），它只存在于陇东、关中、廊县有荒地的地区，而且为数不多。“包山租近来是在逐年减少着”（陇东报告）。

（丙）活租。第三种剥削形式是活租（它在许多地方是被误称作伙种了），地主只出土地，收获之后双方按成分配，这是新近才大大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例如在葭县高家寨地主定租出二千零七十七垧，活租出四百四十垧，伙种出五十七垧。又葭县乌龙铺六个村子共计定租入一千三百二十九垧，活租、伙种入共八百七拾四垧。活租多为中小地主所采用，而且多为近地好地，是以在中小地主集中的村庄，往往比定租还多，例如葭县柠牛沟，没有定租，活租租户则有二十七户，地三百二十六垧；伙种五户，地二百八十九垧；安庄稼五户，一百七十四垧，其中有二十五家共一百八二七垧地，是近两年才改为活租的。又据绥德田庄区调查：一九四一年仅有伙种与活租地一千四百七十四垧，一九四二年增至三千二百八十八垧（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葭县通镇二保共约二千垧，前年一年有一半变为了活租地。陇东、关中也都有这种现象，而且一些地方闹的也很严重。为什么地主纷纷将定租改为活租呢？因为：

1. 活租剥削很重，一般是对半分，即达产量百分之五十的地租。
2. 避免歉收年欠租，丰年又可以多收租。
3. 种什么庄稼随地主的意思。

4. 不吃交租时粗细粮拆算的亏空（警区）。

5. 活租一般是较短期的不固定的，他可以随时撤佃，所以从定租改成活租，就等于取消了农民的佃权。

6. 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减租。

(丁) 伙种。第四种形式是伙种，地主除出土地外，还供给畜力、肥料、种籽之一部或全部，庄稼收获后按对半分，而土地面积较小的叫做伙种（在郿县、关中叫做份种），它往往为小地主、中地主所采用，而在自耕农民较多的地区，则更多为中农、贫农间相互关系。

伙种的条件是极端复杂的，在地主方面所供给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畜力（因为佃农大多是缺乏耕畜的，种籽无关重要，而出肥料的方面大多数可以分得全部柴草，即“草跟粪走”）。伙种在上述各地区都有，但都不占很大比重。

(戊) 安庄稼。第五种形式是安庄稼，在安庄稼之下，地主方面除出土地及全部生产工具之外，还借给佃农以吃粮和住窑。它的土地面积比起伙种是较大的，而且佃农对地主往往担负一些无偿劳役，收获后的分法是对半分配，借粮无利归还。警备区的地主富农很多是每家安一两个伙子的庄稼，在关中极为稀少，在陇东则没有这种制度。

上述五种剥削形式，若按它们所占比重的大小排列，则首先是定租（绝大多数），其次是活租、伙种、安庄稼，最后是包山租。若按剥削程度而论，则在减租之前最重要的是定租，其次是活租。而在各地实行减租以后，因对活租的忽视，活租就成为剥削最重的一种形式。安庄稼是地主或富农对毫

无生产工具的佃农的一种剥削方式，部分的伙种也是如此，不过在这两种制度之下，地主方面除了土地之外，还供给一部分生产工具，所以它们不能纯粹看作一种土地剥削（部分的伙种则为中、贫农中间的土地、畜力等等的调剂）。

以上所述，使我们明确了解：“占边区人口一半的未经分配土地区域的农民，在经济上还受着相当重的封建剥削，要发动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民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及民主建设，并调节农村各阶层间的关系，正确的彻底的实行减租交租政策，实有决定的意义”（一九四二年西北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这就是在边区未经分配土地区域所以要贯彻减租运动的社会经济的根据。

二、减租运动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边区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减租运动，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这些地区属于边区范围起，到一九四〇年初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统一，为第一阶段；从一九四〇年初这些地区的的新政权次第建立，到一九四二年西北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指示以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即为第三阶段。现分别略述如下：

（一）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初的减租运动

上述区域，在这个阶段内的基本特点，是政权的两重性。自从一九三七年国内和平实现与抗战发动之后，上述区域即都属于边区行政范围，均由八路军驻防。可是国民党不顾庐

山谈话的诺言^① 及行政院的决议^②，相继侵入这些区域，并把握各级政权（除关中的淳耀、赤水、新宁以外），利用政权力量来压制和打击群众运动，限制、危害和袭击我们各地的驻军，破坏了边区行政与法令的统一，并企图达到逐渐蚕食与消灭边区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不仅规定属于边区范围，而且有我们的驻军和共产党的组织，并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强有力的群众团体（如各种抗救会与农会等），这些群众团体实际上形成半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顽固派政权相对抗，从而就展开了紧张的复杂的“摩擦”局面。这种“摩擦”到一九四〇年二月达到最高峰，结果是党与群众力量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各地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及其各种政权机关被驱逐，从此才实现了这些地区政权的民选与边区行政的完全统一（其中只有关中的栒邑及新正县两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据，但我们又开辟了同宜耀和马栏区）。

党在上述阶段即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由于当时政权在国民党顽固派手里，故我们只能经过群众团体或驻军名义提出。在警备区，于一九三七年，即以警备司令部与后援会名义与何绍南^③ 会衔出减租布告，提出对半减租。在陇东由救国会、农会宣传三七减租；在鄜县也是于“双十二”后即

① 指1937年7、8月间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时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的诺言。

② 指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三三次会议关于委任陕甘宁边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决议（未正式公布）。

③ 何绍南，时任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

由抗日救国会提出对半减租的口号，交由各联保抗救分会执行；只有在关中的淳耀、赤水、新宁等地的减租，是由政府颁布命令执行的。因为这些地区有其特点，即自内战起，就一贯处在我们政权力量之下，其中又有许多地主是住在边区外面（如淳耀地主的十分之九住在耀县等地），内战停止之后，还长期不敢来讨租子。赤水规定的减租率是每石收二斗五，并扣三升互济粮（后改为每石收三斗）。新宁规定对半减租。当时地主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只要求多少得点租子，维护着地权就够了，不敢妄想多装租子”。（关中报告）。但这一阶段的减租运动是只提出口号，没有规定具体办法，减租工作多停留在宣传号召上面，没有实际动手去做，没有发动群众起来实行减租斗争，因此除了在个别地区（如庆阳的高迎区五乡及三十里铺、合水的店子区及城区、绥德的个别地方）相当的执行了减租外，一般的是没有实行的。

阻碍这一阶段减租运动实行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国民党顽固派政权，他们虽在表面上允许会衔出减租的布告（如何绍南在绥德），或表示赞成减租，但实际上却利用政权力多方阻挠，并在暗中策动地主加以反抗。第二个是以郭洪涛同志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把这些地区当作应以国民党顽固派为主体的“统战区”，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事事牵〔迁〕就国民党顽固派，看着何绍南们的脸色行事，以何绍南们允许发布一个减租命令，或同意减租为满足，以为这就是实行了“统一战线”，而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运动，以为这样子就会防〔妨〕碍“统一

战线”，于是在实际上，就把减租减息放在一个宣传口号的位置上。一个国民党顽固派政权，再加上一个投降主义路线，减租运动自然就无法实行下去了。

当着这一阶段的后期，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为着依靠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当时就以最能动员各阶层行动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进行反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这时主要的口号如反对贪污（绥德的白银案等等）、反对苛捐杂税（鄜县的反对联保办公费及壮丁费等等），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实现了宽广的统一战线，取得反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胜利。在这个场合下的一定时期，不强调减租减息是有策略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在反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中立地主阶级并团结一部分地主阶级站到反顽斗争方面，使顽固派陷于孤立而易于打倒，这与上述的投降主义路线应当严格的区别。

地主阶级在这个阶段，一般的对我们心怀疑惧与不满，但也不敢公开出头反对，对局势多抱观望态度，其中一大部分是倾向国民党的，但也有一小部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与我们结成了统一战线。

这一阶段的末期，在反顽斗争中，曾经造成了汹涌澎湃的农民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在客观上是农民保障分得土地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减租减息的运动，但我们没有把这一运动转入彻底实现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去，则是一个缺点。

（二）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二年的减租运动

自国民党顽固派被驱逐后，边区行政达到了完全统一，上

述地区的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于是开始了减租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一九四〇年，绥德、陇东、郿县先后召开了临时参议会，地主阶级一部分代表参加了。这时期地主阶级一方面怀疑我们在这些地区能否长期站得住脚，一方面又不了解共产党究竟对于地主将要怎么办。于是姑且进来看一看风色再决定态度，这是当时大多数参加参议会地主代表们的心理。在这些临时参议会上都通过了减租减息的决议和办法，地主的代表对这些大多表示意见。

绥德分区临时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这是各地区减租办法比较完备的一个。对于定租规定：丰年减租二成五，平年减租四成，歉年减租五成五，荒年三斗以下全免（一九四二年又增加了一项：平年减租五成）；对于伙种（包括活租），则规定减为四六分；按庄稼则四五、五五分；对于农民的佃权，则规定“地主无故不得收回租地及更换租户”。

郿县临时参议会也通过了减租的决议，按土地分为四等给租：特等地由过去每亩二——三斗减至——一点五斗，川地、原地由——一点五斗减至八升——斗，次川地、原地减至七升，坡地由过去五升减至二——三升。

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三七减租及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以前欠租一律豁免的决议。

关于新恢复的同宣耀和马栏也先后民选区政府，成立参议会，决定四六减租。

从此，过去由群众团体的减租变成政府法令的减租，而

且对于减租开始规定了些具体办法。可是这一阶段的减租工作虽有了正式的法令、条例和布告，党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减租的宣传，但仍缺少认真的领导和深入的实际工作，并且没有发动群众，因而在大多数地区就只看到减租法令或口号，看不到减租的实际行动。

一九四〇年地主阶级的态度，还是游移观望。有的农民在政府法令号召之下，或经过党的某些推动，自动少缴了地租，例如米脂高庙山地主常彦基一九四〇年只收租三成二三（按条例应收六成）；又如米脂艾家铺麻村农民交租四成九（应交四成五）等，但这种情形属了很少数，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佃户是没有减租的。

一九四一年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边区一天天更加巩固，《五一施政纲领》也颁布了，边区、县、乡三级的参议会和政府都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改选，各地的农会或自己经宣布取消或者是名存实亡，地主阶级逐渐相信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三三制”政策是真实的，于是由过去观望、徘徊、试探一变而为积极的呼朋引类向我们政权里钻。去年高干会整党草案上说：“今天在未给土地革命地区的地主阶级，是正在向我们争取政权，并已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的乡村政权……警区半数左右的乡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政府委员是党外人士，也就是说警区乡村政权的很大部分今天尚操纵在地主阶级之手，即令参议员成份是农民，但十个农民小参议员在一个地主大参议员面前是不敢说话的……，在庆阳、镇原、鄜县等地的乡村政权有多数尚在地主阶级操纵之下”。这

种情形在写时是实在的。

地主阶级对于土地问题、减租问题也变得积极起来了，关中住在边区之外的地主过去是不敢讨租子，或随租户给一点租子就满意的，现在“地主大大抬头，代表地主利益的参议员（如淳耀程思忠）大肆宣传，在群众集会上强调交租交息、不谈减租减息”；“赤水三区有的地主不唯不减租，反将租子提高”；“有的地主手持《施政纲领》向农民讨租子，而且非讨足数租子不可”（关中报告）。在陇东“有些农民见到减租法令，想拖延几天，企图减租，反而刺激了地主，想出种种办法来抵抗减租，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陇东报告）。在警备区有些地主对于去年减了租的农民施行了报复，抽了他们的地，或是把定租地改为活种〔租〕地。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说明地主阶级是想利用我们《施政纲领》和实行“三三制”政策，并参加到政权中来抵抗减租，以达到维护其剥削权利的目的。

而在我们党内，个别领导同志中，这时在实行《施政纲领》和“三三制”政权的新情况下，又产生了一种对地主阶级“只团结不斗争”的右倾思想，他们不是把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做为这些区域民主建设的中心，而是把选举和参议会工作做为民主建设的中心：在选举和参议会工作中，他们又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农民方面，而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地主方面；在对地主的政策中，不是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而是只有“必恭必敬”的一面，缺乏批评斗争的一面，他们把对地主的无原则奉〔迁〕就等作了我们同地主阶

级的统一战线，当作了落实党的“三三制”政策。在这种右倾思想的影响之下，使得我们有些下级干部对彻底实行减租缺乏决心，唯恐在实行减租中把地主得罪或逼跑，把“三三制”政权搞翻，因而对于地主上述各种违法反动的企图，就没有发动群众或利用法令予以应有的打击和制裁，甚至还有我们的干部（如在关中）把过去已成定案的对半减租改为二五减租，并负责推动佃户给地主租子算齐（如关中区的宣传科长谢鸿奎），甚至某些干部反而作了地主的尾巴，例如“赤水各级政府在地主曲解《施政纲领》，夸大地主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时，也跟着向群众含糊解释：‘在减租二五之外，地主有收回土地之权利’”。警区有的干部对于地主利用减租减息条例规定的不周密，而非法侵犯农民的佃权，随意撤佃、假典、假卖，改定租为活租等投机取巧行为表示束手无策。在庆阳地主钻入政权，欺压农民，发生农民因减租被地主控诉，而我们政府反判农民两个月禁闭的怪事（庆阳县新堡区三乡土地问题材料）。

于是就产生了下列情形：一方面是地主的得意洋洋，一方面是农民的灰心丧气和对政府不满——“如今穷人没办法，啥都由人家”；“减租是惩了穷人”（庆阳新堡区三乡农民反映）；“八路军现在爱有钱的人了，咱们再不敢得罪财主了”（合水六区农民李兆连语）；“八路军还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说的一样，作的一样”；“公家的事没准”；“八路军手腕大，提倡减租，地主收回土地后，穷光蛋只有当八路军了”（陇东农民反映）；“见了公家人少说话”（绥德延家岔农民）。这时地

主再出来对农民施行点小恩小惠，或稍稍假以词色，于是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就跑到地主方面去了——“谁相信公家，谁就倒霉”；“人是良心要紧，种人家好田好地，这就够财主受了”（米脂河岔八河马光祖）。

总之，这一阶段的减租工作虽是减了一小部分的地租，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利益，但隨之地主就来了一个反攻，使许多农民吃了亏，影响许多农民不敢减租，怕减了租反而没有地种。完全证明了单靠政府一纸命令（对执行这个命令，又是不十分坚决的），不发动群众，则不但不能贯彻减租，以达到发动农民积极参加抗战、生产和民主建设的目的，相反的，如陇东一个下层干部所说是“骑虎难下背，地主佃户两不满”。

（三）一九四二年秋以后的减租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之后，西北局于十月也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附有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不久边区政府又颁布了一个租佃条例草案。在西北局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在减租运动中的最大缺点，并指出贯彻减租运动的基本方针，其中尤其强调发动群众斗争和保护农民佃权；在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及边府租佃条例中，更解决了许多减租中的具体问题，纠正与补救了过去各地减租法令中的一些错误和漏洞。其基本点是：

甲、维持各地已颁布关于定租的减租率，不作统一规定。

乙、对于各地早已存在农民佃权的习惯法作了成文的规

定，并且禁止地主任意变更租佃形式。

丙、对于活租减租，则地主所得最高不得超过三成。

丁、对于一九三九底以前的旧欠租一律免除。

这些文件正确解决了减租运动中的思想政策问题，并在实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以高干会的精神传到各地，遂开始了减租运动的第三阶段，即走上贯彻与深入的阶段。兹将去冬及今春各地执行减租工作的情况概述如下：

绥德警备区于十月初即布置了减租工作，并由专署颁布了一个分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的补充办法，它的要点是：

(1) 列举了地主方面八种破坏减租行为，“得依情节之轻重，照多收粮，加以一倍至五倍之处罚，或科以三月以下之生产”。

(2) 对于农民，“有力交纳，而故意不按政府之规定交足者”，和多交租“又不向政府报告”等行为，也规定了罚粮或罚生产。

此外，对于佃权、年成、典卖地的优先权等等问题，也作了一些新规定。于收到西北局减租指示之后，专署又发了两次命令，纠正了过去几个不妥当之点，并又对回赎典地问题作了几条规定。因为边区政府的租佃条例收到较晚，所以警区去年的减租还是以过去分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和上述法令为依据。

警区各县的减租工作，从去年十月起，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葭县城关二保则是最先搞起减租运动的地区，然后推动到一保通镇、乌龙铺等地；米脂则由河岔六乡、五乡作起

(即杨家沟)。

据去年五月地委的报告，减租工作作的比较好的地区是“葭县城关区、乌龙区和通塞区的两个乡；米脂的河岔区、卧羊区、桃花峁区；绥德的义合区、沙滩坪区。在这类地方，干部积极认真，有较深入的调查，又有群众的发动和组织，会抓住打击个别最坏的地主，办一两件为群众所引痛的旧案，会把政府直接干涉与发动群众运动结合，减的比较彻底。但是这种地区并不多。另外一些地方，干部也积极认真，也有调查，但只限于干部和少(数)党员群众成立检查减租的组织，“还没有把群众发动再推进一步”，例如米脂附近城区、绥德田庄地。至于多数地区则还只限于政府直接检查执行法令，没有转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因之检查也就不能深入，减租也就不能完全彻底。

又据葭县县委今年二月报告：“全县五十五个保，减租工作比较彻底的二十二个保，(其余)或是没有搞开，或是情况不明”。

下面从一些个别区乡的调查来看警区减租的具体成绩。

米脂的河岔区查出七十五家地主、富农和一百九十五家佃户多分粮，或交现租、交夏租还欠租等等都解决了。米脂卧羊区查出有五十五件活租、伙种未按条例分粮，退粮二十六点三石。米脂城里一百八十件活租及一部分定租未按条例减租，退粮五十六石。米脂民权乡经区政府直接检查，有二百一十六户佃户与七十一家地主的租佃关系未按条例减租，后活租退粮二十五石。再如绥德田庄六个乡与城内地主的四

百八十五件租佃关系大部按条例交了租，并且解决了收现租、倒租户、偷典地等问题十五件。绥德沙滩坪区七个乡查出活租多分粮的一百二十六件，结果退粮四十四石；郝家桥一百一十户佃农中有一百〇八户佃农一千〇一十八垧租地皆按条例减了租。又合仅在数日内即发生一百六十五件土地案，多为伙种、分粮、倒地、现租问题，后皆由区署解决（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新店区退回长收租四十多石，地主收回“农会地”六百多垧中退回四百多垧。再如西川双湖峪成立减租交租检查委员会，会后查出半数地主未减，皆由政府令之退回，今年三月解决了二十五件讼案，其中有撤佃的十四件，提高租额的两件，改定租为活租的三件，现租四件，结果判成利于佃户方面的二十三件。西川周复区四乡去年未执行减租，经政府查出退还一部，但未退完。“西川其它各区大体上执行了减租，最差的是驼耳巷区”。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区，群众根据条例——“民国二十八年年底以前的欠租一律免除”，要求地主从他们帐上把这笔欠租勾销（勾帐），并且按减租后新定租额重新订立新租约，退还旧租约（换约），例如米脂的河岔区有些地方这样作了。

葭县的一些地方（城关区、乌龙铺等等）群众，对于一些一九四〇年以来不减租的地主要求清算几年的旧帐，退回多讨去的租子，在租户会上议决处罚这些地主（如城关的李宗回）（绰号“瘟神”）、韩云（绰号“死狗”）、刘木瓜沟的刘争先、高家塞的郭维藩等等）。米脂处罚了城里地主李健候、艾斌卿、瓜园乡的地主蔡秉元。绥德处罚了李桂桐……。葭

县城、螅镇都发生过给地主戴纸帽子游街的事（任养增、任加谋等），地主的气焰是受了一下打击。这中间也发生了乌龙铺因要退三年的租子吓跑了几家地主，并有两个地主服毒自杀（葭县乌龙铺郭维藩企图自杀，绥德义合李桂桐因被处罚及其它原因服毒自杀）。木头峪斗争中破落地主、富农、中农的三年旧帐也算了，没有粮食退的都写了借条。

各地援用了专署颁布的《补充办法》，对于一些佃农也给了处罚，例如绥德杏镇先处罚了几个不肯实说的佃农；葭县刘木瓜沟斗争地主刘争先当中，罚了四户佃农八斗粮，抽回其租地七垧，由减租会处理；一个佃农因开会不到，罚抽地二垧（据说这些佃农都和刘争先有关系，可能是国民党员）；木头峪发动群众时的口号是：“不斗争，不减租，地给政府留下”。

“以保障佃权为减租中心，已在警区实际中证明其正确”，各地的群众斗争都是在“政府保证今年地不能动”之下才发动起来的。“也有不少地方作的过于强调不能影响农民生活一点，使土地运动停滞了，实际上自一九四〇年以后，土地是由地主手上向着中贫农手上转移的。”（上引皆见地委报告）

在上述减租比较深入的地区，都有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它们名称极不一致，如：租户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伙子会、减租检查小组等，有的地方没有组织形式，只推一人到时召集租户开会（乌龙铺）。葭县城关的减租会定了四条规程：
a. 要减租也要交租； b. 不增租夺佃； c. 不与地主订秘密条约； d. 开会要到，大家出主意。开始组织的方式，在葭县有

三种：在有党组织的地方，先经过党的活动，自下而上的组成；第二种是由干部召集开会，预先布置几个人提出来；第三种是由干部直接号召。这些组织证明是能起作用的，例如葭县城关二保的减租会成立一周，就揭发了二十七件违法案。另外，在西川等地叫做“减租交租检查委员会”，例如双湖峪的减租交租检查委员会是由区委、区署各一人、各乡选出炭工一人、地主一人、中农二人、雇农一人、小商人一人组成的。这一类组织虽也有起作用的，但多数是空架子，因没有群众基础。绥德沙滩坪的保地会职权中有一条是“土地租佃纠纷，保地会有全权处理”。米脂河岔区“各乡联合成立各乡保地会，区上有问题，都先交这个会讨论，还规定乡长要得保地会主任同意，才能解决问题”。

今年五月地委报告对警区减租的估计是：“大部分地方对减租大体比之往年较认真，一些地方也作的较彻底……减租运动是动起来了。”今年秋天地委的估计是定租百分之八十以上照条例减了租，伙种、活租则大部分都减了，但是警区对于活租与伙种至今尚未分开，所以去年费大气力，结果只实现了活租四六分”（葭县报告）。

这是绥德警区去年和今年执行减租的情形。下面再看陇东的情形。

陇东分区自收到西北局指示后，即派干部到各县传达布置。工作方式，庆阳、合水是全县普遍进行减租工作，镇原则是集中干部实习两个乡两个村；庆阳、合水整顿了旧农会的组织，镇原则成立了减租交租委员会。各县开了租佃会议，

进行了宣传。

在这一时期（一九四二年年底）退了一部分租，算清了一部分旧帐，并换了一部分租约。譬如庆阳新铺区二百三十五户佃户中，与地主算清帐的八十八户，换了新约的六十五户；庆阳市区的一百一十一户佃户中，算过帐的三十一户，换了约的二十二户，退了租的六户，共三点五石；三十里铺区一乡的五十七户佃户中，算清帐的五十四户，立新约的十户，退租的五户。镇原全县共减免租子四〇八石，马渠区一乡二十六户佃户中，减免租子六十八点一二石。这时期工作的缺点是“个别干部还不足够了解减租交租的意义，有些干部害怕地主玩弄私情，如镇原马渠区区长景启华与地主有干亲，就许他收回租地；柳州市三乡一个地主应退农民王兴邦租子三石，县上去的同志潘光亚则允其不退，最后调解退了一石五。庆阳高迎区六乡干部怕地主，不敢到地主王宣家里去，又说：“减租条例不敢给王宣说。”“部分干部以为征粮非完成不可，减租呢，明年再来还不迟。”庆阳个别干部说“减租是农会的事”，于是不管了。干部中有的对减租条例还不详细了解，庆阳一个干部在同川区把原来每亩九升租额强制抬高到一斗，再以二五减成七斗米，东佃双方都不愿意，……。“因为群众工作的不深入，因之免不掉单用行政力量出来作了……。此外，全县各乡同时进行，干部不敷分配，到处都搞，到处都没搞好，譬如庆阳虽是算了帐换了约，但地主家里还另外有一本秘密的帐……。”

一九四三年高干会闭幕之后，在分区干部会上检讨了减

租交租工作，又配合春耕工作进行减租。这次减租，干部有了认识，领导上抓的紧，工作方式比过去也细密实际了。今年的减租工作镇原县搞的比较好些，全县三十四个乡已搞过了十二个乡；不完全统计，地主一百〇四户，出租地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六亩，佃户二百六十六户，免了民二十八年以前陈租一千七百八十二点六四石，减租六百三十七点三五石，减后因天灾又免了五点三五石；抽约七十一张，……庆阳县配合着春耕把高迎区的五个乡大多都减了，三十里铺三乡五十二户佃户中减租的三十六户；赤城區二百七十六户佃户，过去虽从未减过租，今年减了租的二十六户，退租的六户，计粮十石；驿马关区换了约的六十户，退出租子十六点九五石；庆阳市一百一十一户佃户中减了租的八十七户，换约的六十七户。合水县对减租今年执行稍差，只减了三户地主的租；全县应换约的地主三百八十四户，佃户一千二百一十五户，已换了约的佃户六百六十四户。

陇东历年减租皆照临时参议会决议三七减租，合水有的地方曾对半减过，对于半年、平年、歉年、荒年，并未象警备区一样，规定有分年成减租的办法。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央土地政策颁布后，根据其附件上“二五减租为原则”一句话，又一律改为不分年成二五减租，有些租户已经减了租还要再退租给地主，一部分干部群众对此是不满意的，有些租户则因减租之后地租仍旧太重，要求按公斗交租（当地斗比公斗大四分之一）。

这是陇东分区去年和今年执行减租的情形。下面再看关

中的情形。

关中收到西北局减租指示之后，“各县在响应上级号召减租的口号下，都曾作了口头、标语的宣传”，“但对发动群众斗争一点认识非常不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去作了一下”；“同宜耀县委接到西北局和地委指示，只作简单讨论，政府负责同志也未参加，当时决定由党内发动佃户控告地主，政府开始对这种办法还生怀疑，九、十月之后才有些转变”。

但是“同宜耀在关中各县还是执行减租比较好的，群众也多少发动了一下”，有五十四家地主退给了五十家佃农三百二十六石多收的租子。政府在此期间一共处理了一百八十九件土地租佃案件，其中把地主收回土地仍判归原户耕种者五十五件，并因此处罚了几个地主：企图收回土地而被政府制止者十件；长收租者九十五件，判令立刻退还者三十二件，待夏收退还者四十七件，经政府制止者六件；十件因地主不在边区未判决。

关中各县今年也“机械执行二五减租”，引起许多群众的疑虑和不满，淳耀的群众说：“什么减租，明明是加租。”赤水的群众说：“八路军过去没得势时和穷人好，现在上去了，和地主好。”新宁的群众说：“现在政府变了，不替穷人作事了。”

关中和陇东一样在减租中也发现了个别干部倾向地主，如区委书记高万祥同地主来往，常给他送东西，在区上闭口不谈减租问题。柳林区某乡乡长因为自己租地不好，常替地主说话，想给地主做点事买好地主，若夺回土地来好给他拼

点好地。

开始关中各县组织的减租交租委员会多是包办的抄名单的空架子，如赤水县一定要有一个地主三个佃户一个党员参加，名字是千篇一律的“减租交租委员会”，在新宁县甚至把“交租”放在前面；在同宣耀斗争地主李万昌的时候，在扣押李之后群众才敢来告状；群众斗争差不多只有告状一个方式，而且大多数告密状，不敢明告，在“其他各县群众运动则差不多处在停滞状态。”

后来转变了工作方式，成立农会组织，如在马栏区成立的三个农会小组，是先调查了当地的租佃关系，发现佃农中的积极分子，向他说明减租的意义，再叫他们去自行联络会员，在他们自愿之下才组织成农会。同宣耀也同样成立了六个农会。凡是这样成立的农会都是比较巩固的。

关中的淳耀、同宣二县的地主绝大部分是住在边区之外的，过去减租之后，这些地主趁佃户到耀县等地就挡下牲口，必须找保补租子才准走。今年对于边区以外地主的办法是：a.若是他们在外边挡牲口，则叫佃户在边区里边等他到边区买菜运炭的时候，挡住他们的牲口，讨回多装的租子。据实行的经验，地主再不挡牲口了。b. 地主今年来收租一律到乡政府登记，然后再介绍到佃户家装租，没有介绍信一律不准装。

这就是从报告中看出的去年及今年关中执行减租的情况。下面再看郿县的情形：

郿县县委的报告上说：“据今年五月检查，在牛武、张村驿、直罗、大界号（大界号是经过土地革命区），凡是属于定

租部分都减了，其次是大义、道德、交道、永平区，大部分减了，减的差的是城关区，大部未减。”

减租工作好的区，凡是定租，一般“减了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道德区一百七十二户佃户，租地四千〇六十七亩，全区未减的只有二户；牛武区，区组织了减租委员会，乡成立了减租小组。牛武、张村驿减的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减租较差的区，如永平减了的有百分之五十一—百分之六十；大义减了的有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

至于减的不好的各区，一般也减了百分之三十，如城关二乡统计：佃户三十六户，租地七百二十八亩，减租的共六户，减了四点六石。其他均未减。减租工作不好的原因是：“领导上放的松……，减租小组多成了形式……，其次是地少人多，大家争着租地，佃户怕地主收回土地……。”

“今年布置春耕中，对于地主过去多收了的租子要退回，或今年租子中扣，并对地主收回土地严格制止。”

综合以上各地材料，可以看出去冬及今春的减租运动，比过去任何一年要做得好些和彻底些，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彻底实行了减租。定租地，大部分是减了；活租、伙种地也有不少的部分实行了减租。可以估计这次减租运动是大进了一步，其根本原因就是实现了西北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主要是达到了下列各点：

1. 党政对减租运动的认识和领导比过去更加认真和深入。
2. 坚决保护农民的佃权，即取消了地主抵抗减租的重要

武器，又增强了农民减租斗争的决心。

3.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来进行减租。
4. 用群众力量或政府权力斗争了个别顽固地主，打击了一般地主的抵抗，推动与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
5. 减租法令更加细密与完备，地主无所借口，农民则以之做为合法斗争的武器。

以上数点就是这次减租运动中新的特点和经验，指明减租运动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是这个阶段还是在开始，并未达到普遍的程度，在这个阶段的群众减租斗争中，虽已开始发现某些“左”的现象（如处罚地主过重或过多；给地主带纸帽子游街），引起地主逃跑甚至自杀，但这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是很难免的，是比较容易纠正的。目前为展开群众减租运动，我们主要打击方向，还应是各种右的思想倾向（如迁就地主与不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发动群众的方针，更加展开普遍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就是这一阶段减租运动发展的方向。

三、减租运动中的地主

地主阶级在减租运动的第一阶段，当时因其尚有国民党政权的依靠，同时农民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故对减租运动是大多数持直接反对的态度，他们的想法是想借国民党政权的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封建剥削；他们除直接威吓压迫农民不敢实行减租外，必要时还在国民党政权面前控告农民，借故打击农民，使其不敢有所反抗，特别是在未受过土地革命影响的地区的地主阶级更是如此。但地主阶级进入了减租运

动的第二阶段，情形发生了变化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不存在了，他们失去了依靠，同时民主政权成立，减租成为合法的政府法令，农民群众也逐渐抬头，故对减租不能持公开反对减租的态度；又因我党颁布《施政纲领》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给了地主阶级若干幻想，以为可以利用我党的政策来达其抵抗减租与维持封建剥削目的，于是就采取各种巧妙的曲直的隐蔽的办法，来对抗减租和实行减租的农民。在减租运动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某些时间和地方，地主阶级曾采取如下各种办法对抗减租：

（一）定租改为活租

这是地主阶级普遍采取的对抗减租的方式之一。地主阶级利用政府没有保佃的明文规定，与各地在习惯上把活租（指地分粮）与伙种不分的空隙，便大量实行改定租为活租，使活租在近二年来有突然的发展，尤以绥德分区、陇东分区为甚，如葭县乌龙堡区的高家寨，在一九四〇年前还没有活租的形式，但至一九四二年，该村原有定租租地（本村佃户租入地）八百零七垧降为四百四十九垧，活租地则增为三百五十八垧，这些活租地最大部分是（民）二十七年减租后改变的。店镇区牛沟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由定租、自耕、伙种改为活租者达二十五宗，计一百八十七垧一亩。绥德郝家桥减租前只有二十二垧活租地，但至一九四一年则增为一百零五垧。延家岔乡的两个行政村，以前只有十五垧活租地，现在增至——点五垧。米脂城内地主李建候于一九四二年春把他小桑坪的三百多垧地全部改为活租。同样的情形在陇

东分区也不断的发生，如庆阳地主八大家的任绍亭、田玉亭，镇原地主孙世涛，合水地主赵景胜，都用这种办法来抵抗减租。关中分区的马栏等地，也发现地主把定租改为活租。地主改定租为活租，就可以达到减租等于不减，如庆阳赤城区五乡地主王子树，因佃户李树仓减了租，于一九四二年将其定租的一百四十亩地强迫改为活租，结果地主夏秋两季共收粮一七点八五石，比过去未减租前的十四石原租额还要高些；又如绥德延家岔地主延振华因本村租户延林昌减了租，即将其租地五垧收回，活租给延培义，今年地主按四六分了，八斗麦子后来又按六五三五的退了一斗，还有七斗；原来这五垧地定租租额为麦子七斗五升，若按政府规定夏租六成交租，则地主应得四斗五升，这样活租比定租在减租后还多收二斗五升麦子。因此，农民最怕租地由定租改为活租，而地主则最□□办法来对抗农民减租，如庆阳大地主冯唐，因佃户吴老三要对半交租，就说：“你若不装齐，明年就要伙种！”（指活租）结果佃户只好按原租额交了三石一升，不敢减了。

（二）撤佃倒佃，打击减租农民

撤佃倒佃也是地主抵抗减租的主要方式之一，佃农在减租中最怕的就是这个“紧箍咒”。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地主曾普遍采用这个办法来抵抗减租，故撤佃倒佃之事曾猖獗一时。绥德分区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二年春是地主撤佃倒佃最凶的时期，虽经临参会明文制止，但法不灵验，仍未抑制下去，据葭县柠牛沟调查，租入地共六十九宗，只有十七宗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前租入，其五十二宗皆系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

租入，该村地主张慕宽、张慕谦这几年来都是一年倒一个伙子。葭县高家寨地主高光裕一共有佃户五十五户，减租后，三年中把二十四户定租地收回，另以别的形式租出。米脂县冯家岔共有农民四十七户，租种地五百五十四垧，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四二年春地主借故撤佃者达百余垧，牵涉到九户佃农。陇东、关中截至今春止，撤佃倒佃之事，还是层出不穷。关中同宣耀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耕时就发现了七十三件地主借故收回土地案件；庆阳新堡区地主任绍亭（边区参议员）因佃户韩荣华减了租，将地收回另伙种出去；地主齐鸿升因佃户李瑞实行减租，借口自种收回其土地。这种撤佃倒佃，使许多农民失掉土地，使生产受到损失，如关中一个地主张子供，因减租，借口自耕收回土地，结果把十几亩好地荒芜了。

（三）假典假卖，讨收陈租

假典假卖，或用假典假卖讨回陈租，也是地主抵抗减租的一种办法，但一般只能行之于地主所谓可靠租户及亲族之间，故发现颇不易，这次我们调查，在葭县发现二宗，一宗是刘木瓜沟地主刘争先假典给刘进宗地十垧，另一宗是高家寨地主高植民假典的故事，原来高植民租给高子龙地三垧，高子龙实行减租就将地收回，又租给张青平，高子龙不愿退地，地主即说典了，于是就给张青平假出典约一张，又怕张青平昧了良心，弄假成真，便叫张青平同样给地主出假典约一张，作为抵押，后因征粮时群众要张青平多出粮，才将高植民的假典阴谋揭破。此外地主还有以典卖为名来达到讨收陈租的

目的，如庆阳地主刘克武民国十四年租给贾宜民地一百亩，贾宜民欠其二十八年以前陈租十三石五斗。刘为收陈租计，于民国三十一年将此地典给贾宜民，典价三千一百元（法币），典期三年。陇东习俗是“有钱当地即有钱交租”，于是贾宜民不得不把所欠旧租十三石五斗写成四个欠条，分三年交清。当年就交粮二石。

（四）明减暗不减

这是地主在减租初期普遍采取的一种办法，地主利用其传统地位及撤佃怀柔等软硬办法，压迫农民不实行减租，又要农民对政府说是减了，如葭县乌龙铺地主郭维藩，他利用过去当过县长的地位，与佃户订下密约应付公家，若问他家租户，总是说“按公示走了”。又如关中新正有个地主叫张化新，名义上说是四六分了，实际不但没减，反利用他最忠实的佃户陈采兰活动别的租户多给他交租。另有个地主叫张月禄，当他听到减租委员要来调查的时候，他便连夜备办酒席请他的租户赴筵，装出可怜的样子，向佃户哀求说：“你们看我这几年光景一天不如一天，你们还忍心给我少装租子么？减租委员来了，你们就说租已给你们你们减了。”果然调查人员初来时佃户们都说是减了。

（五）提高租额抵偿减租

地主在不得不实行减租的情况下，就于减租后采取提高租额的办法来弥补其减租的损失。这类事情各地发生的也不少，他们是以下列各种方法来达到其目的的：

第一种是重量土地，如庆阳大地主刘克武，他将大部分

租地重新量过，结果请看下表：

佃户姓名	原租地数	重量后地数
赵生财	60亩	65亩
何富华	70亩	74亩
樊宗海	70亩	78亩
张全福	80亩	88亩
王太	60亩	65亩
李自兴	60亩	65亩
朱旺	100亩	125亩
刘启化	110亩	125亩
戴常青	100亩	125亩
共计	710亩	829亩

结果七百一十亩地变成了八百二十九亩了，长出地一百一十九亩，这一百一十九亩地的地租差不多可以弥补他全部减租的损失，使他的减租实际上只有百分之八点七。高迎区地主徐丁玉也以重量土地威胁佃户不敢减租，镇原地主醴清

华也用这个办法抵抗减租。

第二种是利用卖地扣金抬高租额，这也是刘克武的故事。刘克武利用出卖出土的机会，提高租额，如他将山一座、地十五亩卖给佃农罗新孝，罗又典给刘，以比原租额高一石的租额租回。

第三种是地主联合活动加租，如关中马栏区数家地主曾为提高租额开会商量，叫地主陈彦顺（七十多岁）出头涨租，否则就卧到犁沟里不起！……结果佃户于得润的租涨了三石（原租额三石），史子明的租涨了一石五斗（原租额三石），其余租户租额也都涨了。这样一涨，就是对半减租也和不减差不多。

第四种是地主私自抬高租额。庆阳新堡区三乡农民候进，因生活所迫将自己地一百二十亩典给冯家（冯唐、冯汇），又以每亩五升租额租回，去年算帐时帐上记的是每亩六升。佃户杨金堂也是租的冯家地，原来每亩五升，现在涨成七升了，佃户气愤不已，说他是“抬高私算”。高迎区地主张廷栋把每亩二斗的租额提高到一斗三升。佃户一算，二五减〈租〉后每亩合九升七合五，减和不减相差不多。

第五种方法是地主在出租地时根本不议定租额，他的意思是叫减租无从谈起，关中地主王子杰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六）利用政治地位不实行减租

参加我们政权的一部分地主，常常利用其政治地位来压迫佃户，不实行减租，如庆阳八大家之一的田雨亭是边区参议员、庆阳县参议会副议长，一九四一年由延安开参议会回

来，马上下乡，把租子收光，等到乡上传达减租时，门客（佃户）都向他要求减租，他说：“明年再说，今年已经收齐，怎么好减呢？”又如米脂县王家湾村主任王曾秀是个小地主，听说要开伙子会，他便首先与伙子密约，不准实行减租，也不许一个人向政府报告。又如绥德双湖峪市镇乡行政村副主任也是个地主，他想尽办法抵抗减租，同时还联合其本族地主以撤佃等手法打击佃户，使佃户不敢实行减租，直到今春才被群众告发，区府明令撤职查办。

（七）威胁佃户不敢减租

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地主常用各种方法威胁佃户使其不敢减租，如四区五乡地主王清选，借其士绅势力，不唯不减租，且实行加租，并常以大话威胁佃户说：“我已到区上县上讨论好了，谁少给租子，叫谁坐禁闭！租子连一点也不能少。”佃户害怕了，连忙杀羊赔罪。又如该区三乡地主胡廷选在讨租时对佃户说：“你们租子装不齐，这里距南义井（友区）三十里路，八路军被打跑后，你就是卖了老婆也还不清我的租子！”也有地主在装租时对佃户说：“公家人来问时你就说咱减过了，担保你有地种，不然你就滚蛋？”甚至还有地主说：“八路军走了非杀你的头不可！”

此外五乡四区地主余老七在减租中还以收回农具来威胁佃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八）大斗收租

庆阳地主刘克武收租的斗重四十二斤，比惯用斗大四斤。葭县店镇刘争先收租斗重二十七斤半，比本庄马洪晨的斗每

斗大二斤半。葭县大地主高继容也是惯用大斗收租的，据说他用大斗每年可长收二十石粮，当公家没收其斗后，他又重新制了一只新斗藏起来秘密使用。这种事情，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

（九）逃避政策

庆阳地主刘克武是个顽（固）家伙，他父亲在世时，还减了二年租，自他管家后，以各种方法抵抗减租，上述办法他差不多都用过。他并当县区上干部下乡时便躲到别地去了，如今春朱副专员①和县长专门到他那个乡进行减租，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避到西华池去了；七月间边府派员到该乡进行减租调查，他又跑到定边去了。地主冯得功、冯登堂、张生才等也都采用这个办法对付减租。

（十）造谣欺骗

如葭县籽牛沟地主当减租时造了一个谣说“伙种、活租都对半分了”；关中有个地主对佃户说：“不要向公家实报，公粮可以少出些。”这种情形在许多地方发现，特别在减租初期为地主所采取。

（十一）收买干部

这种办法在个别地方也发现了。如镇原地主吴光前，当赵崇德、刘克夫二同志到他们乡作减租工作时，他拿出了一——四元法币给他们，意思是要他们不要减他的租。赵崇德们就将钱收下了，后来在群众大会公布，钱也没收了，长收

① 指朱开铨。

的租也在政府监督下退了。又如关中八区区委书记高万祥，地主常给他送东西，结果把高引诱得动摇了，他在区上闭口不谈减租问题。

（十二）宣传地主理论，欺骗落后群众：

最后地主对于减租还有种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在思想上来影响农民，不实行减租。米脂大地主马某某宣传地主剥削论，他说：“在减〈租〉中，地主过去收三百石租的，现在只能收一百多石了，这是一层剥削；收租用小斗，交公粮用公斗，这又是一层剥削，租户交绿豆、江豆都是一斗顶一斗，交公粮则绿豆、江豆一斗半顶一斗，这是第三层剥削。”葭县刘木瓜沟地主刘争先又宣传减租不公论，他说：“减租太不公平，对农民太便宜，对地主太吃亏”。米脂高庙山地主常彦承又宣传地主为国家管理财产论，他对佃农讲：“大家要抗战，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我的财产你们不要看成是我的，是我给国家代管的，国家什么时候要，我就得交出来，抗战期间国家要粮食，我就得交公粮，要是你们不交租，我的公粮交不上，那公家就要问我：‘常彦承，你的财产怎么管的呵！’我拿什么话向公家交待呢？……”这样来宣传农民给他交租。

绥德双湖峪地主刘某某宣传良心论，他收租时给佃户说：“有良心就按旧租额装，没良心就照政府规定的给”。

庆阳八大家之一田某某又宣传减租三错论，去年政府准备彻底执行减租，进行换约勾帐时，他说：“第一，上级决定减租，政府不好干，这是政府错了；第二，不让地主多收租子，地主按原来租额收了，这是地主错了；第三，不让佃户

多交租子而佃户多交租子，而佃户多交了，这是佃户错了。”结论是“三家都有错，过去的事糊涂了！”差不多每一个地主都有一套 非难减租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时期还影响了一部分农民，使他觉得“减租太对不起地主了”。

上述各项材料可以看出，一般地主对减租是反对的，他们非在政府法令强制与群众压力下出于万不得已之时，是不愿实行减租的。他们为了抵抗减租，煞费心思，想出了许多办法来和农民斗争，包括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洋洋可观。这些办法，在减租运动的第二阶段确曾起了一些作用，使某些农村屈伏〔服〕和吃了亏，但当减租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是说当政府严格执行减租保佃法令，特别是农民已经发动起来向地主斗争的时候，这些办法就大都被农民所粉碎了。在去年及今年的减租运动中，上述地主的这些花样就相对的减少了，而凡是减租运动深入的地方，地主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受了相当打击，发生很大变化，在经济上地主的封建剥削被削弱了，迫使许多地主大量出卖出典土地，如绥德延家岔十三家地主中，有十一家出卖了土地二百三十四垧，典出了一百七十七垧，占其现有地的百分之三十；又如葭县木头峪地主苗庆保近年出卖土地四十余垧，占其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又如米脂杨家沟地主于去年亦纷纷出卖土地，这种情形在绥德警区是相当普遍的，在陇东也发现许多地主出卖土地。有些地主由土地剥削转入商业投机，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着的趋势，如延家岔十家地主有八家暗中做生意，陇东的地主刘克武卖了三顷多地

做黑货生意。又有些地主感到土地的不可靠，想把土地卖掉换成白洋存下，认为地是负担，而白洋比地可靠。在政治上地主阶级过去的特权显然在崩溃着，当地主不能利用其土地压迫、束缚农民，而农民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地主的特权就不得不丧失了，如像葭县木头峪地主被斗争后，农民们说：“地主灰溜溜的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只会吸烟。”他们既不能用收回土地来恐吓农民，也不能用改变租佃形式来加重剥削，威胁、利诱以及额外勒索等也均使用不上了，于是地主不得不在农民面前低头，如关中同宜耀把最坏的地主李万昌由群众告发加以十石细粮处罚及坐禁闭，释放后自动退了十张□租约给十家债户；又如马栏区减租深入后，地主对农民的态度起了变化，如地主陈彦顺听见政府派人来调查减租，农民又组织了农会，他便把佃户史子明叫来（他曾收回史的地和房子）很和气的说：“好贤侄哩，地保种去，我七十多了，还能活几年，你给我我也不种，房子你要修尽管修，人家怎么办，咱怎么办。”

这个陈彦顺可以看作减租运动深入后相当一部分地主的典型代表。但也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地主代表。如葭县店镇区的刘争先，陇东庆阳的刘克武，前者是在减租斗争后虽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但心怀不满，对我们政权和农民更加愤恨，仍时刻在暗中进行反党反民主反农民的阴谋活动；后者则因减租给他打击的力量还不大，故其反政府反农民的活动终未停止。至于在减租运动尚未深入的地区，地主当然还有更多不死心的，他们不愿勾帐，不愿换约；有些地主有两

本帐，一本应付公家，一本则留待将来“那末〔么〕一天”。

四、减租运动中的农民

未经分配土地区域，地主占有的封建性的土地阶级关系，必然使减租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减租运动的第一阶段农民的这种要求就是很明显的。但因当时国民党顽固政权的阻挠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能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减租斗争，只有在过去土地革命影响深刻（如关中个别地区）或党领导特别强（陇东个别区域）的个别区域，自发的实现了一些农民减租的要求，因此这时一般农民对我们，还是只有“不打人，不骂人，对老百姓好”的感觉，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

到了减租运动的第二阶段，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减租法令也颁布了，这时在农民中曾掀起很大的欢庆的情绪。当减租的法令传到农民耳中的时候，农民们就纷纷的说：“好命令”，“政府要能这样做，穷人才有活路。”庆阳三十里铺一个佃农说：“我们早就等着公家来减租，虽然口里不讲，心里谁不是这样想呢？”这话可以代表一般农民的心理。特别是对于“二十八年①以前欠租一律豁免”一条，佃户们更加高兴，都说：“这一下把万年的帐去了，咱们翻身的日子到了”。可是这个期间一般农民是等待着政府来给他们减租，并未设想到自己动手起来减租，农民们普遍有一种顾虑，就是“减了租，地主抽地怎么办？”“陈租免不了怎么办？”许多农民说：“减

① 指民国二十八年。

租好，就是怕地主抽地。”这是当时农民普遍的呼声。果然在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二年某些农民减了租后，地主们便把他们的地，或用改变租佃形式等方法，更加重对农民剥削；地主对减租农民来了一个反攻，使农民租未减成，地反失掉了。甚至个别农民因减租坐了禁闭，受了处罚，他们等待党与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来对付地主，援助农民，可是这时农民们又看到政府正闹“三三制”，地主代表一个一个上台了，而对于地主在减租中种种违法行为，未加打击，结果使许多减租的农民灰心失望，并对党和政府是否代表他们利益发生怀疑，所谓“山羊绵羊之分，还是谷草莠草之分”，“政府怕地主，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等的论调，就是这时在群众中发生的，于是影响所及，使许多地区农民在地主抽地倒佃等威胁下，不敢减租了，还有一些佃户不得不听地主的话，和地主串通应付政府，形成相当普遍的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有些农民则秘密向政府要求减租，减了租后，又对地主说：“不是我要减，是公家逼得没办法。”这已算是当时农民对减租比较积极的态度。有些农民坚决执行减租，反而吃了大亏，如侯进减租的故事，即为明显例子。

庆阳县新堡区三乡农民侯进租冯家（冯唐、冯汇）地九十亩，一九四一年他按三七交了租，地主就要抽地，侯进不答应，冯家非抽不可，于是就告到县上，裁判员说：“大会决定叫把地抽回去。”侯还不服，案子又转到县府李秘书跟前，李秘书过堂判决：“租子要减，地不能抽回！”次年二、三月，地主又告到田科长（田绍锡）那里，田科长将侯进传来，没问话，

就把侯进押起来，过几天就判决：“侯进把地退给地主。”侯进当时应承了，但心中不悦。七月间又把麦地种了十几亩荞麦，地主又告到县上，政府把侯传去，没问就判了二个月生产，荞麦判给冯家收。后来冯家觉得这样做不大好，才要侯进把荞麦翻了，他种麦子。

侯进至今提起这事，还恨恨的说：“唉！……反正财东家说话有人听，财东家说啥就是啥，还有什么说的？……”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上告呢？”他说：“咱做错了，还告甚呢？咱违犯了政府法令，唉！反正不减租也没有这回事，你们看不减租的地都种的好好的，这里没减租的多着呢，都不敢减了，咱减就要判二个月生产，谁还敢减呢”。这个乡的农民对政府处理这件事非常不满，都说：“减租是惩了穷人。八路军现在向财东，和过去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地区没有减租，或者是明减暗不减，政府检查时，地主、农民都说减了，而实际上都没有减，或减了很少一点；农民对地主的畏惧没有扫除，甚至有些地方更加害怕地主了。

一九四二年冬及一九四三年春，由于党和政府坚决采取保障农民佃权和坚决贯彻减租的政策，并采取发动与组织农民进行减租及对某些顽固地主斗争的方针，于是农民对减租的积极性才真正被发扬起来，开始形成真正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如葭县店镇区群众的减租斗争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葭县店镇区过去未彻底实行减租，今年春天，在该县县委和区委领导下，发动了柠牛沟（四乡）、木头峪（五乡）及刘木瓜沟（六乡）等乡群众的减租斗争，斗争由柠牛沟开始，当区上干

部调查该乡减租情形时，地主们还说减租法令废了，后来集中力量在佃户中调查，经过说服与强制（不说要坐禁闭）后，农民才说了实话，知道没有减，或少减了，于是开租户会，进行宣传鼓动，并决定对不执行减租法令的地主给以处罚。随即开租户大会，到四十多家租户，地主也参加，由乡长宣布开会，说明减租法令一定要实行，地主多分了粮要退出来，并要受处罚，当即提出地主张慕宽多收租一石七斗，应罚多少？群众说：“罚九石”。有说“罚八石”的，后来决定罚八石一斗。又提出张慕敏多收租，决定罚九石五斗；张慕谦多收租罚二石；同时租户李树枝因他多给地主分了二石六斗粮，他只报了一石六斗，经群众斗出后，决定把这一石粮分给大家（后来把他的租地抽出十二垧给别人种了）。其他地主虽未处罚，但进行了借粮，地主张慕信借了五石（群众要罚，区上干部制止了）；张德耀借了二石，张国标借了一石，中农张慕承也自动借出一石。处罚地主与借粮后，当场提出成立减租会，全场一致赞成，举出五个农民为委员。下午退粮，先背罚粮，没有石渠，佃户们一个一个都自动来了，有些没地种的穷人也来了，都挑着口袋、拿着斗，等到减租会负责人来了，就一齐去地主家背粮。口袋不够，向工厂借了二十多条。工人们拍手称贺，农民情绪非常热烈。共退了多分的租粮十五石，背了罚粮三〇点一五石，借粮四石。张慕信五石借粮，区干部决定给三石黑豆，二石谷子，张不肯，说没有谷子，后来查出有谷子而且多，在群众愤怒下，又决定把五石借粮变成罚粮。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起来了，都说：“一夜不睡觉

都不要紧。”农民们为庆祝胜利，杀了一口猪，吃了四斗小米，“一百多农民美美的吃了两顿”，“可是那些地主看也不看，都在家里睡觉去了。”梓牛沟减租斗争后，原拟继续在贺家沟发动减租斗争，因未调查清楚，改在木头峪发动减租斗争。发动方式是采取各乡联合减租斗争的方式，目的为了（1）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2）教育群众认识自己力量；（3）利用群众集合发动生产。区干部分别在各乡一面调查，一面宣传、号召农民于二十七日一起到木头峪退租子，并说“谁不去，地种不成，这是政府命令。去时要带口袋”。农民中还有许多怀疑恐惧的心理，经解释鼓动后，有的有了勇气，有的还是半信半疑，有的抱着勉强态度。但党的支部和小组都起了作用，于二十七日把农民们带到木头峪来了，先后到了六个乡的木头峪租户农民一百多人，便召开各乡租户联合大会，选举主席团，领导减租，当即登记各乡农民给地主长装租子的数目和算帐，化费了两三个钟头，查出苗庆渥多装了二石一斗七升，苗庆宝长装了四石多，经大会讨论说明长装租是地主之过，应当处罚，又经群众公议决定罚苗庆渥二十石，罚苗庆宝二十石。群众又提出张子珍、苗庆谷也要罚，被主席解释制止了。旋即当场成立减租会，举出五人负责。晚上农民们一夜不睡，由减租委员领着到苗家屋里装粮，一夜没有装完。第二天早上又装，把苗庆渥家的粮装完不够，又要苗庆渥折成钱，苗庆宝不在家，把门打开，没有粮食，把他卖地的钱折成五石粮，不够，又把公家罚粮拿出三石多分给佃户。早饭后，又开算帐大会。为了庆祝胜利，援引梓牛沟前

例，拿罚粮换来一口猪，买了一百多斤白面，吃了一顿“活涝〔饴铬〕面”，从早上一直吃到下午，农民有的说：“吃美了，顶过一个年。”有的说：“唯木头峪做得好，家里多少没有吃的，这回可顶事了。”又有的说：“罚倒了，木头峪的地主都灰不溜溜的。”甚至个别农民问乡上干部：“地什么时候分呢？”二十八日所有到木头峪的租户，都纷纷向地主算旧帐，区上干部无法制止，迫得某些地主给农民写了欠条。二十九日开了租户和地主的联合会，由县主任讲话，结束了斗争。

木头峪减租斗争后，刘木瓜沟的农民也起来了，这乡是过去受过土地革命影响的，农民斗争情绪很高，他们在木头峪斗争后，便自动的要求要斗争他们本乡最可恨的地主刘争先，很多租户不断的来找乡长和支部负责人，他们说：“我们可等不得了，非斗争刘争先不可。你们看怎么办？”于是支部决定先要刘退租，不退再说，同时向区上请示。第二天刘争先经过其叔父请支部书记吃饭，并说：“木头峪牛沟的肉已吃了，我的不知几时吃？”支部书记回答说：“你若退了粮，保不吃你的肉”。刘争先听了这话，第二天就退粮，但不全退，只退一部分。又活动某些租户给他写“按四六分了”的执据，并要租户们打手印，租户们都不肯。这时租户们找乡上干部更紧了，于是支部商得区上同意，决定斗争刘争先，并罚他二十石粮。支部同志分别在群众中以木头峪斗争胜利的故事，动员租户起来斗争。许多租户很快就积极起来了，连向来很胆小的农民也动员起来了。接着区长也来了，外村租户也来了，就进行统计各租户三年给刘争先长装的租子，计共三十

一石多，给其堂兄弟刘丕先长装的租子二十石零九斗。召开租户大会，到租户五十多户，主席宣布：“刘争先不执行减租法令，三年长装租子三十多石，还倒地抽地，不合道理，应该罚。”群众一致呼“同意”。主席问“罚多少？”有人说：“罚三十石。”这时有些倾向刘争先的农民就起来说话，有的说“减上五石”（马德超），有的说“少罚一些”（马恩来），有的说“不要罚，由政府办”（马恩丕），有的说：“退了粮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罚人家？”（高福鸿），刘争先后母的儿子李浩说“啥？这么个会，……”进行捣乱会场的活动。主席即说：“把捣乱会场的李浩捆起来！”又有人喊“请把马恩来也捆起来！”群众都站起来了，有的即找绳要捆李浩。这时刘争先又出来说话：“事是我的，不要捆李浩，捆我。”说着上前受缚。主席没命令，群众不敢缚，站住了。刘争先当场发表演说，说他父亲如何行善、救人等等，又说“都是门跟前人，罚是应该，就是我出不起”等。群众愤怒了，都嚷着说：“你出不起谁出得起？”刘才不讲了。当即议定罚刘争先二十石，罚刘丕先十五石。随即成立六乡减租会，举出七个人为委员，散会。散会后，经减租会与区上干部商议处罚李浩等人，结果决定如下：

1. 李浩，因其捣乱会场，抽其租地三垧半，罚黑豆四斗。
2. 马恩来，进行破坏活动，罚黑豆四斗。
3. 高福明，平日即反过减租，这次说“不该罚”！抽其租地二垧。
4. 高福有，平时和其兄福明一样反对减租，这次又说

“少罚些”，①

5. 高友明，这次开会通知他没来是有意的，抽地三垧（外村租户）。

6. 马恩丕，在会场说“不要罚”，是不对的，给了个批评。

当即将抽下的十垧半租地另分给没地种的人种了。晚上和第二天继续背粮，罚粮退粮起够以后，接着就退粮，把刘争先仓库都扫光了，还欠十一石，打了欠条，规定今年秋后扣除。斗争会胜利后，群众热闹了两天，杀了一口猪，吃了三顿，吃饭的七八十个农民，大家都说：“咱又胜利了，有办法。”

类似这样的农民减租斗争，去年及今年在葭县其他区域，在米脂、绥德若干区乡，在陇东、合水和庆阳的个别区乡（详见减租斗争调查材料），都曾有过的。凡是经过这种群众有组织进行斗争的地区，减租工作就做得彻底，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为发扬，他们得到佃权的保障，有了自己的组织，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再不怕地主了。地主的一切压迫剥削农民的花样都很难用上了。（群众）也更加相信了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这种减租斗争给了农民极大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革命。

可是像这类从下而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斗争，在所有减租区域中还占少数，而多数地区是采取从上而下的斗争方式，即由政府出面检查减租，或用个别调解方式

① 此后原文缺字。

令收回土地之地主退回土地，令多收租之地主退粮，或由政府处罚一、二顽固地主，以刺激农民情绪。敢于出来向政府控告不减租的地主，由政府予以解决。如同宜耀曾发动群众告发了一个最坏的地主叫李万昌，政府把李押来，罚了十石细粮，并在群众大会公布其罪状，随即禁上群众退了长装的租子。在这一案件影响下，就有更多的农民到政府来解决其减租问题，有的翻地，有的退租，先后达数十件。又如在绥德双湖峪政府组织减租委员会，派人到各村调查，发现未减租案子二十五件，均由政府一一予以解决，此后即有更多农民自动到政府告地主，不断的到政府来解决其租佃问题。这类减租斗争方式，在绥米、陇东及关中是相当普遍的，尤为没有党或党的力量薄弱的地区所采取，在这些区域，农民虽然没有如上一种区域发动起来，但其情绪是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在绥、米及陇东的若干区域，农民还进行了勾帐换约运动。这件事对农民的影响极大，有些农民把这事看得比减租意义还大。

减租后第一个结果，就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情绪。凡是减租进行彻底和农民有了组织的地区，农民都在政府生产号召下积极参加生产，减租会也积极领导生产，因为减租会之类的组织，本身就是劳动力集中的组织，组织领导生产非常方便，加之佃权有了保障，佃农对土地的经营增加了兴趣，如米脂印斗八乡的租户会，全乡四十九组变工队，绝大多数是租户会的人领导着。这个乡的佃农过去因为地常有被抽的

危险，所以溜岸修畔，都没心情。当该乡组织起租户会后，地不准动了，租也减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大大的提高起来，溜岸修畔的比往年多了，粪也上的多了，同时农作法也细密了。在该乡租户调查会上，他们估计今年如果年头差不多，可比往年每垧地多收五升粮食。如果他们这个估计正确的话，那么该乡在租地上即可增加粗粮五十斤九石，若以全边区租地来计算，那数字就更可惊人了。霞县的减租会，也是大多数都参加领导生产，减租会任务上，就有一条努力生产。这种减租与生产相结合在今年春耕、夏耘中起了很大的积极领导作用，如犛牛沟减租会五个委员，有一个委员专门领导变工队，一个委员专门领导开老坟地，而实际上五个委员都对生产是很关心的。许多佃农说：“生产上没有问题，现在还不好好的生产，还等什么呢？”又说：“庄稼是做美了！”由此可知减租对生产的关系是如何的大呵！

在关中也有这种反映，如佃户吴先春过去地老是不上粪的，石头也不拾，减租以后，石头也拾了，地也上粪了。佃农林仲宽过去对种地不当事，减租后，今年将地修成堰地了。佃家何善广把一块地修成了水地。佃农王金山说：“这个时候是穷人伸腰的时候了！”

减租后第二个结果，就是农民的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租地较多的佃农，发展的更快，如米脂印米〔斗〕八乡佃农刘向恩，一九四〇年前自己没有典地买地，减租后三年内就买入五垧地，典入一垧半地。该乡十多家较大的租户，差不多都买进了土地，或是新买了牲口、或是新建筑住宅，只

有郭俊常因妻亡害病，没有新的发展。

又据张家峁底（自然村）调查，农民减租后的买入土地如下表：

成年份	富农	中农	贫农		其他
			户数	地数	
买 1940 年			1	3	
进 1941 年			1	5	
地 1942 年			2	3	
统 1943 年			3	23	
计 合 计			12	34	

减租后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大大推动了乡村工作。由于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组织性也提高了，所以他们就积极的来参加乡村一切建设工作，如葭县柠牛沟支书说：“过去我们这乡上的工作实在难办，人家（指地主）势大，穷人又不团结，工作下来就办不好。现在就不同了（指今春斗争地主，组织减租会后），不管什么工作，好办的多了，庄上的人见了我们也不同了，穷人更不同了，他们见了我们（减租会的负责人）总是叫吃叫喝的。”刘木瓜沟的支部书记也说：“自有了减租会和减了租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大得多了！乡上一切工作都好办了。”从这两个支部书记谈话中，可以看出一般的情形。

五、减租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一) 思想问题

在去年和今年的减租运动中，虽是许多干部已认识到减租的重要，并积极负责领导减租，但仍有一部分干部对减租问题认识不足。他们以为“减租是农会的事”，党政干部可以不管；他们以为“征粮重要，减租明年再说”；或者仍和过去一样，对减租工作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调查不研究，只是宣传号召一下就算完事。这些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减租在这些区域的重要意义，不了解这是未分土地区域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事实证明，在这些区域如不把减租工作做好，就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而如不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则生产不能加强，政权不能改造，反奸斗争不能展开，党的组织也无法巩固与发展。反之，如真正彻底实行减租，则农民的积极性立刻就会发扬起来，生产情绪就会马上提高，政权工作就会很快深入，反奸斗争也就易于推动，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就会不断的涌现出来，成为吸收党员的最好对象。这是去年及今年减租运动深入的区域所证明了的，因之必须继续在干部中进行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对此问题有透彻了解，懂得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去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去加强与深入其他各项工作，在目前特别重要的是反对特务，改造政权和加强党的力量，这是思想认识上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思想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地主的问题。在去年及今年减租运动中，有些干部还表现出怕得罪地主的思想，以为减

租运动搞得太厉害了会妨碍我们和地主的统一战线，因而畏首畏尾，不敢放手进行减租斗争。这也是错误的，拿去年和今年的减租运动的实际情形来看，如不与某些地主进行必要与适当的斗争，减租运动是不可能贯彻的，这种对地主必要与适当的斗争，不但贯彻了减租运动，也并没有使我们和地主的团结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个别地区由于群众发动起来，迫使某些地主更易于团结。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对地主进行无限的斗争，也不是说对任何地主都要进行斗争，因此即使在和地主斗争中，我们也不应忘记团结的一面，对地主过“左”的斗争才是我们所反对的；但不打破有些干部中对地主的这种“只有团结不要斗争”的思想，减租运动是不能贯彻的。

思想上的第三个问题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问题。去年和今年减租运动中在若干地方已经建立起这种群众观点，因为他们在减租中采取群众路线，但在好些地方也还单独依靠少数干部的积极性去进行减租工作，他们站在群众外面宣传、号召减租，而不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斗争，这是他们在思想上缺乏群众观点，不懂得在减租中采取群众路线的重要。这个问题在今后减租运动中也是需要加以解决的。

解决了上面三个思想问题，则今后减租运动的贯彻就有了保证。

（二）减租斗争问题

各地的减租斗争一般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是葭县、米脂某些地方的群众斗争，是以一个行政

村、一个乡甚至几个乡租户群众为单位的减租、退租、勾帐、换约等等的运动，它是自下而上的群众发动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法令的配合。凡是这种地区，都打击了几个坏的地主，减租也减的彻底，群众也真正发动起来了。

第二是比较小型的斗争。一家地主的佃户共同起来和地主算帐退租，例如陇东有些地方所发生的。它的规模虽然不大，卷入的群众虽然不多，但若是群众行动和政府法令有了配合，取得胜利之后，可以影响多数佃农，推进一个地区的减租运动。

第三是关中同宜耀和警区、陇东某些地方所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检查，群众告状，政府出来作主处罚坏的地主。这种方式在没有党的组织地区也是可以使用的，它的缺点则是往往不能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减租运动不会有大的开展，而方式若是不适当，反而有时造成政府单方与地主的对立。

上述三种斗争方式，主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形适当灵活运用，但应以第一种为运动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发动群众减租斗争时，斗争的对象不可太多，如有的地方所形成的每个地主都罚是欠妥的，因为这样就可能迫使所有地主团结起来和我们对立。处罚地主或是退租也要按违法情节度量地主力量适当处理，如某些地方地主长装租三几石，但加以二十多石的处罚也是可以考虑的。至某些地方给地主戴纸帽子游街的方式更是不妥当的。在和地主斗争中对某些倾向地主或跟地主跑的落后农民，有些地方给他们也罚了粮或抽了地，这也是过火了一点。对这些落后农民，主要

的还是应当采取说服批评与必要时斗争的方式为宜，一般的不应给以罚粮抽地这一类的处罚，使争取这些农民的工作更加发生困难。

有些地区减租运动已经开展，地主已经受了一下打击，群众也已经发动了，在这种地方不是继续斗争下去，而是适当的收场，对于打过的地主还要拉一下，使他能生活下去，而不使他完全失望或跑掉；对于群众的过“左”行动要加以纠正，不过在纠正中间要维持农民现得的基本利益，且向农民耐心解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无论如何要保持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其他减租运动没有开展，地主气焰未受到打击的地区，则中心任务还是以全力发动群众的减租运动，在这种地方主要的不是防止“左”倾，而是坚决反对右倾。

（三）减租组织问题

去年以来的减租运动中，各地曾恢复了农会，或成立了各种名义的领导减租的组织，它们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由区乡政府成立的减租检查委员会等等名义的组织，参加者多为区长、区委及聘请的佃农及地主等等，它的工作是帮助政府检查减租情况，这不能算作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关中分区的大部地区在减租初期以及警区的双湖峪等地的减租组织都属于这一类。这类减租组织虽然也有起作用的，可是它只能算作政府的辅助机关，而大多数地方是不起作用的空架子，既〔即〕使他们作了些减租工作，在群众看来也是政府替他们减的，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委员会等等看成群众自己

的组织，因之在这类组织之下就不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的减租斗争。

第二类是以乡、行政村、自然村为单位成立的减租会、保地会、租户会、农会等等名义的组织，其参加者包括本乡本村大多数的佃农和半佃农，例如葭县、米脂的许多减租组织都属于这一类。虽然铁饭碗这类形式的组织也不免有些是空洞的，没有发动起群众斗争，但各地的经验都证明只有这种形式才适合于领导绝大多数农民参加减租运动，是减租中最适当最好的组织形式，应当广泛的发展起来。

减租会的参加应当是自愿的，绝不可勉强，而且应当尽可能包括广大的佃农和半佃农；有的地方不许中农参加是不对的；自然它的领导成份应当保证为积极觉悟的贫农而且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

这种组织在开始可以从以自然村、行政村组织起，在减租运动开展的中间，可以联合成立一个乡的组织，这样便利于支部和乡政府对减租会的领导和互相发生联系，进一步推动减租运动。

减租会的任务，如党中央土地政策的决定所指出，是从下面发动广大群众协助政府实行政府的减租法令，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减租会代替政府，只有在某些乡村政权把持于地主阶级之手而没有改造过的地方（这样政权应当在减租运动中间改造之）减租会的活动才不应被这些钻入政权的地主阶级分子所限制。再中央决定上对于减租会的工作方式上指出：“应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专断的

方式。”有些地方规定乡政府解决问题都必须经过减租会同意，有些地方的减租会作出决定处罚地主和佃农而不经过政府批准，一般说来是不妥当的，在减租运动开展的地区应当说服农民加以纠正。

在政府方面应当尊重减租会的组织，尤其在群众尚未觉悟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在解决租佃问题时应当多方尊重减租会的意见，但不应把减租会看作驾乎政权组织以上的组织。

在葭县等某些地区，减租会自动领导农民协助政府进行生产、妨〔防〕奸与战争动员工作，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发扬，这是一个极很好的创造，我们应当保持群众这种积极性，政府应当把减租会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群众支柱，并把这种创造在各地普遍化起来，使减租会之类的群众组织真正成为乡村政权的群众支柱。

(四) 保护佃权问题

在边区未经分配土地地区，习惯上农民对于租地已经有了一定的佃权，但是它并未得正式法律的承认，边区政府租佃条例和西北局减租指示附件上关于保护佃权的规定正是正式在法律上承认这个已存在的佃权。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精神，我们对于土地，保护地主的地权（即土地所有权），必须是在确实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土地使用权）之后，正像对于地租利息，我们使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必须是在确实减租减息之后。

地主阶级强调它一方面的土地所有权，否认农民的佃权，我们若是不帮助农民坚决出来主张自己的佃权，那么广大佃

农的生存命脉——土地就完全由地主随意摆布，为所欲为，农民在时刻失去土地的威胁下，是绝对不敢起来要求减租减息的。在边区的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土地一般是比较缺乏的，佃农的第一个要求是“有地种”，第二个要求才是“少交几颗租子”，若是农民的土地被地主收去，减租又何从减起？！所以许多农民（尤其在警备区）对于“保地”的要求比减租还迫切得多。事实证明，去年以来的群众减租运动在许多地方是由“保地”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保护佃权是开展减租的关键的说法的正确。今后在未展开减租运动的地区，对于地主侵犯农民佃权的行为，一方用群众力量，一方用政府法令坚决予以制止，坚持农民对于土地有一定使用权；对于过去地主打击减租运动收回的租地而为农民群众所寒心的事件，应当翻旧案；对于迁就地主的干部应当进行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减租运动。

佃权的没有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个严重障碍，然土地随时可以被地主收去，所以佃农对土地经营的兴趣降低，不敢好好培养地力，和施行耕地改造，这样影响到收获量的不能提高。去年凡是在警区、陇东、关中农民的佃权得到保障的地区，农民的生产热忱都空前提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在大多数地区所应强调的是保障佃权，但是保障佃权并不就是主张农民的永佃权或是完全否认了地主的地权（土地所有权），按照西北局减租指示和边区政府的租佃条例，

所谓佃权的具体内容主要是（1）一定条件下允许地主收回土地；（2）禁止地主单方变更租佃形式；（3）保障佃农典卖土地的优先权。在某些地区，因为防止假典假卖而完全不许地主典卖土地或是一切租地转移，都必须经过农会或减租会调剂，差不多等于取消了一切土地所有人处理买卖的自由，使得土地的变动停滞，引起地主“这是分（分地）的底子”的恐慌。这在农民佃权已得到保障地区也是应当说服农民加以纠正的。

（五）减租主要对象问题

减租的中心对象是未分土地区域的地主，而不是要在所有区域和所有租佃土地中都要实行减租。

去年在边区一些经过分配土地的区域，也进行了减租运动，而且一样地把它当作了工作的中心，例如警备区的清涧、吴堡和绥德的枣林坪等地。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类地区地主的土地早已分配给了自耕农民，即有租佃关系存在，基本上也都属于自耕农间的土地相互调剂，而不能看作封建剥削，所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工作就是“费力不讨好”和“无的放矢了”，如政府过分干涉，其结果势必使得农民间土地自由调剂发生障碍，对于生产不是有利，而是有害。

经过了分配土地地区，应斟酌当地情况规定一定租额，而且在发生租佃纠纷时，政府限制过分剥削虽是必要的（尤其在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但今后主要还是让农民自由处理，自行调剂；对于边区政府颁布的租佃条例，应当灵活运用，不可多事干涉，尤其不必把减租当作工作中心。

其次即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也有一部分租佃关系，属于自耕农民之间相互调剂土地的性质；又有的是抗属、丧失劳动力的农户或是迁移外出的农户以少量土地定租、活租或伙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必要他们一定照条例减租，而应当任凭租佃双方自行处理方为合理。

（六）减租率问题

首先从定租，各地对于定租的减租办法和减租率都是不一致的，即在同一分区的各县也有的相差很大（如关中的各县）。因为各地的自然条件〔件〕、土地产量、土地人口比例□□□□□□，减租历史的不同，所以我们仍主张各地不必强求一致。不过应当指出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一部分地区去年把过去的三七、对半减租改为二五减租是错误的。这些地方过去颁布的减租率已经行之数年，虽然还没有贯彻到底，但已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地主阶级也没有表示重大异议，在此情况下，应当认为这是已成事实：现在由我们出面把农民既得利益要回来还给地主，因之招致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这是咎有应得的。边区各地的减租率不一定限定于二五，而地主所得地租也不一定就是千分之三七五，这从上面定租租额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陇东和关中原定减租率，按照当地的条件来说并不算减的太多，而有些是经过当地参议会议决的议案，随便更改也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各地应当维持过去合法的减租率。

警备区对于减租按半、歉、平、次平、荒五等年成不同减免办法是非常合理的，似乎应当推行于陇东（关中减的较

多，不一定推行），这样既不与去年二五减租的决定相悖（丰年仍可定为二五减），又可平复农民的不满情绪，地主阶级没有什么话可说。（减租率可按陇东具体情况拟定，不必全照警备区一样。）

其次关于活租、伙种问题。边区政府的租佃条例草案和西北局去年十月减租指示附件的要点之下——说是把活租与伙种严格分开，而且规定前者要减租到地主方面所得最高不能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

因为活租和定租一样是地主方面只出土地，所以各地应使活租与定租（减租以后的额数）维持大致相等的额数。过去各地对于这一点都往往忽视了，因之发生了地主纷纷收定租改为活租，加重了对农民剥削的事实，而且把它变成抵抗减租和压制农民的有利武器。所以，不把活租这个漏洞堵住，减租是不会彻底的。自上述条例草案颁发之后，证明各地对这点的了解还是不足的，有的还把活租混同于伙种按四六减（如警区），有些地方则对活租未认真减。

今后的减租运动应当坚持对于活租的减租使地主没有取巧的余地；对于过去地主强迫由定租改为活租的租地在农民要求之下应当翻案，仍改为定租。

活租和伙租之后，已见上面的分析，是以地主是否供给生产工具来区别的，而畜力又是生产工具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凡是“伙种”地主只供给肥料和种子的，今后应当仍按活租的规定减租（理由已见第一部分）；各地对于荒年收获过少定租免租〔减〕的规定同样应当适用于活租。

(七)“退租”和“翻地”问题

在去年减租运动开展之后，发现了地主违法长收当年地租，应当坚持叫地主把长收的地租退还农民，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在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要求清算自实行减租以后历年所缴的地租，并且要求地主把历年所长收地租全数退还农民。这个要求如果出之群众的自愿自觉，或是对付的是为群众所痛恨的地主时，我们应当支持群众这个要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发动群众甚至可以帮助群众提出这个要求。不过要考虑到许多地主是没有力量退出三年长收的地租的，若把“退三年租子”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势必逼跑或逼死地主。“在这些场合，党应以统一战线精神去教育农民。”（去年西北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应当适时的说服农民群众，为了争取地主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必须给地主留一条活路，而不可“逼上梁山”。至于有些地方把破落地主中出租的土地同样清算，退出三年长收的租子，退不出就打欠条，发展下去会造成农村中的不安，更应当纠正。

其次，一九四一年以后，地主为了报复减租，曾大量撤佃倒佃，侵犯农民佃权，其在去年减租运动开始之后，地主收去土地一般仍应归还原佃农耕种；强迫改为活租者再改为定租；原地已归另一佃农耕种者，地主应设法从自己土地中另寻一块土地租给原佃户。这中间原有经过我们干部解决而为群众所最不满的旧案，也应当翻案，公开批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必要时并向群众宣布之。但是这种“翻地”，不应翻的太远（一般不宜超过一九四一年以前），因为一块耕地往往

牵涉几家佃农的生活问题，普遍重新调整往往会造成许多纠纷，反而引起农民的不满，这是应当注意到的。

（八）欠租处理和“勾帐”、“换约”问题

边区租佃条例第二十九条“民国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欠租一律免交”的规定，对于解除未经分配土地地区广大佃农的封建束缚，并发动其生产与拥护政府的积极性具有极大意义，有些地方已经向群众宣传了免除欠租，而且发动了群众与地主间的勾帐换约运动，但还有许多地方对欠租问题重视不够，既未向群众宣传解释，也未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勾帐换约。

所谓“勾帐”有两重作用：第一是把民二十八年底以前欠租无论交足与否一律勾消；其次是实行减租以后依法减去或免去（因歉荒）的地租，在大多数地主帐上仍作为欠租登记，这在地主方面的企图是明显的，就是希望边区政治局面发生变动时仍旧可以向农民索取这笔减免掉的地租，而在一部分农民看来，虽然眼下少交了租子，将来怎样还不一定，因此这笔减免掉的欠租必须完全明确取消，而且要向地主说明将减免的地租作为欠租是违法行为。

“勾帐”应当当着地主和农民的面把帐算清勾掉。有的地方曾发现地主造假帐或写两本帐，或推托帐不在等等欺骗手段，若发现这种行为，在说服（后），仍不悔改时，可以用法律制裁之。“勾帐”之后继以“换约”，就是由地主把旧租约退还农民，重新订立租约。租约的形式可按当地习惯，但应当写成两份，由租户、地主双方签押，每方收执一份，并注明“旧欠租粟已全部交清”。

至于实行减租之后农民对法定应交地租尚未交清的，一般应仍作为欠租。

（九）土地变动及对其政策问题

自从一九四一年以后，边区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地主，开始大宗向外典卖土地，尤其在警备区表现得最明显，其他地区或只略具象征，或情况不明，但减租运动若是发展下去，像警区这种形势必然多少也会发生的。

警区的土地变动的情况和趋势在《绥米土地初步研究》一书上已经作了一些分析，最近的报告说明这种趋势不是减弱，而是在加强……。党对土地变动的总的方针应当是利用这种形势帮助农民取得土地。现在对这个问题分下列三点说明：

1. 土地的买卖。在警备区是地主大量向外卖地，而买进土地的则是中农和贫农。陇东同样有此趋势。这应当看作减租政策下封建经济初步削弱和农民经济状况改善的结果。我们的政策应当是扶助佃农买得土地，办法是保障佃农对于购买土地的优先权（租佃条例），另一方面经过减租会或农会等组织提倡农民间的信用合作，在今天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可以倡导粮食的低利互助借贷和民间固有的信用合作形式（如“请会”）。

2. 典当土地。它今天的趋势和土地的买卖是相同的，由地主向中农方面转移。党同样应当帮助农民典得土地。除了上述两项办法外，还应当禁止出典土地者当年回赎，并且在农民中提倡较长期的典当契约（如三年以上）。

3. 典当土地的回赎。在警备区的情况，是在抗战之前，典

出土地的多数是贫农，而典进土地的多数是地主、富农；在抗战之后，尤其是减租之后，典出土地的绝大多数是地主，而典进土地者多数是中农、贫农。自从货币贬值之后，从前典出土地的贫农利用机会赎回了一大部分典地，但是另一方面地主也利用了货币逐年不断贬值的差额而将抗战后典出土地赎回又行典出，典出又赎回，这样反复进行投机，所以一部（分）典进土地的农民也在这中间吃了很大的亏。（自然这里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中、贫农之间或地主之间相互的回赎典地，这在抗战前后都有）。

因此，（1）在典出人为贫农，而典进人为地主时，而党应当扶助农民赎回其典地；凡是在典出土地人多数为贫农的地区，对于典价货币折算订定过高比率是不妥当的，尤其援用国民政府民法典地超过三十年或六十年时效不准回赎的规定更是错误的。

（2）在典出人为地主而典进人为农民时，党应当尽可能保留土地于农民之手，这一点的精神和保护佃农的佃权正是一致的。应当利用边区政府通过的关于典地纠纷处理办法，“回赎典地严重影响典权人生活时，政府得加调处”的规定，限制地主回赎典地。对于地主进行土地投机更应当严厉禁止。

（3）在典当双方公为农民或公为地主时，可任凭自行处理；在发生纠纷时，在双方互相让步下调解之。

（十）关于减租法令问题

边区政府去年颁布的《土地租典条例》（草案），经过减租运动的实践，已证明其适合于边区的情况。各地区在减租

中所发生的缺点，有一些就是由于没有详细研究这个条例与充〈分〉使用这个条例。今年各地干部应当配合当地实际问题、当地减租法令，逐条研究这个法令，并学会如何使用这个武器发动群众的减租运动。

其次各地应当根据这个条例的原则拟定一个本地区的减租实施办法（如关于减租额及其他当地的特殊问题）。警备区曾于分区减租条例之外，去年又发布了几个《补充办法》、命令等等，使下级干部无所适从（在这些办法和命令中有些地方又是不妥当的），今年应当将之一律取消，拟一个简明扼要的《分区减租办法》（凡边府条例已有规定的不必重复），以便下面能统一执行。

六、结论

（一）边区未经分配土地区域，占全边区面积约百分之四十，人口约百分之五十。这些地区绝大部分为抗战前后统一战线环境下形成的，其经济都是地主经济占优势，广大农民缺乏土地或地不够种；地主以定租、出租、活租、伙种及安庄稼五种形式剥削农民，租额都很重，因此，减租成为广大农民一致的要求，成为这些区域一切工作的中心。

（二）自这种区域属于边区范围起，党即不断的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以动员群众。减租运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一九四〇年二月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减租还停留在宣传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政权的阻挠与党内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减租一般未实行；一九四〇年二月以后至一九四二年秋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政权被驱逐，民主

政权相继建立，并通过减租法令，减租开始实行，但没有贯彻，大部分地区没有减租，或形成明减暗不减现象，地主在农民实行减租时或减租后采取各种方法向农民反攻，而党内某些领导同志又对地主“只团结不斗争”的右倾思想，致使减租运动不能贯彻；一九四二年秋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央公布对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政府颁布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特别是边区高干会的召开，大大推动了减租工作之进行，使减租运动走上彻底的阶段。

(三) 减租运动是农民和地主的一个斗争过程，不是和和平平可以进行的。凡是减租贯彻的区域，都是农民同地主斗争的结果（不论采取何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的深度，正是测量减租运动贯彻的标尺。在减租运动深入的地区，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在一定限度内，已从地主的压迫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他们的经济向上发展，他们再不害怕地主，他们更加信仰党和政府，他们的生产热忱与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另方面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被削弱了，对农民的权威降低以至丧失了，他们再不能或少有可能恐吓农民，甚至相反，要和农民讨好了，他们对党和政府表现出很不满，但又无话可说，其中一部分甚至心怀不测，与特务勾结进行破坏活动。而在减租未深入的地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则又有不同，那里地主还可用些办法来对抗农民的减租，在一定限度的〔内〕还可控制农民；农民对地主的害怕心理还未去掉，对减租虽然赞成，但又怕得罪地主失掉土地，往

往徘徊观望，因而他们的生产热忱与政治积极性还不能大大提高，在这些地区地主对农民还有形无形保存着一种束缚，不打破这层束缚，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难大大的发扬起来。

(四)估计去年及今年减租运动在相当大的区域是彻底实行了，定租大部分减了租，活租、伙种也减了一部分。这次减租所以能比较贯彻执行，是因为：(1)高干会后对未分土地区域减租工作之重要性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更明确的方针，加强了党政领导；(2)纠正了对地主“只用团结，不斗争”的错误思想，并同某些顽固地主进行了斗争；(3)严密了政府减租法令，坚决保障农民佃权；(4)发动群众起来配合政府法令，进行减租斗争。这是这一阶段减租运动的新经验，这些经验应当成为今后贯彻减租运动的基本方向。

(五)发动群众减租运动，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即经过支部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以之为核心来发动广大群众配合政府减租法令，进行有组织的减租运动，这在有党组织的地区一般都是这样去做；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即由当地政府或上级政府派人检查减租执行情形，在检查中抓住中心区域与典型事件惩办一、二抵抗减租的顽固地主，以提高群众情绪，达到普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运动的目的，这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薄弱的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即应迅速建立或加强群众组织及党的组织。

(六)发动群众与展开减租运动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必

须选择剥削压迫群众最厉害最坚决抵抗减租并为群众所最痛恨的一、二顽固地主，发动群众起来与这斗争，并用群众力量给以适当打击，以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影响与推动减租运动，此在减租未贯彻的区域是很必需的。但这种斗争应有一定限度，打击的对象不可过多，打击的重量不可过重，打击的方式不可过火（如带纸帽子等办法可以不用），并在打击之后还要争取与团结他们，不要把他们“逼上梁山”，特别在已经斗争过地主的区域，应适当结束斗争，不宜继续斗争下去。当群众发动起来时，某些过左的行动是很难避免的，党一面要保存群众的积极性，一面即应在不损害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用适当方式纠正群众的过“左”行动，以达到既斗争又团结的目的。

（七）发动群众与展开减租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用群众组织的力量配合政府法令，以对抗地主各种抵抗减租的反攻，保证减租之贯彻执行：应当成为乡政权重要的群众支柱和助手。这种群众组织一般的以乡或村为单位的租户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等形式为适宜；它应在当地支部及乡政府领导之下，而不应把它的权力驾于政府之上；其工作方式，也应该是仲裁说服和调解等方式，不应该采取政权化的专断方式。

（八）发动群众与展开减租运动，还必须保护农民佃权。过去经验证明，地主用撤地倒佃来威胁农民不敢减租，是其抵抗减租的重要方式，而农民佃权如真正得到保障，他们就能免去对地主的畏惧与束缚，减租工作就很容易实行了，这

是应由政府法令与群众组织合力加以保障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减租工作的一半。保障佃权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不许地主动地，后一种倾向应加纠正与防止。

(九)在减租动中必须具体灵活的执行边区政府土地租佃条例，减租主要是减未经分配土地区(域)的租，不是无区别的在经过土地分配区域也照样实行；减租主要是减地主的租，而不是对农民之间或有特殊情况者(如寡孤独及抗工属等)也无区别的一样实行；减租率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规定，不是无区别的一律或机械执行二五减租；对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均应一律减租，不是只减定租，而不减活租和伙种。目前特别对于活租要认真减租，按照条例规定，过去的欠租应一律免除，禁止地主讨取欠租；进行换帐勾约运动，地主无理收回之佃地应“翻地”；地主强行讨取超过减租率之租子应“退粮”；地主对佃户之一切额外剥削应严格禁止。各地应依照租佃条例之原则，参照当地具体情况，规定单一的减租条例，并严格执行之。

(十)对减租运动的领导也应和领导其他工作一样，要采取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办法，一般的应在每区抓住一个中心乡村，首先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区，这是最切实具体的领导；不要普遍布置，企图一下子到处做好(如陇东某些地区)。不突破一点，就很难推动全局，但突破一点，不去推动全面，也是不对的(如合水)。减租领导在秋季可与征粮工作配合，在春季可与春耕运动配合，在必要的地区，还应专门配备力量或抽出时间去进行。

(十一) 党在未分土地区域，必须把减租运动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贯彻减租运动中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强生产，巩固政权，展开锄奸，并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为此，必须在减租运动已经贯彻，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地区，抓住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去巩固与加强群众减租团体工作；使之推动与领导生产运动，把减租与生产结合起来；使之配合党政锄奸，把减租与锄奸结合起来；使之协助政权各项工作，成为乡政权的得力助手，并吸收其积极分子参加政权工作，把减租与加强改选政权工作结合起来。最后更应把减租运动上述各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把减租与建设党结合起来；抓住减租运动来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来加强与深入未分土地区域全部工作的正确方针坚决贯彻下去。

西北局行政处一九四四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

一、工作方针与现有基础

在一九四三年机关生产初步总结中，杨秘书长^①对今后生产工作指出十大方针，这是在计划明年的农业生产时应该首先提出的。十大方针是：

1. 农业第一，畜牧第二。只有继续发展农业与畜牧业，才能变荒山为良田，增产粮食蔬菜与肉类，实际的解决了足食生活的供给任务。
2. 供给任务，营业方式。农业与畜牧业的生产任务，是供给机关需要，但农场应改变过去对生产人员的供给制度，改用合作方式，或与群众伙种，实现公私两利的原则，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减少支出。
3. 充实计划性，组织劳动力。根据机关需要、收获时间、数量及现有生产力量，拟定生产计划，组织劳动力，按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

① 即杨清（欧阳钦）。

4.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农业与畜牧业一年比一年扩大，农场与生产人员数量不断的增加，在领导方面应该是集中的，有统一的计划与正确的方针。在经营方面，因生产工具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而宜于分散经营，这种分散除伙种外，仍系小的集体经营，而不同于小农生产。

5. 首长负责，大家动手。对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领导与检查，各机关行政首长应该负责。在生产进行中，除农场主任生产人员外，机关工作人员亦应尽量发挥辅助劳动，做到大家动手。

6. 学习业务，提高技术。积累农业中粮地、菜园的经营管理及生产经验，经常研究试验，使农务与技术不断改进。

7. 建立核算制度，防止贪污浪费。山场长负责，对经费收支、资产保管、生产品的登记、收获与消费量的核计等，均应有计划的进行，严密检查，防止贪污现象。

8. 实行竞赛办法，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生产热情。勤劳有成绩者得奖，怠惰者受批评。

9. 发展副业，注意各项生产的联系合作，如养猪羊可以供给农业以肥料；烧炭、砍柴等均获利很大。

10. 增加业余生产，发挥辅助劳动力，如三九年、四〇年工作人员的农业生产及今年的个人生产，都是得到成绩的。

西北局行政处直接领导下之农场菜园现有邓家沟、二十里铺、大北沟农场三处，枣园及山下菜园两处，共有土地、人员、资产农具等统计如下：

场别 项目		枣园	邓家沟	三里铺	大北沟	山下	共计	备注
土地	山地	9	390	244	313		956	除现有土地外，大北沟与丹志新农流可以开垦。现有土地亩数中租来水地78亩。
	川地	18		45		15	78	
	水地	46					46	
	开秋荒		30亩		210亩		240	
	合计	73	420	289	623	15	1320	
人员	场长	1	主任	1	1		4	另有雇工三人、按伙子的十一人未计算在内。
	队长	1			1		2	
	指导员	1			1		2	
	管理员	1	1		1		3	
	班长	2	1		2		5	
	生产员	6	6		18	1	33	
	伙夫	1	1		2		4	
物资	合计	13	10	1	26	1	51人	
	房屋	9间			9	1	19间	
	窑洞		4孔	3	9		16孔	
	牛马棚	2间	1		3		6间	
	猪羊圈	5间		2			7间	
	水井					1	1口	
	大车	1					1辆	

牲畜	耕牛	2	2	2	5		11头 (7镇)	
	马	2	1		2		5匹	
	骡	1	1				2头	
	驴				1		1头	
农具	镢头	10	5	3	11	1	30	农业生产总结中有详细材料，秋后应再做调查登记。
	锄头	17	10	4	10	2	43	
	铁锹	6	2		2	1	11	
	斧头	2	3		16		21	
	镰刀	1	8	5	10	1	25	
	耙子	5	1			1	7	
	柴子	1	2	1	2		6	
	铡刀		1	1	1		3	
器皿	大锅	1	1		1		3	
	小锅	2	2		1		5	
	菜刀	1	1		2		4	
	桌子	4	2		1		7	
	凳子	9	2		3		14	
	床板	2.5丈	2.5丈		.		5丈	
	毛口袋		2	2	2		6	
	布口袋		2				2	

二、机关需要与生产计划

本机关连同招待所，经常吃饭人数大约 300 人，如全部自给，每年所需菜蔬、食粮、肉类、木炭等供给数量列表于下：

项别	数量	应种亩数	需劳动力	说 明
蔬菜	160000 斤	水地 30 川地 30 } 共 60 亩 山地 60 }	直种 40 人	
食粮	450 石（细粮）	山地 7500 亩	伙种 10 人	每亩分粗粮一斗二升计算。
豆子	27 石	225 亩	伙种 5 人	耗磨豆腐 13500 斤 每人每年吃豆腐 45 斤。
麻子	84 石	700 亩	伙种 15 人	耗磨油 3360 斤 每人每天五钱油
猪肉	5400 斤	母猪 10 口 养肥猪 150 口	5	每人每年吃肉 18 斤。
羊肉	3600 斤	养羊 600 只	5	每人每年吃羊肉 12 斤
牛肉	1800 斤	养肥牛 30 头	3	每人每年吃肉 6 斤
木炭	75000 斤			

以上数字除木炭与蔬菜可以全年自给外，肉类明年可以走向自给；食粮、豆子、麻油只能生产自给一部分，不能全部自给。

关于蔬菜吃用时间、种植亩数、供给数量列表于下：

菜名	亩数	收获量	吃用时间	附注
冬春菠菜	4 5	9000 斤	4. 20 至 5 月底	5月份以菠菜为主
水萝卜	1. 5	2400 斤	5. 20—6. 20	6月份以此三种菜合吃
春白菜	3	4500 斤	6. 1—7. 30	七月份以白菜黄瓜
黄 瓜	3	9000 斤	6. 20—7. 20	同上
西葫芦	1	1500 斤		
芫 萝	0. 5	400 斤		
莴 苣	1	1500 斤		
蒜	1	8000 个		
葱	1	1000 斤	全年	
韭 菜	1	2000 斤		
以上春菜	水地 23 亩	共收春季 吃菜 29300 斤 其他 2500 斤	五月至七月 三个月吃用。	
芹 菜	1	1500 斤	7. 20—9. 15 日	
茄 子	4	10000 斤	7. 20—11. 30	
西红柿	4	20000 斤	8. 1—10. 30	

辣子	1	1000 斤	7. 10—9. 15	晒干全年吃用
豆角	1	1000 斤	7. 10—9. 15	“*”
南瓜	川地 2	3000 斤	十一月吃用一部分	种一部分缩皮南瓜
秋白菜	川地 15	15000 斤		
茴茴白	水地 3	9000 斤		
旱辣子	川地 1	500 斤		“*”以上八、九、十之三个月以“*”格以上的几种菜为主，加一些秋白菜、秋菠菜等，各种菜共收 33500 斤，茄子可吃到十一月底。共水地 14 亩，大部分是在春菜收获后移植的。
秋菠菜	水地 1	500 斤		
洋芋	山地 40 亩	30000 斤		
白萝卜	山地 10 亩	10000 斤	十二至五月共 60000 斤	
苴莲	水地 4 亩	4000 斤		
冬瓜	1	1000 斤		
苦瓜	1	1000 斤		
西瓜	4	1200 个		
小瓜	2	2000 个		
黄萝卜	山地 10 亩	1000 斤		

明年农业生产总的计划有以下各项：

1. 在志丹县境建立新农场一处，共有农场四处。
2. 山下菜园扩大为 25 亩，共菜园二处。
3. 增加人力、耕牛及农具，生产人员增加至 62 人，接伙子 21 人，耕牛 20 镑。

4. 改变经营方式，采取合作制度。
5. 共计开荒 1800 亩，种熟地 1000 亩。
6. 发展畜牧业及副业生产，羊群增至 600 头，猪 150 口，牛 30 头，烧木炭 75000 斤，在大北沟与安条岭农场开店两处。
7. 投资及借粮共细粮 150 石，现款 100 万元。

三、经营方式与具体办法：

农场的经营方式分为三种：1. 直接经营；2. 合作制度；
3. 接〔安〕伙子。

1. 直接经营，如今年枣园邓家沟等农场的办法：组织生产队，采用津贴供给制度，农场中一切经费开支、伙食消费、实物供给等，均由机关供给，生产收获供给机关吃用；生产有成绩时，用分红奖励办法慰劳生产人员（这样每一生产人员全年衣物伙食供给共需细粮 6.5 石）。

2. 合作制度，是一种公私两利的办法。

(1) 公家以农场土地、房产、耕牛农具等为资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入股；生产人员以劳动力为入股。共为 100 股，公家占 40 股，生产人员占 60 股。

(2) 农场之建筑房舍，购置农具，修理房舍农具，耕牛牲畜之购买，医疗等用费，均按预定数字由公家负担，生产人员之衣食用品杂支自己负责解决之。农场所借农具秋后检查归还，不得遗失掉换或变卖。

(3) 公家借给生产人员每人细粮 1 石 5 斗（分三季），钱 5 千元，（开荒与锄草时各 2500 元），秋收时照本归还，借粮还粮，借钱还钱，并借给农场一定数量之牛料籽种。

(4) 农业生产产品于收获时按股均分之，公家占百分之四十，生产人员占百分之六十。牛料籽种由公推取还，借粮借款由生产人员在应分粮数中偿还，草全部归公家。

(5) 生产人员的工作，是比较固定的，在组织上仍属于行政处，必要时得调动之。生产工作人员如无特别事故，平时亦不得要求调动工作。

(6) 畜牧业与农场在一起，受场长领导，三年结算一次，除原有羊数外，繁殖数对半分，各得百分之五十；羊粪归农场用，羊毛羊皮归拦羊人；羊本如有伤亡，以头羔顶补之；羊的医疗由拦羊人负责。养猪每年结算一次，猪娃对半分，猪食由农场自行搜集。

(7) 烧炭等副业生产，必要时公家得增加投资，生产品各得百分之五十。

(8) 菜地伙种，地租水利由公家负担，其生产品应得比例另行商定之。

3. 安伙子——与群众伙种，安置移难民，如今年二十里铺农场办法。

关于明年各农场进行生产的具体办法，兹分别叙述于后：

(一) 山下菜地

一九四四年的蔬菜供给，以山下菜地为主，扩大土地面积至 25 亩（租老百姓的地），再打一口井，全部分畦种菜，设生产员 3 人，由何有才同志负责，农忙时由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在附近寻山地种洋芋、萝卜数块，预计能收各种蔬菜 5 万至 6 万斤，可供本机关夏秋两季六个月吃用。生产员 3 人

即住在本机关，不另设伙食单位，其待遇与一般工作人员同。生产有成绩时，用分红办法奖励之。各种蔬菜种植亩数另表规定之。

（二）二十里铺农场

明年仍用按〔安〕伙子办法与群众伙种，安伙子3人，设一犋双牛，种川地35垧，山地45垧。不好的地不要了。分粮的办法仍按四六分，吃借细粮4石5斗至6石，牛料种籽1石。牛和农具是今年原有的，生产以种粮为主，多种些豆子和麻子，以供机关磨豆腐和榨油之用。该场不再设专人领导，由行政处领导生产人员直接管理，在伙种中推一人为组长。各种粮食应种亩数另表规定之。

（三）大北沟

大北沟现有土地520亩，内有今春开荒310亩，秋荒210亩，尚有未开荒地约60垧，现有生产人员26人。

明年仍由张正邦同志任场长，用合作制度组织生产队，自种地180垧，开新荒20垧共600亩。人员方面，计场长1人，伙夫1人，生产员9至10人，（内有开店2人，农忙时参加农业生产），放牛1人，共12人，名单已确定。耕牛3犋，吃借粮18石，借钱60000元，借牛料籽种3石，收获时估计能收粗粮200石，还牛料籽种3石，公家分79石，收回借细粮18石，生产人员分118石，还借粮36石（粗粮二折一），还借钱2石，共38石，下余80石，生产人员每人可分粗粮六石多。

炭厂改在羊家峪，由农业生产人员兼营烧炭，共烧炭

75000 元，公家分百分之五！

开店 1 处及养牛 20 头，养母猪 1 头、肥猪 5 口，盈利情形及分红办法另行规定之。

另外在大北沟安伙子 9 人，牛 2 镁，种地 450 亩，受场长张正邦同志领导。

(四) 邓家沟

邓家沟现有土地 420 亩，生产人员 10 人。明年自种 216 亩（内有麦子 36 亩，秋粮仍种麦子）。留生产员 3 人，放羊 2 人（将枣园之羊分去一半），伙夫 1 人，共 6 人，领〔受〕枣园农场领导，其中选班长一人。用一犋牛，可收粗粮 54 石及麦子 7 石 2 斗。用合作制度公家分四成，生产员得六成。麦地在秋天仍种成麦。

另外安伙子三、四人，一犋牛，种熟地 206 亩，开荒 30 亩。吃借粮及分粮、还粮办法与大北沟同。

邓家农场受枣园农场王文业同志领导。生产员中以×××同志为班长（或称主任）。除农业外，并养母猪 1 只，肥猪 8 只。

其种粮任务另表规定之。

(五) 枣园

枣园共有地 73 亩，大部分是租来的水地，每年出地租水利很多，今年已将地种好，有了基础，宜于种菜，种菜收获多，种旁的难以得利。明年以王文业同志为场长，共种地 73 亩。生产人员除场长外，生产员 5 人、养羊 2 人，伙夫 1 人，共 9 人。除农业生产外，养羊 200 只，母猪 1 只，肥猪 15 只。

这一农场因以种菜为主，菜主要的是出卖，只供本机关秋白菜、萝卜、洋芋六万斤，供给冬春两季六个月吃用，详细数字另表规定之。

农场经营方式亦用合作制度，地租水利双方负担，收获菜蔬粮食各得百分之五十。

(六) 安条农场

明年在志丹县境内安条岭新辟农场一处，地址已看好，有大量未开的荒地，从现在起即派人前往筹备。农场的建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创造时期，从现在起到一月底止，由行政处领导直接经营，派陈□^①美同志为场长，带生产人员12人（内木工2人），骡马2头及应用器具，先去打窑洞10孔，盖牛马棚3间，猪羊圈2处，及准备各种应用农具器具、买牛买羊等工作。同时召集移难民安伙子大户。这一时期，仍采取供给制度，经费及粮食实物开支由行政处审核批准发给。明年二月一日起农场正式建立。

农场生产人员，自场长以下共调32人，27人上山开荒；9犋牛，开荒270垧；安伙子6人，2犋牛，开荒65垧，共计1千亩，预计收粗粮200石，菜2万斤。养羊200只，母猪2头，肥猪30口，开店带饭馆一所，粉房一所。

农场采取合作制度，每人吃粮、还粮、分粮等办法与大北沟同。

(三) 农业投资与领导问题

① 原文此处为空白。

一九四四年农业生产人员、土地、投资及收获统计表：

一九四四年西北局各农场生产任务分配表

项 目 别	场 名	山下 菜园	枣园	邓家沟	二十 里铺	大北沟	安条岭	共计	附注
蔬 菜 类	春菠菜	6							
	水萝卜	1.5							
	春白菜	3							
	黄瓜	3							
	西葫芦	1							
	芫荽	5							
	萐苣	1							
	蒜	1							
	葱								
	芹菜	1							
	茄子	4							
	西红柿	4							
	辣子	1							
	茴茴白	3							
	菲菜								
	西瓜	2							
	苜蓿	3.5	1						
	冬瓜		1						
	苦瓜		1						
	西瓜		4						
	黄萝卜		6						
	白萝卜		6						
	洋芋		6	30	9	45	45	135亩	
	秋白菜	2	15						17
收获量		60000斤	60000斤	15000	4500	22500斤	22500斤	184500斤	

粮 食 类	花 生	3						
	棉 花 芝 麻	11						3
	麻 子		54	6	60	6	11	
	收 获		10.8 石	1.2 石	12 石	1.2 石	126	
	豆 子		45	6	12	36	25.2 石	
	收 获		9 石	12	24	7.2	99 亩	
	玉 米	5	16	10	30		19.8 亩	
	收 获	1.5	4.8	3 石	9 石		61 亩	
附 注	此项任务为各农场为供给机关需要所种亩数，收获数应全部在公家应分粮数内交机关吃用。除规定任务外，其余土地耕种及分粮种类，由农场另行计划规定之。							

关于领导问题，西北局行政处由总务科直接领导各农场，并有专人经常搜集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提出意见，总结经验，以供参考。行政处到各农场巡视检查及各农场报告工作，均应按期举行，取得密切联系，随时帮助农场，改进工作，解决困难，使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在合作制度下，对生产人员的慰劳奖励、思想教育同样是不可少的工作。

合作经营的农场，和与群众安伙子不同，不会那样简单，只借些粮食、耕牛、农具，还有许多制度需要建立。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要与农场经常研究计划，建立各种工作制度与劳动纪律，使农场成为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和建立革命家务的基础。

对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先选择与改良种籽，选择土地改良农作法等，都应从光华农场等各方面学得好的办法，供给各农场，以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如大北沟安条岭应用□月□谷种，防止早霜等。

在合作制度下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员，仍系革命队伍中工作的同志，与普通安份子的群众不同，是工作制度上的改变，而不是工作性质的改变。增加公粮生产，发展边区经济，农业第一，这是要全体参加农业生产的同志共同努力来完成的重大任务。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减租运动中的两个不同典型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甲、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

(这是一个发动群众减租斗争的典型)

葭县店镇区今年发动了群众的减租斗争，首先从第四乡的柠牛沟开始，随之是六个乡的租户对第五乡木头峪地主们的联合退租运动，最后又在第六乡的刘木瓜沟发动了退租的斗争。今年七月西北局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店镇进行调查，下面就是根据这次调查材料写成的。

(一) 这些地方过去减租情形

柠牛沟是店镇区四乡的一个主要行政村，是葭县大村庄之一，全村有地主、富农十二家，除二家土地数目不详，其余十家共有土地七八五点七五垧。最多是张慕宽有地一〇五点七五垧，其余都在八〇垧以下。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在本村周围活租，伙种给附近的农民，少数远地则定租给外村农民。

木头峪是店镇区五乡的主要行政村，有中小地主十五家。土地最多的是苗庆宝，现在跑去榆林，土地数目不详。其余

张子珍四三六垧，苗庆谷二〇七点五垧，苗及时一六五垧。一一〇至一二〇垧的地主三家，此外八家小地主（包括经营地主及破落地主）所有土地都在一百垧以下。这些地主的土地散处本区的一、二、三、五、六、七乡，绝大部分都是定租出去的。

刘木瓜沟则是店镇区六乡的一个行政村，土地革命时代曾是游击区。只有两家地主：刘争先，刘丕先（堂兄弟）。刘争先有地三六八垧，刘丕先有地二一四点五垧。他们定租出二一五点五垧，活租、伙种出二五三点五垧，雇人耕种九六垧。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地主都是中小地主。

自从一九四〇年颁布了减租条例以来，这些地方交租的情形据调查如下：

犂牛沟一九四〇年收到命令时定租地一部分减了，伙种地只有黑豆地分的迟，在专署派来工作人员督促之下按条例四六分了，其余都按原来对半对分了。一九四一年定租地很多改成了活租地、伙种地，按四六分的反而比一九四〇年少了，有的甚至于对半分之外再多给地主分一点的。这时是“上面顾及不到，下面不敢提”，有的租户为了地主不减租告过地主（郭桂香告张慕宽），但是乡上推区上，区上推乡上，结果还是没有减成。一九四二年夏收时伙子们都传说“命令不顶事”，都按对半分了。秋后区上在参议会宣布今年的租非减不成。少数租户是四六分了，但是忽然传来了一个谣言说：“米脂对半分了。”地主们说：“米脂对木头峪地主几年来定租

的收利情形可以从木头峪和它所属的一个自然村高家畔的租户两年来交租调查看来，一九四〇年应当交租五成五（按条例歉年减租四成五），而实交租是八成一；一九四一年应当交租六成（平年减租四成），而实交租是七成一；一九四二年应当交租五成（次平年减租五成），而实交租是六成。至于活租地、伙种地只有很少数是减了租的（一九四一年五宗，一九四二年四宗）。

刘木瓜沟的两家地主则可以说几年来没有减什么租，在退租斗争中算出的一部分，刘争先三年来长收租三十一石多，刘丕先长收租二十石零九斗，就可以看出了。

地主们对于减租采取了许多方法来抵抗，其中活动最积极而办法又最多的则是刘木瓜沟的地主刘争先。

刘争先是中学肄业生，年四十岁，过去当过绅士村长，是国民党员，土地革命时分过他的三四十石粮，在联保处当书记数年，今春区上才减下来，现在家里管家。他看不起乡级干部，对新政权及乡村建设常造谣破坏，这次环境紧张，大批动员牲口时，他说：“八路军快走了，住不成了，八十六师来，那些做工作的怎么办？”今春组织变工队时，他把组织变工队认为是“强权”；动员移民时，他们造谣说：“移下去当兵去，种下地全是公家的！”组织自卫军基干班时，造谣说是“抓兵哩！”把几个队员吓的跑到乌龙镇去了。区上有干部估计划刘争先是个特务头子，大概差不多。刘争先会说会讲，狡猾之极，过去当村长绅士时，村里的各种负担由他派，他是大户，反负担的少，甚至不负担；他收租是大斗（比别人的

每斗米重二斤半），老百姓说他斗上的铁梁是活的，入时铁梁下用木片撑高，出粮时就没木片了。他伙种给他人地，他不上粪，可是柴草一定要分一半；过去常用他的政治地位欺负人，又善于挑拨是非，所以周围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活埋人”的绰号。

刘争先对减租法令是研究过的，他认为减租农民太便宜了，地主太吃亏，所以他始终反对。自民国二十九年专署颁布减租法令后，他便与地主等研究过一夜，研究的结果，当时虽没有得到材料，但在他历年来反减租的行动看来，大概是有几条对付办法的，其办法：

(1) 以倒佃对付减租的租户（这时还没有保佃法令与工作），以假典实行倒佃；如假典给刘进宗十垧地，以改变租佃形式，实行倒典（这一条是对付本村租户用的）。

(2) 收回自耕。主要是收回实行了减租租户的地，收回后自种上一年，再另租给别人。

(3) 威胁农民，使他不敢减租。去年、前年他在区上工作，农民更怕他了，他也利用自己的地位，说几句大话，农民有的就被他吓住了。

(4) 假仁假义，假慷慨。当租户交租时，总是问他怎么装？他总是说：“我们几辈的交情了，你看的装去！多装多吃两颗，少装少吃两颗。”有些租户不好意思就给多装几斗（比减租率多几斗）。

(5) 造谣、威胁，进行明减暗不减活动。“八路军快走呀！八十六师快来呀！……”这个谣言乡干部都说是他讲出来的。

以上办法，拧牛沟地主也差不多用过。

自从减租以来，地主们设法把许多定租地改成活租地，把伙种地也改成活租地。拧牛沟的租地二年之中新改为活租的就有一八七垧多。并且地主经常倒换租户，拧牛沟的张慕宽等每年换一个伙子，拧牛沟的租户十之一、二是一九四〇以前的，十之八、九是近一、二年才种上的，原因是新换的伙子是“外村人乖，好说话”，可以多剥削一些。

除了刘木瓜沟的一些农民曾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以外，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对于减租政策并不完全相信，“上头的命令不顶事，算了吧！”是一般的反映。

（二）减租斗争的经过

店镇区的减租运动是于一九四三年高干会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据店镇区长、区书谈，今年二月间在县上传达高干会决议布置春耕时，县上特别强调减租，并说：“减租为了生产，为了发动群众，如果那个同志不认真执行减租，党性就不强，减租工作是测验党性标志之一”。并指出了领导斗争的一些办法。

区上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乡长、支部、干事等），传达与布置店镇区的减租工作，并提出拧牛沟打第一炮，于是干部主力首先放在拧牛沟。县上派来两个干部，和区长区书决定于三月初旬到达拧牛沟。

今年阴历二月初八日，陈昌霖（区长）、李德玉（区书）及县上派的同志先后到了拧牛沟，和乡上干部配合，分开二组调查，一组专门向地主调查，一组在租户中调查。调查了

三天，地主先请干部吃饭，什么都不讲，但暗中又与租户讲好，叫说按四六分了，租户也不敢讲。随后变了计划，集中力量，在租户中调查，首先调查出李长城按对半分了，区上干部找来问，他不敢说，后来要禁闭他（编者注：这种办法欠妥当，应当好好说服），李长城才实讲了。接着又查出几家是对半分了，于是召开了个租户会，登记租地和去年分的粮数，同时宣传“分柴能烧火，分粮能吃，分草能卖钱”。农民雷鸣雨不敢实说，因为地主张国标的祖母已告诉他，叫他不说，可是他老婆已经给乡上一个干部实讲了。他跑回去老婆问他：“你实说了吗？”“没有。”婆姨骂道：“我把你糊脑松，你不说我去说。”正吵闹时，乡上那个干部闯进去了，雷鸣雨见瞒不住了，才实说了。差不多将分粮情形登记清了，决定对违抗政府减租法令的三个地主加以处罚。

二月十三日召开租户会斗争地主（这时党内也做了动员），四十多家伙子全到了，地主也叫来了，由乡长张慕裕主持开会，区上县上的干部坐在高处看着。乡长说：“减租法令不执行不成，减租是为了抗战，为了生产，多分的要退，多分了的还要给一至五倍的处罚。……张慕宽多收了一石七斗多，应罚多少？”群众说：“九石”……“八石”。结果罚了八石一斗。第二罚粮的是张慕敏，罚了九石五斗；张慕谦罚了二石（编者注：对这种地主过去长收租子退回就行了，可以不加处罚，即使罚也不应当这样多）。张慕谦说话了：“罚的不多，国难期间我准备一下，我再欢迎上二斗。”有人说：“要欢迎多欢迎上一些！二斗少了。”慕谦说：“对了！对了！”

接着又罚了两家。张慕敏说他没粮，要求少罚一点，群众说：“减上二石！”张慕宽在会上本来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的，听见他兄弟减了二石，他也说话了：“给咱减上两颗！”群众说：“不减了，连张慕敏的也不减了。”租户郭树枝本来多给张慕敏分了二石大斗粮，他只报了一石六斗，群众斗出后，说：“郭树枝有粮吃，硬〔宁〕愿把一石多粮多给财主，这一石粮退给我们大家吃一顿吧！”大家哄然通过了（后来租户会还抽了他十二垧地给别人种了）。（编者注：不应当罚郭树枝）。区上干部觉着罚的太多了，超过原来决定，即提出借粮问题，意思是要没受罚的地主出一部分借粮（编者注：不应当再向这些小地主进行借粮），经大家提议共借九石，张慕信借五石（因群众要罚他，区上的人制止了的），张德耀借二石，张国标借一石，张慕永（中农）自动借了一石。接着群众又提出我们要组织减租会，我们才有办法（党内事先已有布置），大家都赞成。

当时选出张慕裕（乡长）、阎鹏耀（工人）、张德有（支书）、张慕汉（贫农）、张慕弟五个人为委员，慕裕为主任。到会的伙子全参加了，减租会就这样在群众的欢呼下成立了。主席宣布散会，下午退粮，先背罚粮。

下午没有召集，租户们一个个都来了，没地种的穷人也来了，有的拿着口袋，有的提着斗，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的谈笑着。减租会的人来了，说：“去背罚粮！”大家一拥而至，“口袋不多，去工厂借！”工厂的工人把所有口袋（二十多条）都借给了！并给他们拍手庆贺，农民更高兴了。背粮的

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工人们、婆姨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热闹。天气很晚了还在退粮，共退了多分的粮十五石，背了罚粮三〇点一五石，借粮四石。退粮借粮都是用小斗（八升斗）量的，罚粮退粮大部分都是黑豆，因为黑豆价小。张慕信的五石借粮因为他有粮而谎报没有粮，就将五石借粮改为罚粮了（编者按：这也是不应当的）。

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起来了，庄上的穷人也来参加背粮，他们说，一夜不睡觉也不要紧。他们为庆祝胜利，杀了一口三十九斤半的猪（二石四斗黑豆换的），两顿饭吃了四斗米，吃饭的有一百多人，背粮的、做饭的、不租种地的农民也来了，都美美的吃了两顿，可是那些财主看也不看，都在家里睡觉去了。

减租会的职责，区县没有明确指示过，只区长说过：“保佃很重要，你们这五个人啥事都可以做，与村主任共同负责办理就对了！”减租会的几个人是很团结的，他们常在一块商量事，他们规定租户不愿种地时，将土地退给减租会，由减租会处理。他们今春调剂了一二一点五垧地，十八家没地种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抽出的地大半是租户的地，因为他和地主捣鬼，不实报，被减租会抽出，作为一种处罚。张所娃说：“乡长压迫他们，捣鬼的人为什么不都抽呢？”有的被抽地的外姓人说：“我们迟早在拧牛沟住不成了。”（编者按：调剂农民土地是对的，但不应当对暂时由于落后还跟着地主跑的农民实行“抽地”的处罚，这样可以造成农民间的不团结）。地主张友三说：“抽下的地给穷光蛋种，是分地的底了。”

据支书说，自减租会成立后，他们有了力量了，公事好办的多了，“以前保上的事难办的很啊！近来租户大半都齐心了，地不准倒，没地，减租会给想了些办法，穷人都高兴”。有的租户说：“现在公家给咱作主，咱该发财了！咱们操心往起爬吧”！现在农民们见了减租会的人说就是叫吃吃喝（喝）的，比从前亲热的多了。

减租会五个委员的分工：一人管领导变工队——生产，一人管帐和借粮，一个人管开老坟地，一个人管清查户口和帮助工厂。乡长忙，什么也得管一管。

实际上现在该乡不管出了大小事，总是减租会的人和乡长办，如这次战争动员时，查户口，和贮藏公粮（一百石），他们都半夜半夜的工作着。

地主们恨减租会的人，在去年想打阎鹏耀没打成，今年罚了他们非常不满，说：“命令就是给梓牛沟的”！不几天木头峪地主也罚了，才不讲话了，但又给减租会造谣说：“减租会的人吃罚粮了。”（其实这些罚粮的处理是：买驴二头用法币四五〇〇元；买棉花借给穷人纺纱用洋五九〇九元；减租大会吃饭用去黑豆二石四斗，米四斗，菜油二七六元，招待费一五〇元，学校费一五〇元，送礼二〇〇元，共用法币一四四五元，尚余法币二二六七九元）。地主们又说：“村里有多少有知识的人为什么公事都交给他们办？”张慕清说：“啊！就那几块地分了就算了”！

梓牛沟减租斗争结束，县上区上干部检讨认为是成功的，便决定发动木头峪的退租运动，处罚顽固地主苗庆渥、苗庆

宝。发动办法是先号召后调查，然后发动一个各乡联合的退租斗争。采取这种方式的动机：1. 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2. 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3. 利用群众集会的机会发动生产。

三月十九日，县区干部分别到五乡、六乡、七乡调查。六乡租户开会，乡长说：“二十七日到木头峪退租子，政府有命令，谁不去，地种不成。去时要带口袋。”有人说：“去可以，要有人负责，我们怕租子要不回来，地又被人家要去。”干部答：“去了能斗争，一定能保证种地了。”“去了不给装可以不可以自己装？”干部答：“组织起减租会，由他们退！”“没住处人家饭也不给吃怎么办？找不到地主怎么办？”干部答：“要一起去，回来一起回来，不要你的粮一盘了就跑掉。”会上调查时，群众议论着：“要了好，粮能吃，地也能种，租子是地主强迫的要去，谁还愿意交。”

七乡张顺家沟，西山开了乡政府委员会和支部会，规定宣传和调查共一星期，陈区长在村民大会上问：“谁长交了租子？”大家都说：“按公家命令交了。”问：“按命令给了多少？”说：“不知道，”“记不清了，”“回去问婆姨们。”有一个党员张大良说：“这三年长给了四石多租子。”（预先布置的）陈再一个一个的考查，还有半数以上的租户支支吾吾的不讲。

二十五日，县区干部到了木头峪，住在张好娃家里，各乡乡长通知租户出发，“凡是木头峪的租地户长给了租子的，一律要去木头峪开会，退租，不能短少一个，谁若不去要处罚。”（编者按：这种动员方式不好，应改正。）他们是“用不

斗争，不减租、地给政府留下”的口号来动员的。六乡东山马支福虽然不种地，但区上同志说他的斗争性强，敢说话，敢负责，叫他参加领导。动员时有人说：“公家不去就咱去，这还能要下啦？只是去惹人！”“事搞不好，地也要跑。”有些推马支福说：“我们不敢说，去了你说。”党员和积极分子便在旁边发动说：“不去不行，他们长拿去了咱们的租子要还咱。”

少数的坏分子也就在说破坏话：“租子给了人家又向人家要，八路军净是做这些尽头事情哩！”“看八路军若倒霉，你们连地也种不成了！”

七乡张顺家沟，有三十二户木头峪租地户，去了一六户，有六户是积极的，其中有三个对减租有正确的认识；有两个是讨租时没把地主招待好，把地主怪下；有一个是地主把地已经收回，更不怕地主要地。有七户是“联络去的，”去怕惹人，又怕地保不住，不去，现时退的米就能吃。同时公家又不让。有三户是动摇的，去是为了应付环境，怕村里的人和公家责备他。还有十六户说“没长给的，”没有去。据调查，只有极少数没长给租子，多数是怕惹下地主，种不成地。还有的说：“已经长给了人家拿出去就不疼了，要和人家去要，见面眼熟面花，实在难为情。”

二十七日，各村的组长（每村推一组长率带）把租户带来了，先到的是五乡、六乡、七乡。一乡、二乡、三乡是第二天到的。才到木头峪，街上的人哼着鼻子说：“乡下人装租子来啦？！”地主们故意一问一答嘲笑地说：“乡里那股活贼来了，还要吃饭呢？”“喝雄！”“人家还要窑里住呢！”“就在露

天地里咯纠〔圪蹴〕着去吧！”

人到多了，便按照拟定的手续，先由组长带着租户去找木头峪乡长做见证，说明来意“为的减租，请你帮忙”！于是由乡长把谁的租户集合起来，带到地主家，说：“过去你们没有认真执行减租，如今退租来了。”集合起来的原因为了单个去搞得不彻底。

当时几家地主不在，一直等到下午，到了七八十人（入夜增至一百人），便开各乡租户联合大会，提出：“马支福、乔增明、高凤禄当主席团，乔增明当主席。”（拟定名单）大家说：“赞成。”当即通过。这时县区干部还是暗藏着，由积极的租户当通讯员，与大会主席团联系。之后主席团即说话了：“今天要和地主当面把帐算清退了租，以后大家有粮吃，要好好的种地，坚抗战。减租以后租户把地种好，交好租，对地主有好处，……。”

接着登记长给租子的数目和算帐，花了两三个钟头。算完帐，苗庆渥多装了二石一斗七升，苗庆宝多装了四石多。主席问：“多装租子是谁的过？”刘向荣说：“地主强迫要的，我们这些稀活人（穷人）谁还愿意多交呢！”大家质问苗庆渥：“二十九年公家有命令减租，咱们解不下，你们念书人还能解不下？”主席问：“该罚不该罚？”“该罚。”“多少？”“五十石！”“三十石！”（马曾有提）“二十石”……。多数通过罚二十石，以后又罚苗庆宝二十石（编者按：罚的太多了）。据租户们说：“罚倒了，木头峪的人都灰不溜溜的，怕了！罚的时候地主眉眼不好看的恶啦！一句不言传！灰不塔塔的！”（原来县区干

都决定各罚二十石，并罚二十石。是通讯员传错了，也许故意多传，说“每人罚二十石”）。

当场成立减租会，选举五人（马支福、高凤禄、乔增明等）为减租委员，负责退粮。

当晚县上倪主任秘密地来了，大家把罚粮的情形告诉他，他觉得处罚过重，苗庆渥的超过了三倍。于是翻了一下专署的指示，内有“个别坏地主，要罚耕租粮”一项，便提出算苗庆渥等的旧帐来补救，大家都同意了。当即由江平、陈昌林把减租委员会找来，布置明天清算账簿的旧帐。这时租户们住在乡政府给找下的窑洞里歇，嫌冷，又怕地主把粮移走了，提议晚上搬粮，准备一夜不睡。减租委员便领着租户到苗庆渥家里，粮盘升了，大声的报数……，这一晚共盘了四石多，盘粮的斗是刘木瓜沟租户带来的，重二十五斤。二十八日早上，继续盘粮。苗庆渥一共罚了二十石，还有长装了租户的三石多，把他的女婿高天孝存在他家的两石多粮也拿走了，仓里只剩下两斗多黑豆了。有人说：“给他们留下点口粮吧！”租户会委员说：“把仓扫光！”（编者按：这也过火了一点），扫完了还不够，便找着苗庆渥问：“不够怎么办？”“怎办！”“折钱！”这样折了一千零五十元法币，顶了七斗粗粮。

地主苗庆宝全家在十余天前搬往榆林，但估计他家有麦子十来石，卖地的钱五万余元，亦可折粮，故仍决定罚他以维持原议。苗庆宝的门给打开了，没有一颗粮食，只好将他卖地的钱（只一部分，大部分预先给他的岳父要去到榆林做

生意)，折粮五石多，不够的再将公家的罚粮三石分给来了的租户，以维持群众的情绪。

早饭后开算帐大会，算出苗庆渥三年共长收租子四石八斗。有些群众嚷着：“苗庆宝不务正，赌博，嫖妓，把地卖了又到李家寨买地赚钱，害老百姓，要多罚他个！”

苗庆宝的门打开了，区上干部想威胁他回来，就封了他的门，经全体租户议决，由乡长写封条，代管产业，并发动他的侄女写信叫他回来（现尚未回）。（编者按：封苗庆宝的门也不妥当）。

为了庆祝和巩固会议的胜利，援引特牛沟的前例，有些租户提议：“人家说咱们喝熊喝不上，咱们提议好好吃他个狗日的？”将三石多罚粮换了一口猪，买了一百二十斤白面。猪杀了四十三斤半，吃一顿活烙〔饴铬〕面，从早上一直吃到下午，大家笑嘻嘻地说：“吃美了，顶过一个年！”有些破坏分子说：“事是过好了，就是差着一顿油糕”（油糕是埋死人时吃的）。当天背走了三、四十石粮。天刮着风，下着微雨，刘召先翻了十七八里的山，一口气把三斗黑豆背到家里，向儿子说：“够一个多月吃了。”马洪晨退了三石来的粮，大部分卖了，背回两升黑豆，用卖粮的钱付了买地的地价（没有这笔钱，马便要卖掉啦！），大家都一致地说：“唯木头蛤做了个好，家里多少没有吃的，这回可顶事了！”有的农民就问乡上的干部说：“地什么时候分呢？”或是互相议论说：“唯这个好，比土地革命好！”（意即不用流血，将来就能不给租子分地）。

二十八日到的租户，都要求算旧帐，区上干部多方说服，还是不依，羊圈山和张家圪 的租户，把张××（有二十垧地，四垧园子）抓住在街上转来转去要算旧帐。闹到江平那里，结果写了欠条了事。二十余垧的“地主”也要退租，很多退不出粮的破落小地主和富农、中农便写欠条答应秋里扣除。后来县区干部决定让租户们自己和小地主算帐，闹到不得开交，再去调解。有些租户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带口袋去装粮。七乡有些租户长给租子不很多，只背了九升黑豆就回来了。一些破坏分子来乘机造谣说：“你背是背来了，恐怕给人家背的再送！”

二十九日开了租户、地主联合会、倪主任也参加了，先是减租户委员说话：“我们乡里人不懂规矩〔矩〕”。客气一番。租户多讲了，有说要换旧约，有说以后要好好种地，要交租。地主张子珍和苗桂芳说了话，说自己过去长收租子不对。苗培英（破落小地主，五十多岁，家无劳动力）说减租后“苦乐不均，生活实在难过”，倪主任加以解释，劝其参加生产。

这次调查组开了个地主座谈会，苗普祯说：“减租好，新法没病，法久才生弊”（含有反面的意思），苗桂芳等说三点意见：（1）减租要实际调查土地；（2）一律使用公斗（他们收租是八点五斗）；（3）公粮要按实际收入征收。苗普祯还说驮租要用钱，一斗租子实际只有六升。

地主觉得自己的威风打下去了，惶惶不安。张子珍这次谈到当时开会情形，只说：“厉害！厉害！”不敢再说旁的。张逸民（张鹏图同志之父）说：“地主们开会时只管捻烟布袋不

做声，怕处罚到自己头上。”又说：“地主都想，地要分了，租子吃不成了。今年四六减，明年三七减，后年二八减……地不能倒动，又要照出公粮，地要变成害了。”

破落的小地主都诉说生活的困难，张健说：“减租苦的还不是咱们！”

六乡租户会在租户心目中有了威信，他们说：“租户会好，实在好！”租户会一叫开大会了便来了。

在犂牛沟和木头峪退租斗争之后，刘木瓜沟的农民纷纷要求斗争他们最痛恨的地主刘争先，很多租户不断地找乡长及支部上的负责人说：“我们可等不得了，非斗争刘争先不可！你们看怎么办？”找过刘进孝（支书、乡委员）的就有十多人，支部决定先叫刘争先退租，他不退再说，一面请示区上看怎么办。

第二天刘争先的叔父请马余九（主任）、马进孝（支书）和刘争先吃饭，吃饭中刘争先说：“木头峪、犂牛沟的肉都吃了，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呀？”马进孝（支书）马上很诚恳的答道：“那看你退不退粮，你要把粮全退了，我敢保不吃你的肉！”刘：“你敢保？”“敢”。第二天刘争先找了四五家租户，马马虎虎地退了一下，刘进孝也通知了四五家租户，刘争先又退了一点，长交三、四石粮的，他只退一斗五升麦子，以作了事。刘进孝又告诉他：“你退就通清，不然还是麻烦！”刘争先想了个办法，晚上他去和租户写假条子以作证据，条上写：“按法令四六分了”，叫租户打手印，租户不愿意，也没行通。相反的，有的租户找乡上负责人找的更紧了，刘进

孝又与马支福（支干）商量，叫马支福到区上请示，马见了陈区长约定初五日退租，并决定罚刘争先二十石，刘丕先十五石。他们知道有些群众还怕地主，支部即布置了动员。刘木瓜沟党的小组长是个中农，自己没有租种别人的地，但他认为是党的任务，是打击坏人的机会，他一个人就动员了好几家胆小的租户，如马海礼、马海良、马进业、马继业等。他是用木头峪胜利的故事动员的。他们又动员了刘争先骂过的刘召先（佃农，积极分子），叫他在大会上提出罚粮数目，按一倍的提。刘召先当时说：“这我一定能做好！”附近有刘家租户的村庄都通知了，也进行了动员，约定初五早到。初四日陈区长秘密的来到刘木瓜沟，这时，刘争先也知道要斗争他了。

陈区长来布置了一下应如何进行会议及罚一倍的原则，晚上又走了。第二天就是初五了，区上李德玉、高增先来了，秘密住下了，没出头。外村的租户也来了，乡长和马支福主持先统计各租户三年长交的租，统计一个上午，刘争先三年长收的租三十一石多，刘丕先长收租二十石零九斗。开会了，到会的租户五十人，马支福主席，先讲了一下为什么要减租，刘争先插嘴了：“我先问一问，今天开会是政府叫来的？还是自己来的呢？”主席即很机动的指着马应田说：“你说谁叫来的？”马应田说：“自己来的。”刘争先没话说了，打算捣乱会场的企图破产了。接着主席又讲：“刘争先不执行政府法令，长收租三十多石，反而倒地，抽地，不合理……又假典给刘进宗十垧地，太不对，应该罚！”群众：“同意！”“罚多少？”

主席问：“……三十石，你们看多呢还是少？”马得超说：“减上五石！”马恩来说：“少罚一些！”马恩不说：“不要罚，由政府办！”高福鸿说：“粮退了就算了，为什么罚人家？……减上些……”。李浩（刘争先的继母的前家儿子，老百姓叫他“带羔子”）很生气地说：“哈，这么个会！人家要求，还有人骂的不叫？”（这些人大概都是刘争先前动员好的）一个党员马一（上）质问李浩道：“谁不提？”李浩说：“是马增杰说的。”马增杰见势头不好，说：“小声点！这个人说李浩捣乱会场……大家争吵起来了。马增杰，（唱一些帮刘争先说话的人平日都是跟刘争先跑的）除给李浩辩护外，还活动对落后群众说：“不要提说罚了，罚不罚不管他，何必惹人呢？”……这时刘进孝已趁空请示区上干部回来了，告诉主席说把李浩捆起来。刘争先说话了：“事是我的事，不要捆李浩，捆我！”说着上前受缚。他又向主席说，我说几句话，主席允许了，刘争先把他的父亲如何行善救药施术救人说了一气，又说：“我们都是门跟前人，罚我是应该的，就是我出不起。”“……你出不起谁能出起？”群众嚷起来了，刘的话也不讲了。主席说：到底罚刘争先多少？……三十石！通过了！罚刘丕先多少？……二十石！也通过了！（编者按：刘争先是顽固地主，且长收租三十石，应当罚，但退租三十石后又罚三十石，多了一些）。

接着是成立六乡减租会，选出刘进孝、马得川、马支福、马进昌、刘召先、马心亭、马应用等七人为委员。租户说：“选的好，我们就靠你们！”主席宣布吃了饭后背粮。先起罚粮，然后就退粮，有的租户提议做饭的做饭，吃的吃，背粮

的背粮。……又提议我们吃一口猪，……同意……散会了。

散会后，减租会的负责人商量处理李浩等捣乱会场及马恩来会场活动等问题，商量的结果，经区上干部同意，处罚了以下数人：

1. 李浩因其捣乱会场，抽其租地三垧半，罚黑豆四斗。
2. 马恩来进行破坏活动，罚黑豆四斗。
3. 高福明平日即反对减租，这次说“不该罚！”抽其租地二垧。
4. 高福有，平日和其兄福明一样反对减租，这次又说“少罚些！”
5. 高友明（外村租户）这次开会通知他，没来是有意的，抽地三垧。
6. 马恩丕，在会场说“不要罚”是不对的，给了一个批评。

（编者注：以上各人除李浩外，余皆应该说服教育，并加以争取，不应当加以“抽地”和“罚粮”的处罚。）

当即将抽下的十点五租地分配给没地种的穷人种了。晚上和第二天继续着背粮、退粮。罚粮起够以后（刘争先三十石、刘丕先二十石），接着就退粮，把刘争先的仓子都扫了，还欠十一石（已退二十石）。刘争先说：“我再没粮了！”减租会允许打欠条，今年秋后扣除，刘丕先也不够了（已退二十石），打了六石多的欠条（后来县委书记到东山检查减租工作，给马支先讲刘丕先是抗属，把欠的六石多免了，马支福心里有点不高兴，只减了五石多）。他们热闹了两天，杀了一口猪

(四十多斤)，吃了三顿，共费三石多粮，吃饭时有七八十人，租户们说：“咱又胜利了！有办法！”有的租户看了退粮运动后，暗中问刘进孝“地什么时候分”？有的党员也打听过这个消息，因为农民们看见和亲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他们看见退粮罚粮推测是快分地了，支部书记都给他们做了解释：“这是彻底执行减租减息，不是要分地。”

刘争先在事后仍旧不服气，认为一九四〇年政权还没有改变，不应当退租，更不应当罚粮。他屡次活动被罚的地主联合告区长，告县上倪主任。四月八日，白云山庙会活动木头峪的张子珍，被张说了一顿，才不活动了。

西北局的调查组到刘木瓜沟时，他又把问题向调查组的同志提出，要求答复。经过在会上把他的大斗收租等事实揭发后，他才无话可说了。

（编者注）综观以上所述，店镇区采取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进行集体的减租斗争，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正确性已由减租之能彻底实行，减租中农民斗争情绪高涨和减租后农民积极参加生产和自卫动员等工作所证明，此后这些地区的一切工作由于群众积极性的发动，便都有了最好的保证和基础，这是可以断言的。这个经验，在凡未彻底实行减租的地区均应加以学习的。但店镇区农民减租斗争的领导上是有缺点的，是没有能很好的掌握政策的：第一，差不多对所有未执行减租地主不论其是大中小地主，也不论其是顽固、中间或进步的地主，除退回长收租粮外，一律加以罚粮，而且罚的很重，这是不妥当的，是没有注意我们对地主除斗争外

还有团结的一面。这些地主除刘争先因其顽固反动可以适当处罚外，其余都可以令其退出长收租粮而不加处罚的。党的政策是一方面在减租斗争中发动农民（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又有适当政策不把地主迫跑，使其能生活下去。现在不是说要在店镇区再去纠正群众的这种斗争，这样做是错误的，但今后各地的领导农民减租斗争中是应当好好注意掌握政策的。第二，刘木瓜沟的减租斗争中，对被地主欺骗而跟地主跑的农民都加以抽地或罚粮的处罚，这也是不妥当的。对这些农民一般的应在群众斗争中说服教育之，争取他们脱离地主影响，而站到农民方面，不应当做为斗争对象加以抽地或罚粮的处罚；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用群众力量加以斗争，但这种斗争目的还是为了争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更加迫〔逼〕到地主方面与农民对立。这一点在今后各地减租斗争中也应当加以注意。第三，处罚地主一般的由群众议定后，还应当通过政府执行，不经过政府而由群众自己执行是不很妥当的。今后斗争地主一般的应采取发动群众起来与之斗争，政府则应站在照顾主佃双方利益上（基本的是照顾农民利益）加以仲裁和调解，如农民对地主斗争有过火之处，在不损害农民斗争情绪的条件下，政府可出面调处以达到对地主一打一拉、民打政拉之政策，而党的领导机关则应更好的注意掌握这种有斗争有团结的政策。

乙、绥德延家岔乡减租调查

(一九四三年七月调查。这是一个未彻底实行减租的典型)

(一) 绥德辛店区延家岔乡，是地主比较集中的一个乡。这个乡里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党员（只有今春派去一个乡文书是党员），乡政权在地主手中把持着，农民还受着地主的严重剥削与压迫。全乡辖有三个行政村，共有二三二户，一二五三口（人），共有耕地二九二三垧，而延家岔村十四家地主和破落地主就占有土地一三九四垧，占全乡土地百分之四十八，占全村地数百分之八十三。一九四一年前该村地主以定租形式租出地一〇五三垧，以活租、伙种、按庄稼等形式租出二五〇五垧（余自耕），而延家岔村五十六户，中、贫农仅占有土地三〇二垧，占全村地数百分之十七，每人平均地还不足一垧，平均数为〇点七九垧，农民们说他们是“大树下的草”，的确是那种情况。

(二) 据这次西北局调查组在延家岔调查，该村定租租地百分之八五点七是减租前租入（二十九年①的算在减租前），百分之十四点三是减租后租入，又多属亲族关系，或以高租租入（内三垧川地租额一点八石），这就是说地主自减租后，以定租形式出租地的大大减少了。

但活租在减租后，却有了大的发展，延家岔减租前只有四宗活租，共租地十六垧四分，内只有一宗是山地，其余均

① 即民国二十九年。

是川地水地（老百姓说是瓜儿山芋地）、零块地，地主租出为的是种瓜菜、麻。而百分之七十八的活租地都是减租后租入的。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租入数又占全数百分之七十强。贺家坪减租前活租的形式只有一宗，五垧地，百分之八十一是减租后新租入的。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租入者又占该村活租地数百分之六十五。从这两个行政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活租形式的发展主要是去年和今年。这些地以前大部分是定租，地主在减租后看到活租利大（过去活租是主四佃六的分法），于是纷纷将定租改为活租，同时也是他们抵抗减租的一种办法。

延家岔在减租前伙种形式不少，就伙种地的调查，现在该村农民租入地中，伙种地比活租定租地都多些，其伙种地百分之六十六是减租以前种上的，百分之三十四是减租后伙种的，但从减租后伙种地宗数上看，都是零碎小宗（十二宗四十七垧地），贺家坪的伙种地都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后种上的，以前没有。这些伙种地的来源都是由定租新近改变的，这同样是地主对抗减租的一种办法。

延家岔十家地主过去都按伙子（按庄稼），现在只有六家接着伙子。从播种地数上看，内只有一家的伙子种地二四点五垧，其余都是种十垧左右，并且佃户给地主的无报酬负役很重（伙子李生保夫妻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地主做杂活），这六家地主吃的水，都是伙子担，喂牲口的草也是伙子铡，牲口大半是伙子喂，故有人说地主按伙子是为了叫担水，喂牲口，寻门户，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在按庄稼中还有一个吃借粮问题。延家岔按庄稼的伙子吃借粮每亩地平均吃四升多，但按旧习惯每垧应吃一斗借粮，并且是粗细两样，有的租户说：“财主这二年可巧了，一垧地给吃三四升借粮”。有的问我们：“我们窑也不住财主的，每垧地吃三四升借粮，算不算按庄稼呢？”的确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佃农按庄稼的主要原因是吃了借粮，地主不给借粮吃，佃农生活问题没法解决，一定要妨害生产。我们这次调查中，区乡干部对按庄稼这种租佃形式比较重视，与活租、伙种一样看待的不少。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延家岔地主采取了许多方法来对抗减租，减租在延家岔是没有贯彻的。

(三)一九四二年前县区对这个乡的减租工作是没有领导与检查的，去年(一九四二年)冬这个乡是辛店区征粮试验乡，区级干部和全区乡长都集中在这里试验证粮，他们在这个乡进行了一次“退粮”(退地主伙种和按庄稼多分之粮)，这次退粮也很简单，只是在延家岔村召集了参议员开了一个会，推定延培艾、延文梅二人负责减租减息工作(当时延文梅还没有参加会议)。可是这两个人对减租是没有认识的，他们仍象办其他公事一样，“奉行故事”。区上干部看见群众情绪不高，很多农民还很害怕地主，因此区上干部对参议员和负责减租工作的人说：“你们跟上我们退，我们给你们包办一下”。于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延家岔的退粮工作完结了。至于定租地的减租，他们问过农民，都说：“按公示走了！”他们也就不管了，其实是明减暗不减。

在贺家坪行政村村民大会上马区长在讲征粮问题后，提出减租减息的工作任务，并提出要组织减租会，但群众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只有几个人说了一声“同意”。区上干部提出贺锡会、王九林等八个人负责贺家坪减租工作，并决定由八人中推选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王九林看见贺锡会会说会讲，就提议贺锡会为主任，贺不高兴，为报复起见，反提议王九林当主任，结果是二人都当选。贺锡会本是一个小商人，在绥德城内摆小摊的，选起他当减租主任二天后就到绥德去了，所以根本没有管这个事。王九林当时拖病不愿干，经过一个别乡的乡长说：“七八天公粮就齐了！粮也分光了！退什么？”王九林才允许了。据王九林说，他去年监督的分了三家的粮，是按公示四六分的，其余都没有管，至于那七个人更是没有管事。可是不管怎样，从此以后庄上人都把王九林叫“减租减息”，认为他是管减租减息的。七乡有个地主王锡盘到贺家坪收租子来了，租户贺先耀不在家，他的婆姨不知道该怎么给租，便把“减租减息”找来负责装租子，地主说他们七乡是六成交租，王九林说：“我们乡上是五（成）交租，都是按对半交了，你一定要按六成装你就装去，命令要是五成你可得送来，我们没人找去：要是短下，我给你背的送去”。结果按五成交了。除此以外再没有人找过王九林，他也不知是怎么交的。

据这次调查，该乡历年交租的实际情况是延家岔地主之外乡租地，在一九四〇年凡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就没有收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交租，还要求分地，又经政府命令

免了（如王庄等地），而出租给本乡的租地则大部按原租额收了租，伙种地也按对半分了，就是说一九四〇年该乡没有减租。

一九四一年据说定租大部分都按六成交了租，调查出只有二、三家长交一二斗租的（确否还不定），但伙种、活租都按旧规矩分了，没有实行减租。一九四二年据说贺家坪村活租、伙种都按对半分了，后又按减租规定四六退了（确否不一定）。延家岔村一九四二年伙种地对半分者有十家；四六分的有一家，四五、五五分的有二家（该年伙种地者共十三家租户），就是说大部分没有减租。后来区上干部叫按四六和四五、五五退租粮，可是因为当时退粮没有调查当年的收获量详数，因此只是马马虎虎的退了一下，名则按四六退了，实在却仍没退够应退的数目，因为农民怕地主的心理尚未去掉。他们把收获量少报一些，以取得地主的欢心。据这次调查，去年的退粮连二分之一也没有退足，这是农民没发动起来的必然现象，他们怕地主抽地，不敢实报，而区上干部也没有多少办法。

（四）这次西北局调查组到该村进行调查，农民们很快发觉是延安派人来密查减租来了，于是便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的到处开小会，商讨对付调查组的办法。多数群众是“见了公家人少说话”和“各管各的”态度和办法，如王家崖村王文玉老汉和调查组一位同志谈话，被他儿子发觉了，便立刻叫了回去，儿子并申斥他父亲“见了公家人少说话！”老汉怕了，每天吃过饭后不敢在家里住，到处转来转去，见了公家人便

躲了。延家岔农民延文梅是该乡小学校长，因为调查组的三个同志住在他的学校，开始他还很照护的，每天总要去学校二、三次招待调查的同志，可是后来忽然不来了，原来是他的儿子和侄子们都怕老汉“说下乱子”，不叫他来了。间或有些群众说了实话，一经群众发觉便群起而攻之，如贺家坪的王金堂比较老实的讲出他的减租情形，他给地主延九龄交租子二斗和地主将他十三垧地因为减了租，以假典威胁改为活租等情况，贺家坪的租户就批评他，埋怨他，嫌他讲了实话。他的侄子王志功、王志明指责他说：“唯二叔把租子给了人家，又多说话，不是寻的惹人哩！你叫那些人（指调查组同志）批评一下延九龄，人家还不是问你要地！”结果把王金堂吓得一夜没有睡着觉。这些情形完全说明了是延家岔地主在幕后威胁和操纵农民，农民害怕地主不敢说实话，更不敢实行减租，证明延家岔过去减租是没有彻底实行，或明减暗不减。

（编者按）从延家岔的各种材料，都可证明该乡减租是没有彻底实行的，一方面固然由于地主势力大，他们把持政权压迫农民，并采取各种方法对抗减租，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党政对该乡减租运动的领导非常不力，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采取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斗争的方针，而只是高高在上的号召一下，就算完事。对减租运动的这种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的。由于该乡减租运动未能贯彻，所以直到现在还未建立党的组织，乡政权还为地主把持着，这样该乡的一切工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西北局调查组协同抗大同志会在该乡做了调查并团结了一部分积极群众做核心，成立了减租会，在群众中揭发了地主对于减租的办法和农民应采取的对策，农民情绪才开始有了转变。许多农民因为有了组织，加以党政的宣传和协助，故对减租斗争的决心就增强了。以后这个地方如有党的坚强领导，群众的减租斗争是一定可以发动起来的；如能在减租斗争中把群众发动起来，则其他工作也一定会推向前进 了。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山西兴县水磨滩减租运动的调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一) 租佃概况与群众动态

水磨滩是兴县一区较大的一个自然村，有六十二户人家，距县城仅一里许，其中地主七家，富农一家，中农十五家，贫农三十九家。地主尚自种水地五垧；富农系榨油，不经营土地；中农自种水地六垧二亩，塔地六十七垧半，山地两垧半，尚租种水地二十垧，塔地两垧，旱平地七垧半，山地四垧；贫农自种水地七垧，塔地四十六垧，山地三十六垧外，又租种水地五十九垧，旱平地六垧半，塔地七垧半，山地六十三垧半。有些地主在本村，但多数地主在城关。本村土地质量在全县范围来说，亦属较好者之一。

过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很凶，交租子米价低时要钱，米价高时要米，一张租约上写下十几种东西，向佃户要小麦、绿豆、豇豆、黍子、糜子、谷、高粱、萝卜、白菜、葫芦、蒜、葱、辣子、长山药、干草、母鸡、扫帚、高粱秆杆、糠（喂猪），腊月三十给地主扫地，杀猪杀鸡，掏毛粪，贴对子，扫房子；赶集时，地主和佃户相跟上，地主买下的东西，要佃

户帮他背回家；在负担上地主摊下多少就是多少，动员战士，地主家里弟兄几个不出兵，非让穷人家孤子去顶兵；年年劳动，年年无吃的，一辈穷，辈辈穷，农民的苦衷，“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自新政权成立，一九四〇至四一年，区、村干部把减租当作宣传口号，实际无有作；四二年把减租当作完成公粮的手段，没有切实保障佃权，公粮的计算上是减了，但实际佃户因怕地主夺地，悄悄的按原租约交了，甚至还有个别佃户把解〔巴结〕地主，除原租外，又多交了几斗，这样佃户两头吃亏，公粮多出，租子也未少交下。其中有少数积极分子按法令交租，结果地主借口雇工耕种，大肆夺地，不多天的工夫被收回七十多垧水地；有的把租种变为不投资的伴种，有的将投资的伙种变为不投资的伴种；有的过去投资两石三斗，四六分，现在一点不投，或一垧水地投资上一块钱，就要四六分；有的考〔靠〕下和佃户均贴东西，但是因佃户贴不起，地主也就不贴，而按原约定分法分粮。四〇年前水地伴种的才六垧，四二年伴种的即有四十八垧半。佃权相当紊乱，一块地一年内有捣〔倒〕四个佃户的，佃户对减租怨声载道：“不减没事，一减减的没地种啦！”“这样闹下来，连不减租也不顶，越发多交下哩！”

四二年底，县、区干部曾领导三十多个农民集体向地主要地，反对非法夺地，开始都没有信心，后经政府处理了一家地主的问题，这才上了劲，一天一夜要回五十五垧水地，都以法令交租，农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集体力量，农会在这些

群众的基础上由有名无实转入初步力量的形成，“咱过去还以为农会农会就是开会，一个什事也办不了。不想这次合理（顶事理），以后农会要开会不叫我也要来！”

四三年夏季发动了互济，向富户借了些粮食，贷给了贫苦农民；进行了夏减，由农会讨论了租额，佃户说“这减下来‘客共’（一定的意思）有办法呢！”“终究咱农民是一家人，政府是咱们的政府！”

区上一位同志说：“水磨滩过去工作顶糟糕，现在有点生气哩！”

（二）减租斗争的经过

四三年秋收结束，敌人扫荡被粉碎，因减租法令宣布较迟，有些地主已强行索取租额，佃户亦被迫交付的不少，大家都衷心的盼望公家的法令究竟是怎的个。

区农会同志在旧历十一月初到了该村，当即宣传政府法令与确实保佃的精神，并根据木头峪减租斗争的经验，提出从新政府建立起，凡地主未执行减租法令，多收下的租子得一律退回佃户，一共是退回三年的；从新政权建立起，凡地主非法收回的土地一律归于原佃户，也是要算三年的帐。经过这样的动员，又加之以阶级教育，多数佃户情绪相当高涨：“今年的减租法令可好哩！地夺不走，还不减他干什哩！”“政府订下的法令，条条是扶持咱，不往起爬等什着哩？”首先给佃户李富核算了一下帐，能退下好几石粮食。很多佃户都要求算，一共算了两三天，连明年的租约都定下。一般租期在五年以上，其中有个佃户安发树因与地主吕武英是儿女亲家，

不好意思，说：“交已经交了，记不清哩！退不退吧，已经过去的事哩。”有个佃户白应生，由于地主郭林珠告诉他隐瞒了洋烟，以后公家征烟罚〔款〕，他交不够，坐了房子，最后还赔了洋烟，事了以后，地主见了他拍了一下肩膀，请喝了一碗粉汤，吃了两片子糕，这场事佃户白白吃了一顿亏，算拉倒啦，开始让他报时，他始终不说。还有佃户丁玉秀，因怕地主刘雨畲，也不敢，说：“咱头顶的人家的，脚踏的人家的，可不用麻烦大家给我减哩。不退就好。”

开初大家决议集体到几家较好退的地主家里去要，一窝子家都去，背的口袋、一个人背不动，大家帮助背，捎带着给地主送新租约，这样的退了一些，佃户高兴的边走边唱。安发树在佃户们的经常教育下，并且看到了人家都背回来好多粮食，眼红了，也想通了，很后悔的向农会干事报告：“狗日的，还亲戚哩！人家好活，咱没吃的，咱还说亲戚能照顾咱，嘿！作的四垧水地剩下一垧哩，不是农救会互济，去年春天还要饿死几口子，我要一五一十的报出来。前些时，咱脑盘不开，还说哄你们，不想哄住自家哩！”白应生也觉悟了。丁玉秀是怕农会向地主要回租子不给他，因此才被迫的参加了退租，到地主家里是〔时〕，他也向地主争辩，但事后向地主卖好：“不是我不行，而是农会不行！”

中途接到县农救会对减租的补充指示，区农救会同志向群众作解释：“为避免农民间发生纠纷，一般的使用权在农民手中时应予稳定，减租不再更动；从去年冬天起，若地主非法夺地，则可收回，由原佃户耕种。”这一点农民是接受了。

“关于退租从去年退起，不算旧帐，主要为照顾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为照顾前年政府法令：‘三十年①以前的欠租一笔勾消；三十年以前没有执行减租法令的不再追究’，虽然咱们这里因系川地，过去欠租少，但山地村子欠租可就不少，若咱们追究了三十年以前的多收租，那么人家也要向山地要欠租，农民本是一家人，这样一干，岂不因小失大。”多数农民懂得了这个道理，又重新算了帐。不过还有些农民总觉得不如多退些好。区农会同志开始在思想上还未完全贯通了县上指示的精神，行动上有些迟疑，说服上欠充实，如佃户郭彪就说：“这才埋人呢！算好了的帐还得重算！”

开始减租的过程中，地主王金斗欺哄佃户：“咱这要怎就怎？咱这好说，会上不用提。”地主白应兰：“咱伙家们到背地里说一说。”企图枉骗佃户，说：“有什还不敢人面前说？有什悄悄话不能到背地里谈嘘嘘？我可一颗粮食也没有，由你吧！”地主奥文蔚为逃脱减租偷跑了，第二天才回来，因为佃户在他家住下，想不回，家里有个婆姨放不下心。

十一月十三日城关召开一、二、三、四区农民减租保地大会，水磨滩全行政村到会人数三百八十三人，内有民兵二十七名，订了纪律，谁偷跑罚背炭一次。会中安发树第一名提了意见，得到了群众的援助。在千数农民会后示威游行时，佃户孙沛说：“看这人齐心了威哩吧！咱们这一窝子家以后可得好好的往一打儿圪蹴。”“真是天长眼，龙咳嗽！”“阳坡坡

① 指民国三十年。下同。

[婆婆]（太阳）又照在咱们头上哩！”

大会后的第二天，农民采取集体要的方式，一家一家找上地主商量，和地主好说，劝他执行法令。大家和地主王子珍吵了一阵，之后又派人去说服，你一言我一语，又美美的批评了一顿，有些人气愤得压抑不住，高呼起口号来，佃户郭彪说：“今天我可不怕你，有米协这来人帮助我哩！你说你退不退吧？不退，你趁早给米协准备吃和住的地方，不信你能顽固到哪儿！”坚持了约三个钟头，租子如数退出，并以月利分半跟息，其余十多个地主都很顺利的答复了群众的要求。从城里到水磨滩的路上，有背粮食的，有背菜蔬的，有赶毛驴的，熙熙攘攘，热闹的很，路上碰见都异口同声的说：“有办法哩！”“人手多了，可是厉害！”至于农民间的租佃关系，因时[事]先已在农会上协商处理，没有什么问题发生。

趁大家未散以前，区农会同志与村农会秘书进行了“农民一家人，农民要团结”的教育，中心说明这次的胜利是由于大家的团结。本村共退租粮食四十二石五，农币两千四百四十五元，山药七千一百四十八斤，辣子二百一十三斤，萝卜七十斤，棉花一百八十二斤，麻三十一斤半。

三、减租后的农会

公粮中，农会号召实报。四十三个会员，有四十一个实报的。有个别在减租中隐瞒的，进行补报的。评议员多农会提出的候选人，评议员坐在炕上，一窝子家圪蹴在地下，报一个，大家评一个，笑的哄哄的。一天一夜的功夫，完成了公粮任务。还超过一百分[斤]，“公粮能出几颗？连咱们过

去多交的租子也用不了！”“只要地能稳定住，什也不成问题！”当宣布每人数字后，农会秘书又谆告大家：有头头点点的差别，可以不必计较。

农会号召生产，首先进行在民间调剂土地，不够作的人向作不过的人调剂，共调剂出二十三垧水地，八垧半旱平地，十二垧塔地，两垧半山地，二大流九^①不动也调剂到一块水地喜得他：“咱一辈子没有种过水地，这下农会给我揽下地，可得好好受哪。”孙占熬将自己的四垧水地伙种给一个佃户，均投资，均劳动，下来均分，不吃租子。农会秘书乔建成将自己种不过的水地首先让与贫苦抗属，一个月功夫，共拾下五百三十二驮粪，准备推广种棉，种籽问题已向县上提出要求调剂，发动种夏田，解决青荒〔黄〕不接时的口粮困难。夏日种籽已到河西购买，准备买牛三条，希望政府能帮一部分款，现已调查清楚，发展纺织，准备开一个合作社，以全行政村为单位，现已集股七万多农币，一百五十六斤棉花，有一百六十三户为吸收私人资本，吸收了几个富有者参加筹备会，并推其中一个为副主任。

农会秘书、农会干事参加了县上召开的减租初步总结会议，老乔自回去没提过一点点家里的问题，到处奔跑，自动领导起群众斗争王舍斗（假典假卖）。在陈家沟闹出十四石义仓，并集体向吕咸英抽约退租。他常兴奋的告诉别人：“咱过去可是落后，认为工作没有出路，这一下可认清呢！只有给

① 大二流九，方言，指二流子。

群众解决问题，自己才有威信，才有办法。”刚被推选出的农会干事老马很惭愧他过去什也不知道，“以后要真心为大家办事。”

经过斗争锻炼与干部辛勤的教育后，百分之八十的群众觉悟程度提高了：“如今是咱们翻身的时候了，不抑〔央〕求地主也能活，地由农会给咱保证。”“毛主席的计划咱处处都拥护，都是为的咱穷人！”“你看如今的县长，见了咱们还问候咱们，要是旧政府，见也见不上，别说问候，好怕人子！”约定于阳历年那一天，天气下大雪，所有会员都兴奋的集合在一个大窑洞里，准备正式成立农会。在开会以前，已经过昨晚的自动报名与集体审查，曾审查掉一个因拥军不积极的中农与一个有特务嫌疑的二大流。该二大流常跑岚县，东山群众一致意见不准他参加；至于那个拥军不积极的，大家意见选他当招待员，要考验他一个时期是否改过，若确实改过时尚可参加。会场上摆的火塔子，雇的鼓手，会员名单贴了红榜。在会上讲话的人不下二十名，还进行竞选，干部与会员都宣了誓，当选的干部戴了鲜花，安发树还被选为小组长。鼓手在前面，干部在后，再后为全体会员，一面吹，一面走，在街道上游行，农民们高兴的说：“这是农会打平安会。”走了一遭，雪下的更大，大家要求再走一遍，“可里高兴哩，齐走吧！”会后大家吃了顿豆面汤油糕，算下来一个人才摊的斤数米。会散时，群众嚷着：“这比娶媳妇还热闹！”“喜得心上开花哩！”“咱一辈子未闹过这家的红火！”

主任白好义自感办事不公，向群众提出辞职，农会讨论

后全体同意，重选了一个贫农成份的主任。粮秣管理与过往军人的招待，另选了几个能谈起营生的人，原来的主任又当选了招待员。

民兵训练了一礼拜，又吸收了一些年青的好农会会员参加，认识与质量上有些提高，在保护群众斗争中，曾抓过破坏减租公粮的人，曾监视过违抗法令的地主，根据武委会大队长说：“反扫荡时水磨滩的民兵在打击敌人上，不算第一，总算第二。”

四、农民翻身了

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有贫农八家、中农二十家买进了土地，共水地四垧，旱平地五垧，山地十八垧。目前典卖土地确定一律通过农会，中间说合人的剥削已被取消。农会秘书农会干事常被请去吃谢礼，佃户孙侯油说：“这回家买地先尽咱，要是旧政权，咱有钱想买，挨也挨不的个！该咱们翻身哪！”佃户李富孩退下的租子问了一个老婆，娶的那一天，请农会干部吃饭，笑嘻嘻说：“咱可忘不了本，一辈子也记着大家对我的帮助。”雇工××已打算今年好好务地，明年娶老婆。老乔常向人说：“米家水磨滩有样子呢！一天比一天日子过得好，再有一两年就统统翻起来呢。！”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山西兴县蔡家崖减租斗争的调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一、蔡家崖的租佃情况

(一) 牛、温地主和他的佃农

蔡家崖位于县川——蔚汾河中游，在旧政权时代，这村是以牛、温二财主闻名兴县的。老百姓相传：“他家子弟在省城来往，父兄在县城里作官，县城有他家几座字号，大几十万，有平地千垧，山地万垧，庄户人家谁敢挨地他家门窗”？！“人穷帽低，说话没人听”，旧日这村地主的权势可以想见。贫苦农民觉得牛友兰、温启明是吃租滚利的活神神，是秀才，会算，会划，会刮舌，特地给他俩起了绰号：一个叫“牛头”，一个叫“瘟神”。□□□□□平分五家，每家五百多垧，□□□□□。

牛友兰原是执掌 5000 来垧土地的地主，至一九三八年将近 4000 �垧地，到现在（一九四二年），他本〈人〉有 200 多垧山地，六十几垧平地；牛映阶近 200 亩山地，30 �垧平地；牛映月 460 �垧山地，50 �垧平地；牛映潭约 300 �垧山地，25 �垧平地。牛家另一门原有地千垧，现牛厚生近 350 �垧山地，80 �垧

平地；牛联棣近 250 垄山地、20 垄平地，总共牛家地主约共有地 2300 垄（内有水平地即 300 多垄），分布在县川、南川，远及临县寨上。

温家：温启明有山地近 150 垄，平地 28 垄；温国钧 110 垄山地，近 20 垄平地；共有地 300 垄，几都在蔡家崖。

蔡家崖本村除 9 户地主、2 户富农外，有 11 户中农，30 户贫农和 2 户雇农，其中 34 户系佃农，都是温家地主的佃户。牛家地主的佃户都在外村，仅以高家村、蔡家崖、李家湾、沿川大道 十个自然村来说，就有他家佃户 150 余人之多。外村佃农绝大多数是自己只有几垄或十几垄山地的贫农。蔡家崖本村佃户则稍有不同，34 户佃户里，23 户是贫农，11 户是中农。

（二）三年来的租佃概况

据老百姓们这样说：“从前，牛家成天思谋的是买地，□这块好的，那块好的，要买到每天收租三双石才肯罢休。”于是佃户们讲啦，“哎呀！再过十年，全兴县都要种牛家的地哩！”但是只过了几年，一九四〇年新的日子来了，那年三月老梦古“斗牛”了，斗争牛友兰抗交公粮，地主都说：“不顶事了，地成了害也。”佃户们看热闹，那时虽然有人嚷：“地主快倒塌哩！”大多数人是满怀着惊奇：“有这地回事呀！政府敢惹老财？！”但自己依旧是“穷汗〔汉〕腿里没健筋”！休提二五减租。

一九四〇年普遍流行的还是山地定租每垄三斗，水平地活租对半分，所不同的是以前各家地主都有“招伙子”，“伙

子”为了吃借粮，要拿出他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给“地掌柜的”担水，喂牲口，扫院子，赶集，请医……，这个时候，地主怕“背老财名”，为了缩小目标，纷纷搬家到苏家塔、凤坡、温家寨及圪塔坡等背山村子去，借粮招伙子的大大减少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行署、统一部^①派李国栋、刘长彦等干部下乡，这些工作同志向农民说要实行二五减租，先要组织农会。那时却没有人愿意参加，是由于部圈定的，“闹地的通算是农会”，后来选减租委员会，谁也害怕当，选出温国华、刘根旺、温贵长、冯自荣、温国基五人为减租委员，这五人除温国基是中农以外，都是贫农。那时只是单纯由干部向老财讲“你的租额不能超过3斗7升5升”，干部也搞不清楚。本村第一个农会秘书温国华回忆那时是“随意海倒着减的呢”（即没有准），温国华劝别人减，他自己却没减，他租温国钧在凤坡的地，照法令当年应拉到20%，却实际送了25%，他那时就是怕惹下财主，又是什么不好意思。5个减租委员就有4个偷着长交租子，曾受到工作同志的批评。

这一年更新起一种现租，剥削是很利害的，水地每垧10块到20块白洋，钱到才能务地，地主们说：“春起就使换了钱，看你们秋起怎地减？”

一九四二年秋按七五降低二五减，这期间老财拼命嚷：“发展富农呢，地拿回来咱作（？）”“把那减下来的租子，咱

① 疑为统战部。

不知道去雇上人种？真格，地收回来吧！”平地都变成了伙种，实际是不投资还要对半分，本村几都是对半分，外村反有三分之一是四六分，佃户都怕“地主变富农”，怕地不稳，只得偷着递给人家说〔话〕：“不管多少地，能给租吃上就成！”

（三）地主活动明减暗不减

地主欺骗威胁佃户不减租是形形色色的：

1. 个别拉拢佃户到他家吃饭，递上烟戈〔锅〕子（烟袋）吹吹拍拍，讲人情，说：“良心”，如“人要谋刨捞生活，不要专谋个财主，人穷财尽，穷命跟着法令走也不顶事……”

2. 公开制造空气说天要变。特务头目温国钧就常这样讲：“吃饭没假的，世事没真的，哦！世事这阵是不巩固的，中央军要来。”“莫说地主地主，咱还舍不得放我这个地主哩？”“跟种庄稼一样，有一年不下雨，总有一年要下雨嘛。”“现在交得少，将来（意即天变了）交得多。”特别还对村干部说：“死猫子扶不上树，快不要学那样子。”

3. 假眉假眼的慷慨，叫佃户不好意思减。如说：“噢，抗战不是地主抗了（？），政府要那点咱还不是那点，你们减吧，咱有办法的，全不吃也行……”

4. 用假卖、假典、假自种等方法要挟、包围佃户，使他答应多交租，如温启明把租给温贵长的地假卖给温国彦，贵长最初答应多交租，后农干温牛厚知道了，劝贵长去告发地主，贵长说：“人家过去在县政府可威哩，这阵听去不威，总比我贵长威哩。”温国钧就背地拉贵长说：“你可不要听干部那话，你那麻扎腿还顶得住车驶子滚啦！”

5. 假伙种，暗订密约。牛映月租给牛老四白洞儿共六垧平地，扬言三人伙种，实际是地主两袖清风，吃对半租，地主给佃户的条件是：老四洞儿代他到各佃户家收租给挣些工钱，以后卖地，他二人作中间人，从中可得佣钱。

（四）小股出租，便于盘剥

自减租以来，地主为了逃避减租，早就采用了“小股出租”的办法，每股几垧、十垧不等，梁、塔平夹杂在一道，多是定租形式，如温启明民国七、八年时零买得的一二〇垧地，于民国十一年时集成两大股，由温国基和温长儿分种，那时把零星小佃户都挤垮了。因为这样集中，规定交细粮（以前是交粗粮），又固定写花田册，于地主特别有利，地主说：“给咱再写上些些吧，萝卜、山药，给米下吃便食。”佃户说：“写上就写上吧，咱那地□□地洼洼里撒上几颗籽也就够财主的了。”近两年这种额外租没有了，但地主看到分散于他有利，一九四〇年温启明出租地二股变成了五股，一九四一年又变成九股，这就是说一家佃户只种到他几垧或十来垧地，这是地主的好算盘，每股多递一点，集起来就不少；目标小，人又不注意。

总结起来看，这个村的减租（包括牛、温二家、外村的佃户）名义上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实际减是从一九四二年秋开始，山地有一半减下了，水平地普遍未减，定租转伙种者多（165起，就有154起是按对半分）。四二年减租是干部代替减的，干部对水平地仍明减暗不减。一九四三年春，城关周围村子反对非法夺地，斗争尚未直接影响到这一带，群众

普遍反映：“每几年减租法令是搁在桌子上，专干部知道，咱实在寻不出个清明，公家不管，咱也就嘿的不管。”

二、减租生产把身翻

(一) 开减租的学校

区上扩大干部会（共 60 多人）讨论了两天减租。头天，大半村干部都这样思想：“分也分得去了，吃也吃下了，还能吐呀？”没有发动群众起来。群众自己的力量大，足够把多收的租退回。当大家检讨到去年减租变成征粮敲门砖，“发展富农”，助长明减暗不减的时候，群众观念，基本群众的立场被响亮的提出来了，今年的减租是为了发动群众生产，是为了群众把身翻，大家都举出今春反对非法夺地的经验，听说临县几百成千的大减租都成功了，第二天，大半都认为：“能开那样大的减租会，准能开倒啦！”

区行政村的干部很快就下到蔡家崖与自然村干部、模范民兵、农会积极分子一搭五十几个还开了四天的减租训练班，一说起今年的减租法令，都很满意，认为：“伴种（伙种）与租种同样减，棉花按一般谷物算，假典、假卖要退回……，这好得很，只要跟老百姓讲清楚，算清帐，他们自己就起来了嘞。”学习结果，有 14 个积极分子对减租法令了解得很清楚，其中特别还有 5 个还善于揭破地主的各种欺骗，这是教育农民，克服良心主义，大家起来翻身的好宣传鼓动家与组织家。

接着又两天调查实习，在农会会员里发动实报产量。开始时，大多不敢实报，都因为感到“去年报产量多就交租多。”经反复说明今年减租法令与去年大不相同以后，大家才渐渐

实报。这时落后的会员（十个人里有一个）听到反对非法夺地，还有这样讲的：“人家地有红印黑契，咱能怎家闹呀？！”还有说：“我今年产量大比往日可强了呢，长交些租子也不吃亏。”这时农会干事刘根望和小组长高有碰等就出来教育自家的伙伴：“这法令是咱们的呀，不相信咱们法令，你怎家去反对人家的非法呢？”长交租子就是加重剥削。”甚至有人喊出：“不让有奴隶思想！”最后还作成了决议：“谁要私自长交租不退租，就罚他到巡检司去背炭两次。”

（二）要翻身就自家来算一算！

又两天，农会会员算帐，都是互相鼓励：“你流血流汗刨捞的为什么要长给人家？”“不要地主往出拿，咱们怎能翻身？”“人家可有啦，快别用提，怕拿穷了地主？”“地主可多剥削了咱们哩！”农会干事说：“不怕，咱们农会就有力量保证他夺不了地，咱们今年算出了，就一颗也不长给他。”大家情绪高了，仅有的动摇的 3 户（温国基们）都也抢着来算长交的租子，赵全玉算出应从牛映月那里退回白洋 36 块，白二信算出了要从牛映潭那里退棉花疙瘩 73 斤……，算到最后，温贵长说：“每几年由人家，只能怨咱灰哩！不在〔怕〕他们吃了哩，吃了还不是要往出吐！”高有碰接着说：“呀哈！这就叫狗倒倾！”算帐算的人心齐了，大家都提起了一句平凡的话：“从这阵起，咱可给自家算帐了哩！咱刨捞咱劳动的就该自家来算一算！”

三、减租斗争的经过

（一）农民队伍回来了

十一月十三日，城关减租保粮斗争的金县大地主头子牛倒了。农民代表牛映森、白朴怀、郭俊臣领着大队（人）打着“蔡家崖农救会”的红旗，前面民兵，后面长长的行列300多人都回来了，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区抗联于主任正集中队伍在门前打气，大家高呼统一的口号：“自家的事自家干，不让特务胡捣乱！”“农民本是一家人，减租生产打日本！”“村村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就在“力量大”的声浪中都听到了是老子在说：“最后胜利就在今天，咱们赶晚就去退租去！”大家吓的，老子宣传的：“到地主家去退租，不打人，不骂人，不随便拿他一针一……在城里咱们的缺点是没口啦多说话，现在回来了，看见地主，齐谈吧！”

（二）蔡家崖减租大会

大家决定到温启明院子里去开减租大会，听说牛家地主都不在，全埋人去了，大伙着急说：“不用埋那个人了！快给咱家解决问题吧！”打发村公所通讯员去唤牛家地主，回来时已半晌了，大家匆匆吃罢饭，佃户都陆续集合到院里了，地主却仍钻在窝洞里，佃户们齐喊：“地主们都请出来吧！”地主穿长袍马褂的，都出来了。

月光下，不知谁挤在一窝子告诉：“你和谁有问题？”——“咱和‘牛头’没问题，和‘瘟神’也没有问题，就是和‘牛吁子’还有问题！”（“牛吁子”是牛映树的小名）大家都笑着说：“都有问题？”

老子当主席，区村干部约五十多人都花散在佃户丛中（这里有白区长）。主席宣布开会的意思：“主要是和地主商量

减抽约，退租，赎地，帮助发展生产，坚持抗战……”

温启明低声向牛友兰讲：“咱的对头都来了哩！反正他们说什么应承什么就是。”佃户先提出牛友兰来，牛友兰说：“减租是好事，昨日我已向城关大会讲过，还向白县长写过信，政府规定民国二十年以前的旧约抽掉，我愿意抗战前的全部给……，我的水平地租子都按20%减。”群众问：“光你本身？还是你牛家？”牛友兰回答：“分家了，只能管我自己！”群众嚷：“噫！你执掌着全家嘛，……。”牛有兰含含混混说：“嗯，好，全家，全家。”主席宣布再不用提牛友兰了，待会儿去抽约退租就是。旭谷村奥桂汤借过牛友兰120块钱，找了五年利，还被牛友兰捉[夺]去了13块地两眼窑，因此他讨吃了多年，这回他到会上要求赎地赎窑，得到全场同情，牛友兰答应了，奥桂汤欢喜得落泪说：“要不是农会的力量，可不成哩！”

赵家川口高家村有十来个佃户向牛映树提出要退棉花30斤、50斤……，牛映树大吃一惊，他狡辩说他的地不是让债之产，群众问他：“为什么你要倒租涨租？”他哑口无言。

佃户接二连三的起来置[质]问地主，在院子里大家都忘了冷。

牛映月承认：“政府有法令当然应该退，只是年时颁布法令太迟，我收租稍为早了点……。”大家不让他：“不要花言巧语！抗战前老早就颁布了减租，你为什么不减呀？不成，现在就要退租！”

牛映潭说：“唉，退是往下退，不过这也是年时（去年）

干部给下的，反正我总没有违反法令。你们什时要？”十来个人的声音：“今黑间就要！”

温贵长耐不住了，大声提出温启明假卖了他租种的半垧平地。“瘟神”说：“已经赎出去了，钱也使唤的没什了！”——“反对花言巧语！”口号之声四起。“温神”最后才答应倒出来。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在“瘟神”的身上，二十几个佃户喊着：“不要你那三个字的搅约！”大伙响应：“对！今天非抽出原约不行！”温启明先说：“原约扫荡时丢了！”后看势不佳，连忙跑回去把原约全掌〔拿〕出来退了。“温神”还在会前布置过他的佃户温国基，叫他在大会不用提他那租子事：“挨上咱怎家就怎家，咱们了了就算了。”但温国基前几日在农会住了减租学校，看见大家都行动起来了，他也撕破了情面，直向“瘟神”要退租，温启明的声音有些发抖：“噢，往出退，往出退，看你，看你……”。

会议上还有两个地主暗地活动佃户不要提：“你不用提了，挨着和你退多少就多少”。牛映潭对白二信，牛映树对白万一（六十来岁的老汗〔汉〕）都是使用这号子手段的。但大家都喊：“反对开小组会捣鬼！”□□□□□□□□着胡子理直气壮的站了起来，指着牛映树说：“你既退，早些年时就应当退呀，今夜我觉得都说迟了哩，不说？非说不行！”全场哄笑，鼓掌。

（三）大家退租抽约去

到这时已经是一百多佃户发表了意见了，大家决定：“分七路退粮抽约去！”大家都取好了袋子、绳子，出了院门，群

众不约而同的喊：“把牛老财跟康凤珠抓起来！把牛老财跟康凤珠抓起来！”各找各家地主一道到一个地方去，有的佃户在几家地主那里都有问题，就托他的伙伴们捎办，互助精神都表现出来了，星夜到黎明，背不完的，大家都互相背了回来。

牛友兰答应天明了再走，佃户们不让，“不走？慢点走也得走！”结果牛友兰是雇上毛驴骑着连夜走的，临走时也说：“唉！对我有些过‘左’吧，过‘左’了吧，捎回信给你们于主任，唉！这是抗日哩，是要老命哩！唉，不过也是作好事”。

（四）“咱们翻起来了！”

佃户王四儿，旧日卖给牛友兰地，没有过粮银，每几年还替牛友兰完粮，这阵他来牛家要粮了。牛问：“你是要粮？”王答：“嗯，正是哩！”牛问：“每几年你为什不要？”王答：“每几年咱不敢要哩！”牛紧追着问：“现在你怎地就敢要了呢？”王痛快淋漓地反问道：“你不知道吗？！咱们翻起来了，活出来了哩！”

康凤珠回来向白区长讲：“咱闹回十九张约了。”区长问：“你怎不烧掉？要那些作什？”他眼睛闪着光说：“烧？可不呢，你是不知道，米大还病在炕上哩，肩回去叫他看看。”都说：“抽了穷根，能治穷病。”

西坪白侯中去年长交给牛映同 90 斤棉花，他去退花，地主说没啦棉花了，就将五垧平地抵给他，那里是向阳地，正好种棉花，他贴上 27 斤棉花就全买啦。这人本来是穷光蛋，一跃而为富裕的中农，他真是喜得心上开花！

在赵家川口、高家村一带佃户中，退回 30 到 70 斤棉花者很普遍，光景都快好过起来了，像过去跟着地主当跑腿的四儿、洞儿等半二流子都觉得农会太好，决心好好生产，跟农会走了。

再仅就蔡家崖本村 11 户佃户退租数目来看，共退租 9 石 2 斗粗粮，2 石 4 斗细粮（都是双石），棉花疙疸 329 斤，尾花 224 斤，平均每户约退回粗粮 9 斗，细粮 2 斗 2 升，棉花疙疸 30 斤，尾花 21 斤。显然，彻底减租使得群众生产有了基础了。

西北局组织部召集部队 劳动英雄第一次座谈会记录*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

地 点——边府办公厅

时 间——12月10日

主持者——陈部长。①

到会者——全体部队劳动英雄。

列席者——张令彬等七人。

首先由陈部长讲：一年来各部队皆有惊人的成功和奇绩〔迹〕，经过劳动英雄会，总结了经验，明白了自己的缺点，得到了以后继续生产的改善着手处，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谈谈，就是明年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包括第一，明年如果有战争，则将如何□？从今年的经验看，明年每个人最高能担任若干亩的生产任务？明年的生产技术如何提高？军民之间如何合作？生产中的政治工作应当如何做法？生产的劳动态度如何？等等。希望各单位劳动英雄各就所知发表自己的意见。

① 即陈正人。

关于战争情况下是否可以生产和明年标准数的问题

三五九旅九团三连曹福才同志，根据今年事实证明，虽是担任警戒的部队，虽是有点战争，还是可以进行生产的。战争，对我们的生产是有影响的，但周密的布置和精确配备，妥当准备后，是可以在基本上完成任务的。我们的警戒哨距敌人才五、六里，哨岗上的同志也是担任一小部分生产任务的。我们其他部队离警戒线的有 18 里、60 里、90 里三种。我们的首长是这样布置的：警戒部队和生产部队之间是用电话担任交通联络的，发现敌情时，哨岗、警戒线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撑住五、六个钟头，不许私自退却的；离警戒线 18 里的生产同志，得到命令，最迟须赶两个钟头内跑步赶上前沿；60 里处的，在 6 小时内必须赶到；90 里的 9 小时。不论那个部队，生产时必须全副武装齐备，一得消息与命令，锄头一丢，就便当。因为有这样的戒备，所以，今年生产虽受了点影响，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达到了我们自给一年的目的。

我们今年担任警戒的部队，不只生产、战斗，还修筑工事，光我们一个连曾修过两次，合计两次所担工程为 2000 个工的样子。

根据今年经验，最前线的岗哨，可以担任一点供给自己吃的种菜任务。生产办法，是利用早晚对方看不清的时间和被山峁、转湾等隐闭〔蔽〕、为敌人所不能发现或不能看见的土地，否则，对方看见我们在生产，他可瞄准放枪，要受损害的。

据我知道，我团三连、五连两个连的开荒亩数，平均每

人都在 15 至 20 亩。

警三旅七团一营二连贺正清同志：我们团是专门抽出两个连在白家寨子一带进行生产，上级给的任务是专门生产，每晚将武器收拾好，接到战斗命令则立即前往参战；未接命令时，安心一意生产。环境紧张时，生产曾受影响，有的正在下种，有的需锄的时候，使我们少收了些粮食，但基本任务是完成了。当环境紧张的消息传到时，我们部队内发生两种不同情绪：一种人是能生产一阵仍生产一阵，待令出动，只要战斗命令到来，镢头锄头一丢，即去参战；未接命令时，照旧干，不慌不忙。这种人也就是平常对生产最努力和最认真的，战斗情绪很高，生产情绪也并未降低。另外一种人“打狗目的！还搞什么生产？！”就不安心生产起来。这些人也就是平素不大愿意生产的人。经过首长的解释和教育，这种情绪才下去了。要按我们今年收获所得，两个连生产，差不多够全团吃。

警三旅九团七营三连同志：我们全营三个连，每连抽出七、八个人集合在一块，成立生产队，共给八犋牛，专门生产，归营部生产副营长负责领导。另外每连给 18 个镢头，四百亩地的任务，每天每连 40 人上山，其余担任警戒。

我们因为工具少，采取人休息工具不休息的办法去进行开荒。我连除所给 18 个镢头外，两张铁铣（锨）也参加了，就这样，还是每人不能得到一件工具，要是每人都有一个工具，我连开荒会多些。

何文鼎要进攻边区，我们就全部开去参战，只留我一个

人在家。地田……三连麦的熟，我上岭子去种了 39 亩油菜、西小瓜、豆角、辣子、蒜苗等庄稼，种了 16 亩白菜、萝卜、绿菁，和喂了大小 30 个猪，所以其他的生产收获等我也不清楚了。至于我个人的生产……（另存，此处不录）。

……根据我们的情况，要是不发现敌情时，开荒可以完成，而且还可超过任务，虽然我们工具不够。

警一旅一团一营三连郝政业同志：我们的情况也是在边区的最前线，和敌人也是哨兵可以互相看见，相离只隔一道沟，约 5 里的样子。我们负责的警戒线有 30 多里长，所以我连除了固定必不可少的哨岗有两处外，还要每天派人出去游击（流动巡查）于各哨岗照顾不到的地方，有时甚至要一天打发数批出去游击（流动哨）。

我们的警戒哨是一个放哨，一个带班，一个机枪准备好瞄准。其他担任警戒的同志则生产，地就在战壕、碉堡旁边。至于参加生产的同志，同样也是子弹上膛，全副武装，鞋袜备齐，一听枪响，立即便当，这样准备着。

根据我们的经验，上级给的任务为 750 亩，实际完成 900 多亩，而且还帮助难民 120 个人工。打仗误了我们十几天的生产。全部田禾只有 200 亩锄草两次，其余 700 余亩都是锄草 3 次。我们在初开荒时是两人一把镢头，后来才做到每人一把。全年只有两个开小差的，而且都是因为落后回家了，在边区。

在我看来，明年平均一个人种 25 亩地（连今年已开过的熟地在内）是没有问题的。

三八五旅五团一营三连强全文同志：我们全团担任三个关口，我营担任阳马关，距敌人同样是只有5里，一样是和敌人隔沟相望，互相能看到哨兵的。我们是每连抽一个排或一、二个班去生产。生产的部队离警戒线有的40里，有的70里。我们没电话联络，我们的约定是听见枪声响，应立即急行军去增援；听见炮声响，应立即跑步上前线。因为是在高原上，所以枪声炮声，生产的部队虽隔数十里远，也可听到。

我们在开荒时，敌人袭击，稍受影响。

锄草时，因敌情严重，大受影响，锄未锄出。我们也没有交给别人去。

秋收时，别处的收了，我们阳马关的未能去收，因为我们动身收秋时街上商人知道，来向我们首长提出：“千万去不得，对方情况很坏，你们若去收秋，阳马关若丢了，要你们负完全责任……”。所以，我们只好不收，所以没有收好。

根据今年经验，明年的任务可以完成。今年我们是初干，什么也没经验，明年则不然，有了今年的基础，也有了今年的经验——生产的和对付敌人的。

小结论（陈、张等会谈后）

陈部长：根据上边各同志发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要用两种武器——生产的工具充足，战斗的准备要齐全。
2. 开荒标准，今年最少的每人平均9亩，最多的到每人30亩，普通亦在15亩至20亩的范围内。
3. 担任警戒的也可生产，小规模的战争情况下还可生

产。

4. 组织生产的形式，可以看出有三种：一种是全部全力生产的，其任务为建立所谓“巢”；一种是小后方生产，离前线数十里，生产所得可以供给和改善担任警戒部队生活的；一种是前线上的生产，在工事附近种些蔬菜、少量粮食之类。

5. 总的看来，依据发言，明年可提出 75 万亩的生产任务。但我们不这样提，防备战争，少提一些，找个适中的数字，全数提出 40 万亩，可以不算很高的要求。在这个总数下，每人的平均数为 15 亩。但我们不拒绝某些部分、某些人根据具体条件去提每人 20、25、30 亩的标准，我们只规定个人可以提出平均 15——20 亩的标准。

关于提高技术问题的发言

一、多开荒问题

三旅八团二连郝树才同志讲：70 人开 2034 亩地，共费 33 天。下种用了的人数与前同，只 17 天；两次锄草共用 25 天，秋收共用 30 天。合计开荒用 2310 工，下种用 1190 工，锄草用 1750 工，秋收用 2100 工，共费工 7350，平均每亩用 3 个半工的样子。这样看，明年多开荒是做到的。

各单位劳动英雄最高开荒记录如下：

番 号	姓 名	时 间	面 积
三旅八团二连	郝树才(气死牛)	8 小时	4 亩 3 分
	郝树才	12 小时	5 亩 6 分
炮兵团			6 亩 4 分
三五九旅九团营连	李 住	10 小时	3 亩 6 分 7
	李住等		5 亩
三八五旅七七团营连	牛		4 亩 9
三八五旅五团二营五连	雷海金		4 亩 3
三八旅四团	武生华		4 亩 2
警一旅一团一营三连	郝政业		4 亩 5
			5 亩余
抗大七分校	钱永才		4 亩 7

上表所列，为各劳动英雄在一日十小时至十四小时以上成绩。在他本人也不能每天如此，但他们每天开2亩至2亩半是可以相当持久的。一般战士，明年每人每天开一亩到一亩半生荒，开二亩熟地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便是扩大耕地面积的人力基础。

二、肥料问题。根据发言，综合有下列意见：

1. 新开荒地不施肥，要多锄草。

2. 平地、川地、菜地非施肥不可，而且要多施。

3. 肥料来源：

a. 整顿茅坑，将大粪加以灰、土沤沤。另挖小便池，收集小便加土所沤之粪。

b. 拾粪。在附近利用早晚时间（老弱者去干）。

c. 收集骨头，制造使用。

d. 收集树叶、腐柴、腐枝烧灰，或与粪拌沤。

e. 大路旁修人和牲畜厕所收集。

f. 收集路旁浮土。

g. “掏格棱，溜崖畔，庄稼打下万万石”。

h. 把包谷芯在大粪坑泡后使用。

三、作法问题

1. 留苗问题。俗话说：“锄地不舍得劈苗子，到秋收个屎脑子！”意即不去苗长不好。三旅八团二连，一半糜子分苗，留适当，收到100石；一半糜子未分苗，只收到65石，而且未分苗的地比分苗者好，幼苗也旺，其结果竟相差如此。

2. 种早种迟问题。凡是冻旱的地区，种早点好，种迟了会冻。受冻轻者，减少收获量，重者甚至连籽种都收不回来。

三旅八团二连最早的谷子每亩平均收三斗半粗粮，迟者每亩要少收 6 升左右。

3. 锄草问题

(1) 九旅刘顺清、曹福才：

留苗适当的，每亩收 4 斗左右。

留苗太稠的，每亩收 2 斗左右。

草锄不好的，每亩收 1 斗左右。

以上是同一种谷子，同一地区，一样开荒下种的例子。

(2) 一般以第一次锄草最要紧，一定要锄好。以锄三次为好。

4. 施肥问题

(1) 三八五旅五团一营三连强全义：

施肥的三十亩，收十一石，每亩平均收入为三斗五以上。

未施肥的二十五亩，收到一石多，每亩平均三、四升，而且租地时每亩地租为七升，结果人工一切白费了还不够交租。

(2) 陇东老百姓种芸芥成苗时耕入地内。

(3) 三边使用麻渣耕入地内。

(4) 用油拌种籽，然后下种。

5. 选地问题

根据一旅二团在槐树庄试验（胡清山）：

平地，每亩产量八斗。

坡地，每亩产量三斗。

坳地，每亩产量二斗半。

6. 选种问题

以狼尾谷收获大，每亩五斗。

甘泉一带以小白谷收获大，每斗可得米6升，每亩可收三、四斗。

有的种子不宜移远，移远便不成了。

7. 工具问题

警一旅一团三连郝政业：

开荒用大镢头好，开一下顶一下，一下挖个一尺多一块，每人应有一件，另给一个单位额外配三、五个小镢，以便刨梢时用，平时谁也不用它。

8. 注意各地区之具体条件

(1) 三旅九团七营三连贺芳春：蒙汗〔汉〕交界，牲畜多，种地非打围墙或沟壕不可。开荒非牛不行。荒地之草必须掳去，绝不能像边区一样翻在下边去。种迟收早，只能种一季。

(2) 三八五旅五团一营三连强全义：

陇东以产麦产糜子为主，因此应适应当地情况，否则劳而无功，故不宜强调种小米。

9. 及早计划问题

今年动手还迟了一些，应该赶旧历年前一切准备好。尤其是使用牛，草地荒，牛不行。要在秋末冬初将牛买好，早些上料，否则，临时无论喂多好、多多的料不济事，牛还是要死。工具、牛、粪、籽种都应早筹妥。最好是秋开荒，秋

翻地，今年已过去了。但明年春开荒应早。春开荒早了，草根朽着，地刚消，虚着，新草未将地力吸去，即易开，又对庄稼好。

关于劳动态度、军民合作、巩固部队、管理生产诸问题。

时间——12.11.下午（如前）

三旅九团七营三连贺芳春同志：

我们驻在蒙地，生产任务初到来后，有些人是对生产的意义不了解的，他们甚至还这样说：“驻在沙漠地方，还为什么要生产？每天有了斤半小米吃就算了，再生产，还不是一天斤半小米。……”（许多人说，因为从一连刚到三连；所以人名记不清了）。这种怪话普遍流传，大大影响了生产情绪。经过党内外会议，个别解释，军人大会上动员，慢慢才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

我们每连只有18个镢头，除了掏“席楷”（丛草，生于荒地，非先将它挖掉，不能开荒）者外，只有十一、二件工具使用。若向老百姓借，无从借到，因为蒙人他自己根本不经营农业生产，没有农具，而且他们非常落后，最爱贪小便宜，给他点东西，就高兴的不得了，要他点什么，便不高兴了。一弄不好，困难更多。同时，蒙地开荒完全和边区内不同，那里牛马成群，无圈无栏，只有主人，没有人拦挡，所以，所开荒地必须打围墙，否则牛马羊数十百成群结队而来，连吃带踏，一晚间百八十亩庄稼就完蛋了。所筑土墙低了还不行，必须有三尺多宽二尺多深的壕，绕在墙外，墙边必须有四尺来高才行。若不早防，一旦至场，马群牛吃着，所费

辛苦便冤枉了。同时，因为是在草地，所以田中野草屡锄屡起，尤以苦豆草为最讨厌，所以，一般习惯锄二、三次便不再锄了。秋收时草仍与田禾并茂，甚或超过田禾，故在这里种地只讲开地多，不讲多锄草。

这个地区完全使用法币，边币不能流通，因而事务人员领得伙食经费完全买不来东西。我们的管理人员领到款项，必须先拿到定边，买成布匹等日用品，然后以物易物，才能换来我们的日用必须品，管理人员若不会这一手，或不肯这样干，那便没法办。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懂得这套规律，所以生活搞得还满不错，保证了大家在生产时期的供给。我们生产部队间的生产情绪得以高涨，是由于各班、排、连等单位间进行了革命竞赛的缘故。

三旅八团二连郝树才同志：

部队到达甘泉生产目的地时，先是下手盖房子。那时，很多人情绪不高，两个人只抬一根二三寸粗、七八尺长的椽。我看当时那个样子，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人们都是有力不肯出。负责同志再三讲：“拖延、推诿是不行的！去三边打盐怕咸水蚀的痛；走草地，嫌风沙；盖房子怕出力，不成，盖完房子，还要开荒……。”虽然讲的很厉害，情绪还是提不起来。又经过干部动员，党内动员，开大会，批评，说明“生产是中央的号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岗同志、贺师长的指示……，要自己动手，要和战斗一样看，要减轻人民负担，要自给自足……。”我自己也在这些会议上讲：“保卫边区，就要生产；不生产，就像河南的难民一样，求生救死不暇，还谈什么打

仗？谈什么保卫边区？”过去，连排级干部也对生产问题不认识，经过这样动员，大家态度才转变了，扛木料时，一个人扛两人拿不动的，还不说重。不久，三五九旅一个同志道经我们那里，他向我们叙述了他们去年生产时的困难，经过一年，情况便到如何好的境地，于是，我们提出“学习九旅”的口号。我们部队首长又提出拥政爱民十条，向大家讲了，这样生产情绪比前更高了一些。接着，甘泉地方党政民又来慰劳我们生产，小学校学生们给我们演戏看，这样更鼓舞了每个战士的生产情绪。因此，后来我们见老百姓的地荒了，草大，雇不到工，无法锄，我们的战士便纷纷议论说：“过去我们驻在延长，曾经帮助那里老百姓锄地，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帮此地的老百姓呢？”于是一致提议本连先给老百姓锄一礼拜，然后再给自己锄。得到首长允许后，我们也就这样做，结果也推动了其他各连在他们锄完自己的地以后，也各给老百姓锄地二日。

当环境紧张时，首长下命令说：“休息一天，好去锄完地或打敌人，这一天是听候消息的。”战士们一致提出：“不休息，能锄一时锄一时，我们全副武装上山锄地听命令，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保卫边区，保卫庄稼……。”大家的情绪高极了。当接到参战命令时，天正下大雨，人人磨拳擦掌，赤着脚冒雨赶往榆林桥。雨中到那里时，老百姓就给我们送来炒颗子、馒头、羊……。于是我便向大家说：“过去是打了仗以后老百姓来慰劳，现在我们刚一动，老百姓就这样待我们，如果不生产，不丰衣足食，那能这样

呢？”这样，大家对生产的认识更深刻一些了。在参战之后，秋收时情况与前大不相同，一月工夫，一切搞完了，现在已开始了训练。在集体训练时，看到各个班、排、连、营每个人的精神表现完全和过去不同，也和初到时完全不同了。

老百姓给我们的帮助很多，我们对老百姓的帮助非常不够。从开荒到秋收，我连共有 5 个开小差的，在秋收时这 5 人都回来了，据他们说：“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看到人人生产，自己实在不好意思困住下去，尤其当自己家中的地只需要锄两次时；地方政府及代耕的村邻们却给我们锄了三次，而且锄的非常好，比自己锄的还好，所以我们也实在再没脸在家中住了，归队了”。当我们来时，部队已开始了练兵习武，自己非常惭愧，我自己的学习不好，因为带过彩，木马、横架上满不行。其他同志，我看到他们情绪很高，一刻搞横架，一忽儿跳木马、打手榴弹、瞄准……莫不兴高彩烈。

三八五旅四团六连武生华同志：

原来都没开过荒，因此一接到开荒消息后，怪话讲的很厉害，有的人甚至说：“打柴、生产是当奴隶……。”（冯秋，跑了）经过开各级会议和军人大会动员、解释，开荒是开着，怪话仍很盛行。在初布置时，将每亩生产量估计过高，所布置之亩数太少，只布置了 200 亩，开到 400 亩了，才发现即以 400 亩的收获也不能达到目的（原来布置时是估计每亩收获，此时是向当地老乡调查到了每市的最高收量与最低收量），于是提出增加到 700 亩。这一增加，在生产任务的要求上是正确的，但一些落后点的战士认为号召 200 亩开到 400

亩了，还增加，将来开完 700 亩又不知要增加到多少去，怪话便更多，坏分子也更加散布坏话了，生产情绪也很低。不久，有 4 个讲怪话最凶的逃亡了，于是发觉怪话是破坏生产的，也是由坏分子那里来的。又开大会，要每个人自己去计算到底 65 石细粮次〔需〕多少亩地，并指明逃亡分子才不愿生产。这样，大家情绪才高起来些了。

接着突击队 13 人一天开到二五六亩，消息传开，于是大家也纷纷议论：“一样是人，他们能开那样多，为什么我们不能？”上级也鼓励，上下配合，大家的生产情绪这才高了。开完荒，进行教育，着重指出战斗、生产、学习必须结合起来；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因此，赶到播种时，情绪就很高，连休息也都不愿意休息了。当水推曲子时，部队自动下水给老百姓捞东西；好的同志捞起东西交司令部发还老百姓了。有的人这时思想就起了变化，贪起小便宜来了，有的从水里捡起钱装了腰包，有的甚至把布踏入泥中，过后借口洗衣服去捞出归私。有 4 人在出发打柴时就有两个跑了。凡是捡到便宜打下埋伏的人，在部队中便有的开始不安心工作了，有的就嫌部队生活太苦，吃不下去小米饭了，此时便有很多怪话又出现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逃亡了 7 个。

究其原因，是很多同志认为讲怪话不算啥，讲怪话不犯法，助长了怪话的传播，给了坏分子很大的活动空子。经过整风斗争，怪话的邪风才下去了。怪话少了，情绪就高了。我连有 4 个逃亡分子，有的在延安又参加了工作，其中有一个

过去在部队内装聾子、呆子，也逃到了延安，这个可能是个坏家伙。我在延安碰到一个王正科，据他自己说现在联政当警卫班长，确否不悉；他一块跑掉 4 个，其中一个叫卡光瑞，已回部队了，有个殷应清还不知下落。王等逃亡以前在部队内原来也是很跳〔调〕皮捣蛋的（这 4 人是团教导队的）。逃亡现象很严重，本连一个连一年来跑掉 21 人的。（本连）克服了错误思想，纠正了讲怪话，整风斗争，生产情绪高起之后，不只完成了 45 石细粮的任务，而且得到了 100 余石细〈粮〉的收获之外，还建筑了许多房子。天下雨，把我们刚修起的房子下坍，把机枪班同志们的 645 万土砖冲坏。当时虽曾多少使人有些失望，但一经鼓励，便又重振勇气干起来了，大家用 21 天，48 人又重新建筑了房子。打土砖每人每天打到 800 至 1100 余个，背到〔砖〕每次每人背 20 余个（约一百二三十斤），将自己部队的干了，还在锄草时去给老百姓锄。我们全连平均每人每天锄一亩半，把全村 16 户老百姓的地统统给锄了。秋收时，我们帮老百姓、抗属收秋，区政府和老百姓对我们更好。当梨子和枣子能吃的时候，老百姓天天担来送我们吃，一直送到梨、枣下去之后。当我们部队出发打柴时，老百姓在沿路给我们烧下开水、米汤，摆下西瓜……，一个瓜二三十元，他们却不要一文钱送我们。因为老百姓这样待我们，部队的打柴、生产情绪也更高了。

三五九旅特务团教导营刘顺清同志：

在一开始生产时，不认识生产意义的可以说要占 90%，连一些老干部也是这样的。在这些同志的思想中，认为军队

不是生产的，生产应该只是老百姓的事。但是，今天改变了，许多同志不只改变了认识，而且生产情绪也很高。其所以如此，是有下列原因的：

1. 进行了生产教育。不论在什么会议上，都提到了生产；经过党内、党外的解释，说服，使所有人员开始有了转变，认为可以进行局部生产。

2. 经过了逐步的实践。在进行各种教育，许多人认为可以试试的时候，我们先从修房子、打柴一步一步前进到种菜，再由此进行到种点粮食，这样并使住的房子、吃的伙食也逐渐改善，使人人都实际享受到生产的果实。这样大家便说：“我们自己生产的，比领得那些伙食钱好的多，还是生产才有办法，还是生产对！”

3. 教育老百姓，造成尊重生产的环境和舆论来影响部队。

在生产之初，我们去和老百姓讲我们部队是要生产，生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抗战。老百姓认为这是很好很对。这样，部队一与老百姓接触，老百姓便称赞部队的生产；部队同志从老百姓方面听到称赞生产的光荣以后，也改变了自己对生产的认识和态度。

4. 精神与物质奖惩兼施。对生产认识好的个人、班、排、连予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与鼓舞，把他们的名字、成绩公布在墙报上，或在大会上提出嘉奖，有的酌给一些物品奖赏。同时，把生产所得的东西也有计划拿出一些来改善生活，使人人尝到生产以后吃也改好了，穿也改好了，这样，好的同

志更努力，不好的也改好了。

5. 王旅长的亲自领导，对下边起了决定意义的推动作用。他亲自计划、布置、动员、检查，不断到各单位去……。

6. 政治工作的推动作用。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件事情上，像战斗一样，提出适当的口号，进行宣传鼓动是很要紧的事。

抗大七分校二大队丁建民同志：

在动手生产之前，我们的负责同志在动员时号召“建立革命家底”，“自己动手，自己享受”，使人认识了劳动的目的。另外，党员在劳动中起模范作用，一方面以身作则给别人看，同时进行解释工作，尤其政治工作，从中起了保证作用。当每天每人斤半小 米吃不饱时，便有百分之一、二的人对劳动不大满意，认为“一年生产，不能学习了”（段志强）。但到突击时，情绪很高，行政上规定每日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工作的同志们够了十小时还是不愿意休息。“开小差”在我们那里也有，但意义和内容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的“开小差”是当哨子响了，要大家休息的时候，却有些同志不见了，仍然去打窑洞，是这样的“开小差”；有的甚至借口说小便或大便去，赶到一查，还是“开小差”去工作了。另外，还有一种“放哨”的意义也是和前边各同志所说意义不同，前边同志所说放哨是对付敌人的，我们的放哨是对付自己领导同志的，是三、四个同志当休息时共同向负责同志请假说他们不和大家一块休息，去到窑洞里休息去，其实呢，几个人一位站在窑洞外边放哨，其他几位在里边打窑洞，负责人来查时，外边放哨的便给里边出消息停一停，让负责同志看见他

们真在那里休息。

一天4个人打成2丈7尺5深的一窑洞（高6尺，宽8尺），外大内小。

5个人17个半钟头打成了3丈1尺深、1丈高、9尺8寸宽的一个窑洞，这5个人是1个17岁，1个18岁，1个19岁，两个20岁，都不是健强的全劳动力。

送土的，一个人一天要送到1605车。平均每分钟2车半。五丈多远的出土处，跑，两个人添土，一个人送（合路约计 $89\frac{1}{6}$ 里。注），73个窑洞，15人，斩面子6天，打窑洞9天就完成了。

其所以如此，不外下列原因：

1. 思想搞通了，认为劳动是光荣的，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要人剥削。

2. 组织严密。4个人一个窑洞，每人皆有工具，工具、人力各可尽力发挥。

3. 领导上做到了首长负责，干部模范。全体150人中只有2个同志（队长和指导员）因为除了领导本队一切工作外还有其他工作，未参加，其余148人都参加了劳动。

4. 普遍进行竞赛。个人与个人、组与组、队与队间进行比赛。

5. 文化娱乐工作活跃，减轻了疲劳。俱乐部的工作搞的好，一到休息时，俱乐部的文化娱乐工作就活跃起来；有的打扑克，有的拉大月琴，有的下棋，有的打马〔麻〕将；但

哨子一响，大家丢下玩具又干起来了。

6. 宣传鼓动工作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巩固了生产情绪。

宣传委员广播成绩。他把每个人、每组……一点一滴的生产成绩毫不遗漏地予以公布，这样使得许多人虽然口头上说自己不参加竞赛，实际上看到公布了人家的成绩，使自己心里也打算着“好好干一下，赶过他！”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在竞赛着。

军民关系上，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只在锄草、秋收时帮帮老百姓的忙。在环境紧张时，全校抽出 450 人到庆阳帮老乡割麦十天。

今年，我们的主要力量用在建筑住所方面了，还没有打下生产基础，因此，明年生产中须要依靠老百姓的地方很多，特别在调剂种籽、播种……方面。

三八五旅五团一营三连强全义同志：

我们这个部队多一半是开过几次小差回来的，这些人都是老游击队员和老红军战士，另有一些是内战停止后扩兵团员来的壮丁。同时，又因为驻防区域离国民党接近，所以思想上旧思想的残余和国民党思想的影响在部队中相当浓厚，当生产任务被宣布后，怪话很多、最流行和最厉害的有下列诸说：

1. “当兵就吃粮。”——意即只应吃粮，不应生产。
2. “军队是打仗的，不是生产的。”
3. “生产是老百姓的事，与其在部队上生产，不如干脆

回家去生产。”

4. 骂前进和努力生产的同志说：“这些人是‘烧料子’，‘赤脚片’”——意即讥之为邀宠邀功。

5. 骂前进和努力生产的同志说：“大官要熬，小官要捎！”——同上。

甚至于有的同志因努力生产得到首长在大会上的口头奖励后，一些落后分子讥讽他时，他自己也站不稳立场，回报人家说：“那是给我上政治哩！”因此，生产情绪很低，每人每天只挖二分地。

至于以后所以能够提高，是经过下列工作的：

1. 各种会议的动员。干部会、干部小组、党的支部大会、军人大会……。

2. 反军阀主义思想，检查每个人的思想、历史。

3. 反兵痞子运动。

4. 出刊生产专号，表扬好的，公布不好的。画乌龟给讲怪话的人背上。

5. 强调革命不能讲怪话。

结果，情形转变了，参加开荒的不只是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倒反而是没有参加生产的却开了很多小差。

至于军民关系，老百姓对我们很好，他们帮助军队很多，他们给我们送粮，牛车、驴子借给我们使用；一年来我们没来背过粮，都是老百姓从30里外给我们送。据老百姓说：“县政府批评我们送粮，说我们不应该送，送了是私人感情

……。”此话到底县政府的人是否说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老百姓却的确向我们这样说过。老百姓帮助我们耕过 200 亩地，耕过两次。全村 12 户，有 6 家我们住过。部队生产回来，饭未熟时，老百姓先把他们的饭硬要我们部队先吃。每家自动做了一缸醋，送我们部队吃。老百姓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因为过去六连曾在这里住过，他们在这里落了好名声，走时老百姓挽留不让走。我们改编后，我连仍有许多是过去六连的人，所以，一到此间，老百姓当熟人看待。其次是，我们一到之后，请老百姓吃饭，家家都被请过。在割麦时，我们帮助老百姓割麦 295 亩。耕地时也给耕过一些，秋收时也帮助过。当环境紧张，我们去参战、无法秋收时，老百姓来 94 人帮我们收秋。

仍有个别不良分子违犯群众纪律，一个特务长（陈律朝）到老百姓家，向人家要吃面条，老百姓没有，他就绑人；事后，我们负责同志知道，将此人业已撤职，并开展斗争与教育了全部同志。同时，全部开展了拥政爱民的教育。

干部的模范作用，推动了大家。我们一位排长叫向应基，在生产中把手搞到残废了，他还不停止生产，这样，每个战士手上都起过十几个泡，也没人情绪低落过；拿我自己来说，手上也打过二十三个泡，但我们并没有觉得什么痛苦或不应该，因此，特别是班、排干部的以身作则榜样所起作用最大。政治工作、文化娱乐，对于巩固情绪作用很好，适当的口号是政治工作的首要条件。

三五九旅补充团四连纪风鸣同志：

在开始生产时，我们那里不愿意生产的人说：“白生产，生产好，吃不上，到收成时，来个命令又要调走……。”我们团长亲自下手，党内全体党员动员，我们班上每晚开生活检讨会，团的、旅的报纸上教育，个别教育，亲自号召与别人的比赛，接着连、团也展开了比赛运动，同时，也因为生活上从生产以后改好了，这样才把落后思想克服下去。

向坏思想作斗争，给每个人贯输正确思想，讲清楚这是（1）毛主席的号召；（2）自己享受；（3）为了减轻人民负担……。经过这些办法，加上竞赛的刺激，所以就改变了，到收工时，不愿收工；到扛柴时，一个学一个，一个要比一个扛的多，扛上柴还唱；到发生战争时，连夜生产；接到参战命令时连夜赶去；参战完，又连夜120里路赶回还是继续生产，连休息也不要了。

我们那里有十余户老百姓，和我们关系很好，我们请他们吃饭。帮助老百姓开荒20余亩，把牛借给老百姓去使用。老百姓告诉我们耕作方法，开荒方法，帮我们选地、下种，借给我们家具用，农场还来慰劳我们，李主任并组织老百姓在我们参战去时给我们锄地……。

三五九旅九团三连曹福才同志：

四一年，我们初到南泥湾时，整个部队的情绪很低。一看完全是荒山，没有一个人，连走的路也没有。那时，天还稍微冷一些，最重要的，部队是以打仗动员来的，到了之后，不打仗，却打起窑洞来了，这时怪话很多，有的人说：“天塌了！”当时生活也很困难，连菜都没有，大家捡着吃野菜，干

部说话简直没人听信。甚至于有的人还说：“还不如去给日本当奴隶去，当奴隶他总得给吃饭……。”有一个叫南树云（现在五连，已撤职，也停止党籍了，现当战士），他的家庭出身是个富户，他说：“写信问问家中老婆生下孩子没，如果生的是男孩，先要问他，大了干什么，如果说要当八路军，立即勒死他……。”当天下着细雨，冷，我们还在开荒时，便有人说：“当八路军，坏了心了！……。”（陈丰年，现在团部宣传队工作，非党员，战士，过去在五连）。当政治委员来看我们，正值吃饭，吃苦菜，有的人甚至把苦菜拿给政治委员说：“请你瞧一瞧。”（过去在卫生队工作，是个小鬼，现在不知是否工作调了，名字不知道）苦菜有什么瞧头，明是不满意的表示。当背粮时，便又有人说：“把人当牲口！”（涂红，任民运干事，整风后知是双料特务，已撤职）甚至当休息后再动身时，向同伴说：“喂！你给我掀掀驮子……。”（黄明，过去当宣传干事，现还在。战士落后的人也这样说）。这时，我们给做解释工作时，这些人又说：“得啦！得啦！老一套，做什么政治工作？！”

经过惨淡经营，把窑洞打好时，便也有菜吃了（自种的），还稍微差了一些。说怪话的干部也很多。四一年起，开始整风，召连级干部开始，整了 7 天 7 夜，先整出许多特务来，政治工作的干部有些便是特务。整风结果召集班长以上会议传达后，情绪开始转变，于是紧接着就进行建立革命家务的教育，并进行比赛，首先在党内动员，把党员思想弄通。党内由各小组比赛，部队中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个人

与个人比赛，比赛时订出双方的条件。当时第二组是全连的模范，大家便都以它为标准比赛。竞赛开始，自己提出和全连军政干部进行竞赛的条件如下：（1）遵守时间；（2）不讲怪话；（3）爱护工具；（4）保障伙食（五钱油，盐每人必须吃到）；（5）反对逃亡，巩固部队；（6）减少病员；（7）轻病号仍参加生产。这样提出后，自己本单位首先立即实现了，经过此会后，下边情绪就高起来了。

当时，规定要开到三、四分；但开了一天，才开到二分五，于是有些人便悲观起来，不知何时才可开完。六连却有一个同志一天开了一亩，消息马上传开，旅与团的通令也下来了，于是我们就组织突击，提出一人一天开一亩，只有三个人报名参加，开了一天，开到每人一亩二分三，这个消息又很快传开，旅部又下了通令，而且来了许多负责同志来看我们用的什么工具，量我们的地，看到底够不够。这样一来，我们更有了信心，便号召每天开一亩，结果有 30 余人报名参加，第一天开了每人一亩多，最少的 9 分；于是便成立开荒英雄班，我被任为班长。后来 55 个人一天开到 62 亩。

根据现在情形，过去的毛病是有些政治工作人员光说不干；有些是特务捣鬼。在 7 天大会前，不满意生产的那些人后来证明都是特务。

我的经验，认为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注意处理问题的适当，把好的同志马上表扬，把坏的表现立即压下去，否则，好歹不分明，大家便麻〔模〕糊起来，不知学好，不怕学坏了。这只要在每天点名后，讲清楚，或设法公布就够了。其

次，要说一是一，说一句当一句，不能肯定的事不要说死了，应留余地；说了的一定要做到。开完收工，必须收工，否则下次便不信了，就会有拖时间，不努力出现。要关心战士，生活要搞好，要吃饱。三连二年多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原因就是教育抓的紧，有什么问题立即弄清楚，解决的解决了，解决不了的立予解释。我们生产，要有长期打算，不能把得到的东西都一下吃光，但对必须解决的困难也要给予适当解决，不能只积不用，也不能只用不积。

至于对老百姓要搞好，不难，我们要抓住老百姓的特点。农村老百姓一般爱点小便宜，所以应该首先先给他一点小便宜。我们应该首先自动给他开荒，锄地，收秋，请吃饭，但我们给他干活，不要吃他的饭。另外，应该进行乡民调查，了解他们之中谁好谁坏；有些坏家伙他不会说我们好，也不易和他搞好。一定要自己先了解了他们，然后对什么人用什么办法，也容易把军民关系搞好起来。

警三旅七团一营二连贺正清：

从请假制度，优抗工作，自己动手，整风，部队中有了分工领导以后，许多人的思想开始明朗化了，也有许多人说：“兵又能当了！”过去好多人的思想都麻〔模〕糊起来了，觉得国民党、共产党弄不清楚了，所以四〇年、四一年我们那里排以上干部的逃亡现象很严重。另外，“不要讲漂亮话，要实干！”的说法也开始了。我们那里，干部整风整了7天，战士整了两天，从整风中看到，有一半人是逛革命的，有些还是反革命的，有些还是糊里糊涂，好的看起很少。经过整风

以后，这种现象变过来了、现在是好的人占多数了。

当生产任务下来后，有人便说：“有 60 万生产基金，还为什么要生产？把 60 万元买成粮食放下，不省事么？！……”（李宗云，战士）。

有的便说：“今年生产下来，革命就成了功了……”（意谓把人熬死了。何之鸣，战士）。总之，有五分之一不愿生产的。另外也有些怕学习的，约五分之三，宁生产不学习。经过许多说服教育，说明“长期打算……”的道理后，便开始纠正了不愿生产的情绪。

后来，生产把生活改善了，所以，虽然很忙，也再没人说怪话了。

我们在秋收时，开展“张治国秋收突击队”，秋收便很快结束了。

在开荒完时，我们总结了一下，锄草完也讨论一下。秋收后，坏分子抬头，我们整了两天半风，进行时事教育，把坏现象又压下去了。生产时，我们是大家动手地干。

我们初到时，锅未带到，老百姓不肯借给我们用锅，经说服后，给借了；到我们自己的锅到以后，先尽他们用，这样一来，关系便更好了。三边老百姓要落后一些，他们是拾得个革命，红军打开定盐以后，白军一次未来，未经剧烈的斗争过（程）；我们开荒时，他们有的人便不高兴，认为开了荒他们没有放羊的草场了，经解释后便没问题了。在原来，老百姓以为我们把打下的粮不知运到延安或交给谁去，后来看到我们将粮交了区乡政府保管，并未运走，就高兴了。当环

境紧张时，有些老百姓就消极起来了。认为我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国民党马上就会来。经我们向之解释不要怕，我们绝不离开，这样，他们才安心了。我们和老百姓很好，他们请部队吃饭，住在一起，前房部队住，后房他们住。特务在部队里组织逃跑，破坏团结，破坏生产纪律，影响了生产情绪，但经发觉解决后，情况便改变了。

干部和战士同甘苦。坝〔耙〕地的时候，许多同志白天晚上干。

我们那里生产所以能够完成任务，据我的了解是由于经过动员，大家了解后，自愿干；领导上则对于组织配备搞的好。不能将好的完全另组织起来，那样，不好的就不肯干了。再则由于人人都肯实干。

三边老百姓因为觉悟程度差，而且那里地广人稀，人力比较缺乏，一到锄地、收秋时，有钱无法雇到工人，因此，只背包庇逃兵。我们那里的逃兵有的跑到蒙地去了，有的就隐藏在本地，有的回家去了（因为都是边区人，大多数是警备区、延属的）。三边老百姓包庇逃兵，我不是空话，是有事实的，如张知（二连，回来了）曾逃在老百姓家给人家雇工，后来他和老百姓关系不好了，引起老百姓反感，所以才被送回的。逃兵只求荫庇求食，藏者贪其工钱小劳力好，因为这些人生怕人家不要他，不敢不好好受苦。

后方也有不良家属，活动战士逃跑。清涧有个刘延祥，当其请假回家时，他的叔父便劝他再勿归队，住在家中一切他给帮忙。好在这个战士还好，对他叔父说：“我的兵还没当

够”。他这位叔父闻言说：“不识抬举的东西，没当够去吧，老子不管了！”听说因为有些人请假后不回队伍，所以不□来请假者请假，这样是否妥当，值得考虑，这样影响下边许多人。

另外，暗中流传一种说法，说归队只归新逃兵，去年前的不归了，这样使得很多人说：“开小差开迟了！”追悔过去不开小差。提议政府应把归队工作注意。

三八五旅四团六连武生华同志：

家属活动部队开小差。我们团部理发员绥德人王超英，七月间在卫生队休息时被一个抗属将他活动去后，走到保安被我们挡住，但发现这位抗属从家中动身时，从区乡政府开路条时，已替被活动者将路条开好（这位抗属在政府开路条时本已开到，假说丢了，又补开一张，结果将一张自用，一张交给被活动者）。此事请政府注意。

陈部长：

时间很晚了，有些个别问题可向联防司令部提出解决。还有什么个别问题亦然。

陈与张等交换意见：联政应召集他们收集些各种问题意见。

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的政策

——南泥湾全部工作的发展①

(一九四三年)

南泥湾是“陕北的江南”。在这里我们首先把南泥湾目前具备着的自然条件与今后实际工作怎样密切的结合作一全盘轮廓的概述，作为关心和实际参加开发建设这一地区同志们的参考资料，以便共同协商订定开发和建设更合理的计划。

那里是有山有水，有引人入胜的风景，有蕴藏深厚的自然富源，青葱繁密的丛林，矗立云霄的乔木，有长期不谢的野花，有琳琅满目的山果，成群的野猪，凶恶的狼豹，山中有疾走善跑的麋鹿，林中有美丽善鸣的翠鸟；有清澈明晶的溪水，蜿蜒不断的河流，有宽阔平坦的川面，肥沃待垦的良田，可以开辟稻地，可以捕鱼养鸭，富源深厚，蕴藏无穷。这就是南泥湾目前具备着的真实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而这仅仅是自然的条件，自然长期发展过程所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怎样来有计划的步调一致的合理的开发保持和利用，也就是说把这优美的自然条件与我们今后的实际工作怎样结合起

① 此材料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边区研究室。

来，尚是一个亟待展开研究的问题。在建设新的南泥湾与更进一步的实现南泥湾政策与屯田制度的前提下，我们首先应把那里开展和建设应走的道路作如下的申述：

（一）关于全部土地分配、区划整理问题

这是一个新开发地区的最基本的问题，尤其是投放大量的有组织的人力开发一个新的地区，而且在革命基本根据地创造有历史意义的建设上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须作长期的坚持与奋斗。首先是全部土地应作合理的规划与配列，农地、林地、牧地各应占全部地积的比例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规定着：每一个地区的土地农地应占全部土地 50%，林地 20%，牧地 30%，而且林地牧地均应分配在山上，川地除了应保持的树木（道路两傍之行道树，河流两岸护河与护堤塘的树，以及庭院风景林，果林苗圃等等）外，一般不应浪费土地，再另划林地。

每一个地区（机关农场与部队屯田的地区）庄园与村舍，所连属的土地应按已有的人数作合理的调整与分配，哪一段川地应划归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庄村村舍，或某几户人家；哪几个山峁坡地从哪里开始终止在哪里划作某一个部队或农场；另外几个山峁与坡地则又分配给某些村舍人家。这一切土地与分配的原则，应该是以居住与土地的联〔连〕接性、工作与管理使用的方便性、全部土地的好坏配列的调整性为依归，站在开发与建设任务的共同立场上，不应再有争执和纠纷，应当是互相帮助与工作关系上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和配合。各部划分的土地应当是依次限期的开垦起来。在限期垦荒的

过程中，应检查各个单位与部门在所划定分配的范围内开垦的程度，以便作某些区〔局〕部土地的重行调整与防止贪占的倾向。

土地合理的整理与使用。各部份〔队〕及人民在领到分配的土地后，应该执行合理的整理与按规定的使用，如某些地区河渠道路应该怎样设计整理，疏浚改道，建闸修桥，辟塘开路等；某些土地应划作水田或园地，园地和水地又应怎样的规划和区分；山地的规划布置；林地牧地的划留；农地的开垦；山渠沟洫贮水防冲的设置，以及庄园村舍、庭院、场所规划布置总期使其顺应自然地形，整理得井井有条，脉络系统整然一致，既美观，又省力，既合理，又便利。

（二）关于疏浚河道、□水节流、蓄水的种种方面

为了更多的开辟川地与合理的利用川地，首先就应当来增辟水地与稻田的面积，因此在这一地区疏浚与整理河道首应提进议事日程中，作为急迫切的紧要工作和基本的工作之一。并为了节制流量，使河水流量能永远不竭，供给需水，因此，蓄水贮水亦为必要工作之一，在疏浚河道时，于适当地点应筑塘设池贮水，以备流水不敷时之急需（如插秧与天旱时）。

为了防止山洪暴发，河流泛滥计，在开辟山地时，逐渐配合开设沟洫，一方面在山地土壤毛孔中蓄水防旱，节制暴雨冲刷洗涤田面，另一方面可以将山坡陡地逐渐淤成梯田，这是一个耕种山地长期奋斗过程的目标，又为保持地力，防止山洪冲刷（水土保持）、河流泛滥的治本方法之一。此外在拐

沟、各个支岔逐渐筑坝淤田，或设置水库蓄水，不仅为防止山洪泛滥的，另一方面往为在河流上游培养涵蓄水源，以利下游农田灌溉的永久办法。川面倾斜陡地或拐沟条地，应修筑淤田设置，此等设置不仅可以淤田防旱，培肥土质，有增进土壤生产力之强化作用，亦为节制河流泛滥有效方法之一。

倘今后在全区开发与建设上能有计划的逐渐一步一步的实施，此种疏河辟田、防水蓄水、治水淤田的种种具体办法，则延河二、三年以来狂发大水，泛滥现象之灾害，将不复重见于今后南泥湾与临镇川了。因此，整个河流下游之安全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了。基于上述的种种作法，在本地区实行精耕制度，增益同一单位面积之产量，又为今后农业上耕作上基本的方针之一。

（三）关于森林树木开发与保护方面

所有山坡阴面现有的林地（面积不会超过地积总面积20%），应规定划作“永久的林地”，在驻扎部队、农场村庄面前的林地并首先确定产权，分配给某个单位或农户。在分配后，指导以人工修整的方法限期修整，在修整完善后，并规定只能按期间伐，轮伐，与林地更新的采伐办法，绝对禁止滥伐，及不合理砍伐，如拦腰砍，洗山的砍，剃头割韭菜的砍伐等，更不能无限制的将林地垦为农地，破坏土地上一定森林面积之比例，以造成永远不断的灾荒（水灾，旱灾等）的局面。

部队、机关、人民等所设的伐木厂或材料厂，如欲进入未经分配地区（如林地或沟岔）或划作公有林地内进行采料

拉板取材等工作，应先行登记，经指定在一定地区内照规定采伐与保护森林办法进行采伐工作，不能滥施砍伐，以破坏森林而违法纪。

为了保存大料（大的公共建筑用料）及安全树（如河堤护岸树）、风景树（庭院、坟墓、庙宇、名胜等地的树）起见，所有在大川川面之大树及树木，禁止随意滥伐。凡本区域的居民、机关、部队均有保护的义务，在一定地区之大树，划归一定区域内之机关、部队和人民负责保管〔护〕。

阳面山坡垦种农地内之成材树木，在分配给垦种的单位或人民方面，均须本爱护材料之精神，修整保留，作为以后取材及保存资源之〈防止〉枯竭，并规定地区划归某个部份〔队〕或人民，该树木即划归谁整理归谁所享有。

所有全区森林树木经过这样合理分配管理和修整间伐、轮伐，以至更新的采伐后，林地在这一地区将有无限直接间接收益和取材之利，将造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林地巨大的收入（如木材燃料、染料、果实、木耳、蜂糖、狩猎、药材、牧蓄……等等）〈的〉南泥湾，陕北江南的美名永远将能保持着与培养着，而且在滥伐与不合理的砍伐消灭与根绝后，林地与农地面积的对比确能永远保持一定的比例，因之整个地区气候的调理雨量的保持（森林地带多雨），雨水的涵蓄与保存，水源的培养，河流泛滥的防制，河堤的溃决，田面洗涤冲刷等等为害将都能避免，而得到相当的成功。

（四）关于这一地区社会发展前途的展望

在目前社会物质基础与政治组织领导上，这里社会发展

的前途和远景应当是三个新的不同的类型的出现：第一个类型是农村中个体农民发展后〔为〕新村式的景象；第二个类型是机关创办的公营农场发展壮大为庄园式的景象；第三个类型是战斗的屯田部队发展为建立公共而富有、大家务新的景象。让我们先来诉说第一个类型社会的远景。首先说明在目前农村生活的条件下，我们所要建立的不是集体农庄式的农民生活，也不是像空想派企图妄想建立什么理念的社会制度，更不是像反动派所想像的永远保留着旧的社会遗规；我们一方面清楚的了解了目前社会的物质基础（个体农民的小生产）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不忘记在此社会基础上一定的先进的政治教育的启导作用与一定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诱发作用。我们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之现实需要作出发，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乡建派、平教派某些作法有类似之处，因为大家都是从社会的物质基础（小生产）所出发，但基本上我们思想不同之点是我们认为适合这一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一切作法是一个过渡的作法，是替下一阶段社会（更前进的社会制度）创造下必要的成熟的条件；我们毫不妄想企图保留这前一阶段社会的任何社会制度和遗规，而为下一阶段社会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和法则：空想派他们始终想把社会发展停留在一个理想概念上，不从现实出发的空想来改造社会；反动派始终想保留这全套的旧的社会遗规和社会制度而永远的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的要求，我们与他们的思想分歧就在这里。同时在这里应当了解，南泥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它应当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转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整

个边区的进步发展，而促进它的进步和发展，绝不能把它单纯的与外界隔绝来看待；它将是边区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前进更合理的雏形与模范地区；它所以而且必然发展在一般社会前面，是可以断言的。根据上述这一不同原则出发，我们目前所需要建立的新型的农村社会和农家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

我们要求在每一个旧的或新的移进去的农户家中，在他所进行的生产基础上与生活需要的条件下，在一年到三年以内，逐渐按步〔部〕就班的做到改造他原有的局促狭隘不整洁的住所，逐渐的修整或创造一所一户一户相连的清洁整齐宽敞而舒适的住宅；在每一所住宅内，能具有一个宽阔平坦的院落，能具备三孔至五孔的窑洞；在窑洞内是那样的整洁和布置得井井有条；院内是那样的清洁和有秩序——在一定的处所有牛棚、驴圈、猪舍、羊栏、狗窝和鸡鸭舍、厕所、粪堆和垃圾坑、柴草场和打麦场，院内和行道上植有庭院树和行道树；在距这一村庄不远的对面越河那边高埠和山坡上，就有他们每一家人户修培的园林——果园和各自划分下的永久林地。这里的果园是经过接木和剪枝的，林地是经人工修整而未破坏的自然林；村庄临近着河流，而这河流所经的道路是经过全区集体人工联合修挖与疏浚的，河旁植有荫柳，夏日可以荫凉休息；紧靠河身不远的一线是修筑的平坦而宽阔的干道，在河流与干道交叉的地方是建筑好的桥梁，河水是那样的清澈明晶，可以充作饮料，可以牧饮牛羊，可以灌溉，可以洗涤；河中有自由的凫鸭、又可以培养着莲藕、象征着

这个社会是那样的自由舒适：在这溪流的一旁，有每户人家新辟的稻田，田埂是那样的坚实与整齐，田里栽植着新稻；在稍高的小坪上是每户接连着修筑成畦的园地，种植着各种时季鲜菜；距村中不远的这一大坪上，就是这里人民自己开垦而每户登记下的土地，这土地是顺着自然的地形一家一家的排列着。这划得是那样的合理和耕作上那样的方便，这里实行着精耕的制度——深耕、施肥和尽可能的灌溉，引用灌田法；每家农民都愿接受中心农场技术上的指导，引种着他们所发给的优良品种，和接受着改善的作法；村子背后的高山上，每一个山丘小峁，在开荒时是几家联合变工开的，因此这个山峁是属于这几家人的，各占据划分了的一方，这样〔里〕山田开辟沟洫和沟岔，修筑水坝淤田，或筑成水库，那都是在农暇时各家联合进行的；在这一村庄里，每家都有足够耕种的土地，设有公共的碾磨坊，大的村舍还有村公所、小学，并附设着成年补习学校或识字班；妇女们都会纺织或经常在田里协助男子们工作；此外农民们还有各种组织——自卫军、慰劳队、优抗队以及妇女青年儿童的种种组织；人民由于能安居乐业和生活上的改善，因此在文化与政治教育上是日益提高与进步着。这就是不远将来将在南泥湾出现的新型（新民主主义的）的农村社会发展的远景的轮廓方向。

其次，第二个类型是正规化的公营农场、庄园式的发展前途的远景。这里与第一个新型的农村社会远景不同的特点：第一，由于它是机关公营的农场，所以它的一切主要的财产——如土地、房产、耕具等应当是某一机关公共的、集体的。

第二，它是集体劳动经营的。第三，其组织形式有下列三种：（一）劳动生产人员如果是被雇佣的，则其主要负责领导人应选择能力坚强和思想正确的来主持，其经营的方式应当采取富农式或资本主义式进步经营法；（二）如果系按〔安〕插编余的老弱残废同志，则应当订定分给他们优厚的生产成品及合作的办法，以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和安定他们的工作情绪，另外除了订定他们互相合作办法，共同经营公共的农田外，还允许在某种限度内兼营若干个体的私人的生产；（三）如系工作人员业余生产的公营农场，则首先应根据农场经营的范围确定主要的劳动人员人数及其待遇和生产成品提成的办法，以鼓励与安定其工作情绪；其次，辅助劳动应很好的组织来配合。公营农场不论采取上列何种形态和经营办法，均应确定其经济经营的观点，纠正过去公营农场没有正确核算制度的建立；其农场发展前途的远景应当是大家族式的富有而深厚的公共累积的财产，其一切农田规划、庄园设计建设、道路布设、河渠修理、果园林木的培养等等，应当是上述第一类型一个农户扩大的组织和经营，并且一切作法应为群众的表率和模范，这一种农场创建的基础将来应当是一个进步的社会组织形态。

又次，第三个社会类型是战斗部队屯田，大家族丰裕兵营式的生活发展前途的远景。战斗部队屯田，在这里，社会是一个特色，而且是促成与推进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力酵素。他们是以战斗的精神集体的形式来进行自己的公共团集〔体〕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充实与发扬战斗的力量、建

立公共的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家务。这在历史上将是一个创举。与每一个朝代更替后的“偃武修文”、“重文轻武”编遣式的消极屯田有不同的丰富的历史意义与时代背景：屯田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应以连队伙食单位为基础，而团、营则立于总的领导地位照顾全局，指导全局，使得各单位步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的一致的行动；由于他们是结合着多数人的集体生产，因此在工作上能进行着社会式的分工，这就给了他们以社会性的劳动生产分工与结合的力量，工作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竞争心、激动〔积极〕性、组织性是大大的加强了，因此工作的一致性、整齐性、迅速性、规律化也是异常的强化了。掌握了部队的集体生产的这些特点，与配合着南泥湾优越的自然条件，这第三个类型新的社会——屯田部队大家族式的丰裕生活是很快可以获得的。我们很简单的由他们今后的日常生活直至进行生产与生活的改善、精神的充足饱满、战斗的强化，以及建设新型的南泥湾屯田部队的应有责任与作用作一个轮廓的概述：

每一个连队应有计划的建有自己的整洁舒适而宽畅的住所。这一方面是兵营，有着严格的集体生活纪律；另一方面又是庄园家族式的大田园，因此这里兵营人们——战士们不感到士兵生活的枯燥、机械呆板，而是感到集体生活的愉悦幸福与美满，充满着无限活跃的气象，和追慕着更好前途的到来。他们经常是三种生活围绕着——军事的教练，生产工作的开展和文化娱乐工作的配合，而这三种生活每日时间的支配是因各个季节时令而不同的，农忙时以生产为主，农暇

时以军事教练为主；他们——每个连队不但建有舒适而整洁的住所，兼有自己集体的文化娱乐的场合，这里具备着各式各样的娱乐玩具和各种报纸杂志、画报……等精神食粮，有各种乐器——京胡、二胡、笛子、三弦、口琴……等中西乐器，还有乒乓球、象棋、军棋、跳棋、扑克牌，有书报、课本、自编的乐谱与歌词；在这里是有各种纪律的，而这种规则和纪律，人们——战士们惯于自觉的遵守，没有发现任何人有意的破坏，也没有感觉到要勉强的遵守和强制的执行；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有政治上更远大的前途——革命军人的责任；春天来了，他们娱乐文化的生活可以搬到野外田园里，一边一个口令，劳作随着停止休息下，另一边的音乐歌唱起来，普〔扑〕克、军棋、跳棋也摆起来，这样人们虽在极艰苦的工作——开荒、筑坝、疏浚河道……等——中，也没有感觉到疲劳与厌恶；这里人们崇拜着劳动，尊敬着劳动——劳作神圣，劳动创造一切，和鄙视着不劳而食的人；劳动英雄是最崇高的称号，受到每个人的重视与尊敬，因此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是百倍的紧张着，无限的提高着，好似在战斗中与敌作生死斗争一般。

庄园前后左右不远的地区，就是划分给自己单位的山川的荒地与林地，这荒山荒地是等待着虎狼般战士们的集体劳动来开垦的，不久这荒地就变成肥美的良田佳境，下种着杂粮，生长的异常茂盛繁荣；这里田亩的规划、设计、区分是顺应着自然的地形、河流、道路来更合理的调整，区划与设计的、布置安排的是那样的妥贴适当——整洁平坦的田面，纵

横交错的沟渠，宽阔整齐的道路，有山田、有川地，有旱田、有水地；清澈〔晰〕的溪流，是集结着更大的人力来联合修浚过的；自从疏河、筑堤、设塘以来，水田是大大的增加了，水量也较过去充足了，河傍堤防植有整齐的一排一行的杨柳，过渡处有架设的桥梁，渡桥越河就是自己开辟的园地，园地规划设计布置更是匠心巧夺天工。这里接受中心农场的指导，栽培着各种时季可口的鲜菜，应及时供应着自己的伙食单位，园地还具备着小小公园的性质，设有花坛、园庭、茅屋角亭等，可供人们业余的休养、游赏；不远的高埠上就是培植的果园，桃、杏、梨、苹果、葡萄样样都有，这些虽还是幼苗，却都经过人工的芽接；对面的阴山山坡沟岔里，是划分给这一单位的自然林，这里有白杨林、桦木林、冈木林、柏树林和杂木林等等，这些林木都是经过人工合理间伐修整的，自从划分与修整后，不合理的砍伐与滥伐是根绝了，林木内的风景是那样的幽美，以致使入夏日进入林中总是留恋徘徊的不忍释〔离〕去。

秋天的景象是这样的优美——园林的树叶渐渐变色了，广漠而平坦的川地上的包谷豆类，以及对面的几〔脊〕岭山地上糜谷、荞麦穗粒充实，籽实饱满的成熟而待人收割。这些生长特别优良的庄稼，有一部分的种籽是中心农场供给的，栽培技术是受他们指导的。稻田由于土地的肥活，生长的茂盛，穗抽籽粒的累赘，间或有一陇〔垄〕陇〔垄〕一的新稻有卧伏压倒之象，这一切都象征着丰盈的秋收。园地里有果实累累的蕃茄待人下摘，肥嫩而硕大的萝卜生长吐露出地面高

约寸许，似乎迎人取用。绿油油而生长茁壮的白菜，亦最惹人注目。自从夏季以来，园中各种时菜——黄瓜、莴苣、豆角、辣子、大蒜……等等，除不断的供给新鲜的食用外，多余的蔬菜都加以各种的调制——晒、泡、腌、渍，以备春冬两季的调整与改善生活之用。猪羊鸡鸭的饲养，以及狩猎野味的获得，使全年肉食蛋品可以不断的源源供给，有时过多的肉品又经风腊调制，制成便于贮藏耐久，携带赠送。这些调制的肉品除了调理与改善自己的生活外，还可以奉送敬爱的各级首长和慰劳休养的同志。

秋天的景象，人们——战士们首先忙于割庄稼，然后再收秋菜，然后打场，秋后藏菜，秋收冬藏，伟大的号召“丰衣足食”由政治口号而变为现实优裕的物质生活了，展览、比赛、评判、奖励，总结了一年的生产工作。冬日的到来，军事训练又加紧了。

部队自从在这里实施屯田政策以来，物质生活大加改善了，特别在拥政爱民的号召下，军民的关系更加团结亲密了，部队不仅参加了自己的生产工作；而且也常常协助人民的耕作和收获，特别是〈在〉改造与建设新的南泥湾上，如疏浚河道，开避道路，建设桥梁，修整森林，规划田亩，改良作法等，都给群众作了很好的榜样与范例，屯田的部队成了建设与改造地方社会的先锋、主力和骨干。

这一屯田部队创造下的公共的大家族式的财富，首先应归这些劳动的战士们享受，其次这一财富的积累和扩大将愈益成为支持革命军队的有力支柱。

为屯田制度实现而奋斗！
为执行党的南泥湾政策而奋斗！
为丰衣足食，改善物质生活而奋斗！
胜利就在面前！

关于手工业作坊几点经验总结^①

(一九四三年)^②

概 况

1940年起，西北局、西北党校等机关即注意到设立作坊，供给机关食用物品，可以节省开支，减少商业剥削，而且食用便利。首先是开磨坊，去年又开杀坊，不过还不普遍，不够重视。今年党、民系统手工业作坊有很大的发展：

各单位设立作坊种类投资状况表

投 种 资 类 单 位	磨 坊	杀 坊	豆 腐 坊	皮 坊	炭 窑	染 坊	总 计
西北局	26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西北党校	50000*	140000	30000		20000		
抗 联	80000		35000		35000	50000	
共 计	390000	270000	205000	150000	55000	50000	1120000

① 本文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

②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注明：（一）投资数有*者系估计数；（二）炭窑是西党校、抗联合开的。

以上共计 11 处作坊，其中 4 处是去年旧有的，4 处是去年底及今春季设立的，3 处是夏季设立的。参加作坊生产人员约计 75 人，公家人 25 个，占三分之一；雇工 50 个，占三分之二，这都是正式设立的作坊。文协的玩具工厂和业余豆腐坊未计在内。

各种作坊营业情形

磨坊、杀坊、豆腐坊、皮坊营业情形分别列述于后。炭窑尚未收到具体材料；染坊现已结束，资本有亏损，尚未总结完毕，故皆从略。

几点经验

上述几类作坊，除皮坊是商品生产外，其他皆供给机关为直接任务。检讨这多半年之成绩，供给任务一般的都完成了，如西北局、西北党校的磨坊、杀坊、豆腐坊，从今年 1 月至 7 月，供给物品数量如下：（估计数）

（单位）	磨坊	杀坊	豆腐坊
西北局	20000（斤面）	13000（大斤肉）	
西北党校	18000（斤面）	15000（大斤肉）	8500（斤豆腐）

这些物品完全不需要向市场购买，且价大都低于市价，又取用便利，这是很大的成绩。

但从营业上检查，则有的赚钱，有的不赚，有的甚至赔钱。赚钱有西北局的磨坊、皮坊、抗联磨坊，其中西北局磨

坊赚钱最多，截至 7 月底，以折实计算净赚 63 石麦子，相等于投入资本（按每次投资时间市价折成麦子）全数的 72%。赔钱的有西北局豆腐坊、抗联豆腐坊。西北党校的三坊实际也不赚钱，可能赔钱。根据上述各坊具体材料来看，可以知道办作坊的为什么赔钱。赔钱与赚钱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看作坊的经营方式是否能将作坊的经济损益与参加工作之干部、工人他们本身的责任心及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机关工作形式，如西北局之豆腐坊，参加工作者的伙食待遇完全由机关供给，其责任就是供给机关吃豆腐，他们只要把豆腐做好，够机关上吃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营业上赚了钱与他们没有关系，赔了钱他们没有责任。这种办法是不好的。另一种是独立营业的形式，如西北局的磨坊、皮坊，机关只投资，参加工作者独立营业，吃穿自己解决，再谋获利，这样加重了干部责任心，赚了钱是他们之成绩，赔了是他们之责任。这种办法比前一种好，但这种经营方式中管理者与工人还不一致，工人的利益是工作少做些，吃的更好些。若采用合作社之方式，所有资本劳动力都作成股份，这样赔了钱全体工人管理者都有责任，赚了钱大家都有利益，可以高度提高劳动积极性，及进行必要的节约，则作坊可保证获利。所以，今后机关开设作坊，应该是供给任务，营业方式，而最好是合作制度，这是目前机关作坊中心问题。

第二，要看作坊之劳动力是否能充分的使用。最显著的例子是豆腐坊，一个豆腐坊至少二人一驴，每月可做 5 石豆

子的豆腐，但西北局豆腐坊每月只做两石多豆子就够吃了，仅使用生产力 50%。抗联的豆腐坊每月只做 1 石 2 斗豆子就够吃了，仅使用生产力 25%。又如杀坊两个人每天可杀 8 个猪：西北局杀坊每天只杀两个猪，至多 3 个猪就够了，仅使用生产力 20~30%，这样生产的利润少，甚至不够消费，营业不仅不能发展（即扩大再生产），反而赔钱。研究劳动力不能使用之原因，是由于计划性差。今后要根据需要量计划生产量，配备需用人数，合并豆腐坊、杀坊，以节省人力，或大量发展副业（如喂猪），以充分发挥劳动力。

第三，要看提高技术。一般说，手工业作坊要有具备一定程度的技术人材才能开办。在工作中劳动力之使用要加上相当的技巧，而市场竞争的法则必然是技术越高获利越大。现在机关作坊历史都很短，技术水平比较低，如西北局豆腐坊每斗豆子最多出豆腐 50 斤，比之杨家岭 63 斤还是大有逊色。皮坊出品货色不大好，卖价要低。因此，今后要研究技术，奖励技术提高。

第四，要看经营管理方法是否周到完善。根据这一时期经验，今后经营与管理方法上，要注意四个问题：

1. 存贷不存钱，避免物价上涨白吃亏。
2. 采买原料，路远的要做来回生意，可多获利。
3. 与老百姓合股或雇工，要找真心积极生产的人，和他们好好的合作，要防备带二流子气的及另有打算的人混进来。
4. 要改进与提高会计技术，做到帐项清楚，容易结算；做生意损益要以折实计算。

关于开设皮坊的总结^①

(一九四三年)^②

一、成立经过

今年四五月间由陈尽美同志在农场谈开炭窑事，曾说有个常有珍，闲谈中说到他过去曾在某处开过皮坊，说以后炭窑弄好还可以开皮坊的。后来，陈又同去炭窑一次。五月间，常自来西北局要求开皮坊，说有5万元资本即可。当时言明条件全作坊共算7股，我们出5万元，再加一个技术工人作5股，常本人和工具共作2股。

六月九日，我们拿出5万元，派黄俊儒同志同常出去买皮子，结果把钱都买成了皮子，无法周转。我们又投资10万元，并在磨坊附近拨一个石窑，在七月下旬才开始工作。开工前后陆续购买原料、物资及家具，列表于后：

① 本文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

②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家具一览表

家 具 数 目	项 (平均数目)	单 价	数 量	总 值	用 途
大磁缸		1197	11	13167	熟大皮用
小磁缸		516	6	3100	熟羔皮
长板凳			1	500	铲皮子
骚 子			1	200	骚羔皮
白 布		60	5 (尺)	300	工人围裙
大木匣		1000	2	2000	盛熟皮子的米盐
大方桌			1	1500	做大皮子用
瓷罐子			1	80	放熟皮子的油
拧 车			1	200	打小麻绳
夹鞋板			1	100	锤二甲用
粗洋皮		200	9.7 (尺)	1940	包羔皮货用
绳 车			1	3200	打大麻绳
毛 毯		1300	2	2600	铺锤案用
锤 子		110	2	220	做大皮子用
拉绳板			1	500	拉皮绳用
(带小钳子)			1		拧皮子用
剪 刀		450	2	900	剪皮子剪毛
顶 针		30	5	150	缝皮衣用
皮 箱			2		放贷
案 子			2		缝衣
小凳子			5		坐
大铁锅			1	4000	熟皮子用
帐 笔			1	1000	
日常用具			15	4640	
灶房用具			50	8135	
其 他				2600	
总 计				55602	

购买货物表

货名 数项	单价(平均数)	数量	总值
白羊皮	120	120	14400
黑羔皮 (内有标皮 200 张)	122	1212	148060
黑羔皮	40	255	10260
白羊皮	70	158	11100
牛 皮	80	240 (斤)	19040
狗 皮	250	4	1000
猪 皮	200	3	600
驴 皮	400	6	2400
骡 皮	66	30 (斤)	2000
骡屨子	190	50 (斤)	9500
麻	120	67.5 (斤)	8040
棉 花	850	2 (斤)	1700
共 计			228100

二、开工后的情形

常有珍在六月二十九就开始熟羊皮，我们调菜园子老王参加，后又分配别的工作，另找不到人。有张仲义（生产科作商业工作的）的侄子张志成从国民党区域来，会作大皮子活，张介绍来，即参加皮坊工作。七月初庆兴隆要定做 400 套

皮衣，1500元一套，常有珍说有利，要定。机关上考虑过恐怕不行，即制止。到七月中，以2000元价定做了100套，言明九月底交货，预收货款200000元，当时计算每套成本约1000元，100套可赚10万元。当时即将款大部“探买”（也是定货的性质，先交钱后交货，价便宜）羊皮。黄俊儒同志和常有珍出去买货，张志成在家照料，并开始熟牛皮。

七月二十七日开始做皮衣，雇了两个人，至八月三日又雇两个人，连常有珍、张志成共六个劳动力，黄俊儒同志管帐。截止八月底，制成品如下：

(一) 羊羔皮407张，熟过每张需米1合，盐1两，共计米4.1斗，盐5斤10两，费工30个，铲、剪、裁费工10余个，缝成黑羔皮褂子2件，黑羔小孩抖袍4件，白羔小孩抖袍1件，黑羔大衣7件半，白羔大衣5件，黑羔大衣领19个，费工约60个，余碎羔皮若干，尚可做帽子用。以上羔皮买价共21160元，米以860元计，盐以10元计，工资（工钱、伙食杂支）以每个850元计，外加线、柴等用费2000元，共合成本52465元。

以上各制成品，据现市价估值74000元以上，且不难销售，可得纯利22000元，利率40%。

(二) 常有珍不会做羔皮，上述羔皮货是雇的一个米脂工人做的，常会做大羊皮，熟羊皮曾熟坏了50余张外，熟出200余张，每张需米2合，盐1合（约3两）共费工30个。现在已缝起大皮衣15套，计每套费大羊皮5张，熟、铲、裁、缝起统费工2个，计羊皮买价每张125元，5张共625元，盐、

米工资同上，外加线、柴运费估计 100 元，每套成本约 1345 元，现市价约 3000 元，我们定做洋 2000 元，按定价每套获利 650 元，利率 45%，15 套共赚 9750 元。

(三) 张志成从七月中即开始熟牛皮，共熟出牛皮 240 斤（小秤），用硝 25 斗（4000 元），米 2 斗（1200 元），石灰 60 斤（240 元），清油 24 斤（6000 元），稍带熟出标皮子几十张，又买麻 67.5 斤（8040 元），雇人打成绳子（工资 2680 元），制成各种牲口运输用具，又用线及买铁环等零件若干（约 15000 元），共费工 50 个。制成品已售一小部，余见后面“存货一览表”。计算成本如下：牛皮原买价 19040 元，费工 50 个，12500 元，加上各费共计 68700 元，制成品连同卖出之 11000 元，总值约 120000 元，得利 51300 元，利率 70%。本来还可以多卖些钱，因技术不太好，货的成色差，须便宜一点方好推销出去。现已决定不做大皮子活，张志成改学做皮衣。

此外，做外活得工资 12000 元，八月中卖给制革厂标皮 100 张，价 16000 元，按买黑羊皮平均价可赚 3800 元，连同以上三宗，共计可得利 98000 余元。但也有损失：(一) 熟坏了 50 多张黑羊皮（标皮），按平均价计即 6000 元；(二) 猪皮 3 张也坏了，原价 600 元，此项损失须于盈利中扣除。

以上是皮坊的工作情况。以下再说皮坊的人事情况，这一个多月的开工时间，暴露出各人的情况如下：

(一) 常有珍不是个安分人。当常和黄俊儒同志第一次出去买皮子时，就到处向老百姓吹“我们是西北局的”，在某处

看见老百姓有吸洋烟的，就说他能带洋烟，老百姓问“你怎么能带出来”，他说：“咱不带便罢，要带时就保险能带出来。”回来后不要他多出去跑了，他不高兴。最近检查时，把他藏的几两（烟）土搜出没收，他就公开的说：“原来是想借西北局名义发大财的（贩烟土），早知真正搞皮坊就不来”。原来他是想以给西北局办皮坊名义大权在握，贩烟土赚下钱，主要自己入包，分给西北局一部分，现在见我们黄俊儒同志对他监督很严，早就想干了，自己技术又不高明，对真正办皮坊能否赚钱没有信心。日前黄同志向他说现在结算赚十万多，他才又心定了一下。

（二）常有珍、张志成二人技术都不太高。常原自吹是行家，什么都能行，结果开工后，第一次熟皮子就坏了十几张，后来还熟坏过，共熟坏皮子 50 多张；又不会洗皮子，听别的皮坊的工人说，是在皮子熟过后就用肥皂水洗，洗过再撒上米面，干后，把面抖撒下来，就颜色白，光泽好，再缝。常是先缝起来，再用毛巾抹在毛上一点肥皂水（因皮子已干不能用水洗），结果反把皮弄的不好看了，另一工人就说他有办法，用麸子洗，结果麸子夹在毛里边，出不来，只得买梳子梳，这样费过几遍手，毛还越洗 越黑了。张志成也是能吹，他是做大皮的（牛皮），到市场去看了一回，说市上东西也都会做，结果做的东西大都不好，首先是皮子熟的不好，硝没出完，皮不亮，且不结实。其次皮条切的不均，宽仄〔窄〕不匀，拧成绳子也不匀，第三天□水对头，准备卖给运输队的笼头、叉子等，有的太小驴都带不上。因此，本来讲好了机

关上运输队买皮坊里的货，运输队需要七八万元的货，结果只买了皮坊 1 万多元的货，其他都向市场上买去了。

(三) 雇佣工人情形。除常、张 2 人外，共雇 4 个人，1 个米脂人，是二等技术工人，专做羊羔皮活的，工钱 4500 元；其他 3 人都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都是学手，在工作中的表现有一个是贫家出身，能吃下苦，工作好，学习也用心，工钱 2000 元；其他 2 人都不大踏实，不安心学手，是为躲壮丁来的，想回家又怕拉壮丁，工钱 1700 元。工作速度：二等技术工人每天裁皮衣，缝成一件，还要指点学手的。学手的三人中，前一个每天做好可缝成一件，后 2 人须三天缝两件。常有珍在八月下旬以前，虽当工头，实际领导作用很少，反常常和工人在一块谈论到别处去可以多挣钱，后经黄同志批评他才好了。现在因羊羔皮已做完，已将那个米脂工人辞退。

由上边材料看来，皮坊是可以获利的，但劳动力的组织和发挥上是够的。主要原因是常有珍这个人品质不好，想贩烟土发横财，不肯安心作皮匠，工头不努力干，雇来的工人就更难积极了。但最近常有珍的工作态度较前好了，这是因为他的贩烟土的想头已无法实现，而黄俊儒同志又算帐给他听，说已赚 10 万元了，他又看到他的七分之二，也是有利可图的（以前他实际对办皮坊赚钱无信心），所以又想干下去。以后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皮坊越能做的赚钱，就越能吸收他积极性提高，可见这一点是可以改变的。

三、营业状况

皮坊是个资本周转较慢的作坊，譬如七月买皮子，八月

制成商品，九月卖出去，须三个月周转一回，至快也得两个月。现在才正式开工一个多月，要计算营业状况是很困难的，现在只能勉强结算一下，以作参考：

下面是根据黄俊儒同志的帐单列成的收支对照表：

项目 收 入		项目 支 出	
资本	150000	买皮子	226400
预收定货洋	200000	买熟皮子原料	38210
现 卖	20170	脚 费	3660
做外活工资	12600	买家具	55602
借 款	12116	工 资	19330
赊 帐	18200 (麦子)	伙食 (路费)	430305
同 上	9600 (米)	杂 支 外 欠	6665 24346
共 计	422686	共 计	4172435
	5442.5		

注：

(1) 此表中买皮货钱数，与前购买货物表总数不一致，相差 1700 元，又原帐单中“熟皮子原料”、“脚费”、“工资”、“杂支”等项混在一起，这里分开的数目是根据他的帐计算的近似数。

(2) 支出项中“买熟皮子原料”项，不能算作消费，因这些原料的价值是转到制成品上边去了。其他“脚费”、“工资”、“伙食”、

“杂支”四项是属于消费的。消费达7万多元，是才开办时一般要比平常多些。

损 益 计 算 表

项 目 数 目	现有资产		资本及负债	
	金额	折实(小米)	金额	折实(小米)
资本			150000	(450) 33.03石
预收定货钱			200000	(600) 33.3石
欠 债			39916	(800) 4.99石
存货总值	486320	(800) 60.8石		
家具总值	55602	(500) 11.1石		
外 欠	24346	(800) 3.04石		
尚 存	5457.5	(800) 0.68石		
共 计	571725.5	75.62石	381916	71.59石
损 益	181809.5	4.03石		

说明：

- (1) 折实法：资本15万元，大部系于六月下旬拿到，当买成东西时，已是六月底七月初，故按六月底米价450元折，较合实际，预收货价20万元七月拿到，按当时米价600元折，欠债按八

月米价 800 元折。资产项内除家具系六七月购置按七月初米价 500 元折外，余皆按八月米价折。

(2) 现存货估价，本来皮坊只估了四十万元，有许多是按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估的。但这使折实计算上发生困难。因为估价低了折实计算就成了赔本，而事实上是不赔钱的，研究再三觉得还是按市价估值，而又按市价折实，比较切合实际。

现将存货表列后：

存货一览表

数 目 项		单 价	数 量	总 值
货 名				
羊 皮 制 成 品	黑羔皮褂子	3000	2	6000
	黑羔抖袍	1500	4	6000
	黑羔大衣领	300	19	5700
	白羔抖袍	2000	1	2000
	黑羔大衣	4000	7.5	30000
	白羔大衣	5000	5	25000
	黑羔皮袄	2000	15	30000
牛 皮 麻 制 成 品	大车 缙	1500	3	4500
	大车坐绊	1500	21	31500
	骡子后鞚	800	7	5600
	大绊 雄	600	5	3000
	驴后鞚	700	10	7000
	驴前	600	10	6000
	大岔溜绊	300	9	2700
	小岔子	700	7	4900
	大车鞭子	200	24	4800
	皮笼头	700	11	7700
	大岔子	4000	2	8000
	三 甲	600	19	11400
	大车硬屁	700	1	700
原 料	带 绳	300	1	1200
	麻架绳	1000	6	6000
	麻缰绳	150	19	2850
	小麻绳	70	51	3570
	黑老羊皮	200	793	158600
	白大羊皮	300	120	36000
	黑 小 皮	100	6	600
	狗 皮	200	4	800
	熟黑羊皮	1300	126	37800
	骡 屁	300	50	15000
其 他	牛 皮	500	10(斤)	5000
	石 灰	4	100(斤)	400
	油 线	500	4(斤)	2000
		3200	1.5(斤)	4800
	羊 毛	150	40(斤)	6000
	米	800	4 斗	3200
	总 值			486320

这样结算起来是获利了，获利 181800 元。究竟从那里获利的呢？此帐颇不易算清，原料品值币量的增加，是由于物价上涨，而制成品就有两重性，一重是因原料价上涨而引起之价格上涨，另一重即真正经过劳动创造后而增加的价值。现在分析如下：（这个分析只能是个近似数）

项 目		盈利计算表	
盈 利	物价涨后币量增加数	160000	
	加工后增值	102000	
	做外活工资	12000	
	共 计		274000
开 支	各 种 消 费	72685	
	债 务 差 额	15570	
	损 失	6600	
	共 计		94855
纯 利 益			179.145

注明：

(1) 盈利项中物价上涨而增加币数，系根据几种主要原料平均买价与现估价之差，约涨四分之三弱，计算约得 16 万元。制成品的增值数系就制成品估价数减去原料原价，再减原料应涨价（原价四分之

三)、再减投入其他原料如米、盐、油、硝等得此得。

(2) 开支项数 字见前收支对照表。

很显然的，盈利的三个来源中，只有后两个来源是真正的盈利，所以从“纯利益”项中再抛去物价上涨增加币量数才是真正纯利益，而消费是决不会假的，从真正纯利益中减去消费，纯利益就只剩约二万元了。

五、今后计划

皮坊是有季候性的生产事业，必须赶冬季的生意。根据现有人力、原料，计划再加油做两个半月到三个月，争取获利二倍至三倍，具体计划如下：

甲，工作方面：

(1) 现存黑、白大羊皮 1039 张，再给庆兴隆做 85 套，共用 425 张，五个人工每天缝三套，以上捎带熟皮子，计划于九月下旬至迟九月底完成。

(2) 余下的 614 张，我们自己做皮衣共可做 120 套，赶着于十月底做完，至迟十一月初完成。

(3) 十一月将驴皮 6 张熟出，把未做好的 25 个大骡屨做好，将牛皮 10 斤熟出，“马铲”两个及其他。

(4) 捎带着再剪羊毛 60 斤，做狗皮褥子两个。

(5) 有机会时做一点外活，但不能贪多。

乙，消费预算：

1. 伙食。按现在标准每人每月吃十五次馍，需面 11 斤 4 两，米 33 斤 12 两，肉 3 大斤，菜 30 斤，柴 90 斤，油 1 斤，盐 1 斤，调料 100 元，按市价计约 3700 元，六个人三个月须

70000 元。

2. 熟皮子原料及其他用品，需米 1.6 石，盐 180 斤，柴 500 斤，线 3 斤，及其他共计 34000 元。

3. 工钱，四个人三个月预计 24000 元（常有珍不拿工钱）。

4. 常有珍、黄俊儒二人棉衣需 20000 元。

5. 杂支及其他 10000 元。

以上共计 1580000 元。

丙、货物销售：

除庆兴隆的 100 套大皮衣钱已预收不计外，其他货物销售计划如下：

1. 现存的羊羔皮制成品，估价 70000 元以上，现已有人打问，先不急卖，押至天气渐冷后抛出，最低限度卖 70000 元，并争取超过。

2. 我们自己做大皮衣 120 套，估计至十月底定可涨至 3000 元以上，至少卖 360000 元，争取超过。

3. 现存的大皮子货、麻货，现估价值 110000 元，以后陆续卖出，争取再多卖些。

4. 骡屨 50 个钉好后，可卖 30000 元，连“马铲”狗皮褥子、羊毛，零货共可卖 60000 元。

5. 有适当机会时做 20000 元的外活，或再少多一点。

以上共计收入 620000 元，除去资本 150000 元，消费 158000 元，尚赚 312000 元，已经是两倍以上，若再将家具估价（那时旧价）100000 元，货物抛出价再大一点，赚三倍是

可以达到的（现在估计如能赚三倍，折实计算也可能在一倍上下）。这是假定今后几个月物价不再有大涨的计算，即使物价再有大涨，譬如说三、四个月涨一倍，吃食涨价，工钱增高，我们也不怕，因为在今年冬季皮毛制成品的涨价是不会落后于粮价的，一来皮毛制成品历来冬季上涨，二来今年农闲时运输业必较往年更旺盛，大皮子货销路不困难，布棉入口货不多，皮衣也必容易出售。

丁，提高工作效率

为了保证能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1. 常有珍过去是另有所图，对真正办皮坊赚钱无信心，但现在事实上他的“另图”受到打击，我们对他监督很严。另一方面我们用事实叫他看办皮坊是能够赚钱的。他究竟是七分之二，积极性还是可以发动起来的。最近工作比前好了，就是如此。以后还要加强他的责任心，保证不再浪费原料，货做好的。

2. 其他四人，张志成也给算工钱，可以提出工作好的（货做的好，做的多），每月底检查奖励，并真正以实物奖励；工作好的，物价再有大涨时，即酌量增加工钱，必要时抽出做外活得来的工资改善生活（这样提高工人的积极性）。

3. 黄俊儒同志要继续好好团结这些工人，经常研究实行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办法，并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一些宣传教育、工作。经常注意行情，找好机会销售货物。

货物陆续卖回之款，除消费必需之外，即时存成实物，米麦皆可。至十二月时可结束〔算〕以〔一〕下，除开支及分

红外，将款完全写成实物，至明年还要再办时，三、四月即筹备，另找技术较高、思想较好的人和他合作，条件再高一点也可，如有可能将全部劳动力都作为股份，采取完全合作性质，其劳动生产力比之雇佣劳动力定要高些。

关于开设杀坊的总结^{*①}

(一九四三年)^②

一、概 况

西北局和西北党校都开设杀坊，目的主要都是使本单位吃肉方便。西北局的是去年七月底成立的，西北党校是去年年底成立的。西北局的杀坊与磨坊加上最近成立的皮坊统一由一个主任管理，西北党校的杀坊也是与豆腐坊磨坊在一起的。

西北局杀坊开始赊猪、借工具白手起家，10月间才拨给资本1万元。头二月因无人管理，杀猪人捣鬼，未赚钱，10月间增设主任后，3个月赚钱3万元，存了些猪，今年年初折成8万元，内中固定资本占5千元。今年6月间又增加了5万元作为流动资本，总共资本13万元。西北党校的杀坊本身资本为8万元，同时曾独设置采买人员，采买资本为6万元，主要是为杀坊采买牲畜的，因此杀坊资本实际上是14万元，比西北局杀坊的资本稍多一些。

7个月来，这两个杀坊在保障卖给本机关、学校肉食上是

① 本文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

②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尽到了他们的任务，西北局内杀坊供给本机关大小灶各种肉类和猪油 11601 斤（肉均按大称，下同），加上招待所和各农场的肉食大约供给肉在 1 万 3 千斤以上。西北党校杀坊杀猪 269 口，羊 200 头，牛 25 头，大都是供给了学校。

二、西北局杀坊经营情况

西北局杀坊今年年初有工作人员 4 名，资本做价 8 万元。规定任务：第一，供给机关全年肉食，何时需要随即供给；要是新鲜好肉，不是病猪肉、死猪肉，并每斤减价两元。第二，全年盈利 16 万元。

一、二月间因经营不善，赔洋 2 万元。原因很多，第一是限价的影响，如当时暗市猪肉每斤 35 元以上，物资局规定的肉价格为 30 元，因此卖猪价贵而卖肉价低，这两个月来卖出的猪肉是起了折价作用，但因此赔累不少，第二是当时管钱上有毛病，猪杀之后并不过称，由杀猪人邝益胜零卖后自由交帐，杀猪人正是一贯贪污的分子，所以他交帐是有问题的。第三，本机关用肉每斤管〔单〕价低售二元。第四，此时主任领导上也有毛病。

三月间行政处长和总务科长检查杀坊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决定调梁瑞英同志来当主任。梁瑞英同志工作以后，自己亲手管钱，杀了猪都亲自过称一次，并监督零售，杀猪人作弊的现象克服了，平价此时停止，买猪卖肉也不再贴钱了，从此情况又进步了。但新的主要困难是采买猪的困难。第一是采买人不可靠，刘孝清消极怠工，欧明才是特务，贪污舞弊，都未尽到采买的任务，最近又调来了贾存义买猪；第二，自

从各机关改善生活，肉食增加后，猪源非常缺乏，而且猪价太高，加之买猪人眼力太差，又无耐心讲价，所以杀猪赚利太少。

今年以来，猪杀得不多，到七月底清算共杀猪 498 口，牛 5 条，毛利 175084 元，开支 73819 元，净利 101265 元。其实依肉价论是赔了，正月的资本和 6 月初继续投入的资本如均按当时肉价核算，应为猪肉 2830 斤，此 2830 斤肉到 7 月底值 480000 元，但 7 月底杀坊连猪带钱共为 230000 元，实际是亏损资本一半有余（总务科给杀坊、磨坊每人补助单衣 2 套，毛巾 2 条、肥皂 2 条，鞋两双，杀坊 4 人共约合 3 万余元，以及他们将自己存的布每人制一套衬衣，尚未计算在内）。

赔钱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数项：

第一是买猪的价钱太大，如 7 月份平均每口猪杀（后）卖得肉 34 斤，连猪油和头、蹄、下水在内才卖得 6902.8 元，而每只平均买价则为 6454 元，合肉 46 斤，杀猪一口才获毛利 448.8 元，即才赚肉 2 斤 13 两——本来买猪是按净肉买，一般可至少赚头、蹄、下水和猪油，本月买猪价钱却比净肉多出 12 斤的肉钱。

6 月份的情况更坏，每只猪买价 6300 元，卖油、肉、头、蹄共得 6521.2 元，平均每杀猪一只才获毛利 1 斤 14 两肉。四、五月份虽较好，毛利亦在 5 斤以下。一至三月最好，赚 8 斤 9 两。

为什么买价这样大呢？恐怕不只是猪缺价高的原因，买

猪人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买猪和卖肉上是否还有其他弊病，现在虽没有具体材料发现，却也是值得领导方面今后注意检查的。

赔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肉价上涨太快，杀过一口猪再买便买不到原来大小的猪，仍以7月份情形来看，7月份猪肉月初120元，月底涨至160元，此月平均每只买猪价为6454元，从买到杀了直至再买来中间至少有十天的过程，此十天内肉价涨13元，需多出598元才能买到同样分量的新猪，但每口猪所赚不过毛利448.8元，已赔149.2元，再加上7月杀坊实际开支每口猪应负担开支费193元，则共计赔352.2元，合肉2斤3两，全月杀猪65口，包括开支实赔肉143斤。

赔钱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采买上的困难和人力的浪费。现在下乡买猪很困难，一方面猪少价大，不能大批收买，又不易赊欠，采买上很耗费人力，这是客观上的困难。但另一方面采买人不负责也是很大的关系，如刘孝清规定到甘泉买猪，出发时向南走，后走几里便翻山走小路回到永坪家里去托病不回来，经几次催促才回来，误了不少。欧明才是个特务，不但消极怠工，而且用公款私人捣卖布匹，企图偷卖公粮五石从中取利，与他另一破坏分子勾结作生意，那人偷跑拐走他经手公款9千元，布11匹，他无法交代，于是到处捣鬼，代人买卖猪、粉条、毛线，私要永亨栈欠杀坊的肉帐，招摇撞骗，无所不为。直至抢救运动坦白以后，各处的欠款还未还清，耽误买猪自不必说。又如贾存义与欧明才二人去华池一个月才买回牛5头，猪4口，去时带的钱，不知带货买东西

便宜，又可以免掉物价日益高涨的损失。这些都是买猪人的毛病。此外近两月来每月杀猪都不过 61 余口，7 个月平均每月亦不过 71 口，但杀坊经常都须维持 4 个人的开支和很多客人。

赔钱的第四个原因就是猪太小，和季节的影响，因为猪缺的关系，杀的猪已一月比一月小，现在七、八十几斤的猪已极少见，加之春夏季节猪肉虚油少，所以本年各月份每只猪的肉油和头、蹄、下水的平均分量是递降的，请看下表：

各月份每口猪平均肉量表

月 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总 平 均
肉 量	43 斤	39 斤	45 斤 8 两	41 斤	40 斤	40 斤 9 两	34 斤	40 斤
油 量	7 斤 9 两	6 斤	5 斤 11 两	6 斤 9 两	5 斤 9 两	6 斤 11 两	5 斤 2 两	6 斤 4 两
头、蹄、下水	3 斤 12 两	4 斤 8 两	5 斤	4 斤 12 两	4 斤 13 两	4 斤 9 两	4 斤 3 两	4 斤 9 两

注：一、二月份因卖肉有弊病，实际肉量当较上表为大。

现在一方面是买猪价钱一天天高出净肉肉价，一方面是油和头、蹄、下水重量减低，对于杀坊形成了剪刀差的损失。

此外，一、二、三月份因执行平价和买肉人作弊所受的损失前已叙过，此不重述。

西北局杀坊七个月经营收支概况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总计
原或 存	猪数		4			11	6		24
猪油	折洋(元)		2800	(油)利738.4	(油)利1275	油:45000 1763	33500		油)81300 3776.40
	新买猪数	65	52	50	148	83	66	82	546
	共计猪数	65	56	50	148	97	72	82	570
	共猪价	111490	107032	121650	417525	399275	453835	540200	2130917
	平均每只猪价	1714	1911	2435	2837	3910	6300	6589	
卖 活 猪	猪 数			2	12	5	12	16	47
	卖 价			9250	20750	17800	78550	79100	195450
杀 卖	总共杀数	61	56	48	122	86	60	65	498
	杀猪肉量(斤)	2634	2185	2184	4997	3404	2434	2236	20074
	卖 钱	76766	66267	93361	269739	271278	278340	347101	1402855
	猪油量(斤)	465	335	320	808	481	408	335	3152
	卖 钱	27119	22429	30860	88103	73557	93153	102755	437977
	头蹄下水(斤)	228	253	241	579	406	276	271	2253
	卖 钱	5977	7605	9039	26971	25145	22070	29415	126218
	杀猪共卖钱	109863	94112	138805	384812	369910	393563	479271	1964838

续表

存猪折价	(4头) 2800			11月 45000	12月 33500		(1月) 1300	
活卖杀卖存猪 平均每口毛利	(赔 40)	(赔 306)	317	321	327	221	119	
宰牛毛利	(5头) 2.986	251				11210	5.035	19.482
贩猪获利				5265		12220	13671	30.156
总共毛利			16644	39577	13597	36708	45878	127753
开支	猪食杀猪烧柴	2840	1000	3653	6040	3830	7603	7343
	伙 食	4151	3474	4010	4707	4623	6750	8523
	家 具			530	1800	300	100	80
	总 计	6996	4474	8192	12551	11314	14453	15844
净利(元)	(赔 2742)	(赔 17143)	8452	28027	32383	22255	31033	101265
附：每月月底 内价表	30 元	30	30	60	100	120	160	

三、西北党校杀坊经营情况

西北党校杀坊人 2 名，与豆腐坊、杀坊采买人员共四部分合在一起由正副主任领导，总务科长兼主任，并同在一起吃饭，共同使用一人管帐，今年初给杀坊规定的任务是经常给学校供给肉食，每月 2 千斤左右，价钱按市场九折，并养猪，到年底要净赚 12 万元，采买人员 4 人规定资本 60000 元，到年底须净赚 245000 元，实际上采买人员是杀坊的采买部。

七个月来，该坊收支赔赚情况因管帐记得不清等种种原因，尚难查清，在经营上有以下几个特点是与西北局杀坊不同的。

第一、采买问题。在采买上配备了很大的人力，开始是

四个人采买，以后减少两个，中间曾利用大批学生到处买猪，因此猪的来源充裕（当然开支与人力也耗费很大）。他们采买方面的长处有两点：第一是采买人资本独立，帐项独立，赚钱任务独立，每次外出归来后即依延安猪价卖给杀坊，买猪人立即可以看见自己的猪赔赚情况，因此责任心增强；第二点是实行存货不存钱的原则，以避免因物价上涨所受的损失。这一点经过有能力采买员的执行，发展为与作小贩生意结合，获得了很大的效果，有两个例子可以作正反两方面的说明：

3月29日，高崇山、张玉发两人出发到华池去采买，他们带了3万元钱，此时正是农民换单衣时节，他们即赶快在布价便宜地方将钱买成布，并买了一部分日用品，他们带着布和日用品到交通不便商人稀少的地方去换猪换牛羊，群众非常欢迎，因此他们买的猪羊都便宜得多，他们买到一批牲畜即先由一个人吆着回来。家中又给了他们63000元资本，他们又拿去买布买日用品达12种，并且利用信用关系，向商人赊欠货物，向群众赊买猪羊，加之他们生活也很节俭，因此他们二月零八天后回来结帐时以93000元资本作了六十几万的生意，除去17662元的开支（包括驮货、马一个月的草料钱），净赚243230元，计布赚120000元，牲口赚100000元，油等杂货赚20000万元——带回的也并不是钱，除牲口和少量用品外，带回了103丈布。

将资本存货贩卖货，用货换牲口，利用信用关系，研究那里布贱，那里牲畜便宜，这就是赚钱的主要原因，他们这一次就完成了全年的营业任务。如果不是因为张玉发对存布

曾持怀疑态度，以致曾把一万元钱闲置了一个时期，那末还会赚得多些。

但另两个人王登科、张风五去志丹买牲畜却失败了，他们对于存货不存钱的原则是不懂得的，因此他们作了许多不行的事。他们从延安带了3万元的布，不马上到乡下去换猪羊，而干住在城内店里卖布，今天卖1丈，明天卖8尺，这样是卖了一个多星期，住店开销既大，城内布价又较小，而且布是赊出的，有的是借出的，一时收不到钱，等到换了钱才下乡买牲畜，白费了些时间，却不知畜价更高了，而且群众并不欢迎用现钱买猪。再有他们曾赊卖给别人10000元的布，人家说有延安30000元的汇票，他们又故意卖给人家20000元的布匹，以为到延安取钱可以再买批布去，殊不知回到延安以后，布价已是他们折给人家布价的二倍，他们未敢买，白费了几天的人工2千来元的路费，又跑回志丹买布，到了志丹，布价比延安更大。他们还曾把1万元钱在口袋内装了52天，结果本来500元钱可以买到的羊，他们终于出了1千5百元的高价。这两个人既无能力，又胡作非为，戴眼镜，穿漂亮鞋袜，到处吃东西，吸烟，串门口，一派二流子气味，回来时故意买走骡子往回骑，走骡子跑了，又出了1丈5尺布雇人捉回。他们既然如此，荒〔慌〕张赔钱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出去3个月，回来结帐才赚10800元，赔得一塌糊涂。

这两批人6月初回来结帐以后，去志丹的受到了批评，留在家中养猪；去华池的人得到了奖励，由赚的钱中提5千元

给他们，交代了个人生理任务。7月份又打发高崇山、王玉发出去了。这次是去靖边西境，带了30万元的布，任务是换猪羊，因为当地闭塞，卖了货买不回，决定不再像华池那样零卖货了，到现在还未回来。

像西北党校高、张这样的采买办法是值得发扬的。

西北党校杀坊的第二个特点是兼营养猪。学校灶房有剩饭和豆腐、豆角、豆渣，杀坊两个人，时间甚闲，就负责养猪。猪的多少，常有变化，通常在100只上下。此外现存牛15头羊158只，也是供给食用的，叫饲养人拴放。

第三，他们从6月份开始停止向外卖肉，因此赔累较少。

第四，他们不如西北局杀坊之处是管帐人能力太差，三坊出入全是一笔流水帐，既无分户，又不按月结算，因此无法核算收支详情，也就难于检查三坊各自赔赚情况，这于改进营业，防止贪污上都是不便的。

第五，他们规定了相当的奖励制度，完成任务者以百分之一给奖，超过任务者，抽百分之五为奖金，但一年才结算一次，而且过去是按货币规定任务，所以这种奖励办法还规定的马虎，但这种制度是会起些作用的。

四、今后杀坊营业应改进的问题

从上述两所杀坊的情况看来，今后应该有以下几点改进：

第一，应该停止外卖。依上述西北局情况看来，虽还不敢确定的说开设杀坊不赚钱，但在我们现在的主观条件下一时是难于不赔的，所以我们应该缩小经营，停止外卖，专力供给本单位食用，如此就不会高价急买猪羊。过去不计算赔

赚，为营业而营业，是错误的。

第二，应该合并组织。半年来，两处杀坊人力物力都浪费很大，在人力上本来一个杀猪人每日可杀猪七、八只，但两处都不过杀猪三、二只。西北党校的人，虽附带喂猪，西北局的人虽也到市上买猪，但都太空闲。今后应该实行合并，集中采买人力，减少杀猪人员。西北局利用买猪头的小贩为助手帮助杀猪，这种办法很少，仍可保持。合并之后其他烧柴等的节省更不必说。

第三，须要解决猪源。现在西北局及西北党校两单位每月需肉在3千斤左右（西北局以400人计，西北党校按580人算，且小灶用肉较多），今年36000斤肉，依目前猪的平均肉量算，并包括吃头、蹄、下水，如全吃猪肉，每月需猪65口，全年需800口，半年多的情况告诉我们，猪价一天天高涨，猪源又一天天困难，所以今后更应极力扩大自己养猪，加以养羊，买老牛，如果每年吃九个月的猪肉，两个月的羊肉和一个月的牛肉，则需经常保持养猪587口（以每口每天长肉平称4两计），如每只羊杀肉15斤，则需杀羊340只，另需牛肉3千斤（需牛二十余头）。关于养猪、羊的问题另节已有叙述，于此可以一提的便是今后杀坊应与养猪工作结合，它不但要尽量设法养猪，而且应该尽量与群众合作利用民间流行的伙喂小猪，伙拦羊，伙喂母猪，捎栏羊的种种形式发展猪羊的事业。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利小压本钱，不如杀猪。这是错误的看法。采买人员应该把这件事作为他生产任务的一项，但要防止滥拉不可靠的群众伙喂。

杀坊应该收缩，但杀坊资本还应该增加，主要是增加到发展养猪、羊上，其次是根据需要杀坊外卖猪多少再增加一部分资本，使能灵活周转。

第四，应该研究采买。西北党校华池采买的例子值得继续发扬，这里不再重述。近处群众需用钱的多，不需带货下乡，这话虽有一部（分）道理，但究以手中带货为好，至少可以避免物价日涨的损失，如果猪主用钱，带货下乡不愁换不到钱。

今后杀坊经营的领导主要应放在采买上，因此采买人力不必缩减，而且应该保持由高、张这样能力较强比较忠实的同志负责。为了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现在实行的单独立帐，给以一定的获利任务，并实行分红等制度，都是很必要的。总结盈亏和分红如改成半年一次，则效果会更大些。这是鼓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管理教育上应该更加强，认真检查，防止贪污，提高他们采买牲畜，贩卖货物的能力。

邻近县份买猪去过开支往往不如在本市猪贩子手买便宜，这是两处杀坊共同的经验。所以以后派人出去就要到远处，而以在本市买猪为补助。

第五，就是要改进制度。现在两处杀坊都已经建立了一个时期，经验办法已经得到了一些，但还缺乏细密的研究的精神和充分的营业观点。为了改进杀坊营业，今后必须改货币计算制为实物计算制，以后结帐和分派任务，即以赚多少猪肉或至多不能赔多少为标准。其次是要实行完全的独立核算制，今后可以不再由机关学校补助衣物；他们如再按折扣

卖肉给本单位，也最好走一笔虚帐，则可更好计算他们营业的情况。再次营业人员的待遇应该改变。目前完全是实行供给制，有些奖励也是偶然的，所以，是赔是赚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该改变制度，刺激其积极性。杀坊如将采买独立出去，虽很难获利，但杀猪人可以兼采买或养猪，从采买或养猪上取得分红资格。主任和管帐当然可以实行身份制一类办法，从各坊总的盈利上分红。再次是要建立过称制度，西北局建立过称制度以后，偷卖猪肉的现象防止了，今后还可以用过称的办法检查每次买猪究竟是赔是赚。最后就是记帐问题，西北局杀坊记帐较好，精细，有流水帐，也有各项分类帐，按月结算，而且管钱与管帐人分开，这都是应该保持的，各单位领导杀坊的同志，应该仔细检查研究营业的实况和经验，“毫厘吃饱饭”这是商人的经验，要大处着眼，也要小处着手，否则作生意是不易赚钱的。

关于开设磨坊的总结^{*①}

(一九四三年)^②

一、三处磨坊概况

西北局、西北党校和抗联三处磨坊都是自己开设的。1940年西北党校曾与工会合作开过磨坊，1941年又曾与工西北局合作开过磨坊，中间都曾有过间断。现在，三处经营方法都有不同：西北局的以磨坊为主，资本26万余元，磨两盒，骡子四匹，工人两人，管理人员两人，每天磨一石麦子（三十斤半，下同），规模较大，除本机关用，也外卖甚多；西北党校仅有固定资本，磨的主要是粮食局拨给学校的麦子，其目的完全在供给本校面食的需要，不向别处卖面，现有磨两盒，骡驴各1匹，雇工人1名，每月除磨面用三分之一时间外，以其余十天给学校义务碾米，时间恰无闲余，为了便于检查督促，仍用营业形式给学校磨面，按市价算钱，预定以全年盈余维持三坊（杀坊、磨坊、豆腐坊）本身的开支；抗联的磨坊则开设于真武洞，取就地买麦之便，并可在当地收买土产，唯当地面的销路较慢，延安吃面又要去牲口驮运（去时带

① 本文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

②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货)，管理、领导上要费心。现在磨坊共两人，有磨两台，驴4头，固定资本5万元，流动资本2万元。

经营磨坊只要不空闲人力畜力，存麦不存钱，赚利是靠得住的。以西北党校论，该校磨坊每日平均磨面6斗，可长余麸子1.59斗，面9斤12两，^①按七月份价约合一千余元。

各磨坊资本及盈利表

	资本(元)			工 人	牲 畜	上个月磨 麦量(石)	净利(元)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总 共				磨麦净利	其他收入	共净利
西北局 磨坊	38800	224175	262975	2	4骡	222.6	80413	10380	97932
西北党校 磨坊		0		1	2 ⁽¹⁾ 骡 ⁽¹⁾ 驴	90	76570 (毛利)	0	76570 (毛利)
抗联 磨坊	50000	30000	80000	2	4驴	(不详)			200000
总计		254175		5	10				374502元

注：1. 资本净利均按^{□□}^②计算的，而且收入时间不同，但实存者多为麦。此表仅供参考。

2. 西北局采麦因尚未到手，未计算在内，估计至少可净长麦21.75石，折220000元。除去人马开支及各种消耗，可有对半的净利。总计西北局磨坊七个月磨面麦222.6石，连调剂麦等项收入共净利53.9石麦，合五十余万元（三分之一为探麦盈利）；西北党校磨坊磨麦90石，毛利76.570元，究赚实物多少，因帐目混杂，无从算清；抗联磨坊磨麦盈余麦子八石，

① 按16两制秤计。下同。

② 此处原文空字约两个。

连探买麦子收入共净利 20 万元。

现在就西北局磨坊经营情况作一详细的探讨。

二、西北局磨坊经验研究

甲. 盈利

从前西北局用麦子换面吃，不但换的面掺假，钱叫人赚去，而且不能保证临时供给。前年曾与西北党校合伙开磨坊一处，因为搬家停止了。去年九月底又成立起来，共投资牲口、工具及现款 44514 元，人 4 名，生活与管理上都与杀坊合作，但帐项分开。去年三个月共磨麦 79.44 石，净利 13584 元，抽一万余元添置了家俱，打下了今年发展的基础。

今年磨坊又陆续投入资本 16 万余元，因为记帐是按货币计算的，净利为 97932 元，加上探买麦净利估计为 320000 元，则共为 417932 元。但这一货币数字是不能说明实利情况的，因此须清点现存实物，并把投资依当时麦价折麦，从存款中减中〔去〕资本，才能看出红利实况。从下表可以看出今年的净赚红利 53.9 石麦子。

西北局磨坊资本及盈利表（依实物计）

种 类	项 目	时 间	钱 数	折麦约合石数 (每石麦价)
资 本	固定资本	三次共计 1942年8月25日 1942年9月25日	38800元	30石 (1300元)
	流动资本	第一次投入 1942年10月2日	5711元	4石 (1400元)
		第二次增加 1943年3月	92461元 (丙麦 二石合六万元)	29石 (5000元)
		第三次增加 1943年4月	120000元	24石 (5000元)
		第四次增加 1943年5月	6000元	1石 (6000元)
		总 共	224175元	58石
现 存 实 物	现在固定资本部分物品	牲口、家俱	38800元	30石
	流动资本存本物品部品	去年、今年抽红和 陆续添置的家具	17800元	10石
		现存布		1石
		现存麦		33石
		现存小米44石		29石
		外存探买麦		58.39(注)
		总 共		131.39石
		现存总数		161.39石
红 利	去年红利	家俱、布、 麦总共		10石
	今年红利			63.39

注：探买 83.09 石，能收到此数（后详）乙、盈利原因的分析
盈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握紧了存麦不存钱的原则，实行代磨面的办法，规定每斗麦子换给面 21 斤（平称，下同），很少作现钱生意，因此所赚者多为麦子。这样不但不受币值下跌的损失，反而沾到麦价比较一般物价上涨还快的好处。春夏两季本是一般磨

坊生意清淡常至亏累的季节，但西北局磨坊反而获利甚多，主要原因便在这里。收麦换面是靠得住赚钱的，以今年七个月来经营情况看，平均每斗麦磨面 24 斤 5 两，麸子 18.7 斗，^①则每收麦一石连磨得的麸子可毛赚麦子 2.2 斗，获利七个月来，共磨麦子 224.527 石，毛赚约合麦子 50 石。

第二是在机关麦子困难时又实行了收米换面的办法，共收有 78.965 石，依市价每米一斗换给面十二斤。麦价上涨较米快，存米固然不如存麦，但米价一般平均为麦价的三分之二，每斗米应换面 14 斤，只换给 12 斤（三至五月曾优待机关，换给 13 斤半），这一方面是磨坊占便宜处。估计在此差额上除掉麦价上涨比米价上涨快的损失，尚赚有六石麦左右。在自己有存麦的条件下，实行了收米办法，生意得到了发展。

第三是附带作了倒贩粮食等项的生意。这方面只作过几次，总计赚钱折麦约为 3 石，特举如下几次为例：

① 疑为 1.87 斤。

磨面收支对照表

	一月至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总计	总平均
磨麦(石)	126.499	31.2	31.9	33	222.599	
得面(斤)	31613	7084	7606	7850	54153	
平均每斗磨面	25斤	22斤11两	23斤11两	23斤3两		24斤5两
长余之面折麦(石)	24.044	2.531	1.322	1.38	35.275	
又折成钱(元)	70704	12657	30254	35420	153038	
得麸子(石)	15.08	6.12	6.95	7.04	41.59	
平均每斗得麸子(斤)	1.18	1.98	2.12	2.13		1.82
麸子收入(元)	15594	9440	13320	26560	64914	
余面及麸共毛利润	86298	22106	13874	65980	217953	
工资	21775	6755	8102	10010	52468	
消耗杂支	13225	4625	6732	2523	34221	
伙食	22825	7325	10325	8950	49425	
家俱	4815	1800	300	150	7365	
共计	62669	20583	25463	33934	142650	
净支(元)	23623	1518	1811	33046	75302	
说明	一、此表所列收入只计算了磨麦子部分收入，并非收入的全部。 二、净利按货币计算，实存者是麦子，现所存之麦的价值较表上钱数大得多。 三、长余之面折钱系按每小石折麦一斗计。					

一月间，曾实行代群众交公粮换麦子的办法。蟠龙有一家老百姓应向延市交公粮 12 石，磨坊代他交了，他依 1 斗 4 升小米换麦 1 斗的比例送来了 8.57 石麦子。这种办法是例外的，当时粮价是 1 斗 5 升小米换麦 1 斗，我们节省了 8.57 小

米，而那一老百姓则看到了依他当地米价粮价比价并不吃亏，而落得省了 3 石 4 斗 3 升粮的脚费，又免除了赶碾公粮。这类与群众合作的方式是很好的，今冬还可以大作。

三月间，与西北局总务科合作，将拨到蟠龙的小米倒成麦子，磨坊在斗差方面赚到 10380 元。同月与杀坊存盐赚利 1000 元。

七月间时局紧张时，粮局卖出小米 11.55 石，买价 500 元，与杀坊合作即时购买给工程处，每斗 575 元，除去运费，分到 4111 元。

第四种是探买粮食的盈利。五月间，行政处措予 12 万元（以后作了资本），自己又添些钱，探买了两批麦子。张凤山到蟠龙用现钱和小米共探买了 44.75 石，支出 104940 元，每斗平均价 235 元。在安塞与老百姓高树枝合伙探买了 38.34 石，共支出 78.810 元，每斗平均价 205.6 元。我们分七点五。总共探买麦 83.09 石，共支洋 183750，每斗平均 221 元。探买时麦价为 500 元，均言明三个月后交麦，并有人担保。估计此项麦子资本依当时麦价折成麦收齐运回至少可净赚 21 石。估算法如下：

探买麦净利估计

项 别	麦 数 (石)	说 明
探 买 麦	83.09	
运 费	7.65	按每车拉5石，来往三天路，每日费1.5斗麦计
各 项 损 失	12.45	包括收不齐，过斗损失，坏麦等 按损失 $\frac{1}{10}$ 5石计
高树枝分去红利	4.5	
资本 183750 元 按五月麦价折麦	36.75	按 5000 元一石计
净 赚	21.74	

第五，除去以上各项，尚有 7.65 石，大约系在售粮、售面、买麦、买物等的差额上赚的，因货币记帐等种种关系，现已无法清查。

现将盈利来源及支出列表于下：

一至七月收支对照表

项 目	收入来源						开支	净利
	磨面	收小米按收 麦的差额	贩粮	探买麦	其他	总共		
折麦 (石)	50	6	3	21.74	7.65	38.39	25	53.39

丙、缺点和应该改进的问题

第一是磨面技术和管理问题。按去年三个月的情况是每斗麦子平均磨成面 25 斤 3 两，今年则平均磨成面 24 斤 5 两，相差 14 两之多。据磨坊同志谈，磨面减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麦子过春以后，麦质变虚出面便少，第二是因为供给大生栈的面需要提高面的质量，四、五月间曾使用铜丝罗罗面，面细了，色也白了，但是每斗多 [少] 出产半斤多面。同时给大生栈送面他们用称煤炭的大称过称，每百斤零几斤才称成一百斤，于是我们的帐上也写成一百斤，所以五月份磨面量最低，每半斗才 22 斤 11 两。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因，但还不能充分说明产面的减少，因为第一，五月间因产面太少，面坊主任梁瑞英同志曾亲自到六七处磨坊研究磨面的技术，对于春夏与秋冬两季用水淘麦子多少（春夏应淘 $\frac{1}{3}$ 麦子，秋冬应淘 $\frac{1}{2}$ ，则色既不甚黑，又可多出磨），淘麦时间的迟早（从前是在 24 小时以前，现在改成 12 小时以前），都有了些改进。第二，今年出芽麦子比去年磨得少，所以经

过改善、六七月间每斗麦子还是只能磨 23 斤 13——14 两，还是与去年相差 1 斤 5——6 两，是很奇怪的。据近来的发现，每夜把泡的麦子放在磨盘上为老鼠偷吃甚多。在去年新成立磨坊时老鼠不多，所以去年未受鼠吃的影响。工人畚麦子时也有些糟踏。除此以外，恐怕还有这两种原因以致麦子推得少；一是面磨得不细，踏罗未踏够遍数；一是可能有人偷面，或没有入帐顶替了别的开支……关于这一点从麸子问题上更可怀疑。据讲从前每斗麦约出麸子 3 升，近两月磨面仔细，麸子减少到 2 升 5 合，但根据七个月的总平均，从出卖麸子帐上加上自己牲口吃的，平均每斗麦子才出麸子 1.82 升，一至四月曾少到 1.18 升，六月最多才 2.18 升。所以对于人员的管理，对于磨面技术的研究和监督，对于每天磨成的面和麸子的如何接收，麦子的如何保管与发给，都应该改进，应该建立制度，要作到至少提高到去年的平均出面量，管住麸子不遭踏。

第二是提高磨麦量问题。按现在情况是磨麦时每天磨石二，但去掉修理磨、驮麦每月耽误三、二天，平均每天磨石一。以后应该尽量减少误工，并把每天的磨麦量提高到一石四斗。只要雇强的工人，牲口是没问题的。从这几个月的情形看，大约每月的开销须以磨二十石麦子的毛利（包括长余的面及麸子）来维持，也就是说，磨过二十石以后，每多磨一石，我们即可将其全部毛利都转为红利。依目前情况磨 33 石，我们的红利不过为磨 13 石麦子所长余的约合 2.86 石，而我们如能磨到每天 1 石 4，全部二十九天 40.6 石，则我们的

红利可以是 20.6 石麦子的毛利，即合麦 4.532 石，比现在的收入提高了一半还多，那末我们的磨坊便提高到了将来一个磨坊顶现在一个半磨坊的程度。而这一点再和第一个提高磨面量的问题配合起来，每斗麦子毛利愈大，则红利愈提高，不难作到将来一个磨坊顶现在两个磨坊的程度。（见下表）

第三个是主顾问题。现在每天磨麦不多，原因说是因为主顾有限，那么每天再多磨麦岂不更无销处？事实上现在还有许多机关学校没有磨坊，应该去揽主顾，并且可以考虑优待一些，如每斗麦多换给半斤面，或给予上等面，或代他们调剂麦子等。大生客栈是自己磨坊的面，这样问题是可以商量解决的。

第四是倒贩粮。探买粮的生意还应发展，要时常留心设法买好麦子，好多收面；要调查全年需磨麦多少？各家主顾本身能供给多少？还缺多少？磨坊早设法准备，这都要和各方面取得更好更多的配合，如与我们行政处、运输队、商业单位、杀坊的探买人员等等。为了减少马干开支，探购一些草料存到明年吃也是必要的。

第五是组织和制度问题。这方面许多问题，如应改货币核算为实物（麦）核算制，变更人员待遇制度等，都与在杀坊一年所提议者相同，此不赘述（磨坊生意只要麦源不缺，又有主顾，赚利是比较可靠的、半年来的情况，也是三处磨坊都是盈利的，似乎还不必须合并经营）。现在在组织与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工人生产情绪的低落问题（西北党校磨坊也有这种现象），目前雇工都是现钱工资（西北局七月为 3660 元，西

北党校是全年一力二千元)，受了物价影响，他们常不安心，而且因为工资是固定的，对于提高出面量与磨麦量都是不积极的。因此，以后工人待遇有改为挑份子制度的必要，这样来，他的工资不受物价影响，作得好又可多分得，这是一种公私两利的办法。

提高磨麦与目前情况比较表

	磨麦一斗情况			每天 磨麦量	全月 红利折去 金石	全月 开磨麦 的毛利	全月 开磨麦 金支多少	全月 开磨麦 的毛利	全月 红利折去 金石	全月 红利占磨 麦量
	面、麸子出面	毛利	毛利折去							
一至七月情况	24斤 5两 1.82斤	21斤	面 麸子 3斤5条 1.82斤	0.22 斗	1.1 石	38 石	7.26 石	1 石	19 石	3.26 石
如提高 以后	25斤 3两 2.5斤	21.5 斤	3斤11 两 2.5斤	0.255 斗	1.4 石	40 石	10.24 石	3 石	15 石 6斗	6.24 石
比较		每斗 多付 半斤 面		每斗多赚 3合的麦		每月多 磨7石				红利 为过去二倍

丁、结语

从上述西北局磨坊的优缺点中，对于磨坊经营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存麦不存钱，多存麦子；提高每天磨麦量，提高每斗麦子磨面量；揽足主顾；实行代磨面及以米换面办法；改货币计算为实物计算制；提高工人积极性和管理人员责任——这里都是磨坊内部的问题。还要到磨坊以外去开展，这方面活动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探买粮食，倒贩粮食，代交公粮等等，全在领导人的能力和积极性了。

关于豆腐坊的总结^{*①}

(一九四三年)②

一、筹备开办情形。

本年四月中，总务科提出办豆腐坊事，动机是因买着吃不方便，且不可靠；自己开作坊，既免上述二弊，又可营利，于是筹划开办。在山下菜园子新井旁边，盖房子两间，六月初完成，由通讯班、伙夫班调出肖生、赵应胜二同志负责。计投入资本如下：

项 目 名 称	数 目	单 价	总 值
房 子	2 (间)	4500	9000
购置器具	36 (件)		38460
驴	1 (头)	12000	12000
猪	15 (头)		81950
共 计			141410

① 本文作者初考为西北局办公厅。

②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注：购置器具中，主要的有水磨一，合 6000 元；大铁锅二，8000 元；大瓷缸二，2100；大木缸二，5800 元；其他皆小家俱。

当时黑豆很难量，①市场买不到，适逢粮食局窑洞发生损坏情形，总务科以前曾因调剂牛料向粮食局交涉黑豆，这时他们来信叫去驮黑豆，即乘机要了 18 石，借与豆腐坊 2 石 9 斗，条件是豆腐卖出后，买马料还总务科。当时马料价每斗低于黑豆 50 元以上，对豆腐房是有利的。买猪 15 个，10 个价 6195 元（每头）；5 个价 4000 元（每头）。

投资方面尚有私人投资洋布一匹，价 12000 元，棉花 10 斤，作价 4000 元，惟至现在尚压存，所以实际上还没有动用这笔资本。

二、经营的概况

六月中旬开始，第一次做豆腐先用 5 升豆子试验，结果做坏了，研究原因系水不好，盐质太多，做不成豆腐。第二次担后沟内老百姓的井水，再用一斗豆子试验，又坏了，原因是锅太浅，在锅沿上厢〔镶〕上几层砖，用猪血和泥泥住，做豆腐时猪血尚未干，所以又坏了。第三次做成功，老百姓井水也不多，以后就用水灶上的水，也有盐质，但少，可用。做第四次后，又见到没有坑〔炕〕不行，豆子光太阳晒晒不干，用磨拉时皮就取不净，豆腐发黑，何况雨天来了，没有

① 北方方言，意即买。

太阳晒，于是停了十来天，盘了炕，烧热炕炕豆子，皮去的净，豆腐颜色白了。七月里又做了三、四次豆腐，便奉总务科命令，移交于青山、张占魁等同志接办。在肖生经营时期无细帐可查，据他口头报告，做成豆腐五次，用豆子6斗2升，每斗出37斤，做成豆腐约230斤，供给机关用。每斤作价15元，共收3460元。连坏了的一斗半豆子，应还总务科马料7斗7升，收回的豆腐只能量7斗5升，尚欠2升料。卖掉3个猪，共价18585元，系因猪病，原价出让。

于青山自七月十二日接办。他是作管理员工作，分出一部分时间领导，由张占魁、阎自康二人在豆腐坊工作。计自七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共做豆腐二十六次，用豆子2石5斗3升（作豆浆的豆子在内），出豆腐972.5斤，绝大部分供给机关用。作价，七月份18元、八月份23元，另外供给机关豆浆780缸子（约合豆腐130斤），计每天30缸子，作价每月5000元，计每次出一斗豆子的豆腐，连豆浆估计在内，七月份最少出36斤，最多出46.5斤，平均出42斤。八月份内最少42斤，最多49斤，平均43斤。据于青山、张占魁二同志谈，我们豆腐出的不多，有这些原因：（1）南门外水不好，老百姓豆腐坊也只出50斤，或50多斤。（2）我们现只一台磨子，又拉豆折子，又推豆糊，一磨两用，豆糊推不细，豆腐就出的少。（3）布包还嫌密，豆腐细，但出的少了。

八月内又卖掉7个猪，价70000元，又借总务科豆子1石1斗。

三、经营初步结算

甲、投入流动资本表

项 目 数 量	数 目	单 位	总 值	折 实
黑豆	2.9石	3200	9280	2.32石
猪	15头	6195(10个) 4000(5个)	81950	18.21石
共 计			91230	20.53石

注：(1) 做豆腐共用豆子3.3石，其中有2.9石系开办时总务科供给的，以每斗320元作价（物资局调查六月米价400元，以低80元计），列入资本项，又于七月中在市上买4斗，价每斗500元，是用卖了猪的钱算作资本周转，不能列入资本项。(2) 豆子全系于六月投入，故以六月米价400元折实，猪于六月下旬买，按450元折，较合实际。

乙、营业收入存货表

项 目 数 量	数 目	单 价	总 值	折实(小米)
豆腐	1202.5斤	18.83元	22639.5	(600元) 3.77石
豆浆	780(缸子)		5000	(700元) 0.71石
猪	已卖 10	6195(3头) 10000(7头)	88585	(600—800元) 11.85石
	尚存 5	10000	50000	(800元) 6.25石
共 计			166244.5	22.58石

注：

(1) 物资局调查，六月米价 400 元，七月 600 元，我们调查八月十三、四日米价已 850 元，折实时以 800 元计。

(2) 豆腐价系每月上涨，故以七月米价作中数折。豆浆是从七月份才开始的，故以七月——八月的米价中数 700 元折算。卖猪钱有三个猪系七月里卖的，价 18585，以 600 元折。另七个八月里卖的，以 800 元折，存猪以八月份折。

丙、各种消费及支出表（两个月）

项 数 目	数 目	每月消费数(元)	共 计(元)	折实小米
人	2	4080	8160	
驴	1	4330	8660	
柴		500	1000	
零 用		200	400	
买豆子	4 (斗)		2000	
共 计		91000	20220	3.37 石

注：(1) 所有消费总值，皆以七月米价 600 元作中数折数，豆子也是七月买的。

(2) 人的消费，根据西北局总结伙食经验，每人每月全部伙食费用等于3.3—3.4斗小米，再加服装及其他费用，估计每月500元合计。

(3) 牲口费用，以七月市价计算，草210斤，(每斤)8元，合洋1680元；料3斗，(每斗)550元，合洋1650元；麸子1.5斗，(每斗)600元，合洋900元；其他费用100元合计。

(4) 柴及零用的估计数很低。

丁、营业计算简表

项 目	金 额 (元)	折实 (小米) 石
资 本	91230	20.53 (石)
收 入 及 存 货	166224.5	22.58 (石)
消 费 支 出	20220	3.37 (石)
损 益	56774.5	
损		1.32 (石)

这是按照寻常计算方法结算起来，形式上货币量增加60%，实际上损亏资本6%，为什么亏损了？

1. 技术低下，利率很低。肖生手里每斗豆子平均出豆腐37斤，利率33%；于青山手里平均每斗出43斤，利率55%。估计两人手里做豆腐的获利只等于小米1.33石，减去坏了的1.5斗豆子(折米——1.25斗)，就只剩了1.205石了。如像杨家岭豆腐坊每斗出63斤，豆浆10磅折2斤，共65斤，则

利率 130%，就大不相同了。

2. 劳动力未能充分发挥。生产量小，消费量大，两个月共做 3.3 石豆子，利率又低，获利数只约等于 1.205 石小米，而人及牲口之消费量当在 3 石之数，实际上二人一牲口每月可做 5 石豆子。

3. 喂猪实际上未获利。七月初卖出 3 个猪，是原价出售了，等于白喂了十来天。再看买 15 个猪价，折米 18.21 石，而卖出及现存估价只折 18.1 石。这其中原因究系买价太贵？或是喂的不好？还未调查明白。

以上三条可以解释表中所列的亏损一项，但实际亏损数尚不止表中所列之数，请看现在实际资产负债对照表：

项 数 目	对 照		资 产		负 债	
	字	金 额	折实 (小米)	金 额	折实 (小米)	
资 本				91230	20.53 石	
外 欠	90639.5	11.33 石				
存 猪	50000	6.25 石				
现 存	15625	1.95 石				
买 磨 子	4500	0.75 石				
存 豆 子	3460	0.58 石				
应 支 消 费				18220	3.035 石	
共 计	164224.5	20.86		109450	23.565 (石)	
损 益						
	损				2.705 (石)	

注：一、外欠、存猪、存钱，皆按八月米价 800 元折。

二、肖生手还总务科豆子（以料抵）7.5斗，资本中未除去，故作为存豆子7.5斗，价3460元，又买磨子，系卖猪钱，皆按七月米价600元折。

根据此表损失数，比前表多1.221石小米，原因：甲，外欠中有12000—13000元，系七月份的帐，八月尚未收回，此款在七月可买米2.1石，八月份只可买1.56石，赊帐一月，等于损失米5.4斗。乙，现存15625元，自七月中旬存起来用，那时可买米2.6石，八月只可买米1.95石，钱虽未动，其贬值数等于米6.5斗。

四、经验教训与今后办法

(一) 豆腐坊怎样才能营利？独立经营的豆腐坊，需二人一牲口，若能每斗出豆腐50斤，猪好好喂，做到每猪每月增产一斗米，则每斗豆子做成豆腐利润如下表：

项目		数目	金额	折实
资本	豆子	1斗	500	0.916斗
	零用		50	
	共计		550	
收入	豆腐	50斤	900	1.7斗
	猪	6头	120	
	共计		1020	
利润			472	0.78斗
利率			85%	

注：据谈，每天做一斗豆子，可喂肥六个猪。

估计二人一牲口每月的消费等于1.4—1.5石小米，所

以在上述每斗出 50 斤，喂猪保证每头每月增产一斗米的条件下，每月至少做两石豆子才能够消费，事实上二人一牲口每月可做五石豆子不成问题，如做五石，则每月可获利两石米。技术再提高则获利更多。

(二) 技术要提高。现在已暂停止几天，派张占魁到杨家岭学习去了，将来如能提高到每斗出 60 斤，利润率即提高到 120%，每月做五石斗〔豆〕子，即可获利 3.5 石以上，将来如能做豆腐皮、豆腐干等更妙。

(三) 猪要喂好。参考报上报导的一些经验，要喂熟食，猪圈弄干一些，这些是可以办到的。应该计算喂猪的利润，买来时称一下，记下份量，用帐记下喂猪用去的东西的数目，每一、二月再称一回，看重了多少？取得经验。

(四) 要避免受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的影响，实行“现卖少赊帐，存货不存钱”的办法。机关上赊帐应协商每十天或半月清一次，再长了作坊即非吃亏不可。今年物价上涨指数如下：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每斗小米价	150	200	240	300	350	400	600	800
指 数	100.00	133.33	160.00	200.00	233.33	266.66	400.00	533.33

注：物资局调查数。

一至四月、四月至七月，都是每三个月涨一倍，但六月至八月，两个月就涨了一倍。在此情形下，只有少赊帐，赊短帐，有现钱马上买成实物才能不吃亏。

(五)要参考别处经验，实行分红制度，这是提高工作积极性所必需。如二人一牲口每月能做5石豆子，再管理得好，抽利润2——3%分红，每人每月可分4——5升小米。

可见一个小小的豆腐坊要办得好，必须实行提高技术，关心经营副业，以提高利润率；尽量发挥劳动力，扩大生产量，以扩大利润数；管理得法以逃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之影响，实施“公私两利”的分红制度，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这一全套办法。根据这些道理，现在应考虑停止那些不能营利的小豆腐坊，统一供销，以便使那些太小不赚钱的豆腐坊可抽出人力另投入其他生产事业，而较大的能赚钱的豆腐坊，可以尽量发挥生产力。

西北局机关人员生产总结*

(一九四三年)①

一、怎样开始进行

(一) 动员大会宣布个人生产计划和方向。

三月二十四日，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司令和杨秘书长号召机关人员进行个人生产，改善生活。袁处长宣布了今年个人生产任务。按政府规定，个人各项生产依当时市价估计为 627 元，以当时米价每斗 235 元，折合细米 2.7 斗。其计划如下表：

表一：

名 称	数 量	单 位	单 位 价	总 价	备 注
打毛衣	1	件	100.00	100.00	
打毛袜	1	双	40.00	40.00	
毛 巾	2	条	40.00	80.00	
牙 刷	2	把	75.00	150.00	
精 盐	4	两	20.00	7.00	
单 鞋	1	双	200.00	200.00	
袜 子	1	双	50.00	50.00	
共 计				627.00	折米 0.27 石

① 年代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机关为加强工作效率，把个人生产部分中之手巾、牙刷、精盐、单鞋等，由机关生产中代为解决，另订个人生产计划如下：

表二：

名 称	数 量	单 位	单 位 价	总 计	备 注
西红柿	20	株	10.00	200.00	
菜 蔬	50	斤	3.00	150.00	
烟 叶					
种 树	1	株			
纺 毛	25	斤	50.00	125.00	
草 鞋	1	双	150.00	150.00	
共 计				625.00	

其收入尽数改善自己生活。

由机关规定个人生产计划上看来，就可看出我们个人生产方向，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次之。

(二) 组织

1. 组织的建立。

个人生产的组织是受机关生产委员会领导的，以行政为单位，各部、处成立了六个生产小队、计组织部、秘书处、研究室、宣传部、临时组、行政处（包括招待所、生产科、会计科、卫生所、通讯班、总务科、警卫排）。二十五日，由袁处长召集六个小队长联席会议，推选有农业经验、工作时间比较有固定性、同时与行政上联系密切的人做生产大队长。当

时提出宋炳祥、马作贵、梁瑞英三同志，经讨论后觉得他们还比较忙，最后决定了由彭平同志担任。彭平同志当时也以工作忙乱，没有生产经验为辞，不能担任，乃决定由谷敬同志（当时不在会场）做大队长，负责计划农业生产的进行，彭平同志做副队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分发工具、籽种、秧苗、土地及浇水时间等。

当时各部处人数如下：

组织部： 19人（家属一人）

研究室： 8人（家属一人）

秘书处： 13人（有三人还未来）

宣传部： 10人（家属一人）

临时组： 14人

行政处： 106人（收发室、通讯班8人，招待所5人，青年队31人，行政处30人，伙马夫未规定生产，警卫排32人）。

以上各组共170人全体参加生产。女同志以手工业为主，男同志以农业为主。

2. 组织和人数的变动。

于生产进行中，行政处范围过大，小队长领导；后不方便，乃将青年队、警卫排划出另成立小队；招待所成立小组直属大队领导，另外各小队又以人数过多，或为经营方便起见，把队又分成若干小组，组织机构如下：

正副队长

组织部小队——1组 (12人)
秘书处小队——7组 (10人)
宣传部小队——1组 (10人)
研究室 速记班}小队——1组 (10人)
行政处小队——3组 (32人；伙夫8人，卫生所2人，其他22人)
青年队小队——2组 (31人)
警卫排小队——3组 (32人)
通讯班小队——1组 (8人)
招待所小队——1组 (5人)

共八个小队，二十个小组 150 人，连理发员一名，共 151 人。

说明：警卫人员行政上属于青年队领导，因工作特殊，另由生产大队长指定办公厅秘书附带管理警卫员生产事。

3. 实际参加生产的人数。

由于工作流动性的关系，各部、处有些人不能甚或始终没有参加生产的。实际参加生产的人数为 130 名，即组织部 9 人，秘书处 10 人，宣传部 8 人（还有两个搬到别的机关工作，两个经常不在家），研究室和速记班 7 人，行政处 22 人，青年队 29 人，警卫排 32 人，通讯班 8 人，招待所 5 人，共 130 人。

4. 个人生产组织和机关生产委员会的关系。

个人生产的组织受机关生产委员会领导，总务科对个人

生产负帮助责任，但相互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好在个人生产，又在行政处正副处长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又给了很大便利。

5. 劳动力的组织形式。

在各小队进行生产时，以集体的个人生产为主要形式，很少个人经营的。进行较大规模的个人生产时，以集体的形式为最好，工作上能互相帮助，生产时不妨碍工作；劳动力能适当的配合，各尽所长；并相互督促，提高劳动效率，最后工具还容易分配保管和节省；缺点在于生产和工作冲突时，常因集体生产个人不便于请假，因而耽误或影响工作；缺点还在于人多，行动比较散漫。进行小规模生产时，以个体形式为最好，他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缺点在于个体生产会妨碍集体生产，顾了自己的，影响了大队的。

由今年个人生产的经验，我们认为以各部门为单位进行集体的生产，同时再搞些个体生产，是比较好的。

集体生产，如能做到自由组合时，比机械地以部门为单位还要好些，因为这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经济联系密切，对于生产共同关心。

除过农业生产有固定组织外，其他缝纫、拱砖、修花园，也都曾有过临时的组织。工作结束，组织即行解散。农业生产方面没有专门的人做技术指导，但附近有种菜的，随时可征询意见。

6. 制度。

制度方面，没有例会，遇有问题，临时召集；没有汇报，

临时交换意见；也没定详细的登记制度，只是大略统计，于生产进行时检查与督促比较多些。

(三) 公私关系

个人除支付劳动力经营生产，并找到一小部分土地（青年队和警卫排例外）外，其余为工具、籽种、水地肥料、秧苗，全由机关供给，或贷借，而收入则全部归私人享用。

机关所给予的帮助没有（也不要）任何报酬，就是贷借购买籽种一项开支，在生〈产〉队长联席会上有的同志提议由于货币跌价将来需要偿付时，每元可还一元五角。究竟怎样还法，是否还需要归还，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机关究竟垫付了多少？根据统计列表于下：

表三

类名 别称	项别 数 量	单价(元)	共计(元)	当时粉价 (元)	折合米			备注
					1石	斗	升合	
工具	锯	12把	650	9100	300	13	0	3 3 新买的
	铁	7把	750	5250	240	2	6	0 0 新买的
	大锯	4把	500	2000	240	3	3	3 旧有的
	小锯	2把	300	600	240	2	5	0 旧有的
	木桶	6个	600	3600	400	9	0	0 供挑水用
	水桶	2个	550	1100	350	3	1	4 与机关伙用
	井绳	2条	1200	2400	350	6	8	3 同上
	总计			24050		8	6	1 3
材料	白菜	4斤7两	300	1290	300—600元	3	1	3
	萝卜	4.6斤	300	1600	同上	3	3	
	南瓜	10两	10	100	300	3	3	
	菠菜	2.5斤	300	750	300	2	5	0
	黄萝卜	13两	20	260		8	3	7
	水萝卜	8斤	400	3200	300	1	0	6 7 存六斤三合二八
	糜子	6升	43.5	260	350	7	4	
	洋芋	1400	20	2800	350	0	0	估计数
作物	烟苗	150株	2	300	600	5	0	买的
	总计			10560元		3	0	1 2 实用 8800 元， 合小米 2.212 石
	茴子白	650株	2	1300	350	3	7	0 机关买的
	西红柿	2500株	1	2500	350	7	1	0 机关买的
	黄瓜	600株	0.5	300	350	8	5	机关买的
	茄子	200株	1	200	350	5	5	机关买的
	辣椒	1740株	0.2	348	350	1	0	0 机关买的
	芹菜	300株	2	600	350	1	7	1 机关买的
其他	总计			5248		1	4	9 1
	修理			510	400	1	5	0
	租额		7500	7500	750	1	0	0 0
	总计			8110		1	1	5 0
总计	他			47968		1	4	2 6 6

以上共支出 47968 元，折合粗粮 14.266 石，其中消

耗数如下表：

表四：

名 称	合洋(元)	折合细粮(石)	备 考
籽 种	8800	2.212	现买的参看上表籽种备注栏
秧 苗	5248	1.991	机关菜园养育的
其 他	8110	1.150	
工具损失	8000	3.000	损失三分之一
总 计	30158	7.853	

共计消耗 30158 元，折细粮 7.853 石

(四) 辅助劳动

机关农业生产计划上，曾规定工作人员每人帮助锄草一天，后因生产人员时间和劳动力调剂得好，仅青年队、通讯班、警卫排先后做过 88 个工（计：分秧 20，浇水 8，摘豆角、挑西红柿 60 个，实数不止此），帮助制西红柿酱也出了 30 个工，帮助群众锄草，共出工 85 个，即此已达 203 个工了。其他义务劳动，还未计算在内。

二、个人生产的种类及完成程度

(一) 生产种类

甲、农业。山川水地共计 81.9 亩

1. 山地生产统计表（山地共 61.3 亩）

类 别	亩 数	预 计 收 获				折合小米			备注
		数 量	单 位	单 价	台 洋	十 石	斗 升		
糜 子	24.8	3.45	石	8000 元	27600	3	4	5	
玉 米	1.8	0.36	石	8000 元	2880		3	6	煮吃了
洋 芽	28.2	11800	斤	15 元	17700	2	2	5	
菜豆类	1.8	1800	斤	8 元	14400	1	8	0	
南 瓜	1.6	640	个	12 元	7680		9	6	
高 梁	0.2	150	棵	2 元	300			4	甜高粱
其 他	29	3000	斤	5 元	15000	1	9	0	
共 计	61.3				85560	1	0	7	

(注：粮按每斗 800 元计算)

2. 川地水地生产统计表

川地 5.9 亩，水地 14.7 亩，共 20.6 亩。另外有种二次的约九亩，种植种类如下表：

表六：

山川水地生产统计表

类别	亩数	棵数	已收获的			尚能收获的			总收获			备注	
			数量	单价合洋(元)	折细粮	数量	单价	折细粮	数量	单价	折细粮		
春白菜	6.4		6400 斤	2	12800 石	2.13 石			6400 斤	1386 石	2.13 石	七月份 每斗400 元	
菠菜	1.1		2200 斤	1.5	3300 石	0.55 石			2200 斤	3300 石	0.55 石		
萝卜	1.8		3600 斤	2	7200 石	1.20 石			3600 斤	7800 石	1.20 石		
黄瓜	0.8	673	2019 条	1.2	2433 石	0.33 石			2019 条	24230 石	0.33 石	粮价400元	
西红柿	3.0	2866	40660 个	1.5	60900 石	7.61 石	19135 个	1.5	287045 石	3.61 石	19135 个	1.22	
茄子白	1.3	436	135 棵	20	2900 石	0.37 石	291 个	20	5820 石	0.72 石	436 个	0.09	
茄子	0.2	187	31 斤	10	330 石	0.94 石	63 斤	10	630 石	0.08 石	940 斤	0.12	
烟叶	2.5	1660	50 斤	150		7500 石	0.94 石	198 斤	100 石	29800 石	3.71 石	248 斤	4.65
南瓜	1.3	223	88 个	20	19600 石	0.25 石	358 个	20	7160 石	0.90 石	446 个	0.15	
辣椒	0.7	1740	10	12	120 石	0.02 石	20	12	240 石	0.03 石	30 石	0.05	
秋白菜	6.7						6700 石	3	20100 石	2.52 石			
秋萝卜	2.3						4600 石	3	13800 石	1.72 石			
其他	1.5						750 石	3	2250 石	0.28 石			
共计									108504 石	13.57 石		20771 石	

据光华农
场的估计

表七：
(乙) 手工业统计表

品名	数量	共计(元)	合小米(石)	说明
毛织品	毛衣	17	2410	0.881
	背心	1	60	0.025
	毛裤	7	530	0.197
	围巾	1	30	0.013
	帽子	1	30	0.013
	毛袜	5	255	0.062
	共计		3615	1.191
缝纫纺织	衬衣裤	669	13119	5.713
	做鞋	5双	1250	0.345
	做袜	21双	2050	0.664
	背心	2	110	0.028
	小孩衣	23	790	0.180
	帽子	11	880	0.228
	鞋底	2双	150	0.027
	草鞋	170双	9250	3.279
	纺毛	50斤	2300	0.750
	洗棉衣	32件	250	0.065
小食品	鞋帮	1双	60	0.010
	共计		35129	11.289
	豆腐乳	10斤	300	0.040
	豆酱	8斤	640	0.070
	饼干	5斤	440	0.060
其他	生豆芽	5升	120	0.020
	共计		1500	0.190
	扑克	2付	600	0.100
	蝇拍	60个	1500	0.430
	破布	3斤	90	0.030
	刮竹针	12	48	0.030
	糊信封	15000个	1855	0.430
	共计		4093	1.020
			44037	13.691

收入是按每种生产产品完成时的一般工资计算并以当时米价折合成实物。

表八：

丙、社会劳动统计表

类别	数量	收入	合米	备注
拱砖	27450	10527 元	3.245 石	中有 456 塑约合 160 元，折米 5 升，未要钱
打墙	195 墙	24500 元	7.770 石	中有 50 墙约万元，合米 1.7 石，未要钱
修路	180 工	18000 元	3.000 石	
掘井		22150 元	6.330 石	内 1950 元，合小米 5 斗 6 升，未要钱
锄地	85 工	17000	4.250 石	帮助群众锄的，4.25 石，未算钱
抬病号	24 工	2600 元	0.730 石	中有 2400 元，合米六斗，未要钱
修花园	50 工	5000 元	1.330 石	中有 1000 元，合米 3 斗 3 升，未要钱
挖水沟	115 工	8000 元	2.000 石	
修水沟	8 工	800 元	0.200	未要钱，0.2 石
修球场	10 工	1200 元	0.500 石	未要钱，0.5 石
栽树	200 株			活了 112 株
土工	326 工	24100 元	6.000	
农场	88 工	17600 元	2.200	帮助农场劳动，未要钱，2.2 石
其他				
共计		151477 元	37.555	义务劳动人计：洋 52.110 元，折米 10.39 石

说明：除义务劳动 52100 元，折合米 10.39 石以外，实得洋 99377 元，折小米 27.170 石。

由以上三项生产计算，已收入生产的，共有 242627 元，合细粮 54.3 石，详如下表：

表九：

类 别	合洋(元)	折细米(石)	备 注
农 业	0		
蔬 菜	99213	13.44	见表六
手 工 业	44037	13.69	见表七
社会劳动	99377	27.17	见表八说明
共 计	242627 元	54.30	

现在除总消耗 7.853 石（见表四）外，净收入已达 46.45 石。平均每人已生产 0.36 石。

（二）完成程度及生产收入的处理。

1. 每个人完成了多少生产任务。

如上所述，农工各项截至现在为止，除开支，总共净收入为 46.45 石，平均每人已生产 0.36 石，不过义务劳动不是个人收入，如减去义务劳动 10.39 石，实际总收入为 36.06 石，平均每人实得 0.28 石，三至八月，五个月工夫的生产已超过原定的任务了。

今年全年所获得的生产收入，因为还有四个月的工夫，当然还要更大于此，如果不预算女同志的冬季收入，光预算男同志的秋收 24.33 石，则今年全年收入便可达 60.38 石，那末每人的平均收入项可为 0.47 石，超过生产任务百分之十五。

2. 个人生产收入的处理。

社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所收入的现款 99377 元，及青年队白菜收入 3700 元，共计 103077 元，这两项收入，大半为青年队、警卫排及女同志所生产的。女同志除唐明给大众合作社投资 1000 元外，其余均已改善自己生活了。男同志青年队置了毛毯 21 床，警卫排则每人买到草帽一顶，牙刷一把，牙膏一瓶，肥皂一条，袜子一双。其他也多半是改善自己生活了。

菜蔬方面，除个人消费以外，据最近统计，交给机关约值 17845 元，详如下表：

第四章 财政与经济

表十：

类 别	数 量	单 价	共 计
水 萝 卜	2000 个	1 元	2000 元
白 菜	1600 斤	2	3200 元
菠 菜	500 斤	0.5	250 元
西 红 柿	7400 个	1	7400 元
南 瓜	650 斤	4.5	2925 元
黄 瓜	450 条	1.2	540 元
茄 子	15 个	4	60 元
茴 子 白	42 个	30	1260 元
豆 角	20 斤	8	160 元
芹 菜	16 斤	5	80 元
共 计			17845 元

(三) 几个典型例子

1. 集体生产方面

(1) 宣传部

自始至终，保持着集体生产的经营方式，菜蔬的培植，也以这一小队精细。该小队共有 10 人，两个女的，一个带小孩，

一个怀孕，他们只是做些手工业生产，没有参加农业生产：男的 8 个，两个搬到别的机关工作，两个经常外出（这 4 个同志多多少少还做些生产，需要附带提明的），实际上在家里经常劳动的只有 4 个人。正如该组于初步总结上所说：“不是进行集体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 10 个人的生产任务”。

于这个五月当中，他们生产了这些东西：开荒 3.7 亩，种糜子 3 亩，洋芋 4 分，红豆 3 分，于其门前零块土地上种西红柿 10 棵，小瓜 20 棵，南瓜 40 棵，共费工 38.5 个。

于机关分配的 5 分水地上，他们种的各种菜蔬，已收的有：

春白菜 40 斤，每斤价 2 元，计 80 元。

萝卜 80 斤，每斤价 2 元，计 160 元。

西红柿 2000 个，每个 1.5 元，计 3000 元

黄瓜 400 条，每条 1.2 元，计 480 元。

茴子白 50 个，每棵 40 元，计 2000 元。

茄子 3 个，每个 3 元，计 9 元。

辣椒 20 斤，每斤 12 元，计 240 元。

芹菜 2 斤，每斤 5 元，计 10 元。

西瓜 15 个，每个 30 元，计 450 元

小瓜 50 个，每个价 2 元，计 100 元。

依市价折合共值洋 7250 元。还可收入的有：

西红柿 2000 个，每个价 2 元，计 4000 元。

茄子 50 个，每个价 3 元，计 150 元。

烟叶 30 斤，每斤价 150 元，计 4500 元。

辣角 50 斤，每斤价 12 元，计 600 元。
芹菜 15 斤，每斤价 5 元，计 75 元。
糜子 3 斗，每斗价 750 元，计 2250 元。
洋芋 160 斤，每斤价 15 元，计 2400 元。
南瓜 80 个，每个价 12 元，计 960 元。
依市价共值 14935 元。

又手工业劳动的收入为糊信封 3000 个，收入 300 元（女同志收入 930 元未计）。

以上共可收入 22485 元，每人平均（按 10 人计算）2248.5 元，如按 4 人计算，则每人平均生产 5512.1 元。按市价每斗 750 元，可折合小米 0.73 石。按机关每人总平均生产数 0.43 石，超过 0.3 石，即超过 70%，超过个人生产标准任务（0.27 石）0.46 石，即超过 170%。

关于生产品的处理，除交给机关西红柿 670 个，豆角 20 斤，白菜 110 斤，黄瓜 5 斤外，大部分自己吃了。分配的原则是“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此他们“今天甲自动烧茄子，明天乙又自动炒茴子白，后天又……”。他们对搬到外机关住的同志，也常常诚意地邀请归来摘西红柿，有时还给他们送茴子白。于西红柿大量收获时，政府还未决定收买，他们就首先借缸借坛，准备泡藏，同时还试验制酱，也首先成功。

（2）手工业生产

这方面值得介绍的，就是女同志缝衬衣衬裤，改善了他们生活，还给公家节省了 6 万多元的一个好例子。

四月初，由黄同志召开三条劳动纪律的男女同志，讨论如何响应党的号召，进行个人生产。当时以手工为主。除选出黄葳、唐明等同志负责领导外，还通过了三条劳动纪律全体通过，这三条劳动纪律是：（1）做得好（质量高），（2）做得快（抓紧时间），（3）要节省（爱惜材料）。

四月二十二日，她们开第二次会。由黄葳同志和唐明同志提议承缝机关自给衬衣 80 套，这是公私兼顾的办法，自己可以生产，机关不须另外麻烦去找人，既做不好，又要多出钱。在这发动之下，当时报名的有 25 人，实际参加的只有 19 人，一个月的计划，10 天就完成了。每套 50 元，80 套 94 元，^① 每人平均得 210 元。他们第一次执行了自己三条劳动纪律快、好、还节省。平均每人两天多的业余时间就可缝成一套，质量和式样（西式上身，长腿下身）均好，还节省了些布和钱。

以后又在行政处帮助下，包做财厅 980 套衬衣衬裤，除领布和西北党校女同志缝的不计外，机关女同志 25 人于一个半月的业余时间内，完成 500 套的任务。平均每人缝 20 套，最多的一个缝 43 套（当时她没有工作，还有别的同志给帮些忙）；其次是缝了 37 套（这个同志有工作，并参加学习，还是怀孕六、七个月的）；平均速度，只在业余时间缝的，每两天可以缝成一套，没有工作的半天可以缝成一套，一天半有缝成两套的。

这次成绩是缝得结实，式样好，时间快，执行了自己订

① 此疑笔误，应为 4000 元。

的劳动纪律，特别值得介绍的就是她们在剪裁方面下功夫，研究如何能节省布，如何利用小块布。按财厅规定每套衣服发^布 6.5 尺，本来难于缝成，但由于她们在剪裁方面多花些时间，甚至每套还出剪发 2 元，这样把 500 套衬衣衬裤按照原订尺寸大小式样任务完成之后，还节省了窄面布 5 匹（计长 27.6 尺），宽面布一匹（计长 7.85 尺）。依市价合洋 6 万多元，尽数多给机关，机关为奖励这种模范作风，特提出 12000 元作为奖金，以资鼓励。

缝纫工作开始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女同志没信心，认为这些任务半年都完不成。在几个积极分子领导下和两个家庭妇女张德泽（招待所）及秦□同志帮助与指导下，不到 25 个人的女同志，于 55 天当中缝成 580 套衬衣衬裤，赚工资和奖金 52500 元，平均每人得 2100 元。

（3）青年队

青年队共 31 个人，除警卫员和几个保姆因工作关系未能加集体生产外，其余 21 人在相互帮助工作中进行集体生产。

青年队生产重心在农业方面，主要放在开荒 30 亩，种糜子 21 亩、洋芋 9 亩和菜蔬 1 亩 5 分的经营上。而菜蔬则又很单纯地只种白菜（春秋两季全种白菜）。在社会劳动方面，则以手工为主要生产对象。

至于生产收入，农业方面可收入糜子 3 石，洋芋 1500 斤（每斤 15 元，值 22500 元，合小米 3 石），其他菜蔬春秋两季约 9 千斤，每斤按 3 元计算，值 27000 元，合小米 3.6 石；西红柿 2500 个，每个 1.5 元，合洋 3750 元，折合小米 5 斗。农

业生产共收入细粮 10.10 石，社会劳动共收入 10.14 石，手工业收入 0.41 石，三种共收入 20.65 石，平均每人生产将近细粮 1 石，超过标准任务 270%。其中给公家义务劳动打墙 50 堵，约值 1 万元，掏井 1950 元，挖水沟 1600 元，抬病号 2000 元（4 次），修球场 600 元，赴枣园挑西红柿出工 60 个，工资值 12000 元，挖厕所等未计算，即此给公家节省亦将近 3 万元了。

青年队的生产成绩很好，还没有妨碍工作的进行，其原因就是他们实行了集体生产和集体工作密切配合的劳动互助的办法。大的队员担任重劳动，如开荒、掘井……；小的队员担任打饭、打水、扫地……日常轻工作，只要参加集体劳动，均可按做工次数多少分配生产收入。

他们计工的办法是把一天分成上午、下午、晚饭后三个时间算一个工，来得过迟按半个工计算。于生产时间内，因工作经排长派去的，仍给计工，因此于生产时，大家能自动早到（惟恐去得迟时给算半工了）；于临时工作时，亦乐于去做（因同样算生产给计工的），大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另外行政上曾预借了一部分款项，给他们发了毛毯，他们为偿付这笔垫款，就不能不努力生产。

他们工作时间的登记是由班长、队长分别负责的，有流水和底帐两种，每于分配生产收入时，可相之对照，没有弄出错误，所以大家很高兴，没有发怨言。

（4）警卫排

警卫排的生产是采集体制的生产形式，即个人进行些生

产，也交给集体分配与消费。

警卫排的生产，也是以社会劳动为主要对象，该项收入为 67180 元，折合细粮 19.63 石；手工业生产如纺毛、做鞋赚工资 7100 元，合细粮 2.7 石；农业收入为 56350 元，合细粮 7.5 石，以上共收入 130630 元，合细粮 30 石，每人平均生产 0.9 石，超过任务 (0.27) 0.63 石 230%。

2. 个人生产方面：

(1) 袁治生同志。袁治生同志身体很好，他今年生产除参加集体生产以外，还同段同志合伙开荒地将近 2 亩（全部种白菜、萝卜、洋芋，约可收菜 4000 斤，合洋 12000 元）。另外还种西红柿 150 棵，收柿子 2500 个，合洋 2500 元，共收入 14500 元，平均每人得 7250 元，合米 0.96 石（每石 7500 元），超过生产任务 (0.27 石) 达 0.69 石之多，即超过任务 288%。

(2) 唐明同志。唐明同志到机关来时，机关附近可以开的土地都开过了，她和其他新来同志就在那满布荆棘的山坡上开了约 2 分多地，在住窑门口搞了半分土地，计种白菜半分，可收菜 100 多斤，合洋 300 元；萝卜可收 50 斤，合洋 150 元；西红柿 40 棵，收柿子 750 个，合洋 1000 多元；玉米 100 棵，可收 150 个，合洋 750 元，农业共收入 2950 元，合细米约 0.4 石。

手工业方面，她打毛衣 4 件，合洋 260 元，折米 0.087 石；缝衬衣 30 套，收工资 650 元，合米 0.3 石；裁衬衣 130 套，工资 260 元；裁衬裤 50 件，工资 100 元，共 360 元，合米 0.08

石；做鞋 2 双，约 800 元，合米 0.16 石。手工业方面共收入 3037 元，合细米 0.627 石。以生产所得还节省衬衣一套。

以上共生产 5987 元，合米 1.027 石，还节省了一套衬衣。她超过生产任务 260%。

唐明同志自己生产解决了困难问题，把公家批准发给的被面又退给公家，这种作风是值得学习的。

另外唐明同志和黄威同志领导女同志给机关缝自给衬衣衬裤（长腿的）80 套，结实美观，给财厅缝 500 套，节省材料，工资还低，这种积极负责和创造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的。

(3) 刘永清同志。刘永清同志是警卫排战士，他被公认生产努力，成绩优异。生产还未开始，他听到今年是生产年，要做到丰衣足食，他还听人说，今年每人要完成 10 个南瓜的任务。他为了要响应这个号召，便开始找地开荒，除工作、学习和集体生产以外，他还挖地约三分，将生产产品交排长转给供给科的有白菜 20 斤，水萝卜 100 个，南瓜 20 个，此外自己还收获旱烟 30 棵。预计还能收南瓜 20 个。由此，可以看出他除参加集体的生产以外，还多生产了价值在 1035 元以上的生产品，交给公家了。

(4) 郭志谦同志。志谦是警卫排战士，个子不大，非常能吃苦的一个人，过去由城里到二十五里以外去搞柴，一次搞 105 斤，上午去，下午归，曾得到人们赞扬。

志谦同志今年生产，拟种些辣角、南瓜、洋芋，在警卫排他首先开地，先后共开大小地 5 块，约 5 亩。

志谦同志对别人生产非常欢迎，他找好的土地正在继续

开着，如果有人要来同他伙开，他也不拒绝，因此他的大小五块地除很小的那块自己种旱烟 10 棵外，其余山地二亩五分、河滩地二亩多、门前地三、四分尽是在他的生产热情下影响别人要来同他伙开的。

这只是他自己生产的情形。同时，他还参加所有警卫排集体的生产。

志谦同志对于产品的处理则很简单，就是尽数交给排上，大家吃用，或送到机关供给科了。

西北局调查组关于陕甘宁 边区土地和减租问题的研究*

(一九四三年)

(一) 边区有两种地区

边区约有 60% 的土地上已经经过了土地革命，这就是在内战时期把地主占有的土地无偿分配给了劳动农民，废除了各种债务，消灭了农民所受的各种封建剥削。（这种措施丝毫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种彻底的民主改革，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田”的主张）。

自从日本强盗侵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的土地纲领也改变成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政策。凡是在边区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方，仍旧保障分得了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上述的边区 60% 的土地），不许地主重新收回。

在未曾分配土地的地方，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不管他是地主或是劳动农民），不过地主所收的地租应当减轻，在减租之后，佃农还应当向地主交租；旧债的利息也应当减轻，减息之后债务人也应当向债主交息，这就是一面减租减息，一面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边区有约 40% 的土地都未曾分配过土

地，我们在这种地区所执行的就是上述的政策。这种地区占全边区 213 个区中的 81 个区，1238 个乡中的 468 个乡。它包括：

绥德分区的：米脂、葭县二个县；绥德、子洲县的一部分；清涧的一小部分。

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环县的一个区。

关中分区的：淳耀县；新正、新宁、赤水三县的一部分。

延属分区的：鄜县的大部分。

三边分区的：定边、盐池二县的一部分。

按人口来说，这种地区有边区人口的一半。

(二) 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土地和租佃关系。

在这种地区之内的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关系，过去大体上和大后方区域的绝大多数地区是一样的，保持着半封建的特点。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劳动农民出很重的地租向地主租进土地耕地。现在举个别地区为例：

镇原县全县 5448 户，38311 人，地 385410 亩；出租土地户 584 户，4752 人，地 146380 亩；大地主 26 户，即有地 81810 亩；佃户 1528 户，8236 人，地 2333 亩；佃户租入 57540 亩。这就是说：11% 户口的大小地主所〔占〕有 38% 的土地。大地主 26 户，即占有 22% 土地；28% 户口的佃农所〔占〕有 0.6% 的土地。

淳耀县的东区(即前同宣耀)，全县 2989 户，地 60423 亩；地主 129 户，有地约 43000 亩；佃户约 2500 户。这就是说，4% 户口地主有地 71%。绝大多数佃农户是没有土地的。

米脂县全县 17000 户，共地 162747 垄，有 50 垄以上土地者 403 户，共地 50000 垄；全佃农 4000 户，半佃农尚未计入。

从上边三县的材料可以看出，土地占有情况是极不平均的，劳动的农民无土地耕种，只得向有地的人租种。这些地方的地租过去一般是收获的 30%——50%，以 40% 多为最普遍？这是指的平年中地的产收获量，若是遇到荒歉，则因为地租是固定的（定租制），所以可以高达产量的 70%——80%。

此外，因为地租过重，大多数的佃农都是欠租的，据调查，有的一家佃户欠到 75 石的（米脂高庙山），这差不多是佃农十年的收获量，他是永世也还不清的。

关于边区农村中的地主过去怎样用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这里不必多说，今天大后方农村中的情况就是过去边区农村的写真。在这样绝大多数农民（他们是今天中国抗战和用生产来支持抗战的主力）遭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的情况下，如何能希望激发他们参加抗战和保卫祖国和参加民主政治管理国家的积极性？！

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主张，适当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动生产，充实抗战物质力量；一方面使地主也能生活下去。用这样政策团结境内各阶层，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一个“人民的战争”，保证抗战的胜利。

（三）边区减租的成绩

从抗战以后，特别是 1940 以后，边区在上述未经分配土

地的地区都推行过减租运动，边区政府在 1942 年底更颁布了一个《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了不同种类的租佃形式的减租交租方法和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方法，据去年冬的检查，在边区绝大多数区域是执行了这个条例。例如：

1. 减租。陇东的三个县共 114 个乡，真正减了租有统计的 73 个乡，只庆阳就减了 31323 石粮。

淳耀县的三区三乡原出地租 303.77 石，因歉收减免地租 258 石。该乡去年出公粮 55 石，减去租子即有公粮的四倍。

绥德分区有 80% 以上照条例减了租。估计全边区范围内的佃农去年少交给地主的地租占他们全收获之 15% 或者以上。在减租之后，政府又说服农民把应交地租都交给地主。

2. 免陈租。按边区的租佃条例，凡是 1939 年以前的陈租一律免掉，因为事实上农民没有力量交这笔陈租。这个规定极为农民所拥护，多数地主也是同意这个办法的。免掉陈租的数目是很大的，例如庆阳城里一个地方就免掉了 7800 多石（大），镇原县免掉了 2673 石，葭县螅镇五乡二行政村就免掉 1700 多石。绥米无统计，但数目一定很大。免陈租目下虽只是一个法律手续，然而它对解除农民若干年来的封建束缚，意义是很大的，许多农民说：“这一下子可好了，给子孙把好事作下了”。

3. 退粮。有少数地主在政府颁布过减租之后还用方法威胁利诱农民多交地租，后来有些农民见到各处减了租，要求把地主违法多收的地租退回来。这个要求是有充分法律根据的，但在大多数场合下，政府是说服农民不要求退的太多。

恐怕地主方面出不起。

4. 保障佃权。农民向地主租进土地本来有一定的使用权，而且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过去有些地主随意收回土地，往往使农民当时就无法生活，这样的结果是一方农民不肯好好培养地力提高收获量，一方地主可以借此要胁〔挟〕佃农不准减租。在边区租佃条例上，规定了在地主收回土地自耕及出典出卖，或佃农不交地租等等情况下才准收回租地，否则不能随便收回；地主收回租地在抗战期间应当顾及佃农的生活。这个规定是完全合理的，它并不侵犯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而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绪也大大提高了。这个规定在边区内是一律执行了。

由于上面这些措施，减轻了上述地区农民所受封建剥削，农民有的粮食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他们又都组织起来了，所以结果是：

1. 农民生产情绪大大提高。许多地方在减租之后，农民就自动进行生产动员，组织劳动互助。佃权有了保障，农民自动的修地，开荒，多施肥，有的说：“现在再不好好生产，真对不起政府”。边区的经验证明，若不减轻农民的封建剥削，是不能很好的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战时粮食供应的。

2. 乡村的各方工作都进步了。农民有了组织，延安属分区的鄜县的大部分，抗战自卫，防奸和保卫边区都积极了。

3. 农村的各个阶层地主与农民之间比从前更加团结了，许多地主觉得在抗战期间应当减轻一些地租，是同意减租政策的，事实上在减租之后地主所收的地租生活仍有余，而且

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之后，地主的地租也有了保证（若是土地不收，地主也是无法收到地租）。少数地主不满意减租，想种种方法破坏政府减租法令，但是在农民群众起来要求减租之后，也只好照减。政府在这时的立场是调节各阶层的关系，一方要地主减租，一方又要农民交租；一方要保护农民的佃权，一方保护地主的地权，使各阶层都能生活下去。

（四）边区的减租政策是有全国意义的

在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即建议国民党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不过现在除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以外，各地农村的现象是土地更加集中，租息更为加重。国民党所遇到的兵役困难，农村生产萎缩，危机，各层政治机构的腐败，其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不肯执行共产党所提议孙中山所主张的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

为了使得中国能在反攻日寇中起它的作用，必须动员起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要使他们成为自觉的、积极的民族战士，必须要他们能过着起码的像人样的生活。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若是不接受边区的经验进行减租减息，改善民生的政策，是不会组织一个全国范围的真正的对日反攻的。

（其它方面的详细材料公见《边区减租运动研究》小册子中）

